



帝国史译丛 齐世荣 主编

# 德意志帝国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8

[德]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 著

邢来顺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帝国史译丛 ②

德意志帝国

莫卧儿帝国

拿破仑帝国

罗马帝国

饱受分裂之苦，不甘于忍受欧洲强邻欺凌的德意志人苦苦探寻民族崛起的光明大道。19世纪60年代开始，通过所向披靡的三次王朝战争，普鲁士邦完成了统一德国的历史使命。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完全改变了当时欧洲的国际政治格局，到20世纪初，它不仅拥有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成了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呼风唤雨的角色。但基于保守派操控的现代化改革，使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要同步性难以实现。而这种不正常的现代化积累的诸多问题无法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最终压垮了这个雄霸一时的帝国。

几乎毋庸赘言，韦勒具备诸种学识、理论素养、深刻洞察力，他充分自信且全身心投入，这样一位作者推出的著作可谓“意义非凡”、入木三分、思想丰富、独具见解、不落俗套。同样，该书批判性地看待德意志帝国的开端和它的各种后果，介绍了各种重要的看法，也揭示了诸种新问题……以罕见的集控诉人和法官于一身的敏锐的法学家的方式，将德意志帝国置于被告席上这就是新的批判理论。

——德国当代著名史学家、传统史学派代表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教授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是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本书一反以时间为顺序、事件为描述核心的传统叙事史写作方式，转而以主题为观察视角，突出对问题进行结构性分析，在写作中整合了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甚至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尽管这些尝试并非无可挑剔，但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邢来顺

ISBN 978-7-225-03315-0



定价：36.00 元



帝国史译丛 齐世荣 主编

# 德意志帝国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8

原书名：德意志帝国1871-1918

[德]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 著

邢来顺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 西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意志帝国 / (德) 韦勒著; 邢来顺译.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9. 1  
(帝国史译丛 / 齐世荣主编)  
ISBN 978-7-225-03315-0

I. 德… II. ①韦…②邢… III. 德意志帝国-历史  
IV. K51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8923 号

德意志帝国

[德]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 著

邢来顺 译

出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 行 :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0971) 6143426  
发行部 (0971) 6143516 6123221  
印刷: 青海西宁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25-03315-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 《帝国史译丛》总序

青海人民出版社邀请一些专家，翻译出版《帝国史译丛》，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出现过并至今存在着一些帝国，它们大都统治广大的地区和人口，具有称霸的野心和力量，并由一个皇帝作为最高的统治者。但“皇帝”之外，帝国最高统治者还有“元首”、“哈里发”等其他称号，<sup>[1]</sup>甚至有些共和国因其霸权地位也自居或被人们称做帝国。例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就公开叫嚣前苏联是“邪恶的帝国”；而美国自己也在正反两种意义上也被人称做“美利坚帝国”、“自由帝国”、“新罗马帝国”等等。帝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体，不论我们对它们采取何种态度，都有研究的必要，总结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可供今天的治国者参考和借鉴。由于认识上的分歧，要想给“帝国”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以“帝国”作为称号的国家实际上有各种类型，如以时代划分，则古代的奴隶制帝国、封建帝国与近现代的资本主义帝国有很大的区别，而某些衰落的封建帝国已失去昔日的力量和光辉，徒有虚名，实际上已沦为资本主义帝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本序言的有限篇幅内，不可能对这些既大而又复杂的问题进行讨论，只能就帝国的最一般特征略加讨论而已。帝国都是通过一连串战争和兼并而建立起来的庞大国家，其中包括母国和众多被征服、被奴役的民族。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征服者对被征服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征服以后又对被征服者实行政治上的高压和经济上的剥削。罗马帝国在每次战争胜利后，都把俘虏的士兵和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变卖为奴隶。罗马奴隶主残酷剥削奴隶，力图在最短时间从奴隶身上榨取尽量多的利润。罗马法明确指出“奴隶不是人”，“是另一种牲畜”。蒙古大军所到之处，烧杀劫掠，动辄“屠城”。成吉思汗对他的将领说：“人生最大的乐事莫过于战胜和杀尽敌人，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乘其骏马，纳其妻妾”。1258年蒙古军队攻陷巴格达后，屠城7日之久，数十万居民死于非命。葡萄牙人在建立东方帝国的过程中，于1510年攻占果阿，处死了城内所有的阿拉伯男子、妇女和儿童。西班牙征服秘鲁、墨西哥后，开办银矿，征发印第安人从事奴隶般的采矿劳动，印第安人成批地死去。据估计，整个拉丁美洲在1500年有土著人口4 000万，到1650年就



1  
PDF



只剩下1 200万人了。印第安人的成堆白骨换来了大量金银流向西班牙。1500~1650年间从美洲流入西班牙帝国的白银多达16 000吨，黄金180吨。西方殖民者在16~19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给非洲大陆造成了极其深重的灾难。1666~1776年英国奴隶商向英、法、西三国殖民地输入了300万奴隶，另有25万人死于海运途中。马克思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sup>[2]</sup>

但是，在一些大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战争除具有破坏性的作用外，还具有对闭塞状态的突破性作用。亚历山大远征给东方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但客观上也使希腊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得以接触、交流和融会，是人类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过程的一个环节。蒙古的征服运动严重破坏了许多国家的生产，杀戮了无数人民。但征服的后果也促进了东西交通与文化交流。蒙古帝国建立后，东西交通畅通无阻，各地商人、使臣、僧侣、旅行家来往十分频繁。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入西亚，进而传入欧洲的。西方各地人士东来，也把拜占廷、阿拉伯文明带到东方。大英帝国征服印度后，毁灭了印度的文明，但也开始了重建工作。马克思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英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sup>[3]</sup>

一些大帝国在其存在期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卓有建树，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例如，罗马在司法方面建立了严密的体系，对私人（不包括奴隶）权益的保障有详细、明确的规定，确立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法律地位，因而能为后世资产阶级所利用，拿破仑制定的《法国民法典》就处处以罗马法为蓝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巴格达为中心，往西经开罗和科尔多瓦传播到北非和整个欧洲；往东传到中亚、印度和东南亚，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天文学、数学、医学、地理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拿破仑帝国曾经称霸欧洲，拿破仑所进行的一些著名战役虽然在世界军事史上留下了范例，但他最引以自豪的还是在他主持下制定的《法国民法典》（1807年改称《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在法国第一次将涉及人身自由、财产权、个人之间的关系和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规则整理为成文的法律，尤其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sup>[4]</sup>后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在制定相关法典时，往往以它为范本。不列颠帝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大英帝国的领地遍及亚、非、欧、美、澳五大洲，号称“日不落帝国”。但大英帝国给人类历史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还是它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辉煌成就。英国是“议会之母”，自13世纪创立后又经过不断的改革，终于成为各国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圭臬。英国又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世界，引起了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英国还是“17世纪以来，全部现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sup>[5]</sup>

历史上也有一些大帝国，没有任何积极建树，只起了毁灭人类文明的消极作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在德军占领区残酷剥削当地人民，榨取了至少1 040亿马克（约合260亿美元）的贡金，掠夺的各国文物珍宝还不在于以上计算内。第三帝国还在占领区实行奴隶劳动制度。到1944年9月底，强迫运往德国的外国劳工已达750万人，另有700万劳工在自己的国家为德国的战时经济从事生产。大批劳工因缺衣缺食和超强度的劳动而死亡。最残酷的是第三帝国的种族灭绝政策，约600万犹太人遭到杀害。希特勒对德国人民也不放过，1945年3月他下达“焦土令”，要把所有德国的军事、工业、交通设备以及一切储备统统毁掉。他认为战争已经证明德意志民族是软弱的民族，战争以后留下来的人都是“劣等货”，优秀的人已经战死，因此没有必要给德意志民族留下一个维持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罪恶的第三帝国原来自命是“千年帝国”，但只存在了12年就被埋葬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战败国家被迫交出了殖民地。英、法老牌帝国主义实力大大削弱，已降为二等国家，面临汹涌澎湃的民族解放运动，虽欲保持原有的庞大殖民帝国已不可能，荷兰、比利时更不用说。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老殖民主义向新殖民主义的转化。新殖民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在不进行直接殖民统治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特别是通过经济手段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控制、干涉与掠夺的政策与活动，美、英、法等国是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主要国家。新殖民主义与老殖民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在形式与手段上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在研究“帝国”这种历史现象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把新殖民主义作为“新帝国”的一种表现形式加以研究。

以上用举例的方式说明了一些大帝国在历史上所起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最后，再谈一谈帝国的兴起与衰亡问题。任何大帝国的兴起，都有一个过程。它最初只是一个小国，甚至只是一个部落，首先实现了内部的统一，然后以此为基础向外发展、扩张。以阿拉伯帝国为例，穆罕默德在迁到麦地那后，建立了一个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穆斯林公社，在公社内部不分氏族部落，皆以兄弟相待并互相援助，禁止互相仇杀。成吉思汗首先完成了统一蒙古各部的大业，为蒙古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葡萄牙、



西班牙在欧洲最早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继之而起的荷兰也是先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然后建立起民族独立国家。18世纪英、法的崛起，仍然是从建立民族国家开始的。恩格斯指出，欧洲在中世纪晚期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之一，就是“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这种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就是“现代的欧洲民族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起来的基础。<sup>[6]</sup>帝国兴起的时候，统治者朝气蓬勃，励精图治，并富有创新精神，故能开疆拓土，极一时之盛。有为的继承人也都能做到兢兢业业，守成不坠，更有为者则能在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发展。

各大帝国衰亡的原因不一，但也有若干共同之处，这里只谈两点。

#### (一) 穷兵黩武，逞强称霸。

大帝国统治者的野心总是不会满足的。他们在征服了广大地区以后，还要继续扩张，称霸全球。但是占领的地盘越大，战线就会拉得越长，军费开支就会越来越大，以致兵力分散，财力枯竭。而且，压迫越大，反抗越强。例如，西班牙帝国卷入了连绵不断的战争：从15世纪末延续到16世纪中叶的意大利战争；16世纪上半叶与德国新教诸侯的战争；16世纪下半叶与英国的海战；同时又出兵干涉法国国内的宗教战争。整个16世纪，西班牙还与奥斯曼帝国不断发生冲突。17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又卷入30年战争而不能自拔。一场接一场的战争耗尽了国家的财力，流尽了国民的鲜血，西班牙帝国就在这些战争中走向衰落。又如，拿破仑在征服了大半个欧洲以后，还不满足，在1812年率大军远征俄国。他狂妄地估计，在3周之内可以速战速决，迫使俄国投降，但不料攻下莫斯科后，竟是一座空城。俄国拒绝议和。于是，拿破仑大军纪律涣散，又因战线太长得不到后勤供应，不得不狼狈逃回巴黎，大帝国从此开始瓦解。1941年希特勒进攻前苏联前，德军横扫欧洲大陆，所向无敌，也是骄狂到了极点。他认为苏联不堪一击，在冬季到来之前就可以结束战争。但结果恰恰相反，莫斯科会战中，德国陆军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以来第一次沉重打击，德国的闪电战破产了。德国一旦面临持久的东西两线作战，最终战败就不可避免了。日本以一个小小的岛国，强盛后野心恶性膨胀，竟把战线从中国大陆一直拉到太平洋上，焉能不败。总之，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帝国，不管它曾经多么强大，要想征服全世界，是绝对办不到的，是必然要灭亡的。我国古代兵书上说：“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在今天仍是至理名言。

#### (二) 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日趋腐败。

大帝国的统治阶级对征服地区横征暴敛，搜刮了大量财富，供其享乐。骄奢淫逸的生活使他们日益腐败堕落下去。罗马帝国的尼禄（公元54~68年在位）是历史上罕见的暴君。他不问政事，终日沉溺于声色犬马和宴庆





游赏之中。公元64年夏，罗马发生大火，大火之后，罗马留下一片废墟，尼禄竟抢先修建奢华的“金宫”。尼禄挥霍无度，很快使国库枯竭。面临财政危机，他增加苛捐杂税，并杀死一些元老贵族，没收他们的财产。尼禄的暴政造成民怨沸腾，众叛亲离，近卫军也不再听命于他，终于自杀。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的统治者，或荒淫无道，或庸懦无能，再也没有屋大维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了。香料、奴隶贸易和在东方、美洲的殖民地给葡萄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也起了很坏的腐蚀作用。劳动受到鄙视，好逸恶劳成为时尚。一向游手好闲的贵族拥向宫廷，捐一个闲差，便能领取丰厚的年俸。16世纪三四十年代，庞大的冗官冗员已使国家财政难以支持。奢靡之风盛行，购买外国货成为时尚，富人消费的服装、家具、艺术品、香水等全是进口货。早在16世纪就有葡萄牙人指出，东方的香料和珠宝不是拯救而是毁灭了葡萄牙。拿破仑是一世之雄，以革命起家，但在称帝以后，便大搞家天下，封其兄弟为王，并娶奥皇之女为皇后。拿破仑拜倒在正统主义面前，背叛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越来越丧失人心，腐蚀了国家的政治基础，这是拿破仑帝国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研究以往大帝国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的美国。美国是一个“帝国”吗？它能永远称霸吗？这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帝国”通常被作为贬义词。但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是“新帝国”、“自由帝国”、“新罗马帝国”种种说法骤然热闹起来，而且被当作褒义词使用。美国明明是一个共和国，为什么今天许多人又把它称作帝国呢？美国究竟是共和国，还是帝国呢？我认为，今天的美国无帝国之名，而有帝国之实。美国是一种新型的、有自己特点的帝国。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以后，杜鲁门就一再宣称：“美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后来在40多年时间里美苏争霸，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一直未能得逞。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它认为独霸世界的时机已经到来。为此，1992年1月，老布什总统声称：“美国已从西方的领袖变成世界的领袖”。1993年克林顿也说：“美国在世界上的领袖地位从来没有这样重要过”。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本是一个悲剧，但小布什政府利用这一事件变本加厉地推行霸权主义。在2002年9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政府公开宣称“不允许任何一个敌对军事强国崛起”，“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像在冷战时代一样挑战美国的力量”。2002年6月，布什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中还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可谓霸道到了极点。

美国作为一个“新帝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如假借自由、民主的名义，推销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解除对方的思想武装；打着“人道



主义”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通过经济全球化，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种种经济侵略，其中跨国公司是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主要机构；美国虽然没有正式的殖民地，但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它们实际上是美国的军事殖民地，等等。在上述手段之外，美国也和历史上的大帝国一样发动战争，如对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国的侵略战争。可以说，今天美国的帝国行为，其蛮横霸道的程度，打击范围的广阔，已经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一切大帝国。

美利坚帝国能像它的辩护士所宣传的那样永久存在下去吗？当然不能。有一种规律是新老帝国都无法违反的，那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大，反抗越强。罗马帝国、拿破仑帝国、第三帝国都因穷兵黩武、逞强称霸一一覆灭了。今天美利坚帝国妄图做世界霸主，到处树敌，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俄罗斯学者杰拉金指出：“2001年9月11日的惨剧完成了从苏联解体后开始的苏联后世界的形成过程。在长达十年时间里，人类已从两个国家的对抗转向本质上的另一种对抗——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和其他所有人的对抗。而且，越是在文化和经济发展上离美国越远的社会，这种对抗就越尖锐。”<sup>[7]</sup>美国学者约翰逊说：“像20世纪的其他帝国一样，美国选择了不是审慎地生活于和平和繁荣中，而是成为一个与愤怒、抵制的世界相违反的大规模军事帝国”，“我们发动的事业将把我们引向新版的猪湾惨败和最新的提速的越南战争情形的重演。”<sup>[8]</sup>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观点。一个国家站在全世界人民的对立面，不论它自居什么样的帝国，现在还有多么大的力量，难道能够长久保持下去，不走向衰落吗？

齐世荣

2005年12月

【注释】

- 6
- [1] 罗马帝国的创始者屋大维采用“元首”（*princeps civitatis*）的称号，意为罗马第一公民。直到公元284年，戴克里先才正式称“君主”（*dominus*）。阿拉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称“哈里发”（阿拉伯语继承人一词的音译）。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766页。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8页。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页、261页。
  - [7] 齐世荣主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
  - [8] [美]查默斯·约翰逊著，任晓等译：《帝国的悲哀·黩武主义、保密与共和国的终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2页。



## 译者前言

有幸接到青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德意志帝国》的约稿时，译者手边有几部关于德意志帝国史的德文原著可供选择。根据青海人民出版社提出的译著须符合“著名学者”、“学术性”、“思想性”、“名著”等条件，译者最后选择了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的《德意志帝国》一书。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1931年生，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把社会学方法用于历史研究的德国“比勒费尔德学派”的奠基者之一。曾在科隆大学、波恩大学和美国俄亥俄大学学习。1968年以后，先后在科隆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比勒费尔德大学任教，是美国哈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美国历史学会的荣誉会员。他的专长在于对德意志帝国史的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初至今，已经出版10多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著作，其主要著作有：《社会民主党与民族国家》（Sozialdemokratie und Nationalstaat）、《俾斯麦与帝国主义》（Bismarck und der Imperialismus）、《德意志帝国危机的根源》（Krisenherde des Kaiserreichs 1871—1918）、《现代化理论与历史》（Modernisierungstheorie und Geschichte）、《历史社会学与历史写作》（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 und Geschichtsschreibung. Studien zu Aufgaben und Traditionen deutsch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四卷本《德国社会史》（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民族主义：历史、形态和后果》（Nationalismus. Geschichte, Formen, Folgen）等，其中，1973年出版的《德意志帝国》（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8）是其代表作之一，多次再版，在德国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作为德国当代批判史学派的代表，韦勒在《德意志帝国》一书中支持“德意志独特道路”的观点，认为19世纪的德国只是实现了部分的现代化，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只是通过军事性的“上层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中，经济领域实现了现代化，而社会和政治领域却只是部分地具有现代性，或者说社会和政治现代化进程在德国落后于经济现代化进程。统一后的德国在政治上仍然保持着前工业社会的权力精英的独裁性统治。传



统的权力精英们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和利益，竭力维持各种反民主、反平等和反现代的价值体系、教育制度、官僚制度、政党制度和思想意识。统治集团的这种“防御性”行为使德国社会在发展进程中背上了沉重的历史负担。正是传统权力精英的这种政策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和纳粹统治的到来。他因此得出结论：德国激进法西斯主义及其战争政策，主要是1933年以前德国社会特殊条件的产物，“多数都可以在德意志帝国找到”。

韦勒认为，社会关系和政治的现代化应该从属于德国社会不断进行的经济现代化。德意志帝国的悲剧恰恰在于，基于保守派操控的局部现代化特征，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同步性直到最后也没有实现。而这种不正常的现代化积累的诸多问题无法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最终压垮了这个雄霸一时的帝国。

韦勒所著《德意志帝国》一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其一，诚如韦勒在前言中所言，《德意志帝国》一书打破了传统的叙事史写作方式，采用结构史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以期有新的突破。这种写作方式一反过去那种以时间为顺序、事件为描述核心的传统历史写作方式，转而以主题为观察视角，突出对问题进行结构性分析。其二，韦勒提倡“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的概念，主张在历史写作中要整合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甚至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以此研究社会的发展变化。《德意志帝国》一书明显带有这种研究方法的色彩。这两大特点使得人们在阅读《德意志帝国》一书时有耳目一新之感。与此同时，它也对读者提出了一些较高起点的要求，即必须对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必须具备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

2  
在成稿过程中，译者因多重压力而诚惶诚恐。一是德语水平有限，深恐不能准确理解原文的含义；二是语言驾驭能力有限，担心无法将冗长、思辩的原文转换成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简洁流畅的译文；三是专业水平不足，无法对韦勒在书中广泛采用的新的研究方法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做到心领神会，尤其在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等非历史专业领域的相关理论时，深感费力。此外，由于日常教学和行政事务过多，只能在繁杂的工作之余挤出零星时间进行翻译工作，难以对原文进行精心斟酌和仔细推敲。鉴于上述诸种因素，译稿中定然存在诸多的缺点和错误，在此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批评指正。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曾就有关拉丁文和法文请教过徐晓旭博士，在此



深表谢意。还要感谢青海人民出版社的齐宏亮先生为本书从联系版权到编辑出版所付出的各种辛劳。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爱人韦红教授在我翻译此书的过程中给予的各种关心和支持。

译者

2008年6月于武昌桂子山





## 前 言

以本人之见，今天要书写始于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历史，不能再用传统的叙事方式了。因为，倘若人们继续坚持19世纪以来德国历史写作中所采用的描写和叙述习惯，因循守旧地在居于主导地位的、秉持狭隘化的“那种”政治概念的行业传统内活动，在历史-社会科学诸领域之间仅仅囿于崇尚历史可说明的藩篱内，那么，对于距德意志帝国建立已经百年之久且试图对这一帝国进行批判性回顾的一本新著而言，就很难提出诸种合理的看法。这些看法集中于：将资料与诠释联系起来；追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线索，并且由此透视政治抉择进程；探询这种发展和抉择的条件和结果。然而，流传下来的历史性叙述在于按年月顺序来报告有关的叙事史，这不仅容易引发异议，而且与我们时代的分析性的历史好奇心背道而驰。出于这样一种困境的缘故，对于1871年到1918年近50年之中的德国社会及其政治，人们可以用问题定位的历史结构分析来发现一条正当合适的途径。

问题和结构因素的选择在此被视为中心，这种选择显然会由于认识能力主导的好奇心而得到确定。在此，有几个问题首先要指出来。它们是：

第一，要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德国近代历史的基本问题联系起来，要与对德意志充满灾难的、特别是始于这一时代的德意志特殊道路的阐释联系起来。因此，我们没有对西欧-北美的发展及其可比较的各种问题进行过于积极的描述，而一再地涉足探询德国历史的各种固有的精神负担，探询各种艰难的障碍。这些精神负担和障碍与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相对抗，或者说这些精神负担挡住了它的发展之路。我们要首先探询自由之后对于民主社会的顽固的和卓有成效的抵抗，一种在当时和后来都带来各种灾难性后果的抵抗。这种历史的负担在德意志帝国尤其变得日益沉重，没有对这种历史负担的批判性分析，迈向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灾难之路就无法得到澄清。除了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兴衰这一观察角度之外，人们对于近代的德国历史的评价非常少，因此，我们还是免不了要首先涉及这一问题。仅仅在德意志帝国终结12年以后，就面临着希特勒“夺权”。我们怎样



才能在没有历史广度的情况下，亦即不涉及德意志帝国历史的情况下，应自如地进行尝试性解释呢？

第二，第二点与问题的选择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此，历史科学被理解为一种批判性的社会科学，它虽然承载的是全方位考虑的历史的各种“时态结构”（R.科泽勒克），却首先想有意识地为增强一种自由、批判的社会意识而做出贡献。另外的说法是：历史科学既是对认知的探询，对各个时代经风历雨的历史上的活动者的还原，又是对另一种感知的探询，即在今天的各种理论视角下能够呈现诸多的历史活动。这两项任务历史学家都必须接受，而不是如后期的历史主义那样，仅仅局限于第一项任务。一种如此理解的历史科学所追求的不受束缚的任务在于，用思想批判的方式对带有传说色彩的迷障加以突破，解开公式化的误解，对遇到的各种结果或搁置诸种决定带来的社会代价给以明确的强调。对我们的生活实践而言，由此会扩大理性定位的机会，这些机会被包纳于一种谨慎检验过的历史经验的视野中。在这一意义上，*Historia Magistra Vitae*（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一词能够再度经受考验。站在身处集体中的民主的公民的立场上，我们还总是能感受到，德意志帝国也属于这样的历史之列。因此，抓出某些问题并加以评析的这种观点，对于读者而言应该不难理解。当然，这种暂时很一般性的概述只有通过问题的分析才能获得更清晰的轮廓。这个观点有别于那种认为历史“围绕它自己的意志”运动的奥秘学派，同样也有别于以当时的现状进行文雅辩解的当代新历史主义。

2

诸如时间的距离会自动开启各种观点，这些观点有利于找到一种确信无疑的评判，就是一种散布开来的错误看法。于是，历史写作的理论基础就自然时常地被描写成虚假的。但是，这种关于时间距离的说教只是掩盖了历史理论的必要性，同样，对过去进行阐释也已经相当落伍。事实情况在于，科学的当代史、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可以更少发生错觉。本著的总体表述存在一个坐标系统，在这一坐标系统中，将采取以下结构分析方式，它由三个相互交错的复合体构成：

第一，非均衡的、经常受阻碍的长期趋势之下持续不断的工业和农业经济的增长。

第二，整个社会的社会转型，社会团体和阶级，还有它们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伴随现象和后果。

第三，政治是维护或改变现行体制的优先考虑之下作为权力争夺斗争和社会各派力量现状的结果。同样，对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各种意识形态也



在这三角的范围内受到充分的肯定，这涉及到反犹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日耳曼主义或盎格鲁恐怖症。正如当代源自过去，过去也能在当代的帮助下，也即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类别和范式（如角色、状况、关系集团、个性类型等）的帮助下，加以解释。它们对于历史学的社会结构分析而言，也拥有一种相当高的普遍性，对适应时代的概念构建的合理使用，能够使这些理论工具得到启迪性利用而不至失去效用。

有关这些领域之一的优先性尚无任何提及。就逻辑上的必要性而言，事先也没能就此做出抉择：只有“从抽象提升到具体”，<sup>[1]</sup>从理论的定位模式提升到经验分析，才能既明确不同的重点，同时又明确这些复合体的相互独立之间的关联。但是，政治统治体制会有意识地处于核心地位。不仅如此，因为政治统治体制也是这套丛书（该著作是 Joachim Leuschner 主编的《德国史》丛书中的一本，该丛书侧重点是政治史。译者注）的原本目的。更确切地说，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进程在此相互交错，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尤其复杂多样。就此而言，前工业社会精英们反对新兴力量冲击而捍卫流传下来的统治地位就构成了我们所涉及到的一个中心问题——这是一种防御性斗争，这一斗争随着这一特权领导阶层经济基础的受侵蚀，不仅变得越来越明显，而且长期由于取得的成效而引发越来越危险的敌对，并积聚起了一个恶劣的继承者。

对于这一系列导入性观点，我们还有三点需要补充：关于“帝国建立”问题；1871年到1945年的连续性问题；以这一反面模式为价值尺度之一，评判历史进程。

其一，从个体和社会心理学出发，同时也是出于发展中国家当代历史的考虑，帝国开端时期的完全根本性意义在个人和集团的历史方面是众所周知的。在这一时期，人们常常调整日后发展的道路，打造行为典范，固定明确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同样，一些大型的社会集团，诸如各个民族等，特别是在革命时期或国家建立阶段，都打上了这种烙印，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也不例外。然后，在“各个邦之上形成”了由欧根·罗森施托克-许赛用隐喻所表达的“各种精神气候”，这些“精神气候”在各邦之上而一直长期“保存着”。<sup>[2]</sup>显而易见，在1866年到1879年新的德意志国家建立时期也有这样一种潜伏期的特征。在这一时期，许多事情被决定和确定下来，这些事情后来长期保持着。关于德意志帝国建立时期形势的根本性特征，我们会在第一部分中对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国家形成立即着手进行探讨；对在迈向工业社会进程中艰难而受到不断阻挠的道路，将以不固定的视角在随后的





三个部分中加以跟进。然而，我们对此必须毫不迟疑地进行一些基本的考虑。毋庸置疑，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工业化是推动现代世界的伟大运动力量之一，但是，问题在于，是不是有从（以及在）农业社会中获得过长期有效的前期性抉择，而这种前期性抉择从长时段看肯定对工业化的发展带有重要的影响。这种看法最近在巴林顿·穆尔的比较研究中很普遍，而在涉及到德意志国家疆界内的这种历史方面，汉斯·罗森贝格是最突出的代表。<sup>[3]</sup>首先要说的是：实际上，1866~1871年之后，德国也根据农业社会领导精英们的利益做出了一些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决定，这些决定最持久地决定着德意志国家疆界内工业社会的发展。的确，这一社会引人注目的不一致的好的部分和“摒弃”部分都可以归因于此。作为德意志帝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维护现状以反对一个工业国家中资产阶级的持续动员，这一难点一再成为主题。从总体上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试图对此进行完全正确的评判，即“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他们想加速或阻挠经济的发展以及这种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政治和法律后果，他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sup>[4]</sup>人们必须避免在经济方面仅仅从工业经济角度进行理解，毫无疑问，国家引导可以被理解为“经济上的必要性”以及衰落的农业经济的需求，而且还涉及到政治问题，即这种国家引导显然“在长时期内”绝对不会“听从”衰落。这种状况迄今仍然有效。

其二，有关近现代德国历史的连续性问题，其实是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目标的争论开始之后，才再次进行严肃的讨论。到那时为止，保守派历史学家们成功地封杀了自我批评性的讨论，人们仅仅想到通过格哈德·里特尔对德国军国主义讨论的扼杀，或想到对于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关于魏玛共和国垮台的剖析的本能性反应，通过与魏玛和希特勒德国的比较，来捍卫所谓的1914年以前的健康社会。稍加喘息之后，另外一些社会科学家也对1918年之后民族社会主义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进行了探究。如今，对于将历史连续性视为核心概念的历史科学而言，即使毫无疑问地存在多处断裂和新的开端，还是有些踌躇地在大量的保留之下使用这一范畴或者代之以非连续性的研究。导致这种畏惧不前的原因，大多涉及到一种或多或少的故意的或有明确理由的逃避现实。这种逃避现实会以所谓的德国历史的不合理的结果来排除民族社会主义的政治，而不是去承认



它首先是深深扎根于德国历史的连续性之中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并且切身感受到，民族国家、民族、工业社会的普遍危机的最常用的套语的功用在于，滥用与其他国家威胁性较小的有缺点的发展进行比较，来进行安慰性的辩解。毫无疑问，德国激进法西斯主义及其战争政策问题，无论对内对外都不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普遍性问题，“而首先是1933年以前德国社会特殊条件的产物。”<sup>[5]</sup>在这些条件中，如果并非所有的都很重要的话，多数都可以在德意志帝国找到，或作为其政策的结果而得到解释。诚然，人们可以理解的是：在老一辈那里，1871年的小德意志的大普鲁士的国家统一是民族愿望的实现；对很多人而言，1918年以后的批判性评价因此而变得几乎没有可能；1945年以后也存在一种强有力的心理需求，把皇帝的帝国统一时期理想化，并且将这一时期与1918年以后的“没落社会”，至少是与“第三帝国”清楚地切割开来。然而，这种态度的后果证明是灾难性的。今天，这种1871年到1945年的历史连续性——某些领域早就超出这个阶段——在一种批判性的回顾中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有关这种连续性的单个发展线索，特别是真正的“危机根源”，<sup>[6]</sup>我们会在下文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对于历史连续性讨论的顾虑，在过去和现在都与德国的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敌视和贫乏密切相关。没有对相邻社会科学理论的利用，是无法有效地战胜政治叙事史和一种几乎没有得到反射的历史的理解概念的。在政治上多数具有保守的或民族自由倾向的德国历史学家的传统态度，在1871年以后日益趋向于一种集体精神。这种集体精神在有效的容忍机械论和防御机械论的帮助下，阻止了“行业”内的不同意见，并否认这些不同意见是“科学的”历史观；他们在学术理论方面的保守立场，受益于社会保守派的基础，本来就特别强势。而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态度也阻碍了对新的研究探索的接纳。这两者相互强化的进程必然会造成一个结果，即在几十年中阻碍对德国历史连续性问题的批判性分析。仅仅顺便提到的是，它们也使大学历史学家们在反对民族社会主义方面毫无抵抗能力并造成他们几乎毫无障碍的适应。因此，对于1914年以前所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是1933年到1945年期间可以明显看到的。<sup>[7]</sup>

其三，对德国历史现实历史进程的批判性评价，是以下述见解为基础的，即社会关系和政治的现代化应该从属于德国社会不断进行的经济现代化。一种向法律上更加自由、政治上更负责任、更成熟的、拥有代表团体的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是与包括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制度改变以及社会变



化在内的工业化相适应的。而相关的代表团体的代表们对政治负有责任。1918年前的所有议会化和民主化问题都是与此有联系的。在1850年到1873年之间德国工业革命获得突破性进展后，德意志政治的真正任务就在于，将德国“有意识地、最终地引向现代发展的轨道，使它的政治状况与他的工业状况相适应”（F.恩格斯语）。然而，对“德国两个最强大的政治头脑”而言，这一点自1870年以来仅受到恩格斯的支持，俾斯麦则与之相反，他对此大加反对而结果糟糕。<sup>[8]</sup>为此，我们不应该从一种经济主义技术统治的观点出发，将工业化理解为独立的、仅仅是起决定性因素的发展速度，而应将其纳入社会政治的语境之中。在此，民主化也不是近乎自动的、只是带有某种“滞后”的工业化的追随结果，而是必须通过斗争获得，因为它最容易表述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结果之一以及与现代主义的政治思想相应的状态。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要同步性直到最后也没有实现。当然，是否这种同步性在那个时代的力量场之中基本上得到实现，还有待于更深入的探究。也许德国政治的真正困境在于社会敌对者的实际力量对比。一种保守势力领导下的局部性现代化在德意志帝国的护罩下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在社会和权力结构方面巨大的不一致性的代价却使相关结果延续到1945年。恰恰是这种缺乏自由的社会宪法和国家宪法的经济上取得辉煌成就的现代化积累了长期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和平演进的道路上是几乎无法解决的。正是因为这一点，而不仅仅是因为在国内变化面前进行逃跑冒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德意志帝国垮台了。决定其终结的发动战争、失败和革命是由于其无能造成的，也即在和平年代里，国家和社会结构没能适应现代工业国家的各种状况。





# 目 录

## 《帝国史译丛》总序

### 译者前言

### 前言

## 第一章 1871年的形势：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国家的建立 /1

- 一、农业革命与乡村贵族领导阶层 /2
- 二、工业革命和城市资产阶级 /5
- 三、国内政治：反动、自由主义和宪法冲突 /11
- 四、争霸战争与“上层革命” /14

## 第二章 向工业国家迈进 /23

- 一、1873~1895年，高度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工业增长的紊乱和结构性农业危机 /23
- 二、1895~1914年，工业的高度繁荣和受补贴的农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干预型国家的崛起 /30

## 第三章 统治体制和政治 /41

- 一、政治体制 /41
  - (一) 立宪君主制或假立宪的半专制主义? /41
  - (二) 到1890年为止的波拿巴式独裁统治 /45
  - (三) 1890年之后的持续性国家危机：没有协调的独裁性多头统治 /51
  - (四) 官僚制度：统治要素和组织类型 /55
- 二、中心问题：捍卫现状反对政治动员 /60
  - (一) 软弱无力的政党 /61
    1. 自由党 /62





- 2.中央党 /65
- 3.保守党 /67
- 4.社会民主党 /69
- (二) 利益协会进入国家政治生活：反民主的多元主义及其反对者 /72
- (三) “否定性整合”的统治伎俩：“帝国的敌人”反对“帝国的朋友” /78
- (四) “国家维护者和生产者阶层结成卡特尔”的集结政策（1876~1918年） /82
- 三、整合谋略和对民主的结构性敌视 /86
  - (一) 国家思想和特别立法 /87
  - (二) 民族主义和敌人的固定化 /88
  - (三) 反犹主义和对少数派的政策 /91
  - (四) 宗教作为一种合法性意识形态 /98
    - 1.新教国家教会：王位与圣坛 /98
    - 2.罗马天主教：等级思想及其独占诉求 /100
  - (五) 独裁性社会的母体：社会化过程及其控制 /102
    - 1.家庭 /103
    - 2.公立学校 /104
    - 3.文科中学 /106
    - 4.大学 /108
    - 5.大学生联合会和预备军官制度 /110
  - (六) 冲突处理 /111
    - 1.阶级特性的司法 /111
    - 2.臣仆精神 /112
    - 3.无冲突社会的理想 /113
  - (七) 以确保忠诚为目的的补偿性支付 /114
    - 1.社会保险取代社会改革 /115
    - 2.补偿性的追求威望的政策 /119
- 四、税收和财政政策 /120
  - (一) 统治制度的资金筹措 /121
  - (二) 国民收入的分配 /125
  - (三) 分配不均的强化 /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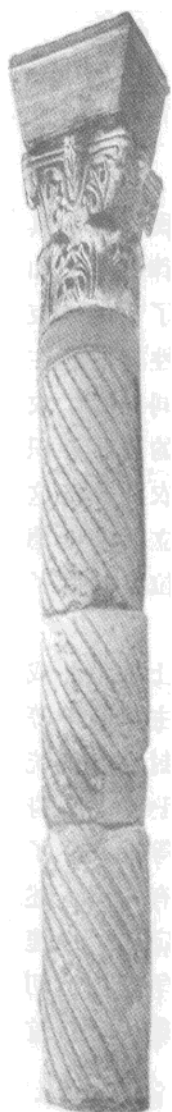


- 五、军备政策 /127
    - (一) 军队 /128
    - (二) 军国主义 /136
      - 1. 军队是对内进行斗争的工具 /138
      - 2. 社会构成和行为控制 /139
      - 3. “小资产阶级的军国主义思想动员” /143
    - (三) 海军 /144
  - 六、帝国主义 /151
    - (一) 不均衡的增长和政治统治的合法化：社会帝国主义 /152
    - (二) 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是国内政策 /155
    - (三)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泛日耳曼主义的帝国主义思想 /159
  - 七、对外政策 /161
    - (一) 国际体系中的德国对外政策 /161
    - (二) “国内政策优先”之下的对外政策 /164
      - 1. 法国 /164
      - 2. 英国 /167
      - 3. 俄国 /168
  - 八、第一次世界大战：向前逃跑 /171
    - (一) 攻击性的防御政策 /172
    - (二) 战争经费筹集和战争经济 /179
    - (三) 战争目标和阶级社会 /186
    - (四) 最后一次“上层革命” /191
    - (五) 德国革命：社会民主还是保守性的共和？ /199
- 第四章 结 语 /209
- 附 录 /221
- 一、缩写 /221
  - 二、注释 /223
  - 三、文献目录 /242
  - 四、人名索引 /262





## 第 1 章



### 1871 年的形势： 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国家的建立

1871 年的德意志帝国在欧洲民族国家中具有独特性。它不仅是普鲁士通过军事“上层革命”在 6 年之内进行三次战争的结果，而且正好建立于德国完成农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出现突破的时代。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社会-经济的彻底变革与中部欧洲的一种国家新格局的内外后果密切相关。这里涉及到真正的、在历史上对国家制度具有重要影响的问题，而非首先是一个“迟到的”或“未完成的”民族国家的危机问题。所有这些变化中，每一种变化本身都会带来许多问题，然而，它们在一起时又会创造出种种出乎常规的复杂性。早在 60 年以前，美国社会学家索尔斯坦·维布伦就已经对于这一时期的基本结构做了极具洞察力的描述：1867 至 1871 年间的德国社会仅仅在制度上有部分改变，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传统的、完全处于前工业社会精英们统治下的社会。当时，西方最先进的技术以无可比拟的速度闯入了这一社会并使之出现了加速性变化。这一传统社会的代表们对于此后 50 年里这种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转变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他们的对手又如何应对？





这些就是德意志帝国史要述及的中心主题。对此，我们可以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总体解释范式出发，也就是说，在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转变中，工业革命的“大冲刺”越快、越彻底，它的各种作用和带来的问题就越复杂、越广泛。一方面，德国在承接英国和西欧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因素时，肯定会享受“落后的优势”，而另一方面，经济革命的显著成就也会直接带来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代价，即各种尖锐化的社会问题。<sup>[1]</sup> 如何来尝试着解决这些问题？从短期的或长远的眼光看，这种转变的代价将落到谁的身上？而谁又从中获益？从根本上看，当时这些问题带来的结果又意味着什么？人们在回顾这些问题时该进行怎样的评价？

从上文列出的基本问题出发，人们首先必须了解德国的农业经济、工业以及普鲁士-德国的对内政策等最具影响力的因素。

## 一、农业革命与乡村贵族领导阶层

在德国，开始于18世纪末的农业革命通常隐藏于“解放农民”这一具有欺骗性的概念的后面。在1807~1811年之后，这一革命由于法律改革而加速，并且经过1840~1847年直到1876年的长期高度繁荣后进入了它的结束阶段。农业革命的后果就是农业经济的结构转变，这种结构性转变还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和促进。这种转变与现代化、合理化等措施共同导致了农业领域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大权在握的传统土地贵族精英们的自我意识和力量感因为这次农业最后繁荣的峰巅也再次上升。从繁荣的农业经济这一表面上稳定的经济基础出发，土地贵族介入了德意志帝国建立时期的德国内部冲突，并加强了这一集团在历史上就已经确定的领导地位，战胜了下一场工业革命中的敌对的资产阶级代表。

自18到19世纪之交以来，大量的新法规已经逐渐地在形式上取消，或减少了以往封建领主制、庄园制、领主审判权、农奴制以及宗主权制等等在经济和法律支配特权方面的关系和限制。换言之，那种源自封建人身统治结构时代、基于土地权之上的各种领主特权（地产、徭役和租金）、人身权利（农奴制，或者说世代依附农）以及冲突调解（司法权）等都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农村人口中不少非正式的依赖性还没有取消，有一些上述相关的特权就已经废除了。这一长期转变过程是由多个目标决定的。加速这一进程的直接动力源自于拿破仑战争的艰难困境。赔款和战争费用迫切要求增加国家收入，而这只能通过一种由上层加以控制的经济现代化，首





先要通过农业的现代化才能达到。为了促进收入和利润的最大化，农业就要采取竞争经济方式加以改组。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希望通过释放劳动能量，刺激获取赢利和提高生产效率等，取得最大的好处。与此同时，以下想法也产生了影响，即如果德意志各个大邦，特别是普鲁士，要想在各列强的竞争中有望获得成功，那么从根本上讲，现代化是其中绝对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最具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即土地贵族的立场而言，违反他们意志的农业法律是绝对不可能起草的。因此新的法律给了他们更多的好处：农民保护废除了，各种令人讨厌的强制义务摆脱了，雇佣劳动制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可直接支配的地产扩大了。在此，晚期专制主义国家通过资助性的信贷机构以及各种税收优惠给它的“国家支柱”阶层以力所能及的帮助。与此同时，到 1850 年为止，没有受到资助的农民们则必须通过支付现金和割让土地的方式，高价从领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否则他们就无法获得解放。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在有损农民地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这种情况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尤其突出。1811 年到 1890 年间，庄园地产面积扩大了 2/3！当然，这主要得益于农业耕作方式和合理化的推动。它不仅表明能够承受养活迅速增加的国内人口，而且也有能力引导更多的农产品进入不对等的、较为有利可图的出口贸易，特别是在 1846 年谷物关税取消以后对英国的出口。对于农业领域这些以出口为目标的大生产者而言，自由贸易显然是一种最理想的对外贸易政策。与此相反，“在这一封建集团看来，保护关税则是他们所反对的城市资产阶级的一项错误政策”。<sup>[2]</sup>

人们不仅从农产品的价格方面可以看到自 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以来出现的农业繁荣，而且土地价格在 1875 年以前的 50 年间也上涨 3 倍。农业革命这种量的变化还可以从普鲁士可耕地的增长方面进一步看出。在 1816 年到 1866 年的半个世纪中，普鲁士的可耕地面积翻了一番，从总面积的 26.5% 上升到 51.4%。与此相对，不毛之地则从 40.3% 下降到 7.1%。在可耕地指数由 100 增加到 194 的情况下，收成则增长了 3 倍，而人口指数“仅仅”从 100 增加到 173。<sup>[3]</sup> 在供给和出口方面所取得的这种有目共睹的成就，是以跳跃式的生产发展为基础的。1840 年到 1876 年间，这种跳跃式的生产发展使大地主达到了“他们经济力量的顶峰”（H. 罗森贝格语）。一方面，他们的购买力由此得到了提升。农业社会市场对手工业和工业制造产品的接纳能力也因此提高了；另一方面，他们的储蓄也增加了。对于对资金有持续需求的农业而言，得益于出口生意而获得的资本积累显然大有好处。同时，由于私人财富的增长、源自对外贸易获得的财富以及全年税收的增加等方式，农



业经济极可能间接地为德国早期工业资本的形成做出贡献。现在只是还需要有灵活的股份公司法，以便在工业化进程中引导这些资本形成一股投资潮。

最后，得出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是，随着法律关系的质的变化，诸如从雇佣劳动向个人拥有地产的过渡，从仆役或完全的农奴向正式的独立自主的变迁，从徭役向工资劳动的转变，从强制性的仆役到特别是领主对农民结婚许可权的废除等，使得在德国的东北部直接出现了一个不再与土地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小农和雇农阶层的巨大增长。普鲁士人口从1815年到1840年增加了大约37%，1840年到1860年增加了26%，人口总数从2500万增加到3800万。由于传统职业领域新增工作岗位数量甚少，加之劳动力过剩引起的工资减少等原因，1850年之前就有数以十万计的德国人移居海外，1850年到1870年间的出境移民更是达到200万人。更多的人则进入德国早期工业的集结中心和手工业地区。这些人成为移动的产业后备大军。他们满足了工厂企业在专业技术工人之外不断增长的对非熟练工人的需求。因此，人口的增加、消费的增长、资本的积聚、城市化和早期的国内人口流动等，都与农业革命有着一种紧密的功能联系。在这一意义上，德国农业革命的结果实际上属于德国工业革命的前提。

只是在受到1848年革命的打击之后，对于旧的封建法律规定的强制义务的豁免才结束。在1811年到1848年间，普鲁士有大约7万农民通过割让土地的方式获得了解放，另有大约17万农民通过交付现金的方式获得了自由。但是，在1850到1865年间，就有64万农民赎回了他们630万个徭役日和2340万个手工劳役日。在此以前，只有大地产所有者才能动用“Landschaften”[在此指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的典契会（Pfandbriefinstitute）。它是由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建立起来的帮助贵族的信贷机构，贵族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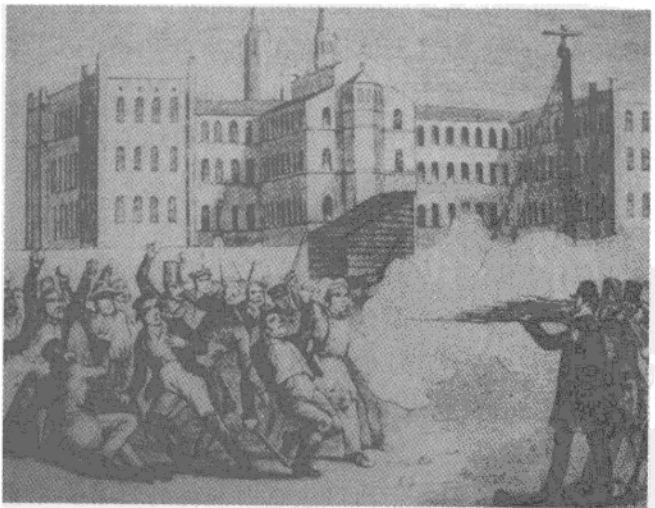


图1 1848年10月16日国民军在柏林射杀起义的工人



过抵押契约获得贷款。译者注]，现在，农民则可以得到新的国家地产抵押银行的帮助。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地产抵押银行也由于农民的赎免金而大大增加了大地产所有者的流动资本。从1807年起，由于法律变动的结果，土地所有者由“世袭贵族阶层”转变成了“可随意转买地产的属于拥有资本的流动经济阶级，地产经营者和雇主的特权贵族”。但是，旧的贵族核心阶层继续构成“同样孤傲闭塞的封建职业阶层”，他们在1849年以后仍然原封不动享受着国家帮助的特权。1852年，普鲁士政府通过了新的产业受益权法；1853年，普鲁士议会上院变成了贵族的独享领地；同年，有关地方管理自治的开始又继续被推后40年；1856年，庄园领主的警察法继续生效。这一年，符合被推荐进入地方和县议会条件、拥有大约500公顷地产的庄园者有12 339人，其中拥有5 000公顷以上大地产者7 023人，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贵族。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种“土地贵族向现代农业经济者的转变”是逐渐地、悄然进行的。1885年，东普鲁士的庄园中，在同一个家族手中长达50年者只占13%。然而，正如土地贵族、贵族军官和贵族官僚等精英阶层在经济问题上捍卫他们的利益一样，他们也激烈地并且竭尽所能地捍卫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特权。到1861年为止，骑士庄园仍完全免征土地税；到1879年为止，农产品的出口仍实行自由贸易。<sup>[4]</sup> 贵族们还享受着直接与作为正式决策中心的宫廷打交道的权力。由于拥有不受威胁的支配地位，他们在1848年革命以后仍控制着政府各部、外交和军队等上层位置，掌握着国家的“三大支柱”，而这些最重要的工具则成了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力杠杆。如果没有这一种农业革命的经济基础，传统贵族要守住他们的这种统治地位是难以想象的。由于经济上成就不凡，尽管受到了1848年革命的冲击，土地贵族阶层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仍然相当安全，并由此进入了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军事国家以及俾斯麦政策的辉煌成就也惠及前工业社会精英们。这些精英们现在繁荣兴旺，仍具权力和威望，他们在1848年革命时的怀疑也消除了。只是在工业经济领域，他们才给资产阶级腾出一席之地。

## 二、工业革命和城市资产阶级

正如在农业经济领域一样，德国早期工业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然发展。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有意识的采取现代化措施的结果。在1807年到1815年这段重大转折时期（1807年到1815年期间，普鲁士在施泰





因、哈登贝格等人的领导下进行各项改革并打败拿破仑军队。译者注)之后,普鲁士国家领导集团自觉坚持相关主张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由于拥有现代化的机器、长期的定单、销路保障等,国家建立的模范企业,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由国家资助的企业,从一开始就成为重要的促进动力。在逐渐壮大的年轻私人企业的海洋中,这些国家资助的企业构成了计划经济的零星岛屿。19世纪40年代初,德国工业增长率首次出现高涨。但是,由于1845年到1847年间农业和手工业的危机、1848~1849年革命以及到1850年为止的战后萧条,人们可以确定,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德国工业革命才出现突破。按照传统的语义用法,在这里,革命一词的含义被理解成一种激烈的、快速的、短暂的过程,而非像一些流行的文章瞎掰的那样,用持续的工业革命代替工业化,将工业革命理解成一种持续一百多年的发展。因此,对于一个如此重要的发展时期进行分期的问题显得特别迫切。我们需要确定一些什么样的标准,以便能够突出工业革命这种“特别压缩的工业化进程”转入从无可争议的工业化持续性出发的“迅速增长阶段”(格申克龙语)?<sup>[5]</sup>

经济是一种社会的相互作用过程。因此,德国的生产资料是否能够如此投入和利用,以至形成工业资本主义的特例,是由各种社会准则来决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规则允许实行现代的技术和工厂生产。基础技术的进步,如力学机械取代人的技巧和人力,机械工具加工材料的改进,等等,都蕴含一种潜在的革命性动力,这种动力只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会释放出来。这些社会准则也决定了:在经营之中,政治统治体制是否被仿效以及由于国家的许可而使蒙昧的专制主义被复制;企业是否成为纯粹的追逐经济经营之地;把富有经验的手工业的或科学的革新转化成持久的技术进步的心愿是否存在;是否允许招募产业工人并就新的工业劳动方法进行纪律训练,等等。甚至创立受训劳动力储备的这样一个关键过程,还有国内外市场的扩张和资本积累的推动,等等,任何一个地方,都只有得到作为社会结构一部分的国家的帮助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展。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重要的前提性条件,这里仅予涉及,它们将是前面各卷著述的内容。对于另外一些重要的然而又有些不甚清晰的提高工业化速度的条件,例如,企业主文化准则和社会威望的变化;发明的增加和技术本身的变化;资本和资本所有者受到法律特许,而长时间的工作却不被视为值得保护的所有物;冒险思想(连同报酬的获取)仅仅与资本而非工作岗位和人力的损耗有关;等等,我们在此不必做进一步的探讨。关于这类条件,



我们在此只能说，看来它们已经在 19 世纪中叶的德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此，对于这一时期德国加速具有决定性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有利的整体性社会条件，包括社会的、制度的和心理的前提条件或已经存在，或很快就会形成。

如果我们集中注意力于一种较窄意义上的经济标准，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经济增长研究的一致性和经济史作为我们的起点。据此，在工业经济方面（也就是除农业领域之外）至少存在三大核心进程：（1）社会生产总额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均收入的突然增长；（2）关键工业领域增长率的非同寻常的攀升 [见“kink in the curve”（曲线的纽结）中的图示：增长曲线的上升弯曲处（作者在此处可能是指 Gerschenkron 著作中的图表。译者注）；（3）国民经济净投资增长到社会生产净额的大约 10% 到 12%。

如果从这样一些预想出发，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德国的发展的视角得出如下看法。到 1850 年为止，不管是自然的发展还是有意识的规划，社会的变迁，法制的改革，制度的变化，尤其是仿效外国模式的经济增长，国家半心半意的鼓励以及政治上的长远目标等，所有这一切积聚起来，共同作用，形成了有利的起点。德国工业革命第一次力量强劲的繁荣浪潮是在 1857 年之前的年代。工业和（总体）经济的增长率迅速上升；投资和消费品的生产翻了一番；对外贸易扩大了 130%；估算的净投资率增加 8%，然后是 10%，甚至达到 12%，这一势头一直持续到 1873 年。关键性工业部门，包括炼铁、采矿和机器制造等，都出现了快速的发展。关税同盟区域内的生铁产值由 1848 年的 2 400 万马克增加到 1857 年的 6 600 万马克，增加了 250%；煤炭产值从 2 500 万马克增加到 6 200 万马克，增长了 138%；铁矿石和煤炭开采则从 4 500 万马克上升到了 13 500 万马克。而铁路建设则表明，它也是德国工业化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先导部门。从 1850 年到 1860 年，德国铁路线的长度从大约 6 000 公里增加到 11 500 公里。德国的机器制造业已经能够获得德国车皮和机车定单的最大份额（超过 2/3）。1858 年，柏林的波尔锡西机车制造厂出厂了第一千台机车。铁路建设这一先导部门产生的扩散性效应拉动了炼铁、煤炭、机器制造以及其他众多的相关产业的发展。普鲁士铁路部门的货物运输就增加了 6 倍。

但是，1857 年到 1859 年，德国受到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发展进程被打断。此后，德国经济好转，恢复景气，一直持续到 1866 年的短期经济衰退。然后是 1866 年到 1873 年间的持续扩张，直到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为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1866 年，德国的生铁产量为 100



万吨，1870年为150万吨，1873年已经达到220万吨；煤炭生产在1860到1870年间增长了114%，达到2600万吨（相当于法国产量的两倍！）。同期德国的铁路网也几乎翻了一倍，达到19500公里，紧接着，在1870年到1875年间又再次增加到28000公里。1850年到1870年间，德国铁路货物运输以“吨公里”计算增加21倍。作为交通部门的铁路一直是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先导部门，这一领域在三十年中领先狂奔，拉动其他工业部门跟随其后发展。

1850年到1860年间，德国每个工人的年生产效率提升了8.5%，但是，在1860年到1870年间，得益于技术装备的改进，这种年生产效率提升到了42%。19世纪50年代，由于最重要消费品的价格显著上涨（从1850年到1855年，土豆价格上涨了125%，黑麦价格上涨了150%，小麦价格上涨了100%！），名义工资的增长并没有导致实际工资的持续增加。但是，从1866年到1873年，生活费用的上涨没有赶上工资的增长，以至实际工资终于使受雇阶层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sup>[6]</sup>

19世纪60年代，年轻的工人阶级继续他们的以往的社团传统，开始组织政党和早期工会。在短暂的相互敌对后，拉萨尔的工人联合会（即1863年在莱比锡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译者注）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爱森纳赫党（即1869年在爱森纳赫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译者注）于1875年在哥达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这一政党中，马克思的解放和斗争理论逐渐获得了承认。因此，到德国工业革命结束时，工人阶级有了一个政治代表。这一代表在原则上要求所有的阶级同胞团结起来，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政治和社会冲突。此前，由于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已经发生了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决裂。到那时为止，受惠于经济的繁荣，工人们在不断增加的罢工的帮助下，在劳动纠纷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1864年到1873年，共发生903起罢工，其中1871年有188起，1872年有215起，1873年甚至达到255起。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的头三年中就总共发生了631次罢工！这里也向人们展示了在国民生产的分配以及实现平等方面的现代冲突模式。在1848年革命以后，拥有财产和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曾称呼这种冲突为“红色幽灵”，现在则在很大程度上视之作为一种威胁性的社会革命的不祥之兆。

如果将英国工业革命视为经典模式，那么，由于德国没有产生相同的模式，它的工业革命就必须找到替代英国最初成就的解决办法。就像在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一样，19世纪50和60年代形成的一些德国的大银行就



承担了资本财富的代理功能。从一开始，这些大银行就兼具了在英国通常要分开的两项功能：储蓄银行和向工业提供长期资金。作为全方位经营的银行，由于用发行股票的方式动员投资资本并引导之进入工业领域，它们因此而变成了“德国工业化的战略因素”（格申克龙语）。它们协调建立新的重工业；它们在一定意义上是私人经济的计划者，因此不久便控制了一些重要经济部门，帮助加速克服德国的相对落后性。与此同时，它们在早期的银行集中过程中，共同结成金融寡头，形成了强大的寡头政治。它们还通过大银行的“普鲁士财团”来调节国家贷款，并因此在一种相当大的程度上参与决定着德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进程。在这方面，从19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主要是由所谓的D字开头的银行（贴现公司、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达姆施塔特银行）来定调的。这就是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有关德国“金融资本”的概念是以这一事实为根据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从长远的眼光看来，教育事业的持续有力的扩张使德国进一步弥补了英国富于创造力的技术进步。这种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德国拥有了规模惊人的“人力资本”。当然，德国的文科中学和综合性大学仍然受到贵族式的人文主义教育原则的束缚，在这种教育原则下，毕业的学生不是



图2 1870年成立的德意志银行总裁格奥尔格·冯·西门子

直接为日常经济斗争准备的。然而，尽管如此，德国教育事业很快就形成了国民经济学或者社会科学（经济和法学）与工业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对此，人们要感谢诸如翁鲁、汉马赫尔、米克威尔 [约翰内斯·冯·米克威尔（1828~1901年），1890~1901年担任普鲁士财政大臣。译者注] 和班贝格尔等许多人。而且自从19世纪20年代以来，德意志的一些大邦建立了技术和工程科学学校以及技术学校。1821年，柏林成立了博伊特工艺研究所；1825年、1827年和1832年，卡尔斯鲁厄、慕尼黑和斯图加特等地仿照法国，先后建立了综合技



术学校；德累斯顿于1828年建立了技术教育学校。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介绍手工业技艺的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这些学校培养了许多的专家和技术骨干，这些人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对德国的工业化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尽管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科学转化为第一生产力、教育投资以及教育影响的详细情况知之甚少，有计划的科学评估已经强烈表现出来。到19世纪90年代这一分水岭为止，基于技术创新之上的工业经济的增长进程，在事实上是以科学思想的实践性应用为基础的，而且这种倾向越来越强。

关税同盟创造了到1871年为止缺少的德国民族市场，在这方面，它至少可以与英国的对外贸易相比较。这一同盟由1819年到1918年的一百年间形成的双边和多边条约构成。尽管它经常被高估，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对德国的成功工业化而言，也绝不能被视为可有可无的前提条件。在1871年前，对于各成员邦而言，关税同盟由于收入的增加和管理费用的下降，在财政上已经成了赚钱的企业。关税同盟还通过了货币协议和新的贸易法规，促进了法制和货币的统一；它通过缔结有关的贸易条约，实现了对外关税保护、河流免税航行以及同盟内部的低关税。所有这些对经济的长期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刺激作用。毋庸置疑，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普鲁士作为领导力量，一直是关税同盟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早在1829年，一位法国外交官曾在慕尼黑言过其实地称之为“19世纪初改革以后最富意义的事件之一”；在这一“庞大的体系”中，普鲁士取得了无可比拟的地位。梅特涅也毫不怀疑地同意这一点，即关税同盟的十分重要的后果是“普鲁士的支配地位”。因为如今在德意志联盟 [德意志联盟 (Deutscher Bund)，旧译德意志联邦或德意志邦联，但是由于相关文件规定了该组织是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联合会 (ein völkerrechtlicher Verein)，各成员国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独立和不可伤害性，因此译为德意志联盟较为合适。译者注] 中出现了“一个并行的小联盟，从完全意义上讲，是一种国中之国，它很快就会习惯于首先用它的方式来追求它自己的目标”。<sup>[7]</sup>这就涉及到了问题的核心。维也纳从未认真地尝试过要粉碎这一威胁，但有两次曾试图闯入这一“并行的联盟”。一次是1848年革命后在布鲁克和施瓦岑贝格领导下，但是除了在1853年达成为期25年的贸易条约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成果；加入关税同盟的谈判则一直推迟到1860年。从根本上讲，柏林的这一经济政策的后果完全可以弥补普鲁士于1850年在奥尔缪茨所经历的外交挫折！众所周知的1862年普鲁士-法国商业条约确认了普鲁士的优势地位，此后，奥地利在雷希贝格领导下于1862年到1865年间与关税同盟第二次接近，但归于





失败。在此，哈布斯堡帝国不只是在商业政策上输掉了 1866~1871 年之前的竞争。由于自 1850 年以来，工业革命在普鲁士获得了全面突破，这一邦国已经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强劲动力以及在工业增长方面的倾斜性优势地位。因此，那些坚持反普鲁士以及大德意志道路的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的计划失败 10 年之后，把普鲁士视为德意志联盟两大敌对邦国中的真正的现代型国家，是不无道理的。但是，我们必须防止在关税同盟和 1871 年的德意志帝国之间构建一种不可避免的和直接的发展。当然，就新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较量而言，回旋余地是非常有限的。普鲁士已经成为工业国家的这种优势地位，仍然根据不充分，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可。但是，从历史的视角看，普鲁士在工业革命中出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跳跃，这种跳跃是一种持续扩张的经济体系的长期发展，这种异乎寻常的趋势就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尽管是不均衡的增长。

### 三、国内政治：反动、自由主义和宪法冲突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德国国内政治发展的主要承载者。这两大社会阶级中，资产阶级在 1848 年分享政治权力的争夺中失败。实际上，在整个德国，没有一个地方的资产阶级试图独享权力。这种失败带来的是一种休克性的后果。马克思所说的“第三个主要阶级”，<sup>[8]</sup>即土地所有者，尤其是土地贵族，再一次达到了目的。诚如赫尔曼·瓦格纳在欢庆容克地主统治的巩固时所指出的那样，19 世纪 50 年代通过的一些最重要的保守性法律，起到了稳定作用，完全打上了“胜利的反动的印记”。<sup>[9]</sup>但是，自此以后，有如平地起惊雷一般，手工业者陷入了躁动不安之中，早期的无产阶级也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德国陷入了群众性运动之中。于是，相关的保守性法律中推出了包含有家长式的针对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阶层的补偿性政策。出于迫不得已，统治集团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农民、手工业者、工人及其子女的社会救济措施。而 30 年以后，他们才又被迫做出了类似的让步。国内政治方面的镇压政策以及政府对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弊端的补救措施等，与迅速的经济自由化一起形成了奇特的对照。通过这种快速的经济自由化，注入工业之中并使资产阶级得到壮大的巨大能量被释放出来。在众所周知的 1848 年革命失败一段时间以后，1858 年开始了向普鲁士国王威廉领导下的所谓的自由主义政府路线的“新时代”转变。然而，虽然社会和政治方面参差不齐的工业资产阶级与“进步的”商人、绅士、手工业者、官员，简言之就是中等阶层



的各自由派集团，他们一道再次提出了政治上的要求，人们的期望只能在于经济上的巨大成就。围绕着普鲁士军队改革所形成的“宪法冲突”并非事先计划的结果，最终却演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议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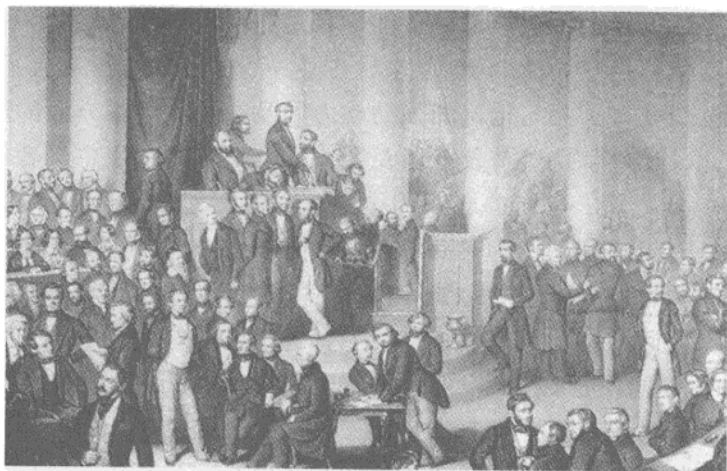


图3 1848年圣保罗教堂的全国代表大会

主义与晚期专制主义的独裁军事国家之间的一场新的全方位的力量检验。而资产阶级再次遭到了失败。因此，宪法冲突是普鲁士国内政治的第二次重大转折的标志，与此同时也是德国历史的重大转折性标志。此后，普鲁士吸纳了德国 2/3 的领土。宪法冲突的结果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直到 1918 年为止在政治上的软弱无力。

1860 年，当罗恩领导下的国防部提出的新军事法案，而该法案不仅仅限于实施已经采纳的技术性重组计划时，资产阶级的议会主义与晚期专制主义的独裁国家之间的对抗就开始了。更确切地说，法案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在三年期义务兵役制方面，在没有争议的范围内增加和平时期的军队力量，即将法律规定的三年制义务兵役制新招兵员由迄今为止的每年 40 000 人增加到 63 000 人，以便从社会的军事化角度应付国内治安问题；第二，大幅削减国民后备军以便加强常备军，而这将摧毁沙恩霍斯特和博伊恩的军事改革建立起来的真正的国民军队。虽然普鲁士邦议会批准了新增费用，但结果表明，国防部与议会中的老自由主义者多数派之间在服役时间以及国民后备军等问题上的对立是无法克服的。在这一点上，军事核心集团采取了老练的策略，将冲突置于两者选一的基础上，即国王的军队或者议会的军队。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现在，国王宣称这场军事改革是专制王权的事情，实际上是基于封建权利之上的最上层的“战争贵族”的君王的权力。根据宪法，它不受代议机构的任何控制。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法律调控的必要性。普鲁士军队打算用不加掩饰的方式来摆脱资产阶级议会的任何影响。从此以后，军队宪法的基本问题因此就成了武装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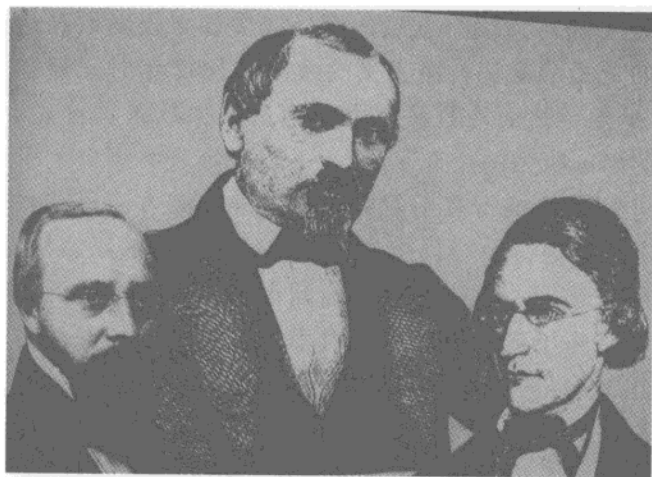


图4 进步党领导人菲尔绍、舒尔策-德里茨、莫姆森

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也就是说，国家宪法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军队早就看清了这一争论焦点，特别把职业士兵的精神置于国家统治的顶端而突然加以大肆宣染。在这一争吵中，议会中的老自由主义者多数派瓦解。新形成的“德意志进步党”在 1861 年 12 月选举后成

为普鲁士下院中最强大的议会党团。这一政党拥有大量的自由派官员。1862 年 3 月，由于在政府中占据了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自由派大臣因此遭到清除。议会提出了各种新的已经没有了火药味的妥协建议，但仍然遭到国王的拒绝。于是，1863 年的国家预算没有得到批准。国王已经开始考虑退位，他的儿子被视为自由派。因此，一时间，似乎议会多数派的胜利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是一件大事，一个对德国而言长期不能见到的结果。是要议会君主制，还是要公民投票的半专制政体，现在，两者之间的选择摆上了桌面。事实上，议会制度受到了阻止，而君主制在日后的数十年里也遭到了损伤。但是，通过公民表决方式使具有超凡魅力的专制者合法化，这样一份遗产仍然保存了下来。

1862 年，普鲁士军事国家的代表们既不考虑放弃也不愿意做出让步。1862 年秋天，在明显有意识地加剧危机的形势下，他们提出了极端保守派、极端君主主义、彻头彻尾的晚期专制主义派别的唯一候选人为普鲁士首相。这个人就是奥托·冯·俾斯麦。对于俾斯麦，普王早在 1848 年时就充满不祥预兆地预言，只有在进行赤裸裸地进行暴力统治时，才需要他。在宪法冲突这样一种前提下，为了保卫受到威胁的军事国家，捍卫它的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俾斯麦作为“君王权力的稳定装置”（梅塞尔施密特语），踏入了决定德国政治进程的中心位置。在此后的三十年里，他与支持自己的集团一起，与德国政治及社会发展中的进步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就旧的普鲁士国家和及其精英层面而言，这种斗争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果，然而，从长远的眼光看，对大多数德国民众而言，它却有着极为有害的结果。



如果选民能够完全清楚地表达其政治意愿，而且选举参与程度最高达到50%，很明显，大多数的选民都支持自由主义的政策。1862年时，保守党还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党，然而却是具有强大力量的少数派。首先，它的政府控制了“有组织的国家权力的全部工具”，<sup>[10]</sup>俾斯麦终于登上了最重要的政治位置。他并非那种在推行有用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畏首畏尾的人。在国内，人们经常忘记他曾经对自由党人实施过强硬的镇压路线。这位新首相非常熟练地使用着逮捕、驱逐出境、新闻审查、恐吓性的诉讼等各种各样的统治手段。他从来不低估他的主要对手。当拉萨尔领导的工人联合会已经成为一股真正的力量时，他甚至亲自与之达成协议，共同反对“进步党”。甚至25年以后，这一真正的自由党仍然是俾斯麦的主要敌人。资产阶级自由党的议员们相信，在“法制国家”中，不通过预算法案，政府是无法治理国家的。于是俾斯麦政府转而寻找他们的依据，即在普鲁士宪法中有张开了一个“漏洞”。根据俾斯麦政府的观点，这意味着，由于缺乏立法方面的统一性，古老的君王的最终决定权允许政府按照上次规定的预算继续进行治理和管理。由于经济的繁荣，充裕的税收也允许一种大方的经营管理。在宪法政治争论持续激烈进行期间，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却在他们的利益考虑方面表现出极不一致性。有时候在议会的同一次会议上，俾斯麦政府所强调的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会得到无保留的赞同和法律上的批准；而它在对内政策方面采取的措施则受到猛烈却又无力的批评。然而，如果不是俾斯麦遵照他的座右铭，即“只要我们在对外政策上拥有威望，我们在国内就会受到欢迎”以及多次证明他那成问题的“要用对外政策的蒸汽动力来驾驭国内政治的技巧”（翁肯语），这场国内冲突终结的结果将是不确定的。“十字报”在俾斯麦上任时的预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他的“规划”是：“通过大胆的对外政策来克服国内的困难”。<sup>[11]</sup>

#### 四、争霸战争与“上层革命”

在经过精心的外交准备之后——这次被视为技术杰作的外交准备总是能给人带来美学的享受，因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俾斯麦与竞争对手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一道，于1864年卷入了对丹麦的战争。自1848年以来，在自由党到左派各党的德国民族主义政治规划中，获得这两个公国是毋庸置疑的目标。在战争中涉及到一些严肃性的军事行动时，俾斯麦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在普军攻克迪佩尔 [迪佩尔 (Düppel), 即 Dybbøl, 在



今丹麦境内。译者注] 的防御工事的问题上，有关进攻的争论长达数周之久，战场指挥官根本就不知道这种进攻的军事必要性在哪里。但是，俾斯麦与国防大臣冯·罗恩站在一起，坚持要进攻迪佩尔，以便利用出师大捷的结果来赢得在国内的威望。这一攻击最终取得了成功。确实，“胜利的捷报在普鲁士引起了极大的振奋”，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削弱了“自由主义者在国内战线上抵抗专制主义”的基础。还在柏林和维也纳建立起对两公国的共管之前，进步自由党人的宪法原则就已经开始软化。这也证明了拉萨尔的怀疑，那就是，自由党人要利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以便转移人们对国内形势的注意，并且在爱国主义的伪装下，逃避解决他们一直没有取得进展的冲突”。<sup>[12]</sup>



图5 1866年7月3日，普鲁士军队决定性地在柯尼希格莱茨击败奥地利军队

毫无疑问，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血腥内战具有决定性意义。1866年，俾斯麦领导的普鲁士通过关键性的萨多瓦（柯尼希格莱茨）战役，将奥地利赶出了德意志联盟。虽然毛奇领导的总参谋部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只有这次战役进程才使普鲁士取得了胜利。俾斯麦可能说过，如果战争失败，他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毫不夸张。然而，第二场战争的结果导致了北德意志“进步党”的道德崩溃。除了少数围绕在欧根·里希特身边的人还将自由主义宪法国家视为第一需要外，坚持自由主义宪法不久就被视为是冥顽不化了。优势转向了胜利的政府阵营。人们不难理解，一个对权力和责任不甚适



应的运动在 1848 年被打败。然而，这是走了味的“现实政治”的胜利，这种“现实政治”经常退化为对从前可恶的敌人的力量的无原则的迁就，它或者折断了许多自由党人的脊梁，或者使他们产生动摇，以至于曾经引导他们的最好的信仰也变得可疑起来。

俾斯麦要比短视的右派保守党人聪明。现在他勉强同意向自由党人做出表面让步，即通过提出“追认建议”来批准政府自 1862 年以来推行的政策。难道果如一些人当时或以后所相信的那样，宪法冲突解决了吗？回答是：否。俾斯麦在此只是赢得了一种“拖延性的客套妥协”，<sup>[13]</sup> 这种妥协虽然暂时掩盖了基本的利益矛盾，却没有澄清宪法政治的现代化的关键问题。更确切地说，这一问题的解决推迟了长达近 60 年之久。就此而言，这一策略上非常高明的妙招呈献的只是传统统治者一次破绽百出的胜利。拥有独立军事机器的专制国家结构仍处于不可触碰的核心地位。新成立起来的北德意志联邦，戴着假议会的面罩，围绕着这一核心，可明确视为通向建立大普鲁士国家的前奏。

俾斯麦“通过在其计划极为有利的时机发动战争”<sup>[14]</sup> 第三次获得了成功。数年来，巴黎对崛起的普鲁士，特别是对俾斯麦的神经质式的怀疑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其结果也是可以想象的。俾斯麦挑衅性地在西班牙王位候选人方面安排了霍亨索伦家族人选，并且利用了法国的失礼，刺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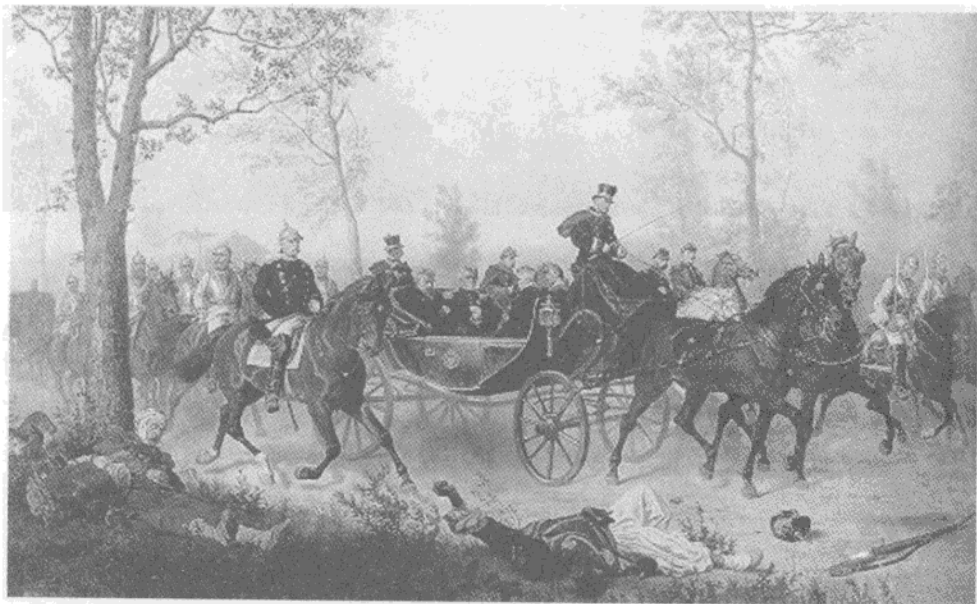


图6 俾斯麦在1870年9月2日陪拿破仑三世去见威廉一世



了法国不明智地对普宣战（1868年9月，新上台的西班牙军政府决定寻找一位新君主。俾斯麦认为这是刺激法国，挑起普法纠纷的良机，派人到马德里活动，使西班牙政府宣布将王位献给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法国担心因此遭到霍亨索伦家族的包围，不仅迫使普鲁士国王说服利奥波德放弃继承王位，而且“失礼”地要求其书面保证永不赞成霍亨索伦家族的人登上西班牙王位。感到屈辱的普鲁士国王将情况电告了俾斯麦。蓄意刺激法国的俾斯麦将电文加以删节并登报，似乎普鲁士国王粗暴地拒绝了法国大使的要求。1870年7月19日，法国遂向普鲁士宣战。译者注）。对法战争的胜利消除了俾斯麦对于南德诸邦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担忧，并因此解除了他将北德意志联邦扩建为一个以德意志的统一国家的忧虑。对法战争的胜利也打消了他在“不可动摇的”军队法案延长问题上的担心，该法案将在1871年12月到期。这一法案占当时北德意志联邦支出的95%，而且实际上不在议会的监控之下。人们无须怀疑，在最后的日子里，拿破仑三世的已经自由化的短命帝国会再次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它的诸多内部问题上引开而转向对外的波拿巴主义政策。但是，他的这种政策碰到了他的柏林对手推行的同样波拿巴主义式的、然而却着眼于长期和冷静考虑的政策。很显然，俾斯麦也做了多手的准备。他从来不将对法战争置于一种可能性之下。不过，事实证明，“真正的治国才干”在于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解决1870年的德国问题。“没有人坚持认为”，俾斯麦“曾运用其天才来避免这场战争”。<sup>[15]</sup>而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却来自于一种新的孤注一掷的大普鲁士的冒险政策。

通常来说，战争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解决国家间纠纷的合法的、至少是可为一般人接受的手段。俾斯麦正是在令人瞩目的极短时间内解决了三次这样的决斗。但是，这并没有回答人们对于用“其他手段”实施这种进攻性外交的重要作用的探究。不与其竞争对手们相互打击，普鲁士就不能实现其在德国的目标吗？我们姑且不谈这一问题。在柏林采取战争行为的国家秘密中，有两个动机显然不可忽视：

第一，丝毫没有证据证明，这三场争霸战争在严格的意义上是由经济利益决定的。然而，很难否认，这些战争也是统治者用来使自己合法化、反对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甚至还有第四“等级”的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社会解放的工具，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这种追求政治和社会解放的渴望则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当然，就主谋者而言，这些战争在长时间内也确实产生了他们所想要的作用。在德国，雅各布·布尔克哈特 [雅各布·布尔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年)，出生于瑞士巴塞尔，著名历史学家。曾



在柏林、波恩等大学学习历史，后在蒂宾根、柏林等大学讲授历史。译者注]的判断通常得到肯定。他早在1871年时就很冷静地认识到，“这三场战争是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而进行的。七年来，我们一直欣赏并利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全世界都相信，只有路易·拿破仑才因为国内的原因而发动多次战争。从自卫的角度来看，这三场战争进行的正是时候，”以便“应付国内的困境”。<sup>[16]</sup>正如1848年革命第一次明确宣布，宪法冲突予以确认，而工人阶级的组织成就又加以强调的那样，工业化不仅将德国社会无法回避地置于运动之中，推动它提出各种政治要求，而且开始摧毁晚期封建主义等级的权力结构，造成对传统特权体制无法压制的怀疑，确切地说，唤起了“日益增长的革命期待”。面对业已改变的这种世俗力量，用一种通常的驯服战略是不够的。工业革命的直接后果，尤其是它的间接后果，要求使用在旧的统治集团看来非同寻常的手段。不相信“人类创造历史”的人们都不会承认这一点，即由于拥有俾斯麦的旧的统治集团有着一种独特的政治力量，他们冒险用三次战争的方式对稳定君主制做了近乎绝望的治疗。然而，战绩辉煌的胜利使他们得到所渴望的结果：专制统治以及社会制度重新得到了合法性确认，它们依靠俾斯麦外交以及普鲁士军队所赢得的巨大威望继续存在。国内的危机形势趋于缓和。诚如所期待的那样，它的主要敌人，即民族自由主义，也成了这种具有战斗性的抚慰性政策结果的牺牲品。

18

第二，大普士的扩张实现了自由派资产阶级追求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愿望，是排除奥地利的小德意志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柏林中央政府那些具有远见的人们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奥地利在德意志内战中的失败以及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都确认了他们的这种认识。同样，人们也经常表示，必须发动一场共同的战争来化解南德意志诸邦对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国家的抵制，同时对民族的一体化施加影响。早在1866年，毛奇就瞄准了这一可以实现的目标：“德国通过反对法国而联合起来”。恰好在德法战争期间，民族激情构成了建立德意志帝国政策的强大推进剂。这一目标实现了。正如经过1864年和1866年两次战争后的自由党人一样，南德诸邦在1870年至1871年的德法战争后也被制服了。因此，这场战争具有双重功能。作为民族的“统一战争”，它“完成了普鲁士1866年退出德意志联盟的战争”；然而，作为“先发制人的国内政治的整合战争”，它则终止了普鲁士军事君主制的“政治和社会的根本危机”。克劳塞维茨早就预测，“通过剑”实现德国的统一和用战争手段克服其内部问题，是普鲁士的任务。<sup>[17]</sup>毫无疑





问，“与自由派在1848年的尝试相比”，“俾斯麦用暴力战争来解决问题的革命性毫不逊色”。“他与旧帝国的大德意志联邦主义传统进行了彻底的决裂，并以普鲁士霸权领导下的更紧密的小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取而代之。”<sup>[18]</sup>

然而，盘踞于普鲁士政治顶端的保守的“白色革命者”，现在面临着“上层革命”的连续性问题。他们自己则称之为“从上层进行的改革”，并且以军事状态的激进手段加以实行。早在法国大革命不久，普鲁士大臣施特林泽就通知法国公使：法国发生的“自下而上”的“有益的革命”，将“在普鲁士缓慢地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实行”。通过有限的让步政策，革命的炸药会被拆除引信，而有益的变革则会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实现。在很早的时候，克劳塞维茨也纲领性地介绍过这种上层革命。他在1809年写道：“欧洲无法逃避一场浩大而普遍的革命，国王们只有理解了这种大改革的真正精神，懂得先行一步，才能保住自己”。或者就像他同时代的格奈泽瑙所指出的那样：“明智的法律抢在每次革命爆发前出台”，有如“退出埋在我们脚下的一颗地雷的弹药，我们要一步一步地把火药弄出来”。早在洛伦茨·冯·施泰因或古斯塔夫·冯·施莫勒广泛宣传社会君主政体之前，王权干预就已经影响着普鲁士政治的实践。由于拥有多年“上层革命”实践的自信，因此俾斯麦认为，“在普鲁士，只有国王闹革命”。<sup>[19]</sup>在用行政机构变革方式退出1848年革命这颗地雷的弹药失败后，即使在反动时期，仍然用经济方面的让步来补偿政治上尚不成熟的资产阶级，这一原则再次证明是有效的。在普鲁士的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在德意志的民族政治领域，军队是唯一的、长期可靠的保证。19世纪60年代初，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再次表明其过于软弱，另一方面这时德国社会的发展动力还没有丧失其活力。同时，各种推进小德意志的统一政策的传统计策也都没有成功（普鲁士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曾数次试图排除奥地利，确立自己在德意志的霸权。1849年，普鲁士国王以镇压革命为名，与萨克森、汉诺威结成三王同盟，希图以此为开端建立普鲁士领导下的新德意志联盟，后来在奥地利和俄国的联合压力下放弃这一打算。1859年，普鲁士利用法国和撒丁王国联合对奥地利开战的机会，试图建立迫使奥地利承认其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但战争的迅速结束使之再次希望落空。译者注）。正在这时，普鲁士军队作为俾斯麦计划的执行者，同时也是为了传统精英们，用三次战争，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内政及对外事务方面的各项困难。有人甚至在没有对德意志联盟及其联邦主义计划的改革能力进行为时已晚的考虑，就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俾斯麦的“铁血”解决方案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更难以否认的一点是，保守的革命者所取得的成就



最终只是加剧了德国社会和政治的长期危机。

早在1870年和1871年时，来自各个不同阵营的敏锐观察家们都已经对当时的实际情况非常清楚。民族自由党文化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古斯塔夫·弗赖塔格就曾怀疑地表示：“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我们用来获得这种伟大成就的手段却给我们的未来投下了阴影。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

根本的问题在于，是否这个大普鲁士的帝制国家可能更好地捍卫和平，或者至少像已经被打碎的德意志联盟那样。面对建立起来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这一问题在很长的时期内被不公正地认为是次要的。甚至萨克森外交官亚历山大·冯·维勒斯也抱有此类见解。如果冷静下来看，也许他过于模仿梅特涅反对自由主义“运动党”的固执风格，而对于普鲁士国内的各种推动力量和新的社会潮流重视不够。他曾经提出，“德意志联盟实为欧洲外交中政治家们最糟糕的构思，它具守势特性，而普鲁士则是其中的攻势酵母，它使这一揉好的生面团发酵起来。德国不只是与她的邻国和平相处，对于任何一个想破坏世界和平的欧洲国家而言，它也是制动器。在德意志联盟这一组织结构中，唯一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错误就是将所有成员邦都置于拥有崇高的道德这一前提之下……而普鲁士早就表示，它不会被多数票压倒。在普鲁士说这句话的当天，德意志联盟就应该将它永远扼杀。然而，人们畏首畏尾，结果是德意志联盟遭到毁灭。” G.G.格维努斯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自由派著名学者和时事评论员，他在一封令人印象深刻的“致普鲁士王室”的呼吁书中也有令人感触颇深的言辞。他表示：“由于德意志联盟在1866年的垮台，德意志的疆域内就有2/3变成了一个在任何时候都具进攻能力的战争国家。即便不是普鲁士和德国的敌人，人们也会疑心，这一国家对欧洲大陆的安宁以及对它的邻国的安全有一种经常性威胁。……如果以爱国主义为由而罔顾下述事实，实非明智之举。对于整个欧洲以及整个时代而言，1866年的事件复活并且在极大程度上扩大了原本以为已经消失的危险秩序。在经过长达500年的期待、奋斗和渴望之后，普鲁士已经日益超过早期的军事制度。……现在，它已经形成一个拥有非常巨大优势的持久军事强权。过去数个世纪中，各军事国家都集中注意力于征服和扩张，对这一点根本就没有想到。……在从前，如果有人提出这种对时局的看法，定会受到偏激的责骂。但是，在经历了1870年之后，人们对此已经不予否认。这些事件使普鲁士军事强权得到了新的加强，此外也不可避免地使之充斥着不断增长的自信。”卡尔·马克思在做了完全相似的分析之后，讽刺性地将德意志帝国的特点归纳为“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



图 7 1890 年连环画：“二月赦免”。它是对威廉二世的美化描述，表达了德国人对有爱心的皇权的渴望

民族国家似乎已经彻底丧失了信誉。一个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事实上也许只有通过一场彻底的下层革命才能实现。在 1848 年春天的德国以及英国，人们都持有这种观点。此后，事实清楚地表明，普鲁士这一“开明君主国”的“小幅领先”使得没有进行成功革命的德意志民族走入了“一条死胡同”。长期以来，虽然普鲁士国家的管理实践与“从上层进行革命的想法”的结合表明，它足够强大，以至敢接受人权宣言的挑战，然而，正如“1848 年以来没有解决的、被延迟的危机的有害物质”在“德意志民族的机体”中循环一样，德国在进入新的国家大厦时，政治上尚不成熟的大众阶层缺乏最基本的解放行动，而专制的普鲁士极权国家却带着耀眼的成就，扩张成了 1871 年的德意志帝国。<sup>[21]</sup> 资产阶级的工业社会将会在它的护罩下建立起来。贵族、军队和农业界的势力逆时代潮流而动，庆祝着他们进攻性的防御性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凯旋。在这样一种征兆下，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开始了它的历史。1914 年，也是在这些社会阶层的支持下，将开始又一次冒险性的“向前逃跑”，并导致了这一帝国的灭亡。

影响、按照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sup>[20]</sup> 这种看法不也同样是对的吗？

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更详细地回顾 1871 年之后的相关政治统治体制。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需要稳定和合法化等各种负担的压力下，俾斯麦普鲁士的政策开始“向前逃跑”，通过三次战争，以“上层革命”的军事进军方式，给了德国人一个“小德意志的大普鲁士”的德意志帝国。共和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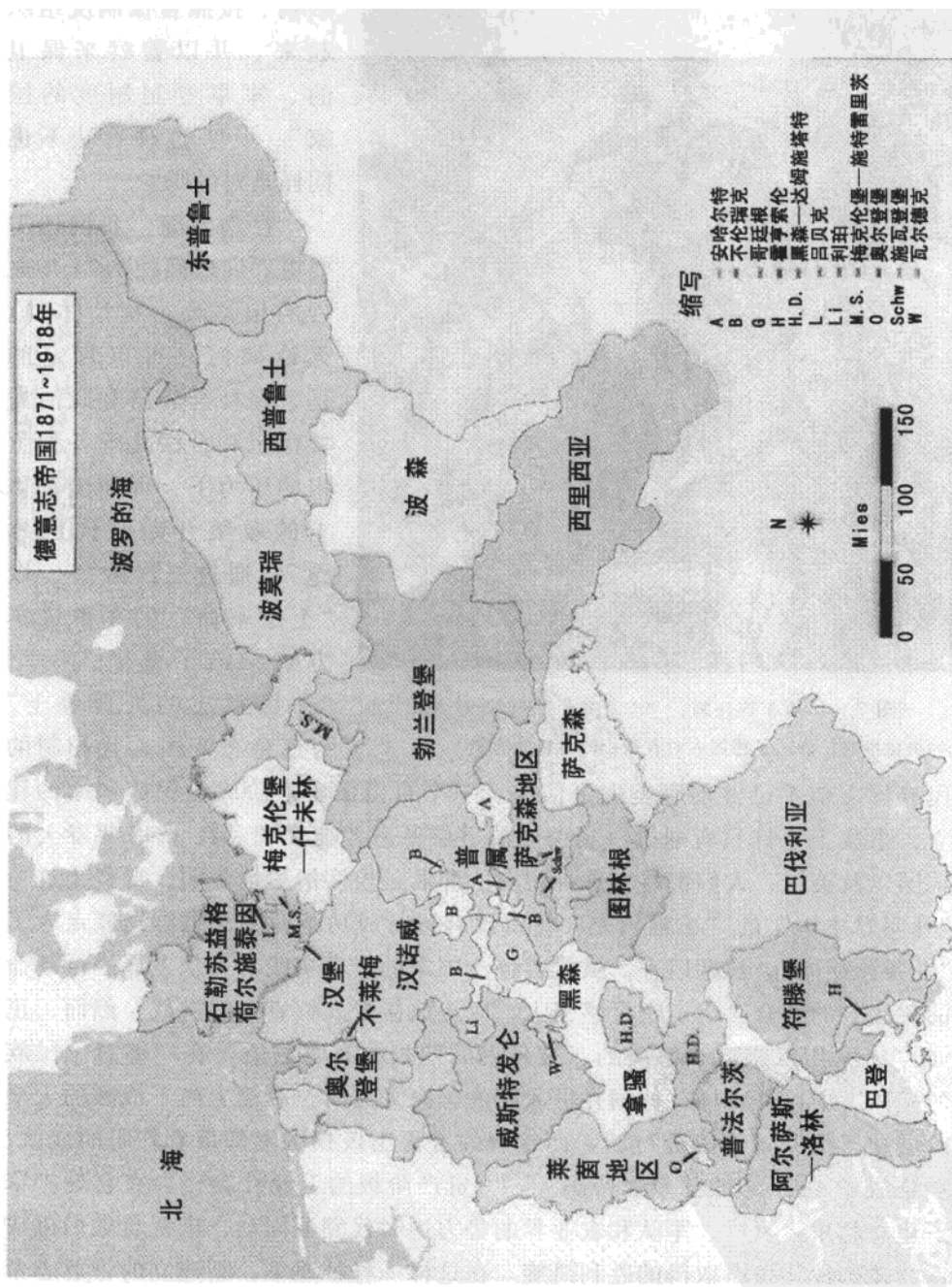


图8 德意志帝国版图(1871~1918年)



## 第 2 章

### 向工业国家迈进

#### 一、1873~1895 年，高度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工业增长的紊乱和结构性农业危机

1850 年到 1873 年是德国工业革命的高度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从相对狭隘的经济意义上讲，“落后的优势”使德意志各邦受益匪浅。实用主义的适应以及目标明确的学习令人惊讶地迅速缩短了西欧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德意志各“发展中国家”通过仿造、购买专利或者刺探业务秘密等方式，从先进国家吸纳各种看上去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到 19 世纪 70 年代初，工业资本主义作为“使自我调节的经济增长制度化的第一种生产方式”，在德意志帝国也出现了决定性的跳跃性发展。<sup>[1]</sup>在此，“帝国”这一全球性的概念切不可引起误解：只是在诸如鲁尔地区、萨尔矿区、上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等一些地区，工业发展才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在周围地区，或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保留着相对传统的社会状况，或者由于工业发展的扩散性影响而逐渐地发生了改变。因此，在德





国延续的也是一条典型的不均衡的经济增长进程。

在工业革命的突破阶段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高度工业化的第一个20年。通过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德国在甚至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变成了工业国家。这一过程构成了1873年到1895年间德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真正内容。然而，除了这种异乎寻常的发展趋势之外，这些年的历史性重要特征是，工业和农业经济的长期增长被打断，并且带来非常重要的后果。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引发各种变化的原因和条件以及长期影响将会持续到1918年为止。到1873年为止，20年的高度经济繁荣时期加上1867年到1873年期间史无前例的、蒸蒸日上的兴旺景象，使人们期盼着辉煌的19世纪70年代的来临。因此，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悲观的经济形势以及调整的困难等，都令人感到更加压抑。当经济统计标准表明经济高涨已经再次开始时，大萧条的经历还极大地妨碍着现实性的或市场的合理导向。就此而言，社会心理对经济高涨的反作用再次使各种客观性的问题尖锐化。

1873年到1895年的工业发展阶段从1873年秋天爆发的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开始。几个星期之后，伴随着交易所崩盘和银行破产倒闭而来的猛烈经济危机逐渐转变成了一场严重的大萧条。这次大萧条一直持续到1879年2月为止，中间几乎没有中断过。这6年的中断使经济增长率下降了一半，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停滞，而且还导致出现了带有普遍、持续的价格通货紧缩的生产回落，形成了到当时为止对德国工业经济时间最长、最激烈的阻碍。具有重要标志的德国的铁消费量，在很短的时间内下降了50%，矿工工资到1879年为止减少了一半。几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因为大萧条而受到了损害。柏林警察总监曾在1879年评价道：“收入的失调”以及“所表达出的紧急状态”使人们对当今经济和社会秩序正当性产生了怀疑，并且在日益广泛的、通常较为平静、温和的人群中引发对现状的不满。用恩格斯的话说，这是“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发生颤抖的地震”<sup>[2]</sup>之一。

虽然第二次萧条相当微弱，却一直持续到1886年8月。在这次萧条开始之前，1879年春天到1882年1月间有短暂的经济复苏，但并没有对经济以及作为经济主体的人的意识产生振奋性的作用。尽管这时的经济已经不再像1873年到1879年期间那样令人痛苦，但是这次经济的下滑却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它进一步加剧了19世纪70年代所受到的打击。对于工业的这种周期性重要波动，人们显得毫无抵御能力。它似乎再次证明，资本主义行为的三大基本期望，即稳定的增长进程、回报率的合理预测以及规律性的利润最大化的前景，随时可能崩溃。有些人甚至相信，由于缺乏持久的



(即使是不均衡的)增长,德国的社会秩序有瓦解的危险。虽然工业发展的经历并非像当时那样引人注目,鉴于自由主义理论中所有“仁慈的”市场机制已经失效,第二次经济低潮期间不显眼的长期发展还是给予了一些实际的安慰。马克思此前曾对即将来临的经济危机做了准确的预言,即这次经济危机“由于其活动场所的普遍性以及影响的强烈程度,甚至连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这样的幸运儿也会被灌输这一辩证法课程”。<sup>[3]</sup>现在,这种预言终于得到了证实。

1886年秋天到19世纪90年代初,总算又实现了强劲的经济高涨。1889年甚至可以被宣布为繁荣之年。然而,在1890年1月到1895年2月间,下降性的停滞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后,在1895年到1913年间,世界经济以及德国国民经济的众多领域都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发展时期。因此,在俾斯麦约20年的帝国宰相生涯中,无疑仅有4年处于经济高度繁荣时期。与此相比,在卡普里维(卡普里维在1890年到1894年间接替俾斯麦担任德意志帝国宰相。译者注)时代则完全没有。没有现实主义的分析能够忽视这一事实。这种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非同寻常,其原因必须从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中寻找。这种过剩的生产能力使得生产持续过剩。这是自由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种独特现象。由于陷于这种经济发展趋势的魔力之中,同时又要面对缺乏透明度的市场、固定资本的稳定性以及长期起作用的需求的不确定性,自由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就会持续向过剩投资倾斜,并对经济危机缺乏抵抗力。此外,在这一发展阶段,上述普遍性问题还会因为三个因素而加剧:

第一,德国工业革命的传统主导部门,如铁的生产、采矿、铁路建设等,渐渐地失去了它们的动力。首先,铁路建设失去了它的先导角色。1870年到1879年间,在德国国民经济的年净投资中,铁路建设吸引了约25%;到188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3.5%,1889年更下降到了5.7%!在这些统计数字以及达4/5的缩减量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资本运动、对冶金工业的深刻影响以及对众多供应企业的消极扩散作用。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新的主导性工业部门,如电气技术工业、发动机制造业、化学工业等,与迅速发展的服务性产业一道,作为新的“Cycle Leaders”,才再次持续推动经济走向高涨。

第二,这种初次遇到的长期阻碍工业增长的经历增加了人们确定方向的困难度。在同一个时期,当德国工业经济不得不适应逐渐形成的现代世界市场以及它的变化万端时,它也不得不去熟悉自己的国内市场。这一国内市场已经日益卷入世界市场,但是又没有通过一种明确的景气政策、更不用说刺



激性的工资政策和扩大消费期望等等，来扩大这一市场。

第三，另一方面，恰恰在工业和农业都出现萧条的这一发展阶段，帝国的人口却出现了猛烈的增长。1873年到1895年间，尽管在这几十年中有200万德国人移民国外，帝国的人口仍从4160万增加到了5200万，也就是说，增加了约1040万人。于是，工作场所的增加以及工作岗位的价值等重要问题就摆上了桌面。如果说1848年革命之前的那种贫困状态没有出现的话，那么，这首先要归功于虽然受到各种干扰却持续扩张的工业经济。由于处于结构性危机的阴影之中，农业在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重要。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强劲的工业增长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尽管在新的人口聚居区出现了各种糟糕的不良状况，然而，对社会而言，只是由于工业的发展才使得城市化进程没有变成致命危险。在1871年到1880年以及1881年到1890年期间，德国的人口每10年增加410万，而城市居民数量（统计以超过2000居民的城镇为准）却增加约350万，也就是说，城市的住所和工作场所必须容纳德意志帝国新增人口的3/4以上。在传统统治精英和资产阶级看来，在这20年间，德国已经跨过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道路迈进的门槛。尽管这一点还有争议，但已经不是问题。

毫无疑问，三次工业经济萧条已经积累了足够严重的问题。然而，始于1876年的结构性农业危机也与工商业的不景气叠加在一起。此后，两大危机重叠起来，并被帖上了黑暗的标签。当时广泛流行的概念就是所有西方工业国家的人们都提到的“大萧条”。从1852年开始，德国出现了少量的黑麦进口过剩，然而，到19世纪70年代末，这种进口过剩已经超过100万吨（1879年为130万吨）。尤其是在1876年以后，德国从小麦出口国变成了小麦进口国，进口量急速增加。燕麦和大麦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德国突然发现，它已经成为依赖谷物进口的国家，与此同时，一次巨大的农产品的价格跌落则标志当时正在形成世界农业市场的阵痛的开端，也是迄今德国农业中的结构性农业危机的开始。到1885年，德国农产品价格跌落了大约20%。直到1912年，农产品价格才又恢复到了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水平。1879年，农业领域年平均工资收入下降到了低于1872年状况的水平。

这次农业危机首先是强大的海外竞争、特别是北美新大陆地区的竞争的结果。尤其是1879年以后，在生产和运输费用持续下降的有利条件下，廉价的美国小麦压垮了中欧农业市场的价格结构。与此同时，俄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出口赢利来筹集资金，推进现代化，因此也大大增加了谷物





的出口。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小麦也开始出现在市场上。而处于高生产成本、由于抵押而负债累累、完全习惯于过高运费的德国谷物生产者表明，他们无法对付这样的冲击。原本是德国谷物主要出口地的英国很快就落入了美国人的手中。普鲁士的小麦价格在政治上非常敏感。这一价格从1880年的每吨221马克下降到了1886年的每吨157马克。特别是德国东部地区的谷物生产者的经济低迷与第二次工业萧条相伴长达5年之久。直接受到影响的行业阶级是传统的普鲁士大地主统治阶层。这一阶层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还将自由贸易视为信条。他们对于这种国际性生产过剩的反应是，优先采取政治手段而非经济的转变和适应方式，来捍卫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一眨眼间，他们就转向了农业保护主义的路线。1887年到1890年间的短暂复苏给他们带来了某种轻松感，然而，到卡普里维时期，又出现了农业和工业的双重萧条。

如果人们回忆一下19世纪70、80年代以及90年代早期令人注目的压力，就会从中得到一种最初的印象，即工业增长的紊乱以及农业危机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具有重要的影响。显然，对不同的社会群体而言，危机时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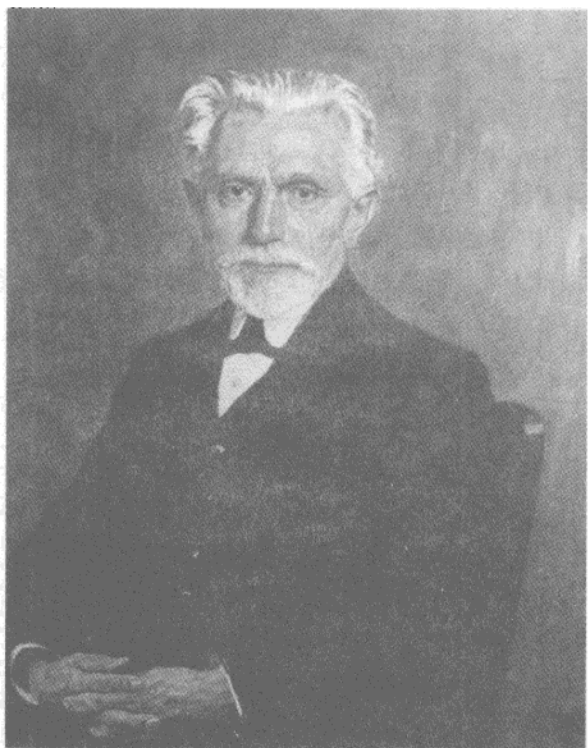


图9 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任主席奥古斯特·倍倍尔

影响是绝对不一样的。生产者由于价格跌落和销路问题而受到重创，与此同时，固定薪金收入者则会在物质上受益良多。对于工业领域里以工资为生的劳动群体而言，19世纪70年代的工资的减少、解雇或者短时工作等，造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令人压抑的绝望气氛。这种气氛无疑有利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崛起。这里再次引用柏林警察总监的话：这种紧急状况甚至使那些平静的人群也开始考虑，“实现社会主义理论是否真的就能改善生活状况”。在1877年的帝国议会的选举中，德国社会民



主党获得的选票数在参选的各党派中高居第四位。<sup>[4]</sup>

19世纪80年代，在一些工业部门，实际工资开始缓慢上升，维持生活所需费用指数开始下降，但谷物生产领域却看不到任何改善的迹象。具有巨大影响的利益集团或者人数众多的阶层都会感觉到，他们时常直接地或间接地遭受工业资本主义或农业经济发展的突然波动的冲击。正因为如此，德国的经济政策中一个深刻而重要的变化就与这一危机时期联系到了一起。在自由主义的经济贸易及其相关理论、自由主义的思想及其价值观丧失信用之后，尤其是受到中欧地区第一次农业危机和持续6年的工业萧条打击之后，德国出现了从自由贸易向保护关税体系的过渡。农业和工业界的业主们大声疾呼，认为有必要保护其免受外国的竞争。不久，帝国政府即以经济民族主义以及敌视消费者的态度，对这些业主们的抱怨进行了立法确认。而它这样做的冠冕堂皇的口号就是“保护民族劳动”。然而，对德国的业主们而言，更急迫的问题在于，鉴于当时经济形势的转变，还涉及到稳定德国国内价格以及同时向外倾销的问题，涉及到通过提高关税壁垒来保障不受干扰地开发德国国内市场。而这种通过提高关税来保护德国国内市场的政策却妨碍了德国工薪阶层消费者从世界市场价格跌落中得到好处。基于当时德国社会的力量分配状况，大地产者对于帝国政府上层的压力见到了效果。与大地产者的利益要求相适应，德意志帝国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于1879年开始实行农业保护关税。1885年到1887年间，相关的关税税率增加了4倍。俾斯麦政府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政策，来稳定“地产分配的阶级结构现状”，尤其要捍卫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大地产所有者的“集体地位”，以城市中下层民众阶层为代价来维护他们的特权地位。因此，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德意志帝国的农业政策显然是“一种仅仅被表面掩盖着的阶级立法”<sup>[5]</sup>而已。

另外一方面，各种工业关税显然有利于重工业，但对以出口为目标的制成品工业以及轻工业极为不利。工业关税对这些以出口为目标的企业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就这些企业而言，不仅对外贸易以及贸易平衡有赖于它们的效率和成就，而且不断超越国内经济消费力量的经济体制的运行方式也有赖于它们。从纯粹的经济视角来看，保护关税政策就更有问题。1882年和1890年以后出现的新的经济下滑则证明，这种关税政策确实是无效的。这种保护关税政策，从前被视为反对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景气政策的万灵妙药，现在彻底失败了。然而，保护关税政策的真正的重要性在于稳定政治统治体制。从这一意义上讲，它显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像格申克



龙所估计的那样，由于 1876 年以后的农业危机，确实存在剥夺作为前工业社会精英的容克的权力的“一次大好的民主机会”，<sup>[6]</sup>那么，由于国家采取了一整套的保护和资助措施，尤其最令人瞩目的 1879 年、1885 年和 1887 年保护关税政策，这样一个机会就化为乌有了。在这方面，资产阶级的议员以及主张保护关税的工业界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都给予了支持。

倘若说大地产贵族的支配性特权由于这一切而再次得到了延长，那么，与此同时，因本身具有的强大力量，工业在不理会其代表们的意见的情况下而继续胜利进军。所有重要的经济统计表明，到 1890 年，工业已经居于支配地位。从经济方面看，此后关于“工业国或农业国”的特别激烈的争论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不再是一个尚未完成的、需要选择的问题。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工业已经最终超过了农业。如果以 1913 年价格为准，1873 年，德国农业经济在国内净产值中所占份额为 379 亿马克，工业为 317 亿马克。到 1889 年，二者已经拉平，1895 年，工业与农业之比为 368 亿马克和 322 亿马克。而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则超过了 6.5:5.1。在净投资方面，仍以 1913 年价格为准，1870 年，还有 220 亿马克流入了农业领域，到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这一数字则下降到了 100 亿马克，而流入“工商业”中的净投资却达到了 330 亿马克。在 1879 年前后第一次萧条造成的停顿期间，二者得到的净投资水平的确相当，为 108 亿马克和 106 亿马克。这一数据表明，工商业投资缩减了约 2/3，仅此就可清楚地说明衰退的严重性。此后，工业出现了持续性的进展。1885 年，农业净投资与工业投资分别为 115 亿马克和 375 亿马克，1890 年为 138 亿马克和 453 亿马克。换句话说，在 20 年间，工业净投资所占份额从 140 亿马克增加到了 450 亿马克。

然而，在这些净投资中隐藏着对经济前景的抉择。在当时的大多数观察家还没有清醒过来时，工业占有的 453 亿马克的投资份额早就决定了德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表面性的从业人数指标并不能说明劳动生产率、产值等问题，但它也表明，到 1890 年，一切都已成定局。如果说 1871 年德意志帝国内从事农业和从事工业、交通、商业、银行、保险业的从业人员的比例是 850 万比 530 万，1880 年则是 960 万比 750 万，1890 年则是 960 万比 1 000 万，并且继续以对农业不利的形势加速改变。虽然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在数量上意识到这种发展，人们还是可以通过价值创造和劳动生产率、从对外贸易份额和总产量等看出，工业在全方位地胜利进军。尽管处于多年的增长停滞、长期通货紧缩的价格趋势以及由此引起的诸种问题的阴影之下，工业发展的强劲动力还是成功地凸显出来。就浩浩荡荡的工业化进程而言，在其革





命性突破阶段之后，这种强劲动力独自持续着。

## 二、1895~1914年，工业的高度繁荣和受补贴的农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干预型国家的崛起

此后，工业的迅速推进完全成为从1895年到1913年为止的下一个发展阶段的特征。在1873年到1894年间，工业和手工业的总产量从266亿马克增加到了454亿马克，1895年到1913年则从489亿马克增加到了1000亿马克。1890年，工业和农业的净投资比例为340亿马克和115亿马克，1900年为545亿马克和9亿马克，1910年则为430亿马克和100亿马克。在价值创造方面，二者的差别也同样令人注目。1890年到1913年间，德意志帝国的人口从4920万增加到了6700万。到1910年为止，这些人口中大多数已经居住在城市之中，这是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的标志。而这些城镇人口则是不受限制的工业产品出口和农业产品进口的最大受益者。1871年，德意志帝国境内64%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低于2000人口的乡镇），仅有5%的居民生活在1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在19世纪90年代初农村人口和城市居民出现平衡之后，到1910年的结果是，仅有40%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在40年里减少了24%），与此相对，大城市的人口则增加到了21.3%（增加16%），拥有5000到10万居民的中等城市的人口达到了27.4%（1871年时所占比例为18.9%，增加8.5%）。农业领域的从业人数在1900年左右为980万人，1910年为1050万人，而在工业、交通、商业、银行和保险业领域的从业人数则分别是，1900年1030万人，1910年为1300万人。与此相应，大企业中的从业人数也得到增加。1875年，在1860万受雇人员总数中，5个员工以下的企业雇佣的工人人数占到64%，30年以后，到1907年，这一比重下降了一半，即占2800万受雇人员总数的31.9%，而5到50人规模的企业雇佣的人数则占到26%，50到1000人规模的企业雇佣的人数增加到了37%，1000人以上的企业雇佣的人数也增加到了5%。在工业中，特别是在大工业中，职员的比例增长最快。1882年，职员在从业人数中所占比例为1.9%，到1907年则增加到了5.7%。平均劳动时间则有所下降。1872年每周工作72小时，1900年为62小时，1914年为57小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虽然19世纪80年代末以后，人们保持着悲观的看法，担心由于劳动时间的减少而造成下降，生产效率却持续提高。与此同时，德意



志帝国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也得到提高。如果说在 1872 年时只达到 37 岁（男性 35.6 岁，女性 38.3 岁），那么，到 1910 年时则已经达到 47 岁（男性 44.8 岁，女性 48.3 岁；在联邦德国，1960 年的人均预期寿命为 70 岁）。<sup>[7]</sup> 由此，建造住房、养老、创造工作岗位等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又浮上了台面。从长远的眼光看，只有工业的增长才能减缓相关的压力。

1895 年是一个重要的确定方向之年，这不仅因为 1895 年春天开始了经济上的高度繁荣阶段，而且也是因为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成了正式的“德国资本主义社会史上两个阶段的分水岭”。<sup>[8]</sup> 到那时为止，现代工业的大企业体制已经形成。此后，这种体制统治的不仅仅是经济界。德国的大型企业，不管是家族型或完全依赖于银行的股份公司，不管是托拉斯还是康采恩，在质量方面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种新的工业经济的组织形式。在此后的数十年中，仍是小企业和中型企业的天下，自由主义的竞争理论还可以适用，但大企业已经开始趋于支配地位。它们那种少数企业控制市场的竞争形式、它们的社会影响以及政治作用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理论在很长时间内所无法解释的。与此相对，马克思的集中和权权理论在早前就预言了这种发展，并且把这种发展纳入了一种整体的社会分析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社会科学学者，如希尔弗丁、鲍尔、考茨基等人，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但是，处于同时代的马克斯·韦伯、熊彼得、舒尔策-格沃尼茨等人，像美国“Corporation Capitalism”的观察家们一样，也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新的结构。这种大企业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自 19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形成，它出人意料地致力于保障稳定性、经营机会的合理估算、凭借企业内部的安全性赢利以及很大程度上通过共同控制市场而获得的繁荣。特别要指出的是，科学研究因此而进入了企业，以便使作为工业扩张的万灵妙药的技术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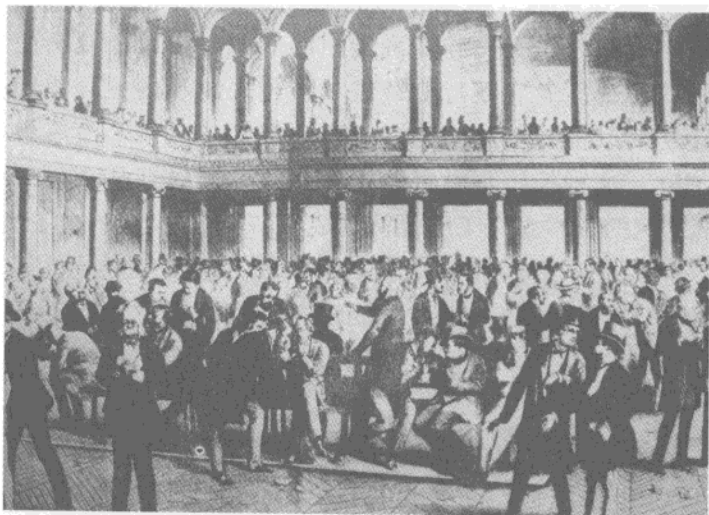


图10 柏林交易所大厅盛况

开始形成，它出人意料地致力于保障稳定性、经营机会的合理估算、凭借企业内部的安全性赢利以及很大程度上通过共同控制市场而获得的繁荣。特别要指出的是，科学研究因此而进入了企业，以便使作为工业扩张的万灵妙药的技术创新，



能够通过内部规划而不断涌现。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增长的无规律性及其后果，则通过受益者制定的短期性补偿计划而得到缓解。在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中，对于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竞争（也是价格的调节者）、企业主的独立性以及作为个人冒险回报的获利而言，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了。在许多方面，这种模式的资本主义是由以下看法来决定的，即现代工业的发展决不允许听任亚当·斯密所称的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来摆弄，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市场社会的幌子还要继续保留。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其他领域经济组织的集中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生产效率、合理化以及利润最大化的法则之下，通过水平的和垂直的联盟来跳跃性地增加固定资本的方式，形成占据支配地位的大企业、康采恩、托拉斯等控制下的巨大市场份额，不仅企业自身成长起来，而且各企业也会根据行业部门的不同而结成卡特尔直至形成垄断性的辛迪加。特别是在两个发展阶段的各个萧条时期，冒出来的卡特尔常常被视为暂时的“困境的孩子”，<sup>[9]</sup>然而，在一种持续增长的联合结构化的经济中，这种现象已经很普遍。于是，卡特尔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经济集中方面的典型的德意志特征。在诸如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这种经济集中则以另外的法律形式加以实施。这种基于企业和工业部门平台的集中进程还瞄准了民族经济的水平。保护关税即与此有关。这种保护关税会保护紧密关联着的国内市场，辅之以国家在外向型经济方面的诸多干预措施，这些干预措施视整个国民经济为一个经济单位。此外，人们出于攻防动机的需要，形成了“中欧”国家卡特尔之下的跨国家联合计划，但是也包含着明显的帝国主义特征，在垄断市场的基础上，带有向外扩大民族经济集中的取向。就政治社会史而言，有关这种集中进程对于工业和银行业领域变得越来越小的领导集团的意义，对于各种利益集团以及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等，还是一个没有解释清楚的问题。不管怎样，这种经济集中进程是德意志帝国时期早期可以确定的、典型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成熟特征之一。

1895年3月之后，世界经济的高涨、德国工业领域三大新的先导性部门以及大企业和大银行史无前例的各种投资可能性，将德国经济拖入了高度繁荣的旋涡之中。然而，如果将1895年到1913年的整个发展阶段视为高度繁荣时期，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一发展时期受到1900年3月至1902年3月以及1907年7月至1908年12月两次严重而相对短暂的萧条的打断。到这一时期的末尾，自1913年4月起，再次出现了向萧条的过渡，以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月份都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因此，不管怎样，我



们都不能奢谈这是一次平稳的景气周期。就资本主义制度而言，危机、下降、萧条、高涨、繁荣、危机等等这种起伏运动会继续发生。然而，严格意义上的繁荣时期（1895年到1900年，1902年到1907年，1909年到1913年，其间净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导致了工业生产方面的一种爆炸性扩张，同时，与早先时期相比，经济低迷情况会显著地迅速得到克服，以致很大程度上使人充满繁荣之感。当时有一位经济学家从事国民经济的总体统计。根据这位信息灵通的经济学家的估计，1895年到1900年间，生产增加了1/3，而国内消费却只增加了1/5。<sup>[10]</sup>由于1903年4月到1905年2月间出现了轻微的部门性衰退，因此，开始于1902年春天的第二次繁荣已经带来这种巨大的增长。然而，在1907年和1908年危机之后，经济繁荣极其引人注目，以致超过了世纪之交前的最后五年，也几乎达到了1867年到1873年的水平。德意志帝国的净国民生产总值从1908年的424.4亿马克增长到了1913年的524.4亿马克，增加了100亿马克。

1907年到1913年期间，传统的采煤业领域的产量从14 300万吨增加到19 100万吨，增长了1/3，铁产量增长了约50%，从1 300万吨增加到1 930万吨。帝国内部的铁路货运量也增加了1/3。但是，首先要指出的是，以通用电气公司和西门子为代表的电气技术成就使得褐煤生产增加了1/3（从6 250万吨增加到8 700万吨）。化学工业以及通过提供电动马达使中小企业活跃起来的发动机制造业，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增长率。销售需要由于不可避免的过量生产而急速增加，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德国向世界市场的出口。在这一时期，进口增加了220亿马克，出口则增加了330亿马克，德国对外贸易总额由1 560亿马克增加到2 090亿马克，增长了约1/3。<sup>[11]</sup>德国工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所取得的成就，自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成了人们热论的现象。在欧洲和美国保护主义的膨胀的情况下，德国人倍加努力，也总能达到令人惊讶的出口率，从而为缓和经济增长进程中的社会紧张氛围做出了贡献。

这些情况向人们展示了威廉德国在经济方面的光亮外表。然而，资本构成的进步却越来越困难。由于持续的信贷过度，在储备金用完之后，国际国内的政治危险临界线就逐渐临近了。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区别在日益扩大。依赖工资为生的工人阶级群体由于失业而遭受的苦难最大。1913年经济低潮时，失业人数达到348 000人，超过1908年的319 000人。然而，部分职员、手工业者和公职人员在经济高涨中也获利极少。1890年到1914年期间，英国、法国、瑞典以及美国的实际工资的变化是，平均每年提高



4%。倘若与之相比，德国的实际工资年增长仅为1%。因此，德国的实际工资“远远落后”是有根据的。<sup>[12]</sup>对于那种1914年以前德意志帝国“不断增长的国民福利”的悦耳的空洞言词，人们必须很冷静地对如此迅速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片面性分配提出异议。此外，由于实际工资增长缓慢，妇女参加工作的人数增加了。例如，仅在1905年到1913年间，职业妇女人数就增加了1.5倍。许多家庭只有通过妻子的全职工作，才能跟上生活费用的上涨步伐。生活费用的上涨是近乎持续性的，而且涨幅很高，仅1900年到1913年间就上涨了1/3。生活费用的上涨是食品价格昂贵的结果，而食品价格的昂贵则是比洛夫的关税政策（1902年12月，比洛夫政府为了帮助德国农业界对付外来竞争，推动德意志帝国议会通过新的关税法案，大幅提升了农产品进口的最低和最高关税。译者注）的结果，而这种关税政策本身又是德意志帝国社会权力结构的结果。

德意志帝国的关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要得到大地产所有者，特别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贵族的首肯。一位众所周知的著名观察家弗里德里希·瑙曼对这一“旧的统治阶层”在1900年左右时的规模做了估计（通过M.韦伯也可以了解到）。当时帝国人口为5600万左右，这一阶层为24000人。然而，这一小撮权力精英当初就坐镇于他们的庄园和县长职位上，几乎不受限制地根据其利益统治着广大农村地区。未经整理的传统法律给予容克以各种好处，因此，容克们数十年来一直抵制制定法典或者对传统法规体系进行修订，直到1891年，才成功推广了一部普鲁士乡镇条例。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等于是一种“法律上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法律上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庄园主可以做出各种对自己有利的决定。在日常生活中，1891年以后的变化也不大。大约从这一时期以来，对于那些法律上失去社会地位的农业工人、雇农、农场的固定工人等而言，由于工业区的持续繁荣，向国内工业地区进行迁徙的逃避性流动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因此，这种农业区的人口外流也被描绘成一种“潜在的罢工”。<sup>[13]</sup>此外，有如在军队中或在国家政策方面一样，在县级和省级行政管理中，贵族的利益同样会得到照顾。由于19世纪60年代战争的影响、俾斯麦政府以及普鲁士的霸主地位，由于德意志帝国宰相对普鲁士议会、普鲁士官员以及普鲁士宫廷的依赖性，由于直接或间接控制着许多关键性权力职位，德意志帝国的政策也处于贵族利益的强大影响之下，以至于自由主义者班贝格尔称之为德意志帝国内“如此情况从未见过的容克统治”。这样一个“事实”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年代里人们批评“农业党统治整个德国”的基础。<sup>[14]</sup>





贵族的传统领导权利受到顽强的捍卫，而且在很长时间内根基非常稳固，以至在经过 1848 年革命、宪法冲突和波拿巴主义之后，已经迷失方向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屈从于“封建主义”，确切地说，就是一种对贵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进行模仿意义上的“贵族化”，以适应贵族的价值观和追求。拥有一座骑士庄园，儿子们在近卫军“服役”，或通过令人信服的门路熟悉新的封建荣誉观念等，都成了资产阶级的新理想。这些理想与他们放弃夺取政治优先权相得益彰。与这样一种对陌生的生活方式的拙劣模仿相对应，在涉及到贵族这一“祖传统治者”关系的问题上，“德国中产阶级表露”出“大度的卑躬屈膝精神”。在经营方面，进行父权制操控方式的企业主和经理们则凭借他们是“自己屋子的主人”的看法，寻求企业自治的合法性，并因此将土地贵族的统治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军事等级思想移植到工业领域中来。<sup>[15]</sup>

如果人们可以将这些发展变化视为贵族的历史地位及其成果的后续影响的证据，那么，不论是向工业国家的过渡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社会力量的不同利益，还是对易北河以东地区大庄园主的经济基础造成迅速侵蚀的看不见的世界市场，都对贵族的牢固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早在 1895 年，马克斯·韦伯就认为，他可以断定容克“经济上正在垂死挣扎”，因为“如果一个经济上不断下降的阶级将政治统治权紧握于手中的话，长此下去，是与民族利益不相容的……”<sup>[16]</sup> 旧的统治阶层通过肆无忌惮的抵制、通过国家干预的现代化以及国家补助等形式来寻求阻止这种衰落。然而，由于许多变化过程置于其有效控制之外，如外国的竞争和工业发展等，大庄园主的这种针对强大对手的防御性抗争就变得越来越激烈，带有垂死挣扎的色彩。在 1887 年，即俾斯麦统治时期最后一次增加关税之后，1891 年之后的卡普里维时代（1890 年，俾斯麦辞去帝国宰相职务，卡普里维接任。）有利于工业的贸易条约使关税税率调低了大约 1/3。与此同时，农产品价格却处于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最低点。此后，由于大庄园主们的持续施压，1902 年又再次提高了关税。这次从 1906 年 3 月起全面生效的提高关税，明显超过了 1887 年的水平。在“集结政策”的范围内，首先涉及到了由埃卡特·克尔从阶级分析角度提出的和解问题，即资产阶级造舰队，易北河以东的土地贵族提高农业关税。生产谷物的大地产者再次从强烈的保护主义旗帜下得利。最高 25% 的经营农业的企业和 18% 的农村人口享受到了高谷物价格的好处。与此相对，根据卢约·布伦塔诺的保守估计，一个工人必须多工作 13 天到 18 天以上，才能弥补因新关税给食品带来的涨价负担。<sup>[17]</sup> 这种毫不掩饰的阶级立



法在新的世纪中照样继续施行。此外，比洛夫的关税法案在 1925 年重新生效并且在形式上一直存在到 1945 年。对于利益政策的历史连续性而言，这是一个范例。它成功地贯彻了那些既没有竞争能力又没做好转型准备的大地主的特权，并且在“帝国农业阶层”的“市场秩序”框架内实现了他们的理想目标。

1894 年，议员卡尼茨提出议案，要求帝国政府实行进口垄断，并且授权其在国内市场上依据 1850 年到 1890 年间计算出的平均价格出售，即使这一价格高于当时的世界市场价格也是如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庄园主的代表们在帝国议会中失败了。因为，根据古斯塔夫·施莫勒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估计，当时德国每年的粮食消费总共为 75 亿马克，而这一调整将使德国消费者为谷物生产者再额外负担 5 亿马克的“救济”。不过，这一“支撑着国家的阶层”成功地使进口许可证制度得到实施，这一制度起到了间接的出口奖励金的作用。它意味着，在德国纳税人负担补贴的情况下，黑麦可以重新出口。1908 年以后，德意志帝国甚至奇怪地成了“世界上第二大黑麦出口国”。然而，这也意味着，整个德国经济不仅人为地承受着维持谷物生产的负担，而且还要承担谷物生产扩大所带来的重负。<sup>[18]</sup>德国西北部地区生猪饲养的成果清楚表明，德国的农场主们很能适应世界市场。相反，由于进口许可证制度完全有利于以出口为目标的大庄园主，德国的黑麦种植收获量得到提高（1900 年到 1913 年间从 1 440 万公担增加到 1 910 万公担，增加 33%）。在相关进口邦，则推动了牲畜饲养和牛奶的利用。而这反过来必然使德国农业的转变更加困难。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而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土地贵族在经济政策方面过于成功的防御性斗争则是这种恶性循环的起因。在这里，一般性原则也是适用的。从严格意义上讲，反动的阶级都是通过部分地适应现代化进程，例如技艺高超地利用他们对于对外贸易政策立法的影响，以及提高管理效率等，并以多数资产阶级的沉默为代价，来延长他们的生命和统治。

在 1873 年以后，由于工业增长的不均衡性，不仅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而且所有的德国人，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害。在很短的时间内，到 1879 年为止，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相关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由于这种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一方面，大企业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随之迅速获得了承认，这就是所谓的自助措施。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现代干预型国家的早期形式出现了起初是犹豫的、试探性的，而后是目标明确的和大规模的发展。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干预型国家构成了一个现象的两面性，即大企



业和集中进程主导下的不规则工业发展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相关受益者推动“国家力量的私人动员”，以便在其帮助下渡过难关。这就导致了“对经济领域的极其有力的干预”。<sup>[19]</sup>另一方面，政治领袖、权力精英、官僚等，人们通常简称这些人为“国家”，他们也从自己的打算出发，在稳定现行统治并为之披上合法外衣的指令下，越来越深地插手经济过程和经济政策。干预型国家绝对不会下降到“那种”经济的代理人的角色。显然，在很早以前，国家就通过商业条约、领事、战舰、利息保证、补贴以及外交行为等，包括在自由贸易地区在内，对经济利益集团进行帮助。然而，在工业革命取得突破性进展后，似乎高速运转的工业化进程，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均衡性和波动性及其带来的无法预见的各种问题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才非同寻常地提高了对社会进行控制的需要。在这方面，1873年到1879年的萧条也提供了一种至关重要的经验，据此，有效的操控措施是绝对有必要的。1879年，帝国司法局国务秘书海因里希·冯·弗里德贝格曾评价道：数年来，“所有的想法，无论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都无一例外地受经济政策的影响和支配”，但是，现在它已经“完全取得了独占统治”。面对这样一种发展，国家开始较之从前更直接地干预或悄悄地插手，其手段包括保护关税和进口许可证、通过出口货物运输的优惠铁路和水运费率、通过对以深加工再出口为目标的进口货物提供优惠、税收优惠、根据前途看好的市场对烧酒酿造厂和轮船航线进行国家补助、扩增领事馆、获取殖民地等等。简言之，通过一整套的措施，实现政府在经济繁荣以及社会政治方面的操控努力。所有这一切得出的结论是，正如新自由主义所崇信的那样，干预主义并非“与制度不相容”，而是“制度本身所固有的，自我防卫的典范”。“没有什么可以确切地解释辩证法这一概念。”国家干预主义确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学习能力和抵抗力，假如完全只把它交给市场力量的话，那么也间接地证明了它的衰竭趋势。<sup>[20]</sup>

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时代的现象的起源。在当今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体制中，政府通过目标明确的干预来克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障碍，并由此努力保持经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这是使政治统治合法化的主要途径。在现代社会中，“合法性要求”导致的结果是，人们用一种“补偿规划来取代”最晚已经于1929年之后丧失信誉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观念形态。在这种“补偿规划”下，优先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领导精英们以及与之相关的利益集团有义务“维护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稳定条件”，“并预防各种妨碍增长的风险”。因此，他们也需要推行一种“保障工薪阶层



群体的补偿政策，亦即避免冲突的政策”。因此，持续而尽可能稳定的经济增长承担着一种卓越的“使统治合法化的功能”。<sup>[21]</sup>这种不可能从纯粹的经济动机中找到根源的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成长起来的干预型国家的诸多行为可以被视为国家进行引导以及支持国家的社会集团所做的努力。这也确实为经济和社会制度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它不仅改善了经济增长的机会，而且也使得围绕分配国民总收入以及争夺权力的斗争尖锐化。因此，尽管对传统的和神授的权威的批评越来越多，权威性国家领导和特权化阶级的统治却得到了加强。只有人们领会这种使现行统治合法化的功能，无论是1879年以来的关税体制，还是开始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帝国主义，政府的垄断计划和铁路国有化，种类繁多的对外贸易、税收和金融政策措施等，才会揭晓它的真正要义。

在这方面，人们必须考虑到，无论是理论上（即依据当时居于支配地位的经济理论），还是实践上（在法律和利益政策的可能性游戏空间范围内），政府的行动自由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它所采取的措施经常有一种实用性的探索，经历了多次的反弹，需要许多次的试验，直到证明其是一种确切的、有成功希望的手段为止。例如，保护主义或者帝国主义对于对外经济政策的特别重要性就表明了这一点。国家驾驭繁荣的三大现代支柱是货币、财政和对外贸易政策，而前二者无法帮助帝国政府。帝国银行要根据金本位制的游戏规则行事，此外也无现代的中央银行政策可供推行，因此，对政府而言，在对抗经济危机的货币政策方面，没有合适的杠杆可供使用。同样，在通过柏林的财政政策影响帝国经济方面，政府也缺乏中央机构。所以，根据当时的理



图 11 1888 年的宣传印刷品：左右两人为德皇威廉一世和宰相俾斯麦，上面写着：“我们德国人不惧世界上任何人，只敬畏上帝”



论和制度的可行性，只剩下对外经济是早期的国家景气政策可推行的领域。<sup>[22]</sup>因此，随着保护关税的实施，政府开始了第一次干预杠杆的使用。尽管关税税率不断提高，当保护主义在世界经济的波动面前无法提供人们所期望的保护时，采取措施促进进出口的要求也就日益增强。在这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干预型国家选择了真正具有广阔未来的行军路线。无论是帝国议会中的斗争，新闻界的论战，还是当时各种讨论的纷乱复杂，都不会遮掩住干预型国家崛起的必然性和各种前提条件。

有关这种干预型国家的崛起，无处不存在争议，其发展进程也并非迅速而毫无障碍。然而，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在德国，这种干预型国家似乎很早而且很清楚地表明了它的两面性。经济的活跃及其对社会和政治的巨大深层影响，需要进行控制，这一点显然是难以否认的，但是有关这种控制的范围，则一直存在争议。不过，就这方面而言，德国的未来属于伴随着迅速进步的高速工业化的干预型国家。因为只有进行社会控制，才能确保工业社会中各种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逐渐得到缓和。在这方面，只有正统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者或者集团利己主义者视而不见。在另一方面，一切都取决于谁是国家干预的受益者，这种干预所需的社会成本以及这种干预的目的。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社会权力结构决定了不可能推行有利于德国大多数公民福利的社会平等主义的经济政策。必须直言不讳地说，经验表明，这是毋庸置疑的。无论从长远的眼光还是从近期的情况看，前工业社会的精英、大庄园主或者重工业领域的封建绅士们，特别是独裁的国家领导者，都是国家干预的最大受益者。当然，与此同时，“由于保护关税而带来的生活费用的人为上涨”也确实成为“助大规模社会不安的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之一，这种不安则扩大了“社会民主党的基础”。<sup>[23]</sup>到1918年为止，德意志干预型国家始终保持着它偏狭的、反民主的明显特征。它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稳定性成果，通常是在保守性的特征下顺利实现的。这种稳定性成果不仅有利于那些狭隘意义上的经济利益集团，而且总是有利于那些反对民主的社会集团。因此，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国家干预的成功总是不断地使独裁统治合法化。

学舟网  
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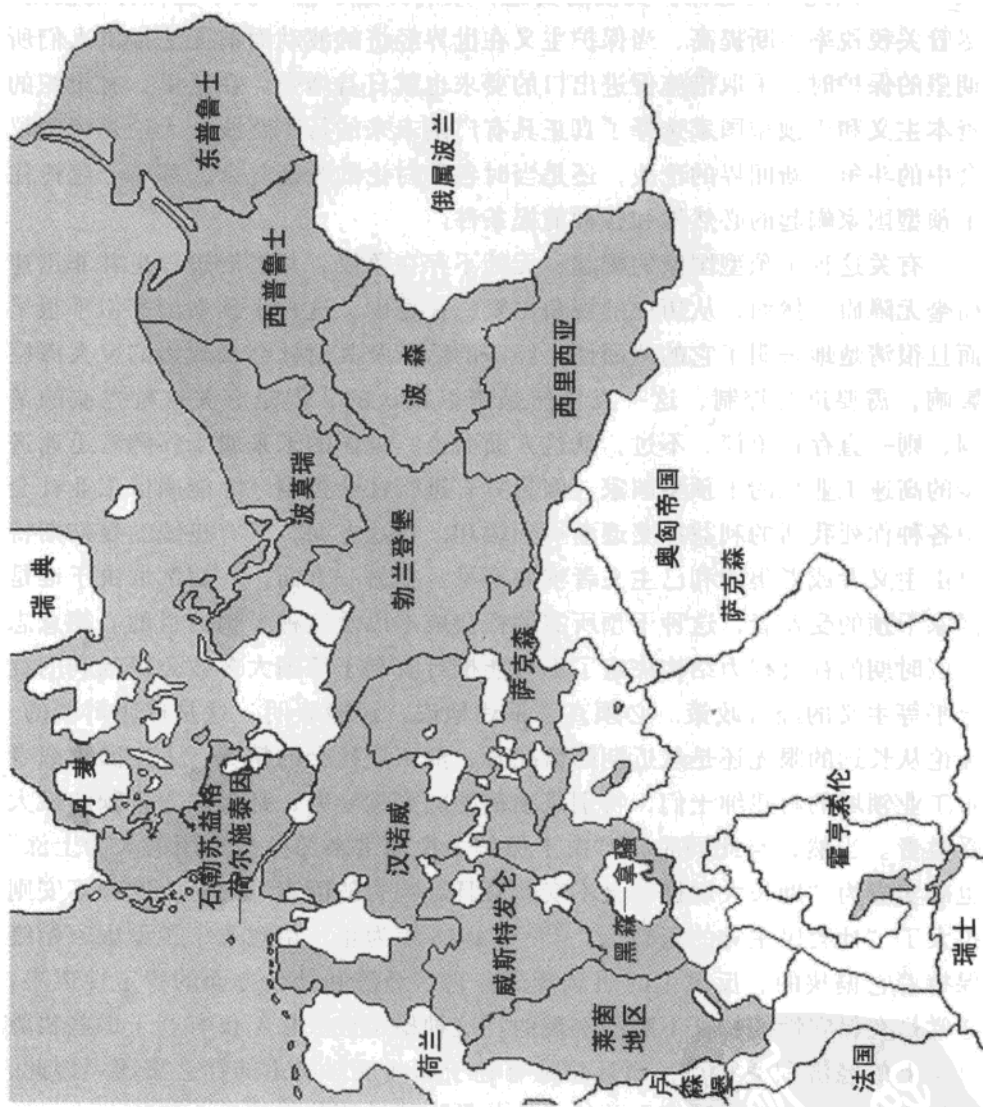


图 12 1871~1918 年的普鲁士王国及各省版图

PDF  
PDF  
PDF



## 第 3 章

# 统治体制和政治

### 一、政治体制

#### (一) 立宪君主制或假立宪的半专制主义？

在德意志内战（即 1866 年普奥战争。译者注）胜利四年半之后，亦即俾斯麦的第三次战争结束前夕，自 1866 年以来持续扩张的大普鲁士，在凡尔赛宫模仿过时的选举军事皇帝的方式，被重新命名为“德意志帝国”。在 1871 年 1 月 1 日用条约法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如果我们要从宪法本身和宪法的真实性之间的区别加以判断，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统治体制又有怎样的特点呢？德意志帝国的机构和组织法的基础是 1871 年 5 月 4 日生效的德意志帝国宪法，该宪法严格按照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发展而来。根据德意志帝国宪法，拥有主权的 22 个德意志诸侯邦和三个自由汉萨城市结成一个“永久的联盟”。这一宪法的组织原则，一个最高国家，即帝国，而处于附属地位、承担明确义务的各邦则被授予了一定的主权。这一个不是邦联的而是联邦的最高国家，只有在一个地区，





图13 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镜厅宣告成立

即“帝国属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从一开始就行使直接的、单一的国家主权。到1918年为止，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一直都没有独立的、在帝国联合体内赋予主权的国家地位。而根据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基本思想，赋予所有联邦成员一种主权国家地位是一种前提条件。各邦的正式主权是由代表各邦的机构即联邦议会来行使。与此同时，联邦议会还是各邦行政机关所认可的帝国立法机关的一部分。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普鲁士在联邦议会中都享有特殊的地位。联邦议会实际上只是“普鲁士统治整个德意志帝国的宪法上的遮羞布”（A.罗森贝格语）。因此，俾斯麦也将在联邦议会中的会议视为“是民族层次上的、由于其他的德意志大臣参加而扩大了、首先是普鲁士大臣的会议”。<sup>[1]</sup>然而，就象征意义而言，特别是在一般大众的意识中，“德意志皇帝”越来越成为德意志帝国主权的真正代表者。帝国宰相为这位“联邦主席”掌管联邦议院主席职位，通过副署各种帝国法令、规定、命令等，承担“相关责任”。当然，这并非一种完全的议会意义上的责任，而只存在已经缩水的副署签字的意义。这种副署签字就是晚期专制主义的德意志“法制国家”争取的象征性的官僚主义的共同掌权。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最高国家中，帝国宰相通常由于其担任的普鲁士首相和外交事务大臣的官职而成为普鲁士“帝国邦”的全部重心。这种多个官职兼于一身的情况，创造出一个异常重要的关键性职位。只有在面临权力腐蚀的危险情况下，作为宰相权力的各个官职支柱才会被停止。

由成年男子的普遍、直接和秘密选举产生的帝国议会拥有大约 400 个议席。除了君主、联邦议会和帝国宰相外，帝国议会构成了德意志帝国的第四大权力要素。由于“俾斯麦的众所周知的煽动宣传”，早在北德意志联邦时期，这一选举法就已经得到实施。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这是出于专制主义反对当时难以驾驭的资产阶级的需要”。这位德意志帝国宰相供认不讳地将他的希望完全建立在可以信赖的保守的选举者的优势之上，想借这种假民主的花招，“通过议会主义来推翻议会主义”。<sup>[2]</sup> 尽管对议会发展的压制在很长时间内都取得了成功，但是总体上看，他的保守打算经常由于帝国议会中政党的构成问题而受挫，或者只有通过额外的施压手段才能达到目的。他还必须以一种“完全的联邦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腔调”出现，以对抗帝

国议会中逐渐扩散开来的“民主和议会的中央权威主义”，并掩盖与之竞争的“普鲁士霸权下的中央权威主义”。事实是，通过这种方式，宪法的真实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了掩盖。然而，即使人们撇开宪法，不考虑德国政治文化中许多阻碍性的传统，由于议会的解散权掌握在皇帝和联邦议会手中，帝国议会除了拥有预算权，手中没有什么独立的权力要素。对于这类政治组织，托马斯·霍布斯早就说过，谁拥有“解散它们的权利”，也就拥有了“控制它们的权利，并



图14 普鲁士在德国的支配地位（漫画）



因此而控制它们的监督”。<sup>[3]</sup>

这种由普鲁士霸权、联邦制的帝国联盟、旧的极权体制和现代选举法等构成的混合体，能够确切地和充分地称为“立宪君主制”吗？人们应该视这种通过宪法加以限制的君主制为独立的政治形式或者仅仅是过渡现象吗？它可以被看做君主政体与有自由主义及议会倾向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拖延性的妥协、不可靠的和平或停战吗？它体现了封建势力的一种惊人的胜利吗？或者说，它仅仅只是一种具有大众倾向的议会主义的预备阶段吗？正如迄今为止的大多数德国历史学家一样，人们最近再次将这种国家形式视为一种百年前“德国宪法问题的合适的解决之道”。<sup>[4]</sup>然而，这里所说的“合适的”是指什么呢？对此，难道在缺少新的批评性研究的情况下，我们就对适用于1871年前的历史可能性再次得出结论，认为俾斯麦的解决方案是由于实际力量的原因而成为唯一的可能性抉择吗？或者从今天的历史视角看，甚至君主政体也被赋予“满意”的评价吗？对德意志集权国家时期的完美社会抱以怀念的人希望这二者皆是，然而，清醒的批评者却不再对二者表示认同。

在理解立宪君主制时，重点是放在“君主制”这一名词上，而非“立宪的”这一形容词上。它涉及到的是“国王的统治”。普鲁士君主不仅控制着占德意志帝国面积2/3的霸权邦，控制着专制主义国家的三大支柱，即军队、官僚机构和外交，而且是新的德意志帝国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军事和对外政策的最高统治者。德意志帝国议会从来没有真正成功地闯入这样的国家机密（*Arcana Imperii*）地带。实际上，在宪法的掩盖下，专制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在机构方面依然保留着，没有什么改变。如果说有利于君主行政的保留条件是立宪君主制的基本准则，那么，在帝国宪法的范围内，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皇帝根据其对上述三大支柱的支配权，就拥有了“决定性的以及由此而来的关键性的”影响力。换言之，专制主义的各种势力作为决定宪法的力量而继续存在。就此而言，由于旧的极权国家的权力要素仍然控制在君主（以及他的顾问们）的手中，以后所有的重大决定都将取决于处于专制国家顶端的统治者。

此外，虽然德意志帝国宪法对于资产阶级时代自由主义的要求不可避免地要做出让步，但是传统统治体制的坚硬核心仍然继续保留着。马克思在反对这种立宪君主制的辩论中低估了这一核心，称之为“一种完全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的中间体”。当然，从长远看，他的预言也是现实的。<sup>[5]</sup>由于真正的权力关系没有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独裁的、



半专制主义的虚假的立宪主义。在这里，如果人们从国家法的意义上更宽泛地理解统治一词的话，那就更确切了。因此，“逆时代而动的君主制的半专制主义”这一表述虽然尚有争议，但切中要害。<sup>[6]</sup>反之，由于在立宪的外表后面仍然完全保留着旧的专制主义统治的连续性，因此人们不应视之作为一种新专制主义。然而，以假立宪的专制君主政体来加以概括，并不能完全涵盖 1871 年开始的德意志帝国“真实宪法”的特征。诚如拉萨尔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特征“只能在一个国家中存在的真正实际的权力关系中”去寻找。<sup>[7]</sup>如果人们希望对德意志帝国的统治类型进行历史性的特征归纳，那么，人们就首先必须对 1871 年到 1890 年以及 1890 年到 1918 年两个时期加以区分。在考察第一时段时，首先要对俾斯麦的中心角色进行全方位的解读，其次要

对很大程度上由他体现的政治统治的社会作用有充分的认识。

### （二）到 1890 年为止的波拿巴式独裁统治

从宪法冲突到在凡尔赛建立德意志帝国，在此期间，资产阶级自由派最终屈服于“现实政治”，确切地说，就是打算忍受俾斯麦“在构建帝国的利益之上的……强有力的僭主政治”。然而，数年之后，随着民族自由党对帝国立法开始产生影响以及在自己的作用方面的自欺欺人，一些批评家开始谈论“宰相独裁”，称之为“一位……变得全能的乡村容克，在圆滑和古怪念头的支配下的残暴统治”。<sup>[8]</sup>在 19 世纪 70 和 80 年代，这一概念当然是无法从严格的国家法的意义上来理解的。正如这些批评者们所熟知的那样，依据宪



图 15 皇帝威廉一世



法，帝国宰相的从属地位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是，作为宪法现实性的描述，这一术语具有明显的强制性，以至于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甚至认为，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任宰相行使的是“一种独裁”。<sup>[9]</sup>事实上，就这一独裁因素而言，几乎不存在疑问。当时熟悉情况的人们，不论其属于右派或左派，在这方面的认知都是一致的。极端保守的德国驻彼得堡大使冯·施魏尼茨将军曾评价道：“一切都只取决于俾斯麦，决不会有一种更彻底的专制”。他认为，“Moi, je suis l' état”（法语，意为“朕即国家”。译者注）就是“俾斯麦独裁”的北斗星。后来出任国务秘书和文化大臣的博塞，在进行近距离观察后，也得出了这样的看法：“一切都取决于俾斯麦。他完全控制着大臣们”。来自梅克伦堡的联邦议会议员奥尔登堡抱怨道：“在这位朱庇特的统治下”，一切都“在经过调适的节拍和提供的缄默服从之下……”进行，“一切都要默默地屈从于这种束缚。”像梅菲森这样的老自由党人则认为，俾斯麦“早先就是强势人物”，这位“侯爵的专制主义”置于“其权力和自负的顶点”之上。自由意识党的卡普则尖锐地嘲讽道：“对俾斯麦而言，根本上只存在一种政府形式，就是他个人”，因此，他在帝国议会中急需的只是“一个被阉割了的多数……，他们不得张嘴”。像英国大使安普西尔勋爵这样的外国观察家们也相当明确地谈及这位“德国的独裁者”，称其“正处于权力的顶峰”。美国公使卡森的评价是：一个“原则上全能的独裁者”，他的“威望……目前还没有找到欧洲历史上的先例”。法国外交官圣·瓦列尔和德·考塞尔也曾多次重复这些评价。<sup>[10]</sup>还需要最后证明一下的是，皇帝威廉一世就坦承：“在这样一位宰相手下当皇帝，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一次因说话漫不经心而漏嘴的错误暴露了他有悖于宪法的看法：“您的下属必须享有您的信任”。这就是柏林中央的真正等级制度。在这方面，俾斯麦用令人赞赏的坦率，准确地描述了他熟练地装出的“勃兰登堡选帝侯国的封臣”角色：“总之，我是德国的主人，只是名义上不是。”<sup>[11]</sup>

尽管如此，宰相独裁的概念仍然不够。它过于狭窄，过于个人化。对于一种适应于德意志帝国的宪法现实性的比较统治学类型而言，波拿巴主义的概念是特别有用的。它在关于统治的社会功能方面具有启发性的价值，这就是在当时的德国也存在的、由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公民投票和传统主义因素组成的特有的混合。波拿巴主义源于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以及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sup>[12]</sup>一文的阶级分析中。它最早是指工业化较早时期的一种专制统治类型。在这一时期，前工业社会的精英仍然能够证明他们的强大力量，而资产阶级也在迅速壮大。然而，就像1848年到1849年“红色



幽灵”的不祥之兆所警告的那样，资产阶级已经受到来自下层的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威胁。当然，在这时就谈论各主要社会阶级之间的均势，显然是不对的。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传统的、等级性的权力结构在此时已经明显不合时宜。资产阶级由于害怕社会暴力革命而坚定地转向与旧势力妥协，并且放弃了直接行使权力的要求。工人阶级则作为现代化的力量或者引起恐惧的变革的象征而存在。这是一种不确定的、悬而未决的状态。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形势下，如果有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家，利用一定的、明显合乎时势的手段，就可以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开辟一种保守性的稳定政策。历史经验表明，这经常是一种有限的妥协的混合物。它一方面包括对各种进步性要求，诸如选举权、社会政策、经济法规等方面的令人吃惊的让步，另一方面又对反对派施以激烈的、毫不掩饰的镇压和迫害，诸如非常法、新闻压制、驱逐等。它还通过向外进行军事冒险或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并辅以政变、少数民族动员等的威胁以及实施帝国议会选举法、领土兼并等革命性的手段，来转移国内要求解放的压力。诚如俾斯麦的保守派良师益友路德维希·冯·格拉赫所见到的那样，正是这种最后的特征将波拿巴主义政策与传统的保守主义区别开来。在表决或选举斗争中，通过公民表决式的鼓掌来获得赞同，这是波拿巴主义政策的战略。在这种组合性战略的帮助下，传统统治阶层以及工业领导阶层的统治优势会再次得到确认，并且仿佛会超越历史时代而得到



图16 俾斯麦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延长。当然，他们必须再次忍受一定的政治限制，以便在社会中、在社会转型的各种力量的激烈交锋中继续起作用。统治阶级出于各种不同的保护的 need，会容忍甚至要求由于上述形势而形成的专制行政权力。针对上述力量状况，这种专制行政权力可以暂时达成各种极端的和直接的社会影响力的一种相对平衡，实现一种相对的高度自主性。从某些方面看，它是针对工业化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后果的一种绝望的防御性抗争。就专制行政权的社会作用而言，其他国家在短期内，德国则在长时期内，这种掩护退却的抗争具有保守的社会意义，是反解放的，完全意味着对整个社会现代化的一种阻挠，而绝对不会只是局部的改变。

俾斯麦计划既当传统统治阶层的代表又当“守法的资产阶级”的“救星”。恩格斯在俾斯麦 1866 年 4 月选举法的突然打击 (1866 年 4 月，普鲁士在德意志联盟议会上提出议案，要求召开一个由全民族直接选举和普遍投票产生的大会，以便接受和讨论德意志各邦政府提出的关于修改联盟宪法的草案。俾斯麦此举旨在为普鲁士争取民族自由主义的支持，打击奥地利。译者注) 之后，就以极其敏锐的目光，从对法国局势的分析中得出了普遍性的结论。他首先考虑到了作为资产阶级救星的第二种作用。“波拿巴主义确实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宗教。我越来越清楚的是，资产阶级没有才能去亲自进行直接的统治，因此……波拿巴主义的半独裁就是标准形式。它实现了资产阶级的巨大物质利益，即使反对资产阶级，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分享哪怕是部分的统治。另一方面，这种独裁又被迫在违背自己的意志，接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因此，我们现在有了俾斯麦先生，他采纳了民族联合会的方案。当然，付诸实施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俾斯麦是几乎不可能与德国资产阶级一起失败的。”<sup>[13]</sup> 在这方面，俾斯麦事实上并没有失败。然而，他不仅慷慨大方地满足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经济愿望，保护他们免受反抗强烈的“第四等级”的伤害，而且如在历史上取得的成功一样，也巩固了传统精英们的地位。与主张自由贸易的民族自由党的合作，暂时使得这样一种“半独裁”的特征得到掩盖。但是，在 1873 年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不久，这种“半独裁”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1879 年以后，这种“半独裁”则较之以前更加彰显。到那时，社会政治状况的各种有利条件，诸如经济的繁荣、相对较少的政治参与、在与国家机器关系方面相当弱小的政党等，都非常利于俾斯麦的统治。在此，有关俾斯麦本人的无可争议的灵活性就更无须赘述了。然而，此后，社会政治状况发生转变，以至他越来越考虑进行政变。他对统治体制的政治驾驭则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俾斯麦在传统的和现代的因素之间进行混合平衡，这是一种典型的波拿巴主义。例如，他将专制主义的军事政策与干预型国家的、公众表决为基础的利己政策结合起来；到1871年为止，他推行战争政策，此后，他又在19世纪80年代推行社会和经济帝国主义。其目的在于，通过将注意力转向外部，使国内问题变得沉寂下来。尽管如此，他依靠的是一种无可争辩的、逐渐增强的超凡魅力，即通过建立帝国、外对政策以及在传统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大统治阶级之间长期成功的调解，来维持其统治。路德维希·班贝格尔是德意志帝国时期最著名的自由党人之一。他在与俾斯麦共处近30年后，极不情愿地承认：“人们不得不呆在那里，以便证明这位处于颠峰的男人对于其周围的一切人进行统治。在德国，有一段时间没有人能知道，他的意志到底能够达到多远的地方”，“他的权力极其稳固，以致所有一切在他面前都会吓得颤抖。”并非每一个人都保持这种具有嘲讽意义的敬而远之。布克哈特对这种敬而远之的评论是：“对于德国而言，……俾斯麦简直就是那种独裁奥秘的依据和标准。”然而，即使清楚俾斯麦错误和弱点的保守党人，在1789年、1830年和1848年三次革命的打击之后，也不得不承认，“最重大的任务就是阻挡革命的洪流，……无论如何，眼前别无它法”。<sup>[14]</sup>因此，一种没有成见的评价得出的结论是：“1862年以后，普鲁士德国也找到了它的专制主义国务活动家。”“俾斯麦政策的‘波拿巴主义’的特点隐藏在用礼节和技巧装扮起来的君主主义传统外表下。他是国王的臣仆，是皇帝的宰相……，而他与以前的内阁政治首领的区别是他的政治游戏中的‘现代性’，‘the figure in the carpet’（意为“不能立即看清的图像”。译者注），这也是‘波拿巴主义的’特点。波拿巴主义的特点还可以从他在国内外不断重复的冒险政策、对普选权的操纵、鼓动性的招术、对合法性的藐视以及对保守性革命的矛盾心理中得到确认。”<sup>[15]</sup>但是，倘若人们不去过多地强调个人因素，而是稍微改变一下马克思有关德意志帝国特点的分析，那么，人们就可以轻易地看出，直到1890年为止，波拿巴主义的独裁统治因公民表决而加强了。它对传统精英有利，但又以部分的现代化而成功地处于迅速工业化的外壳之下。它是一种半专制主义的、假立宪的、部分地受到资产阶级和官僚政治影响的军事君主政体。这充分说明，俾斯麦的位置既处于非正式的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又处于波拿巴主义统治的社会保守性功能的顶端。

至此，还有两个考虑。由于波拿巴主义统治时期与序言中所描述的德意志帝国“建立时期”有所重叠，这一统治时期因此特别重要。尤其是1879年这个转折点，具有关键性意义。如果说到此时为止，俾斯麦还在对内政



策、经济立法以及对外贸易政策方面与自由党人合作，那么，1873年以后的萧条则开始首先削弱这一不稳定结构的经济基础，然后又冲蚀它的政治基础。但是，对于民族自由党而言，这种不稳定的结构并非一个纯粹的“对某一方片面有利的公司”。在处理干扰工业和农业增长的问题方面，德意志帝国政府在1876年以后开始改变方向。它开始寻求一种反自由的保守派的集结，其支柱是工业和农业生产领域中的巨大利益集团。这些“生产阶层的卡特尔”随着1879年保护关税体系的出台而引人注目地浮现于大庭广众面前。此后，直到1918年为止，这样一种保守派的集结政策的游戏方式构成了德意志帝国政治的基础。与此同时，许多政治和社会领域还经历了一次后果严重的去自由化。由于这些进程是由俾斯麦协力推动的，且他的极端独裁也有助于这些结果的合法化，因此，在1890年以前，已经为整个随之而来的德意志帝国历史确定了一条灾难性的道路。有鉴于此，广博、多疑而且反对个人崇拜的班贝格尔曾对这些结果做了评价。他指出，俾斯麦已经“确定了轨迹，德国的机构、法律、以及更重要的精神状态等，皆在其中运行”。<sup>[16]</sup> 集结政策具有关键意义的最初12年，处于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的半独裁统治时期。这种集结政策受到相关附加措施的支持，从普特卡默的公职人员政策（见下文（四））到国家社会保险制度，从帝国政府国民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职业等级实验到海外扩张等，都加固了俾



图17 俾斯麦离职。英国《笨拙周刊》漫画：领航员离船了





斯麦时代通向反自由的、专制的、新德意志的权权国家的道路。因此，汉斯·罗特费尔斯在1945年以后的评价是对的，这就是，在德国政治中存在继续“阻碍资产阶级成熟”和“美化借口”的问题。他指出，“不管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的道路有多长，多么曲折”，第一任帝国宰相似乎“……要对方向的改变负责，至少要对方向改变的合法化负责。他向顶峰的爬升是灾难性的。从我们的时代来看，这一点已经变得显而易见”。<sup>[17]</sup>

俾斯麦通往20世纪的道路，是用一种立竿见影的、巨大的德国社会和国内政治发展的负担换来的。在这方面，还有他那具有同样严重问题的对外政策，我们都要做进一步的探讨。无论如何，1890年时，从帝国内部、帝国社会的宪法角度来看，一种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占据了支配地位，那就是，“这位伟人无疑已经失败了。”在很早以前，布克哈特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他再也无法治愈帝国内部的创伤。”而特奥多尔·莫姆森持有的观点是，俾斯麦“已经折断了德意志民族的脊柱。”“俾斯麦时代造成的损害远远大过了它所带来的好处。这一时期所获得的力量价值由于随之而来的世界历史的巨大风暴而再次损失殆尽”，而通过德国的波拿巴主义“所造成的奴役则是一种灾难，这种灾难是永远不可能再变好”。<sup>[18]</sup>当然，有关这种明显的损害，在此还有很多要说。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无法遮掩的：与这种集结政策相联系的统治阶级的新权力结构在俾斯麦时期已经习以为常，因此，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尽管会有各种不顺畅，但仍可以运行。1890年以后，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随着俾斯麦的辞职，波拿巴主义式的统治

的榜样和象征都一并从柏林消失了。

（三）1890年之后的持续性国家危机：没有协调的独裁性多头统治

俾斯麦辞职以后，普鲁士德国的权力金字塔就失去了它的顶端。或者说换句话说，根据俾斯麦的能力设计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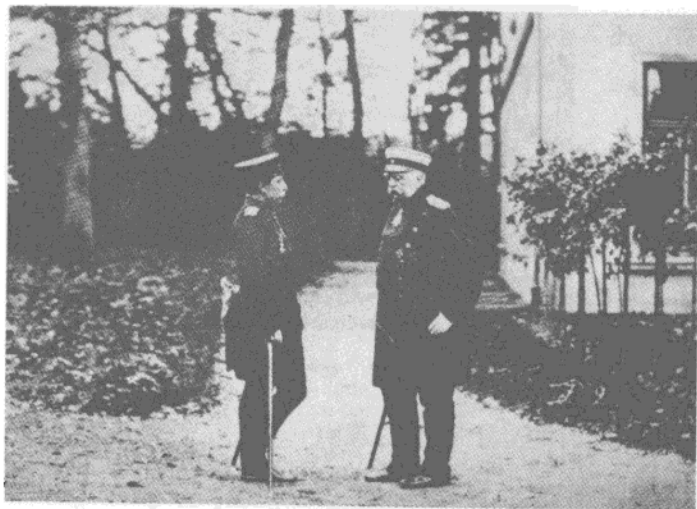


图18 威廉二世皇帝拜访俾斯麦（1888年）



及他所习以为常的宪法实践等，都缺乏一个协调中心。因此，不论事实上还是氛围上，都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各种不同的人物和势力都试图填补这一真空。由于在很长的时期中，俾斯麦和议会都没有取得成功，于是，德国在一种自负的统治背后，存在着一种长时期的国家危机。这种长时期的国家危机导致了一种有多个对抗性的权力中心并存的多头统治。这种多头统治体制也是导致德国出现“之”字形路线的原因。此后，这种“之”字形路线经常驾驭着德国政治。首先，那位年轻的君主（指威廉二世。译者注）试图同时将皇帝和宰相兼于一身，以俾斯麦所讥讽的“大众喜爱的专制主义”取代一种至少在形式上是椭圆形（意即存在皇帝和宰相两极权力中心。译者注）的体制。<sup>[19]</sup>这一实验就是一种迈向“亲自统治”起点。然而，这并不符合宪法规定，而且威廉二世也没有长期改变宪法的现实性。他的顾问团抱着皇帝有决定权的幻想，总是喜欢以拜占廷式的谄媚来应付决策过程。不过，无论是从个人的能力还是从制度的要求出发，这位霍亨索伦家族的末代皇帝都没有能力对德意志帝国进行独断统治。而这些能力和制度要求是与军事指挥权力以及交际方面的帝国政策紧密关连在一起的。其实，还在进入20世纪之前，他的这种逆时代而动的游戏就已经失败了。当然，一方面，他继续其过分的的要求，不断超越宪法赋予他的权限，另一方面，他又充分利用对立宪君主体制行政权有利的法律认可的保留条件，用充满激情的雄辩，强调他对皇帝的统治的异乎寻常的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完全暴露了自己的看法，即根据权力的重心来看，他所起的只是一个“名义皇帝”（H.德尔布吕克语）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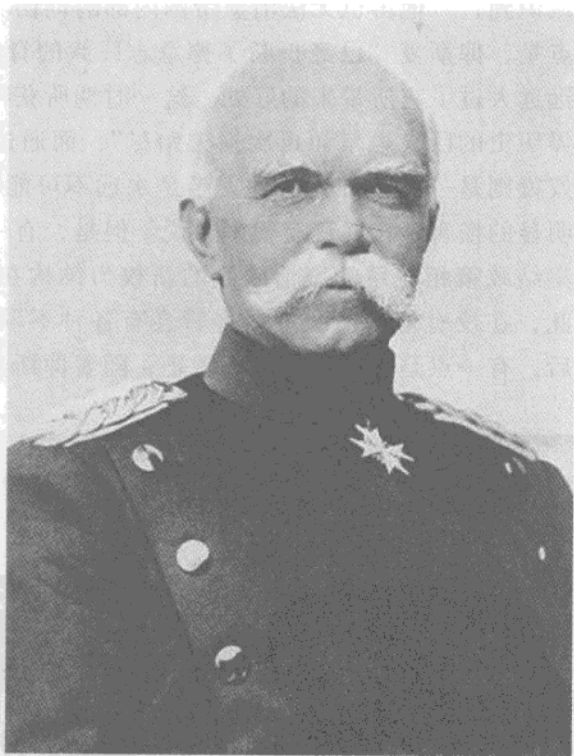


图19 帝国宰相卡普里维



图20 带有威廉二世画像的壁挂

另一方面，宰相们无一例外地是通过在官僚和外交等级制度下的辛勤努力，才慢慢爬上来的。在俾斯麦看来，这种道路是极其有害的，而马克斯·韦伯则视之作为一种灾难。他们因此很难完全填补权力的真空。正直的卡普里维由于缺少对权力的敏感性，在很长时期里都受到低估。他毁掉了一个一直以来有利于宰相们活动的制度平台。毕竟，这个短命的“卡普里维时代”首先通过对工业界友好的对外贸易政策，试图适应工业国家的需要，并且暂时寻求工业界的必要的政治支持。这种

敌视农业界保守势力的政策以及敏感的权力格局，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恐惧，以致他们推翻了这位宰相。在随后的年份里，1890年到1894年期间这种受到威胁的经历无疑对农业界保守势力的态度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此后，年迈的霍恩洛厄-席林斯菲尔斯特 [霍恩洛厄-席林斯菲尔斯特侯爵 (Chlodwig Fürst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 1819~1901年)，德国政治家，1894年到1900年间担任德意志帝国宰相兼普鲁士首相。译者注]。承担起了过渡时期的傀儡角色。尽管比洛夫被认为是威廉二世的“俾斯麦”，他体现出来的只不过是一只熟练灵巧的机械手形象而已。贝特曼·霍尔维格是有文化素养、勤奋、不愿惹事的官员的典范。但是，他推行“对角线政策”也失败了。所谓的“对角线政策”，就是皇帝任命的官员政府在一种制度内管理各种问题。而实际情况是，已经无法再用这种方法进行统治了。米夏埃利斯—赫特林—巴登 [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 (Georg Michaelis), 1857~1936年，德国政治



家，1917年7月到10月担任德意志帝国宰相，是德意志帝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贵族出身的宰相；格奥尔格·冯·赫特林（Georg von Hertling, 1843~1919年），德国政治家，1917年11月到1918年9月担任德意志帝国宰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Prinz Max von Baden, 1867~1929年），1918年10月出任德意志帝国宰相，11月9日宣告威廉二世退位。译者注] 只是一个舞台上的几个苍白的形象而已。这一舞台在1916年以后被第三最高统帅部的军事独裁所控制。至于那些被古典政治理论一直视为公共福利的事情，作为宰相，只能一点一点地加以协调，逐步地实现。

然而，除了他们之外，还存在一些秘密的关键性人物，像冯·蒂尔皮茨这样的人物，由于负责舰队建设而对德国的内外政策、社会、财政和军事政策等都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从1898年到至迟1914年夏天幻想的破灭，也即蒂尔皮茨的整个设想遭到失败，与这一时期在位的三位宰相相比，他可能有更大的决策影响力。这位帝国海军部的国务秘书曾一度挤入柏林的政治真空地带。

在威廉二世时代，权力精英中的关键人物比1887年到1890年期间要强得多。他们还包括一些大的利益联盟的企业负责人，宣传鼓动联合会的领导人，总参谋部的策划者等。特别要指出的是，各种利益联盟成为继普鲁士官僚机构、帝国政府、陆军和海军等之后的新的权力中心。与议会制的英国以及共和制的法国相比，德意志帝国的立宪君主政体作为强势的国家形式，带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在这种立宪君主政体表面的分崩离析之下，隐藏着很大程度的决策脆弱性和中央协调能力的缺失。然而，德意志帝国所有的重要问题都基于一种原则性的困境，即一方面是正在向工业社会前进的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传统僵化的政治结构。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既无法克服，也不会克服。此外，小部分传统统治精英的经济和统治利益也是关键性的障碍因素。当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团只是在议会中发挥影响时，这部分传统精英却热衷于维持现有状态。直到1918年为止，统治阶级中的前工业社会精英们一直维持着这种内政方面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在和平状态下看来是难以调和的。因此，德意志帝国无法进行合乎时代的政治调适，以应对已经改变的社会关系，它只是由于各个相互竞争的权力中心之间的短暂妥协而变得越来越僵化。这种力的平行四边形始终维持着一种静态的保守体制。面对缓慢而来的自由化发展趋势，亦即不断增强的议会的、民主的力量的平衡力量，这种保守体制会转趋强硬。但是，正如俾斯麦完全以梅特涅式的防御性政策风格所表达的那样，这种保守体



制的强硬会使自由化的“运动党反对……维持和巩固现有制度”陷于无力状态。<sup>[20]</sup>人们经常不恰当地把“威廉主义”视为这一时期的标志，而它归根到底只是对于各种压力集团、准独立机构、官僚制度和形式上不负责任的政治家之间相互协调的一种有效的遮掩。它可以被视为“半清醒、半糊涂的试验，也即通过一种个人的和象征性的权力集中，来解决政治结构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各种矛盾：德意志民族的皇帝是一种整合因素。”然而，“德意志皇帝一面用铁拳来镇压阶级对抗，一面又向这一姗姗来迟的民族许诺‘阳光下的地盘’”，威廉皇帝的这种梦想，实际上只能围绕着黏土基座上的一座软弱雕像转转而已。<sup>[21]</sup>不只是威廉二世给他所处时代的德意志帝国政治打上了烙印，而且传统寡头政治与多头专制统治的各种无名势力一起都产生了影响。就他们的力量而言，即使不实行一种半独裁的统治，只要用一种波拿巴主义的策略来捍卫他们的统治地位，也已经足够了。但是，其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 （四）官僚制度：统治要素和组织类型

不论是俾斯麦政府内的政治冲突的快速场景转换，还是威廉二世时期的多头统治，在这一切的后面，官僚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负担着国家各项管理方面的连续性。它构成了国家管理机构的坚硬架构，宰相和大臣们都必须考虑到它的份量，较高层的公职人员则总是觉得自己要比政党领袖们有优越感。不论是普鲁士的还是帝国的官僚体制，都不仅仅体现为一种政治统治的执行机关。更确切地说，它也有能力去准备、起草各类决定，或直接付诸实施；或者经常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它可以推迟、阻碍甚至拒绝执行相关决定。在这一方面，它与统治阶层特别是贵族阶层进行最紧密的协作，作为言听计从的执行者而发挥作用。但是，它的影响也是建立在它积累起来的专业知识、经验、传统的自我意识以及重要性之上的。在近代国家的构建过程中，作为各邦诸侯们的组织，德国的官僚制度是在反对封建等级的斗争中，通过扩建由中央操控的财政、税收、军事体制以及在君主和国家臣民之间建立起直接的统治关系而形成的。它是随着近代专制主义领地国家的成长而一起膨胀起来的，经常获得施加影响和行使权力的机会。最终，它作为一个功能性的和社会性的群体，给普鲁士国家打上了特别清晰的烙印。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近20年中，由于受到官僚主义化的专制主义的影响，它甚至获得了共同执政的地位。在1815年到1848年期间以及1848年革命时期，由于社会进程越来越超出它的控制，它的影响力跌落下来。但是，它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权力要素。虽然官僚机构和各政党一样，在德国的宪法中没有受



到足够的重视，然而，由于德国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它仍能对德国的工业化进程产生明显的影响。

1849年以后，特别是宪法冲突以后，自由派公职人员陷入了困境。俾斯麦不仅反复要求，而且以实际行动强调，“凡站在敌视政府、从事革命活动的政党一边的公职人员，……将通过责令其暂时退休待命的方式解除其职务”。<sup>[22]</sup>但是，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以后，这种以管理层的完全政治同一性为目标的保守性公职人员政策，才在俾斯麦和普鲁士内政大臣冯·普特卡默坚持下得到坚定的贯彻[参见第三章：三：（六）：1]。例如，在司法官僚机构中，这种方法就得到明确的贯彻：一方面，大量的自由派法学家被迫暂时退休待命；与此同时，宣布停止提拔，并将候补文职人员的时间从8年延长到10年。在此之后，开始实行相关专业的学生的预先培养以及预备役军官委任制。这种预选制度是，在长达4年的候选文官培养期间，可以进行仔细的考察。还要所谓的“财力证书”（Sustentationszeugnis），即必须事先得到父母的保证，表明他们有能力向他们的儿子提供足够的资金，以便他在现在以及可能在日后的候补文职人员时期，可以过上“与身份相当的”生活。在此期间，凡证明其毫不动摇地忠于国家者，同时因为拥有大量财产而博得的尊敬者，将在政治上被视为是可靠的。于是，当自由派的法学家们因受排挤而进入私人办公场所时，那些普特卡默体制的特殊宠儿们却提升成了国家的检察官。不过，他们还须在司法部的牢牢控制下，在接受指令的公职人员岗位上工作数年。这样一个效力于普特卡默的极端保守的群体，是彻头彻尾的唯上级之命是从的法律奴仆的新典范。他们会在几轮提升之后，成为司法权的主导者。

56

人们不能否认，包括整个行政管理在内的俾斯麦-普特卡默“改革”是与体制完全一致的。此后，与德国公职人员不关心政治的这一悠久的传奇相反，由于在保守和专制最大化的基础上致力于“可靠的信念”，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的官僚机构在政治上较之以前更加一致了。当然，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行政要客观、中立的令人眩晕的神圣信条”继续得到“不断灌输”。<sup>[23]</sup>公职人员相对较高的收入也没有改变。到1914年为止，下层公职人员的所得甚至比熟练工人还要多。与此同时，他们长期以来片面代表利益集团带来的腐败较之以前更明显了。由于规模越来越大的国家帮助和计划变得日益重要，1879年之后的干预型国家政策持续性地增强了官僚机构的影响。德意志帝国宰相霍恩洛厄-席林斯菲尔斯特认为，这样一支公职人员对队伍“比皇帝和宰相还有权力”。然而，仅仅这样一支近乎特权阶层



的保守公职人员队伍，就会让德意志帝国政策的有效自由化变得格外困难。也就是说，在官僚体制的“坚固网络”之中，推行自由主义的政策完全是不可能的。1903年，巴伐利亚驻柏林代表莱兴费尔德伯爵曾评价道：如果一位宰相胆敢在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依据“严格的自由主义”观点管理有关事务，那么，他首先必须要做的事就是，改变“整个官僚体制”。这无疑是一种西西弗斯的苦役（意即徒劳无益的重活。西西弗斯是希腊传说中的暴君，死后被宙斯处罚推石上山，石头到山顶时又滚下，于是重新再推。如此循环不断。译者注）。不过，原本就没有一位帝国宰相有意去推行一种“严格的自由主义”的国内政策。<sup>[24]</sup>

因此，保守的统治联盟可以信任这样的行政管理机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行政管理机器也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从1907年职业统计的结果看，根据奥托·欣策的估计，当年德国的公职人员约120万人，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属（240万），他们就占据了德国总人口的4%。也就是说，每10 000个居民中有126名公职人员。与此相比，法国是176人，美国是113人，英国是73人。如果扣除诸如邮政、铁路等服务性行业，那么在行政管理、司法等领域工作的严格意义上的公职人员有39万人，其中约55 000人位居较高职位，257 000人居于中等职位，还有77 000人处于下层。到德意志帝国末期，这些比例是否有很大变化，是很难估计的。<sup>[25]</sup>

此外，这支公职人员军团令人瞩目的管理效能，也是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极其典型的官僚组织方法和行为方式、招募方式和经历模式的结果。在普鲁士德国的行政管理史上，所有这些经历了四个世纪的历史积累，因此，在马克斯·韦伯的官僚政治理论中已经概念化。<sup>[26]</sup>与任务以及功能的细化相对应的，是职业化的专门人才的增长和培训。程序的形式化和客观规定、办事手续的书面化和连续性、卷宗和表格的档案化等，都有利于各种指令和决定的执行，使他们在控制、修改和计划等方面变得更加容易。作为既定目标，管理方面尽可能完全预先的考虑和合理化取得了进展。规范化的办事程序、明确的职权分工、所有上下级之间管道的制度化以及机关工作人员和各类政府的固定等级等，都适应了公式化的规范性组织流程发展趋势。统一的教育、考试和资格认证标准与根据经验、资历排成梯队晋升的机械性程序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政治方面的“社会关系”帮助下，人们是可以绕过它们的。终身毫无风险的工薪收入、津贴、养老金等带来的经济和法律方面的特权化，特殊的忠诚和关怀关系，还有发生纠纷时国家给予的特殊保护、行政管理审判权方面的特别的司法等，使这些“国家公仆”凌驾于其



他的社会群体之上，促进了他们的团队精神。直到1918年，制服、军刀、勋章扣带等还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的明显标志。甚至在一名低级的邮政人员的充满忧郁的岗位上，也拥有些许的自尊心，毕竟代表一点儿国家的权力。然而，这种制度结构及其功能也具有一种僵化、拖延决定和形式主义的咬文嚼字的固有倾向。诚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官僚机构的最大化绝不意味着是办事效率最高化的保证，因为在处理困难事务时，公职人员的自觉性、富于创新、敏捷的反应、超常态度等，都没有受到奖励。长期呆在“绿色呢绒覆盖的桌子”旁，生涯中的各种限制、职场上的虚荣心、脱离大众、对外一无所知、对内谄媚上级等，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并且是难以改正的错误。而且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普鲁士德国官僚体制也绝不像它想展示的那样，是唯一细致培养过的。例如，英国的职业公职人员队伍以及高层的法国的公务员等，也都有杰出的表现。然而，德国的公职人员在执行大部分的行政管理任务时，的确具有相当高的效率，大多能够牢牢把持他们的影响领域。作为稳定政治统治的要素，他们拥有不可估量的特殊价值。

主管机关的等级制组织模式使得各级职位的最高领导具有一种巨大的权力潜能。几乎所有的决策都要由他们去实施，而且经常由他们通过秘密指令的途径来进一步向下层传达。因此，统治利益集团要求，必须注意各等级的绝对可靠以及与制度的一致性。其结果是，直到1918年甚至更晚时候，贵族在这一领域以及其他关键职位方面的比重一直很高。1871年以后，虽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是，在普鲁士的中层和高层公职人员中，贵族出身者所占的比重仍像1858年时一样，达到42%。1910年左右，贵族在普鲁士各级机构中所占比例的情况是：普鲁士邦11个部的大臣中有9位是贵族；65位名副其实的枢密顾问中38位是贵族；12位省长中有11位是贵族；36位行政专区主席中有25位是贵族；467位县长中有271位是贵族。1914年，德国外交机构的较高职位分别由8位侯爵、29位伯爵、20位男爵、54位没有头衔的贵族以及11位资产阶级人士所占有。同一年，普鲁士政府的全部候补官员中，有55.5%是贵族，而1890年的比重为40.4%，1900年的比重为44.6%。到1918年，仍有55%的候补文职人员是贵族。普鲁士内政部是地方行政管理的控制机构，也是传统统治制度的支柱，贵族官员占了1/3。<sup>[27]</sup> 这些数据清楚地说明，社会出身已经预先确定了那些居于关键地位的公职人员的政治态度。所谓的法学家职位的独占则强化了这种政治上的顺从性。法律的学习和研究导致形成一种特有的固执态度，赋予了





一种预先确定的法制和行政管理方法 [参见第三章：三：（五）：4]。拉班德 [保罗·拉班德 (Paul Laband, 1838~1918 年), 德国法学家] 学派的法学实证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使 1871 年的“政府的现状”合法化, 并且赋予“其一种与政治无关的、‘纯粹的’正当性的神圣光环”。还有根据普特卡默的有关原则对教育的操控, 等等。它们为德意志帝国这样一个极权国家提供了服从性的专门人才。特别要指出的是, 宗教信仰的过滤器加强了公职人员的同一性。1888 年到 1914 年间, 包括宰相、帝国国务秘书以及普鲁士大臣在内的 90 位政要中, 只有 7 位是天主教徒。1904 年, 所有的政府候补官员中, 天主教徒占 16%, 政府候补文职人员中的天主教徒则占 7%。特别典型的是普鲁士内政部, 只有一位年轻的邮差是天主教徒。<sup>[28]</sup> 人们必须了解这些情况, 以便能够理解中央党的公职人员政策。同样, 只有了解德意志帝国时期普鲁士德国官僚体制的历史, 人们才能推导出, 魏玛共和国在继承了这样一种已经形成的公职人员队伍后, 它所承受的这一负担的所有影响。

德意志帝国的官僚体制模式已经超越了它的传统职能领域, 对德国社会生活中普遍的官僚制度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直到 20 世纪, 人们才在各个高度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社会中看到这种影响, 但是, 在德国, 由于行政管理历史的缘故, 这种官僚制度化进程开始得很早, 而且是全方位的。在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中, 除了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进程外, 人们甚至可以将官僚制度化当作单独的领域加以对待。除了国家、省级和地区的行政管理外, 在这几十年中, 官僚制度化在政党、利益集团、工商业、银行和交通等领域都获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一点可以通过对诸如农场主联盟或社会民主党、西门子或克虏伯等的进一步研究而得到证实。在这方面, 不仅公职人员的组织方法被模仿, 而且他们的特权化、影响和可靠性也同样成为所追求的目标。人们可以从工业界职员的发展例子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可能还在劳动和管理职能的专门化发展出独特的要求之前, 工业领域中早就模仿国家官僚体制的模式特征了。像以前官僚体制对早期工业化以及在工业革命期间的的影响一样, 这种在一定程度上过早的官僚制度化也给德国工业化鼎盛时期打上了特有的印记, 即对企业的发展灵活性具有极大的有害性, 对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组织效率则明显具有好处。对于迅速扩大的职员阶层而言, 完全模仿国家公职人员的“工业界官员”就是榜样。这种雇员角色在早期是受到企业主的法律支持的。与这种雇员角色相对应的社会心理, 则是一种具有长期影响的团队精神, 即羞于抗争, 认同作为“上级主管”的企业领导, 与手工业工人日益疏远。这里涉及到政治上的整合努力, 也反对平均主



义的改革，代之以推进社会不平等和职能方面没有必要的等级化（例如1911年的职员保险法），以便将这个“新的”中等阶层与统治体制捆绑在一起。<sup>[29]</sup>

同样，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官僚主义组织的利和弊，即使是人们选择居民登记处或自由工会，也不例外。不管怎样，早就启动并且在广泛领域内向前推进的官僚制度化，与高度专业化的行政管理要求的所谓“物质需要”相比，常常更多地受到前工业社会公职人员传统的决定性影响。这种官僚制度化不仅有助于形成德意志帝国的社会结构和集体意识，而且有助于在不寻常的范围内塑造这一帝国的公共和政治生活。因此，人们可以用“公职人员国家”这一普通的词语称呼之。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对官僚们长期的控制和经常刁难的态度积聚了大量的怨恨，这一点在1918年时非常明显。由于根据保守的普鲁士-德国国家官僚体制的历史模式的官僚制度化，完全可以肯定，自由化和民主化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

## 二、中心问题：捍卫现状反对政治动员

如果我们正确地把握住德意志帝国的这样一种困境，也就是通过捍卫社会和政治现状来反对与工业化进程相关联的“根本性民主化”（曼海姆语）的这样一种困境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还未成熟的资产阶级的逐渐政治动员，那么，我们也就能在成文的和不成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中，清楚地看出一种基本的结构性缺陷。到1918年为止，政治上的反对派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得到合法认可。每一种有关国家政治改革的压力都遭到拒绝。然而，在一个社会持续转变的时代，如果不想陷入僵化的危机的话，就必须接受合法的变革愿望。只有不压制推动改革，而是通过认可反对现状的正当性和承认改革的绝对必要性，一步一步地适应转变，保持制度结构的弹性时，工业社会各群体才能以其史无前例的动力来避开这种制度上的呆板性。从明智的长远眼光看，这些群体必须在体制中注入有益的改革压力，自觉地服从这种改革的压力，这样才能阻止革命的可能性，否则的话，就会为革命埋下伏笔，导致体制的崩溃。当然，对反对派长期歧视也是德意志帝国的一个特征，这也是德意志帝国垮台的原因之一。这首先在各政党的地位方面得到清楚的展示。他们都被有意识地圈置在“权力的前院”。<sup>[1]</sup>



### (一) 软弱无力的政党

早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德国的五大政党体制就已经形成了。这一体制一直存在到 20 世纪 20 年代，由于出现了德国共产党（KPD）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即纳粹党，以前译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译者注）的左右两派，这一体制才出现了问题。处于右翼的是保守派政党，在保守派政党和自由派政党之间的是天主教的中央党，左翼党派则是社会主义政党以及逐渐与之合并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这一政党体制内存在各种各样的细微差别和倾向，经历了多次的分裂与合并，但是有一点却不曾有，即传统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之间清晰的、毫不含糊的对抗。这种两极化也许就是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决条件。与此相比，在德国这样一个没有革命的国家，就形成了一种特别模糊的政党关系的编织物。<sup>[2]</sup>所有的德国政党都具有一种混合性的特征。一方面，他们坚持原则以至于僵化成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又随时准备调整 and 适应，以至于表现出赤裸裸的机会主义。从意识形态哲学学派以及神学方面的斗争可以得知，他们致力于理想目标的讨论、热衷于对信念的忠诚以及未来的计划等。然而，在实际的策略运用中，他们却不顾各种正统的世界观，显现出对预选确定的权力结构的高度顺从。旧的政治哲学的“自由”本来就被理解为国家权力的让步或补充，很少是从独立的自然法的角度来理解的。作为激进资产阶级左派的运动学说，早期自由主义者的政党理论与德国的国家思想相对立的。根据德国的国家思想，与政党的分治主义相比，只有国家才能代表全体。由此，极权国家的威望一再受到确证，反政党的印象一再得到助长，人们也一再要求政党的自我限制。在这方面，诸如特赖奇克等一些富有影响力的大众化人物起了特别关键的作用。此外，社会结构的多样性、有关政治秩序的不同看法、地区条件的差异和宗教信仰的区别等，也产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影响。在易北河以东地区的每个容克与德国西南部的的新教保守派之间，巴登的民主派和汉萨城市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之间，以及反过来说，在他们与西里西亚的贵族、萨克森的工厂工人、莱茵地区的农民之间，是什么使之没有分裂呢？近乎无数的裂痕、冲突和矛盾，使自由党人陷入分裂，政治上的天主教也只是短暂、艰难地克服了这些裂痕，而保守党人也出现了分裂。不管怎么说，要从世界观和利益的角度来清晰地划分德国的政党，显然头脑过于简单。从一开始，这两大要素就相互纠缠在一起，无法分清。纯粹的物质利益才直接从内部将他们划分为各个党派集团。值得注意的是，在很长的时间内，即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1929 年为止，基于最初的信仰团体之上的德国各政党，



仍持续着他们早期的冲突。长期以来，由于被排除在“权力通道”之外，他们的争论已经程式化，带有被迫妥协的特征。所有这些，都阻碍了德国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因此，诚如在促进解放中所看到的那样，各个中派和左派政党的中心任务都没有得到解决。在这里，民主化被理解成了逐步实现对法制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平等的努力贯彻。T.H.马沙尔的理论方案将向平等社会的运动设计为时间上相互衔接的三大进程，这大概只适合英国的经验。<sup>[3]</sup>然而，在德意志帝国，复杂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在这三大平等化进程中，每一项进程都已经进展到了最艰难的境地，现在它们开始重叠起来了。所有这些积累起来的障碍，即便不是在整个帝国范围内，至少应该在普鲁士，即便不是在下层市民中，至少在农村的雇工中等，必须加以解决。然而，与此同时，德国各政党作为这场运动的或许是最重要的发动机，却由于俾斯麦的帝国宪法以及作为帝国最重要的普鲁士邦的宪法而受到了束缚，他们被驱使着不断适应传统的秩序架构。

### 1. 自由党

早在19世纪6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就已经丧失了它的整合力量。德高望重者（Honoratioren）组成的委员会并没有能够获得广泛的群众支持，社会自由主义仍然是一种边缘现象。在这方面，突发性的“资产阶级从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分离出去”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而这种分离直到1869年为止都是被掩盖着的。由于无法逾越的利益对立和目标冲突，自由主义“进步派”的左翼，即年轻的工人运动，在诸如W.李卜克内西和A.倍倍尔等一些来自手工业工人联合会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领导下，独立出来。<sup>[4]</sup>然而，德国的自由主义却因此而失去了这唯一的票仓，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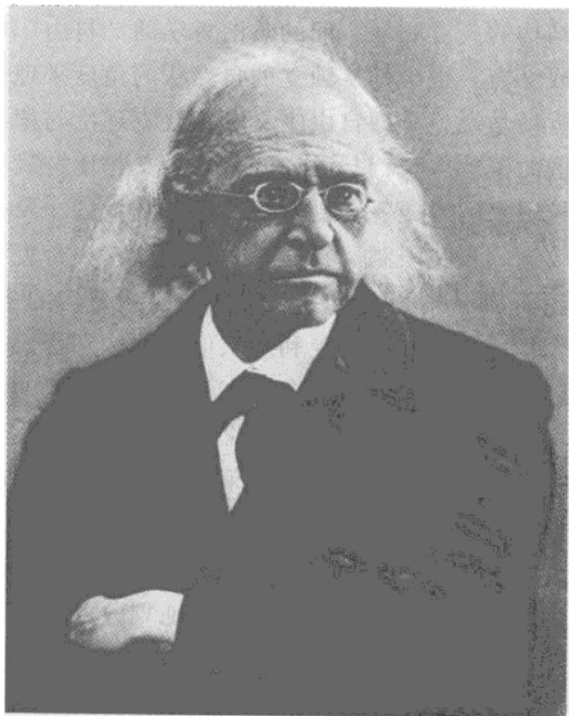


图21 历史学家莫姆森



这一票仓本来可以使之成为群众性政党。保守派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施塔尔在分析自由党人那种反对等级制度和贵族的资产阶级平等思想时，以政治对手的敏锐洞察力，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这些弱点。但是，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平等得到真正的贯彻，如果无产者阶级也拥有与他们一样的权力，仅此一点，他们就会放弃这些思想；并且会做出有利于有产者的政治和法律的差别对待。他们会要求财产资格限制，要求新闻出版业保证金，只在沙龙中举办时尚活动，不像对待富人那样尊敬和礼遇穷人。部分地实行这些革命原则就是自由党人的党派立场特征”。<sup>[5]</sup> 因此，自由主义违



图22 欧根·里希特

背了它最初的一个长远目标，即一个资产阶级的平整化的社会，基于一个阶级之上的社会，确切地说，是基于资产阶级各个阶层之上的社会。这一社会与自由主义所想象的那种仅限于少数人的、基于财产和教育之上的社会是相矛盾的。更进一步的是，自由主义开始遭受一个持续的瓦解过程，这一过程受到数十年来一直保存着的松散的德高望重者组织的推动，并伴以不断缩减的破碎的小团体的短暂合并。在这种情况下，中等阶层的选举者与1871年之后越来越具有重要性的工业资

本主义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成为德国自由主义的实质性问题之一。

宪法冲突导致了1866年民族自由党从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在此后的大约10年中，民族自由主义在政党发展中达到了它的顶峰。1871年和1874年的选举中，资产阶级中的“每一个人”都选择民族自由党。但是，由于始于1873年的6年经济萧条使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策信誉尽丧，在1879年和1880年的选举中，民族自由党这一鱼龙混杂的各种力量聚集在一起的政党



分崩离析了。正如民族自由党的左翼人物卡普在 1875 年以后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旧的政党的分解过程”首先清除了民族自由党的“各种可能的、有些是无法统一的志向、观点和目标的混乱”。民族自由党的右翼人物弗里德里希·哈马赫尔则完全认为，“民族自由党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个政党如果“高高在上，不关心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艰难，或者以神学式的目空一切来对待社会等级的差别，是注定要灭亡的”。<sup>[6]</sup>

1880 年，这一时刻到来了。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派的“脱离派”[脱离派 (Sezession) 即自由党联合 (Liberale Vereinigung), 1880 年 8 月底从民族自由党分离出来。译者注]走上了另外的道路。随之而去的有自由党的最重要的人物，其中包括班贝格尔、莫姆森、巴尔特、里克特、施陶芬贝格、卡普等。“本尼希森和米克威尔的汉诺威阵线”则留了下来。正是他们做了有利于“陷入混乱的举动，这种混乱是俾斯麦政府在散布的，其目的在于最终将德国置于容克阶级的控制之下，而这一点在以前是没有过的”。<sup>[7]</sup> 1884 年，当大资产阶级和工业界的右翼自由主义在左翼保守派的海德尔堡纲领的基础上合并时，左翼自由党人在 1881 年引起轰动的、也是最后一次的选举胜利（左翼自由党人在帝国议会的 397 个议席中获得 115 席，还获得了 23% 的选票）之后，“脱离派”与欧根·里希特的旧“进步党”合并成了运气不佳的“德意志自由意识党”。自由主义是名副其实的，但在这样一个社会保守的、专制的极权国家中，它的衰落已经是预料之中的事。到 1887 年，自由党在帝国议会中的议席已经减少到 37 个。它再也没有从这样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到 1918 年为止，民族自由主义一直维持在持续缩减的基础上。而左翼自由主义则于 1893 年分裂成了“自由意识联合”和“自由意识人民党”。弗里德里希·瑙曼的“民族社会协会”[民族社会协会 (National-Sozialer Verein) 的存在时间是 1896 年到 1903 年。译者注]作为新的蓄水池，以可怜的失败而告终。直到 1910 年，这些力量才在“进步人民党”的旗帜下重新联合起来。像从前的几十年里一样，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初的年代，尽管自由党人受到各种有关它的软弱的指责，它们仍然是“运动党”。然而，无论如何，现在在德意志帝国的国内政治中已经没有了团结一致 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1879 年之后，随着新的向右转的冲击以及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干预型国家政策的到来，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崛起，统一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恐怕再也不会出现了。

此外，还在较早的时候，即紧接着在 1873 年之后，德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就已经开始了另一种相当成功的发展。一个激进的右翼抗议开始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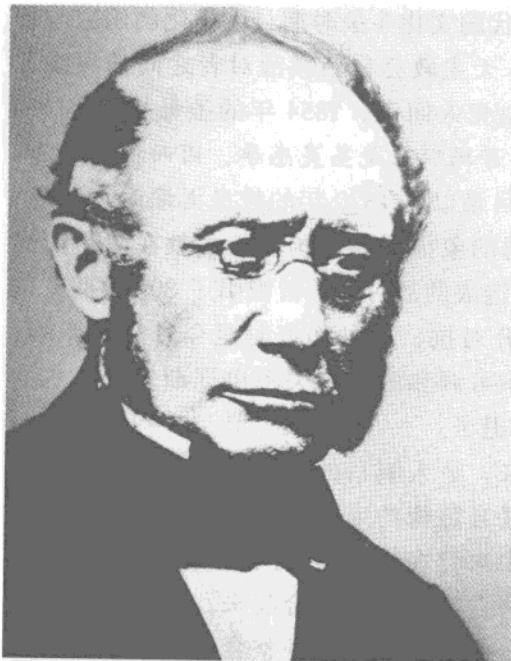


图23 中央党政治家路德维希·温特霍斯特

生作用。一部分从前支持自由主义的选民剥离出来，在对现代工业主义的反应中转向政治反犹太主义的抗议政党。到德意志帝国结束时，除了社会民主党之外，还有大约 60 万是敌视现存制度的异议者，其中有一半是反犹太主义者。尽管这一势力在德意志帝国时期还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它预示着一种发展。这种发展在 1918 年以后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对此，下文将再次涉及到。在此，如果说反犹太主义涉及到右翼自由主义，那么左翼自由主义就像所有的中间偏左的政党一样，感觉到了 1874 年制定的、直到 1918 年仍然

使用的帝国议会选举的选区划分带来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公正地划分的选区只对农村地区有利。相反，它无视大量的人口流向城市聚居区以及由此带走的大批选民。

## 2. 中央党

从政治色彩看，天主教的“宪法党”，即中央党，主要站在自由党人的右翼立场上。在德意志帝国这样一个打着北德意志新教烙印的国度里，作为宗教信仰方面的少数派政党，中央党有非常强有力的组织。它的基础是众多的、主要由教士领导着的职业性天主教联合会，可以被直接视为这些天主教联合会的政治代表。在天主教势力占优势的地区，它奉行一种强硬的路线；在宗教信仰混合的地区，它则帮助散居的天主教社区建立教区。为了捍卫自己作为少数派的自治，中央党根据天主教会的学说和新经院哲学的等级性社会哲学，在内部事务方面保持独裁体制，对外则与世隔绝，通过顽固的防守来对抗“敌视”它的周围环境，从而使之孤立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孤立于工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孤立于城市化和科学技术文明。它支持在德意志帝国社会内部进行天主教的亚文化教育。这明显形成一种分离性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地方变成了类似犹太人居住区。尽管如此，在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它开始流失选票，得票率从 23% 下降到了 1912 年的 16%。造成这一局



面主要有三个原因。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文化斗争时期，世俗化的国家与传统的天主教会之间存在直接的冲突，天主教会与新教敌对者之间的界线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对于开明的自由党人而言，1854 年的圣母教条（1854 年，教皇庇奥九世发布教谕，坚称圣母玛丽亚是圣灵感孕，因而没有原罪。译者注），1864 年反自由主义的禁书目录以及 1870 年的教皇无谬误声明等，是彻头彻尾的梵蒂冈的非理性和倒退的象征。在德国，天主教在政治上受文化斗争打击的伤害很深，文化斗争造成的敌对关系曾吸引了 80% 的拥有选举权的天主教徒支持中央党进行公开对抗，这种伤痕时至今日还有影响。但是，随着公开斗争的减弱，起初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也逐渐失去了它的基础。因此，中央党的吸引力也就消退了。

同样，对中央党而言，这些年来，令人瞩目的是，首先是城市人口的宗教虔诚在减退。与这种基督教的社会道德约束力的减退相联系，投票率也随之下降。从另一角度看，尽管中央党在很长的时间内，成功地将各种纷呈复杂的集团在共同的宗教信仰利益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但是，不断发展的工业社会内部日益增长的利益分歧却抵制着这种整合的要求。农民转向保守党，职员转向自由党，工人转向社会民主党。总之，他们相信，他们投奔的所在能够强有力地代表他们的特殊利益。在这方面，与中央党获得的对应选票份额相比，有利于农业地区的多数选举法和选区划分常常使它获得帝国议会 1/4 以上的议席。然而，人们可以从一个中心点来认识中央党政策的飞去来器效应。中央党竭尽全力支持教士垄断在父母屋里时期以及公立学校时期的早期社会化。但是，对于那些在相对安静的农村地区的乡村学校中长大的少数年轻天主教徒来说，城市化、国内迁徙、教育事业的专门化等等大量的不可控因素，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对于城市生活、流动性以及世俗性的更高层次的教育传统性敌视，实际上也就是围绕着对小孩进行天主教教育的激烈斗争，还有顽固而转向倒退的对混合婚姻的抵制等，这些问题都已经转移到了其他的方面，因而就导致了中央党影响区域的收缩。时至今日，在天主教“人不敷出的教育”中，这种对现代性的敌视传统所带来的损害依然存在。

中央党首先是一个具有攻击性的少数派政党，其次也由于它在 20 年间选票减少了 1/3 的缘故，它更强有力地围绕着过去的既定方向去进行斗争。这种既定方向大多是天主教会事先指定的目标，而绝非是通过民主化来改变一个它所敌视的社会。它还试图通过对德意志民族的极端爱国主义以及殊为勉强的对德意志帝国的效忠，弥补文化斗争造成的歧视和自卑，却因





此而在各种政治色彩方面紧密地与保守党走向接近。例如，它在帝国议会中支持有关的军事法案、海军政策以及帝国主义的决议等。人们决不能过高地估计中央党的左翼以及鲜明地反对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工会。而中央党的令人瞩目的见风使舵策略，它较之其他政党更大的政治活动余地，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之上的，即与对自己选民的责任相比较，它必须要更对天主教会组织负责。而在天主教神甫助手们控制之下的党内民主，也是无从谈起的。因此，中央党及其联盟的一小撮寡头就能决定地方天主教联合会和中央党的政策。由于是一种纯粹的利益游戏，中央党在这方面也就卖力地支持赤裸裸的反动政策，而普鲁士议会的三级选举制就是典型例子。这种三级选举制将使中央党比较容易地推行它的学校政策，另一方面，在做出一些重要决定时，对于它捍卫少数派显然也具有关键性意义。

### 3. 保守党

普鲁士的旧保守党是包括土地贵族、军队、新教教士以及官僚等在内的传统统治阶层的最大政党。一直以来，它的力量基础是传承下来而且成功地得以维持的各种统治职位。1871年以后，保守党仍然在许多地方保持着对权力通道的控制，并且在作为普鲁士国王的皇帝、上层军事贵族以及独立的新教教会的高级教士那里仍然是一种私人的效忠焦点。然而，与俾斯麦的分歧以及德意志帝国政府政策的新调整导致了保守党的一次重组。1876年，从保守党中分裂出新的“德意志保守党”。早在1866年，“自由保守党”就已经从旧保守党中脱离出来。他们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使用“德意志帝国党”的称号，代表着一小撮强大的、拥有高层部属官僚的农业和工业界大有产者的联合。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完全可以信赖这一个“俾斯麦一句话”的政党。因此，德意志保守党拥有巨大的或许并非总是很明显的影响力，而且直到1918年为止，它还强有力地捍卫着这种影响力。在长达20年的时间中，德意志保守党依赖于它在易北河以东地区的重要影响力，依赖于它的那些县长们的居间的统治地位，还有依赖一小撮职业政治家集团。这些职业政治家们就像自由党的德高望重者一样，承担着德意志保守党的党务工作。然而，它不仅在新的选举者中成功地取得了进展。当德意志帝国时期最强大的农业利益联盟“农场主同盟”（简称BdL）在1893年以后成为德意志保守党的附属组织以及基础时，该党也成功地在广泛的基础上实现了向现代类型的政党的转变。站在德意志保守党的立场上看，这一联盟显然是非常有用的。作为利益集团，虽然“农场主同盟”完全优先遵循大地主的目标，但它成功地将中、小农民都组织起来，而且迅速将他们引向贫血的保守党。顺便





要提到的是，完全就像“天主教德国人民联合会” [德国天主教人民联合会 (Volksverein für das katholische Deutschland) 1890 年成立。译者注] 对于中央党所做出的贡献一样，如果没有“农场主同盟”这样的拉票人，保守党到 1912 年时就几乎不会仍能获得大约 14% 的选票。

“农场主同盟”的组织成功，建立了一个稳固的组织架构，从而使德意志保守党与它的贵族生活情感、捍卫神圣的等级法律、来自右翼反对政府的忠诚君主主义、对现代化抱有农民式怨恨的大地产者之间形成了链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农场主同盟是继各种旧式协会和 19 世纪 70 年代第一批压力集团之后，出现的又一种新型组织类型，是有效的、彻底组织起来的战斗联盟组织。

保守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有效的联合思想的结果，源自早期一个民族的血和土地的神话，而反犹太主义也就成了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sup>[8]</sup> 德意志保守党的现代政治反犹太主义受到追随宫廷牧师施特克尔的“基督教社会”保守党人的影响，他们在 1878 年以后确定了敌视犹太人的进攻路线。与此同时，这种现代政治反犹太主义尤其受到农场主同盟的影响。在农场主同盟中，反犹太主义不仅可以毫不费力地与贵族的反感联系起来，而且可以将中等阶层中的农民反对“金钱和畜生犹太人”的情感引导到德意志保守党的政策轨道上来。当反犹太主义渗透到德意志保守党的煽动和选举造势中时，它似乎也会受到他们的尊重。因此，如果只满足于对整体上没有印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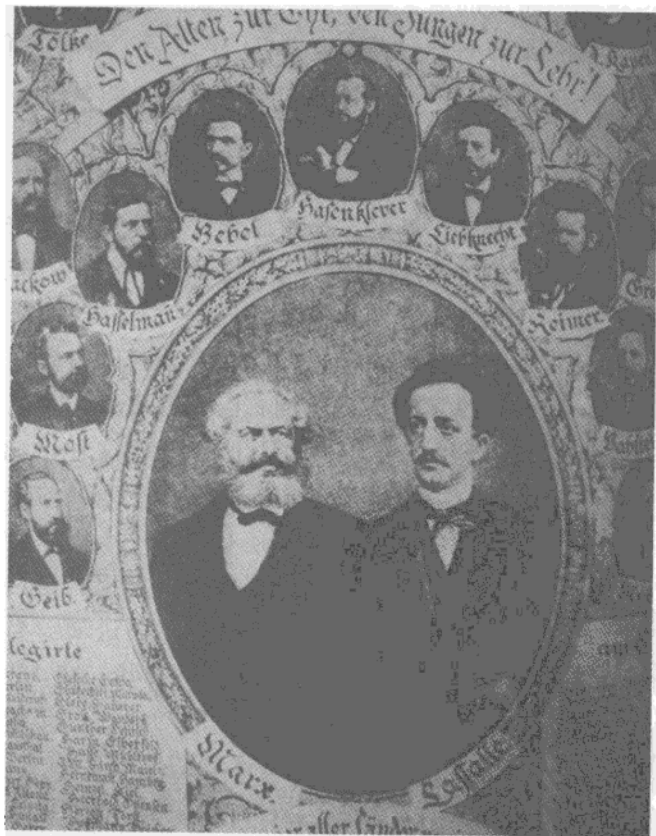


图24 纪念1875年德国工人阶级两党联合的图片



各种反犹主义政党的选举数字看上一眼，并且得出结论认为，反犹主义作为一种有组织政治势力，归根结底只是一种意义不大的边缘现象，那就完全错了。更确切地说，从长远看来，由于德意志保守党使政治反犹主义具有了社会性，反犹主义因此获得了一种不可同日而语的更大的影响。

人们绝对不能因为德意志保守党在帝国议会中的人数而忽视它。它不仅拥有非正规的力量以及在行政管理领域的机构化权力，在实行三级选举法的普鲁士议会中也有牢固的根据地。对保守党而言，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普鲁士议会是引发恐惧不安的“进步自由主义的堡垒”，但是，在俾斯麦的战争政策成功以后，它已经变成了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内“保守党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工具”。当然，这是指在普鲁士。不过，在德意志帝国内也是一样。在1890年以后，身兼普鲁士大臣的德意志帝国宰相们必须经常屈服于保守党控制的普鲁士议会。<sup>[9]</sup>虽然在这一时期，第一等级拥有选举权者仅占4%，与此相比，第三等级却占到84%，但是，在普鲁士议会中，保守的民族自由党和中央党之中根本就没有人打算抵制德意志保守党和自由保守党。普鲁士的权力精英们终于意识到，他们为什么要欢呼内政大臣冯·普特卡默的三级选举法“是一种贵重的财产，政府并不打算放弃”。<sup>[10]</sup>

#### 4. 社会民主党

不管人们怎样评价1918年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强悍和软弱，毋庸置疑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它组织了一场解放运动。这场解放运动最坚决地捍卫各种民主的平等权利。1875年，拉萨尔的工人联合会与团结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周围的“埃森纳赫派”在哥达联合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尽管不久在反社会主义非常法（1878~1890年）之下开始了12年的迫害时期，极权国家采用了驱逐出境、报刊禁令和各种各样的刁难手段，仍无法阻止这一政党的崛起。作为一种新的组织模式以及现行制度的原则上的批判者，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其他政党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早在1878年，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SAP）就已经变成了帝国议会的第四大党，此后“这个红色的幽灵便进入了这一最后的啤酒馆捣乱”。<sup>[11]</sup>俾斯麦政府同样毫不迟疑、有目的地试图利用自1848年革命前夕以来不断扩散的恐惧，将持续性经济萧条的真正罪责加到社会民主党身上。这位德意志帝国宰相曾不断地重复道：“只要我们无法用国内立法踏灭这个共产主义的蚁堆，我们就不会有复苏”。<sup>[12]</sup>反社会主义非常法使这种“踏灭”有了可能。然而，它既没有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周期，也没有能够阻止诸如工人运动向前发展这样的特殊运动。尽管有各种官方的剥夺公权，还有各种非正规的放逐国外，社会民主



PDF



党仍能巩固自己。

1890年，反社会主义非常法被废除。社会民主党带着坚定的团结感和数量大大增加的追随者，踏入了广阔发展的时代。到1912年时，它已经与其他所有政党相适应了。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长期经济发展不畅，无疑使得社会民主党的经济理论的可信度大大增强。德国的现实表明，它关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注定要垮台的分析得到了证明。<sup>[13]</sup>与此同时，令其失望的是，在1866年和1867年期间，共和制人民国家的理想已经败于胜利的军事君主制。而反社会主义非常法的斗争时期则打上了赤裸裸的“残暴的

阶级统治的烙印”（施莫勒语），<sup>[14]</sup>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广泛深入的传播。一个需要更细致地阐明的的问题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工人运动如何变得越来越马克思主义化，为什么他们对于所有的问题，包括他们的斗争和解放目标等，都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加以表达，而这种情况在美国却没有发生，在英国和西欧其他地区，这种情况也受到很大限制。有关德国的这种发展状况的一个解释是，由于缺少资产阶级革命，各种传统中的晚期封建主义残余使各阶级和阶层之间保持着一种明显的等级落差。在普鲁士，这种等级的区别就非常明显。因此，到1918年为止，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矛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反对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封建主义结构。然而，还在工业阶级社会形成以前，这种明显的晚期等级制裂痕似乎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由于这种阶级裂痕在一次平稳的转变之后成了主导性的结构，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分析威力，似乎它一直就是合情合



图25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伦敦宣传1890年在帝国议会选举中的胜利



理的。而事实是，这种阶级理论从一开始就预期了德国的发展，并且被用来确定等级性区别。相反，美国的工人阶级就证明其可能不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为美国革命使得平等权在制度上更加容易实现，并且通过平等主义的预言，在思想上先行一步，实现了社会主义在德国的吸引力。

甚至在 1890 年以后，在德意志帝国这样一个阶级社会中，社会民主党在各个地方都仍然受到蔑视，有如“没有祖国的伙计”。修正主义的传播是与全球的经济繁荣相对应的，一个改革性政党的合法化实践则是与实际工资增长和选举获得胜利相适应的。这样一个改革性政党逐渐地超出了代表工人阶级的范围。尤其在德国南部地区，作为左翼自由主义的人民党，还变成了“旧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事业的继续者”。<sup>[15]</sup>然而，考茨基主义的协商一致思想所持有的准革命性的花言巧语这时只会被继续利用来攻击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由于行动克制而在宪法权利方面受到容忍。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不管是致力于资产阶级社会内的权利平等，还是在参加第一国际（1869 年）后保持对国家的忠诚，既然这些都受到了人们的置疑，它就把自己孤立起来，在整个德国社会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亚文化。各种工会、党校、无数的帮工协会、运动俱乐部、各种报纸和工人图书馆等，一方面表明，社会民主党非常认真地对待解放的问题，另一方面却也进一步加强了它从社会分离的发展趋势。它不是坚持争取整个社会的改变，而是经常满足于构建它那几乎无懈可击的亚文化，尤其是它内部的提升机会，以此来取代它的政治纲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简称 USPD）在 1917 年之后，才要求采取改变社会制度和打破旧的社会结构的措施，从而再次坚持了这一政治纲领。从另外的方面看，与美国不同之处在于，可能是德国的社会流动性较小，从而使工人们支持有能力的领袖们。

首先，由于这种影响广泛的“局外人”的角色，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的崛起并没有像人们所估想的那样，对德国社会的民主化产生强有力的有利影响。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贬低社会民主党的亚文化内部取得的无可争辩的成就。同时，鉴于它所面对的愤怒敌视以及由于痛苦的历史经验所造成的对组织的崇拜，也不应该高估它可做出的行为抉择。其次，社会民主党持续的有影响力的发展使所有其他政治集团的威胁感大大加强了，并因此而间接地导致他们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努力趋于强硬。所有的进步性变动都会遭到顽固性的抵制，以免让人产生向“红色”妥协的印象。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害怕社会民主党，旧的选区划分一直保持不变。在这种旧的选区划分之下，保守党议员只需要一个来自柏林的社会民主党议员 1/10 的选票，就可



以进入帝国议会，进入普鲁士邦议会所需要的选票就更少了。由于这种僵化的安排以及通过指责社会民主党的反民族思想而获得资产阶级的选票的策略优势，资产阶级自由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斗争联盟，即所谓的“从巴塞曼到倍倍尔”的社会—自由阵线，也归于失败。特奥多尔·莫姆森曾站在左翼自由党的立场上，徒然地为之辩解说，在德国，任何人都知道，“像倍倍尔这样的头脑可以装备一打易北河以东地区出类拔萃的容克。”<sup>[16]</sup> 奥古斯特·倍倍尔是德意志帝国时期一位经历超过40

年的令人敬佩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也是德意志帝国议会中一位无所畏惧的议员。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对他的政党的迫害。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在帝国议会大厦遇见了研究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学家古斯塔夫·迈尔，这时贝特曼·霍尔韦格向他致敬，祝他身体康复。倍倍尔转而对迈尔道：“自这座大厦建立以来，我就在这里，但是，一位政府官员在谈判之外与我说话，这还是第一次。”<sup>[17]</sup> 而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们的遭遇也好不到那里去。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德意志“帝国民族”的现实。

## （二）利益协会进入国家政治生活：反民主的多元主义及其反对者

人们一再将一些大型的利益协会视为现代多元主义的要素，并且因此而有些幼稚地将它们与德国的民主化因素相提并论。然而，德国带有早期协会组织结构的敌对性社会经历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这些经济利益协会更喜欢独裁政治，并且完全支持以一种反民主的多元主义为标志的政治体制。这恰恰适用于那些右翼的大型政治鼓动性群众协会，诸如海军联合会、军队联合会以及殖民联合会等。就历史评价而言，道德教育层面的高调抱



图26 倍倍尔在帝国议会的反非常法演说稿



怨在此没有任何益处。这些以协会方式体现出来的社会利益集团组织承担了一种在国家、官僚制度、政党和议会之间的中间角色，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很显然，就像当时的人们已经所做的那样，必须对这些为害公益的畸形产物进行尖锐的批评。不过，真正的困境并非野蛮而赤裸裸的集团利己主义，而是在很长的时期内缺少对抗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的平衡力量。直到为消费者大众说话的自由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发展成为强有力的因素之前，占有生产资料的卡特尔因为与这些现行统治制度的政治后备军以及宣传组织纠缠在一起，形同一座难以动摇的堡垒。正因为如此，在德意志帝国时期，赤裸裸的阶级立法可以长期延续。人们只考虑对外贸易和征税，只想到军备和农业政策。要通过这种独裁的协会辛迪加主义来期待民主化，即便只是间接的形式，那也明显是一种错误的提法。以农场主同盟为例，它对政治民主化所做的贡献仅限于“戴着民主的面罩，以反民主的信念，为了反民主的目的，利用民主的方式而已”。<sup>[18]</sup>从某些角度看，利益协会也是工业化集中进程的一种表达方式，是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过渡的一种表达方式，是要求部分地操控经济增长进程的一种表现。然而，这些于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型利益集团在各个方面都能够与旧的制度牵扯上关系。“税务和经济改革者联盟”（1876~1928年）是大地产者的协会。它承接了农业联合会（农业联合会（Landwirtschaftlicher Verein），1808年成立。译者注）、农业经济委员会（1842年）[即普鲁士国家农业经济委员会（Preußisches Lndesökonomie-Kollegium）。译者注]、捍卫地产利益联合会（1848~1852年）、北德农场主代表大会（1868年）等组织的工作，这就是1893年以后农场主同盟更有力地所做的那类事。“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简称ZdI，1876~1919年）主要是重工业和矿冶工业界的共同代表。它充分利用了“德国钢铁工业家联合会”（1874年）、还有“矿业利益联合会”（1858年）或所谓的“朗格纳姆联合会”（1871年成立，即莱茵兰和威斯特发利亚维护共同利益联合会。译者注）的经验。在集结政策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之后，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和农场主同盟于1913年干脆结成“生产者阶层卡特尔”，共同合作。批评者形象地称之为“聚敛之手卡特尔”。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的日后竞争对手是以出口为目标、代表轻工业和制成品工业的“工业家联合会”（1895~1912年），也是施特雷泽曼[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1878~1929年），德国著名政治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担任总理和外交部长。译者注]政治发迹的跳板。1906年，工业家联合会决定与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结成利益共同体，1913年成立“德国雇主协会联盟”（1913~1933年），然后又



于1914年成立了“德国工业战争委员会”，1919年，这两个顶尖的协会合并成了统一的“德国工业帝国协会”。

各种商会负责处理商业利益集团的事务。此类组织有1858年成立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家代表大会”、1861年成立的“德国商业代表大会”等。他们所持的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倾向在1876年以后日益受到忽视，而主张保护主义的重工业则从此以后获得了一种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显然是“商业条约联合会”（1900~1918年）和有益于商业发展的“手工业、商业和工业汉萨同盟”（1909~1934年）所不能弥补的。常常被人低估的手工业则得到了手工业同业公会的支持。手工业同业工会在1881年到1897年间再次转变为公共权利社团，它因此就像工商业联合会一样，获得了代表性的“主权”。1883年以后，手工业者又转而依靠“全德手工业者同盟”。这个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所知的组织，却是一个极其成功的协会。直到1897年颁布手工业者法案为止，这一协会一直反对自由主义的营业自由原则，支持职业等级制度。当然，它的这种强制性的手工业同业公会的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

19世纪70和80年代以后，各次经济危机都大大有利于利益集团的组合。在所有的领域中，各个协会抱成一团，成为各个利益集团的极具影响力的代言人。它们很早就发现了直接通向国家领导层、官僚机构和各政党的道路。例如，县长们就帮助保守党，而利益集团则在经济方面构建了一种中介性的权力结构。俾斯麦的反议会和危害宪法的计划就是职业等级制的合作主义（这也是在发生国家政变时的一种利益集团的替代议会！），其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方式，正式地将各利益集团纳入政治体制之中。尽管“普鲁士国民经济委员会”（1881年）仅仅昙花一现，而一个国家委员会也立马垮台了，这些协会却凭借实际影响力和事实上的参与，逐渐地、非正式地进入了决策之中。

在这方面，向保护关税的转变是第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例。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在起草1878年关税草案方面扮演了决定性的参与角色，无论在帝国议会中，还是在联邦议会的调查委员会中，都有该协会的成员在给予关照。听话记录是由该协会的主要负责人比克 [亨利·阿克塞尔·比克（1830~1916年），曾担任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德国钢铁工业家联合会总部的书记。译者注] 来编审的。1879年7月被采纳的新税率代表了德国的第一件现代法律杰作，它在各个方面都展示出一个顶级协会的笔迹。在穿越1879年、1887年和1902年等各个阶段的关税法案时，人们都能继续看到这种发展。





图27 1902年德国海军联合会明信片

在其他领域的其他的立法题材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事情。由此出发，它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联邦各部共同议事规则”是直接相通的。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和协会官僚之间的合作已经

格式化了。<sup>[19]</sup> 一个国家，那里的人们长期将罢工这种劳工斗争的正常手段视为无耻行为，并且反过来流行着无冲突社会的理想，却需要很长的时间，也就是在德意志帝国垮台多年以后，这些利益协会的支配地位才能受到挑战和偶尔被打破。

那些致力于群众性影响的鼓动性联合会，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通过社团性的机构形式，从一开始就与各经济利益协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它们的重点放在贯彻其政治目标上面，那就是，除了选举斗争之外，还动员公民投票，以便对于德意志帝国政策的某些决定加以支持。“德国海军联合会”（1898~1934年）是蒂尔皮茨关于建设战役舰队方案的支持者，它的单个和法人会员达80 000之众。由于它以“重工业界的鼓动中心”（克勒语）的地位进行活动，宣传经费竟达100万马克之巨。<sup>[20]</sup> “德国军队联合会”（1912~1935年）拥有36 000会众。它卷入了特别是1912年和1913年的军备辩论，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德国军队联合会的发起人，退休将军凯姆就代表了诸如H.A.比克、H.克拉斯、胡根贝格等现代类型的舆论操控者。“德意志东方马克联合会”（1894~1935年），根据其创立者汉泽曼、肯内曼和蒂德曼的名字也被称为“HKT”联合会或“Hakatisten”。组织这一联合会的目的是进行反对波兰人的民族斗争。这场斗争包括支持1908年的没收地产业法、要求根据种族重新划分土地等，而后者则是日后的民族社会主义实践的预演。在“德国殖民地联合会”（1882年）和卡尔·彼得斯的“德国殖民协会”（1884年）合并后，新成立的“德国殖民地协会”（1887~1936年）发展成为大型的帝国主义宣传社团之一。而它的重要性是无法用波动的会员人



数来加以精确解读的。在“泛德意志协会”（1891~1939年）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例子需要提到，即右翼激进的、种族的民族主义与混乱的、未来却影响巨大的各种种族主义的、泛日耳曼主义的、扩张主义的思想聚集在了一起。很清楚，不能再将这个爆炸性的混合物描写为一个误入歧途的少数派的梦想。每一个社团都必须与它打交道。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好战的德国民族主义的“支撑物”，泛德意志运动能够在官僚机构和国家政策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当然，在1917年到1918年它所参加的“德意志祖国党”[参见第三章：八：（四）“最后一次‘上层革命’”。译者注]灾难性的插曲之后，只是随着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在1929年的突破性进展，它那最后的自我毁灭的成功才得以实现。在这里，人们同样强烈要求“生存空间”、世界影响力、扩充军备；在国内则通过“具有民族意识的独裁”来暴力解决阶级冲突问题。确切地讲，那些操弄思想意识的学究式的资产阶级是德意志帝国时期的“舆论制造者”。在他们之中，这些思想已经广泛传播开来。对此，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像海因里希·曼在《臣仆》（Untertan）这一小说中所做的那样，透彻地描写这种状况。早在1886年，泛德意志运动发起者之一、银行家卡尔·冯·戴尔·海特就已经指出，“殖民主义仅仅是实现德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统治的一种手段，因此，只是泛日耳曼主义的一种观点”。卡尔·兰普雷希特曾经是一位温和的历史学家（1915年去世），他不仅成了德国海军联合会、德意志东方马克联合会和泛德意志协会的成员，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再呼吁：“要扩张成为最大的国家，也就是说，要将德国社会的所有力量都凝聚起来，在对外方面形成统一的影响力，并且通过勇敢的方式和主人的姿态来使用这种影响力：这就是需要扩张的德意志国家的最迫切的要求。”<sup>[21]</sup>1916年以获取世界强权为目标的德国军事独裁就可以视为相关愿望的执行人，在这里，已经为1933年纳粹独裁者统治世界的要求打下了早期的基础。

更进一步的观察表明，那种认为德意志极权国家能够控制各种协会的利己主义以及由于其超然地位而能够实现公共利益的看法，是完全有悖于事实的。在专制的德意志帝国这样一个国度中，恰恰是在帝国宪法架构的空腔中，各种利益协会才得以蔓延开来，确切地说，是德国各个政党的软弱无力才诱发了利益集团的强势。而德意志帝国议会缺乏协调能力也鼓励了各利益集团的利己主义，例如，这些利益协会不断地寻求在帝国议会中获得对一些重要法案的影响力等。在德国的宪法结构下，由于无法通过帝国议会、政党以及众所周知的利益组织的介入来实现利益协会的利己主义



意志，它们就直接通过与官僚机构以及国家领导层的合作贯彻自己的利益要求。从这种现实情况来看，对于“政府的超党派”的幻想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只能是暴露无遗的“极权国家的活生生的谎言”。<sup>[22]</sup>

首先，雇主利益集团和民族主义鼓动协会的反对者们很少觉察到这种超党派性。在这些反对者中，除了社会民主党外，还有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特别是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手工业者联合会和工人联合会，为了反对过于强大的敌人，他们走到了一起。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尽管社会民主党的工会、自由党的希尔施-东克尔工会联合会以及后来基督教工会之间的分裂并没有被消除，但是，原先处于分裂状态的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以及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共同建立的“国际工会合作社”（Internationale Gewerkschaftsgenossenschaft）却于1875年在哥达实现了两党联合，由此产生了德国自由工会的最有力的和最强大的组织核心。1877年，自由工会在1266个地方的会员人数达到50000之众。此后，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组织也受到了反社会主义非常法的打击。1881年到1886年期间，也就是在普鲁士内政大臣冯普特卡默1886年的“罢工公告”引发新的迫害浪潮之前，它们在所谓的中央协会（Zentraverbände）之下重新集结了起来。尽管有这种严酷的环境，1889年和1890年，仍有大约39.5万工人参加了1100多次的罢工。在俾斯麦统治结束之后，至少已经形成了58个中央协会，其属下的3860个地方联合会拥有会员30万之众。1890年之后，它更是出现了不可遏制的发展。卡尔·列金领导下的“总委员会”是一个受到社团法律禁止的领导小组。直到1918年为止，受工会代表大会的委托，这一小组一直试图在国家层面来协调工会的发展和活动。这种发展的成果可以从一些数据中窥见一斑。1900年，自由工会之下集中了68万名工人，190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00万，1910年则超过了200万，1913年，它的会员人数达到了250万。与此相比，基督教工会34.3万会员；“黄色”工会，也就是对雇主友好的工会有会员28万；自由党的工会联合会为10.7万人。自由工会拥有130个指导和法律援助工人秘书处，同时还有将近3000名专职干部兢兢业业地维持着组织的运转。在为数众多的劳工斗争中（1900年有1433起罢工，1910年有2113起罢工，1913年有2127起罢工，参加人数分别为10万人、15.6万人和25.4万人），各工会都坚决地为改善工人的工资状况和生活条件而抗争。它们与社会民主党一道，逐渐地构建起一种强大的、令对手不敢轻视的地位。

与此相伴而来的是自由工会政治战斗力的消退。自由工会在1914年之



前的目标是，在极少受到原则性质疑的现行制度内，让组织起来的工人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获取更大的份额。据估计，自由工会的大多数成员会支持社会民主党，但这绝不意味着自由工会的会员只是社会民主党的后备大军。恰恰是他们，还有日益增加的出身工会干部的帝国议会议员，强有力地向社会民主党灌输了寂静主义的改革思想。然而，尽管人们总是认为“总委员会”害怕冒险，自由工会奉行“面包和黄油”政策，毋庸置疑的是，在各种敌视性的状况下，他们在组织方面仍然继续取得较大的成就，他们的努力和团结感增强了；在建立与雇主以及国家官僚制度对抗的均势方面，他们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各次罢工中，他们也坚持着勇敢无畏和乐于牺牲的精神。

### （三）“否定性整合”的统治伎俩：“帝国的敌人”反对“帝国的朋友”

德意志帝国领导层是 1871 年建立起来的“反民主的王侯的保险机构”。<sup>[23]</sup> 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创业陶醉消失之后，这一领导层很快就认识到，他们面临着一种困境。由于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缺少两个焦点，即赞成还是反对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就必须在波拿巴主义的半独裁之下以及在此之后，人为地制造出整合性中心点。1870 年和 1871 年这两年使人们兴奋不已。整体上看，这种高度兴奋在于，选举政治方面使得对政府真正顺从的民族自由党获得了多数。然而，这种高度兴奋持续时间并不长，准确地说，持续到 1873 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经济萧条。1871 年，针对资产阶级在民族政策实现后所持的激情，右翼自由主义的海因里希·冯·西贝尔充满预感地用以下言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何以得到上帝的恩典，以至于可以经历如此伟大和有影响的事件？”然而，接着他又提出了这样令人不安的问题：“而我们今后又怎么生活呢？”与此同时，俾斯麦也提出了完全相似的问题：“对于我们而言，还有什么保存下来了呢？在这样的成就和巨大的、富有影响力的事件之后，对于我们而言，如今还有什么看起来值得经历呢？”<sup>[24]</sup> 这种怀疑，确切地说，几乎是对于德意志帝国日常政治生活的恐惧，在 1873 年之后是非常合理的。在经济危机以及相伴而来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时期，德意志帝国那种不均衡的特征已经非常清楚地展现出来了。从根本上讲，在这方面，它是受到各种不同的历史传统影响的。当统一战争的成果在德国逐渐被人淡忘，而代之而起的是经济萧条的重负时，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和标准的缺失暴露无遗。有关普鲁士的特殊地位的自我辩解思想并没有获得广泛的基础。在莱茵河以南地区，人们根本就不接受



它。就像共和制和人民国家的支持者一样，1866年和1871年的失败者们很少会马上喜欢普鲁士。通向“帝国民族”之路主要受到阶级和集团分化的不同速度的干扰。鉴于这种打击，俾斯麦发展了一套统治伎俩，人们称之为“否定性整合”。<sup>[25]</sup>他利用了“集团内”和“集团外”这种古老的社会心理对立，转变内部冲突的类型，即能够引导“忠诚于帝国的”各种力量形成多数派，反对少数派的“帝国敌人”。后者必须看起来像是“严重的威胁”，但不可能给整个制度带来实质性的问题。于是，在否定性的符号之下，效忠于帝国的各个联盟通过对于共同的敌人的仇视而团结起来并形成优势。韦尔夫党、大德意志党、阿尔萨斯-洛林党、丹麦人党、波兰人党等，则压根儿就是天生的“帝国的敌人”之列。然而，它们之中任何一个都难以构成对帝国的哪怕是很小的威胁。因此，政治性的天主教、议会自由主义、社会民主党、自由意识的犹太人就成了真正的“帝国的敌人”。在文化斗争中，天主教徒就成了标靶。文化斗争不仅仅是在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和国家化框架内的一次国家和教会的权利冲突。俾斯麦通过把天主教政党的中央党说成“帝国的敌人”，不仅排除了中央党在议会中与自由党人合作的各种可能性，而且能够根据“有些事物总是黏在一起的”这句格言，通过宣传性社团而将德意志帝国内部的天主教与天主教的波兰以及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帝国联系起来。像克特勒这样聪明的天主教观察家都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种肆无忌惮的对少数派歧视的后面，是一种原则性的反宪法的、反社会的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就是要“从整体上”恢复“古老的君主主义的、专制主义的、军国主义的普鲁士”。<sup>[26]</sup>

与梵蒂冈之间开始的和解几乎还没有形成，德意志帝国政府又投入了反对具有实际危险的左翼自由党以及长期的、更具危险性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斗争中。前者被称为“秘密共和主义者”，“来自里希特的牲口棚、有着进步党笨拙头脑的投票畜生”，“虚无主义的进步党议会党团”，后者则被称为“在各民族和各邦内部疼痛不已的社会革命的癌症”的象征。在此，这些德国政党又再次与自由主义的英国以及第一国际等外部的力量扯上了关系，从而使它们对帝国的忠诚受到质疑。<sup>[27]</sup>从帝国内部的力量对比看，由于资产阶级政治家们的自由主义要比社会主义的民主更具威胁（俾斯麦高估自由主义正如他低估社会民主党一样），俾斯麦也就无所顾忌地把反犹太主义当作一种反对奉行自由主义的犹太人的替代物加以利用。<sup>[28]</sup>自从19世纪初颁布解放法令以来，政治方面活跃起来的犹太人也要求在普鲁士实现完全平等。为此，在资产阶级自由党中以及后来的社会民主党中，出现了不少的犹太





人。早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犹太人广为散布他们的陈词滥调之前，犹太人作为“进步的”“帝国的敌人”，就已经被俾斯麦明确地认定为德国对内政策的替罪羊了。理所当然地，波兰人和阿尔萨斯人也是“帝国的敌人”。自由意识党和社会民主党经常与他们一起为少数派的权利以及宪法赋予的权利而斗争。由于他们与波兰的独立理想以及法兰西祖国之间的传统关系，普遍怀疑他们背叛国家的想法使他们登上了反对党的位置。俾斯麦曾指出，只要“外国的支持对他们的政党利益看上去有好处”，他们“就会抛弃自己的祖国……”并且以“相当热心的效劳来对待取得胜利的法国，就像拿破仑时代这位法国皇帝在莱茵联盟中”所遭遇到的一样。<sup>[29]</sup>

然而，当这些敌视帝国的匪徒还不足以令人满意地推动否定性整合时，俾斯麦就总是用政变的秘密武器加以威胁。在19世纪70和80年代，这种政变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德意志帝国议会的头上。俾斯麦曾宣布，由于帝国议会中反对派的不断增强，“议会制将崩溃得更快，并且为军刀的统治做好准备，德国将因此而不能继续前行。联盟条约必须解体……宪法也将因此而被推翻。”<sup>[30]</sup>各成员邦、联邦议会、帝国议会议员等的许多反对意见都因此而遭到封杀。对于俾斯麦这样一个在1848年曾试图组织对抗革命、并且又挺过了宪法冲突的人，直到1890年他发生下台危机为止，人们都完全相信他具有这种破坏能力。在这种看法之下，波拿巴主义类型的立宪君主制度在短期内是不会受到很大的削弱的。此外，长期以来，“帝国领地”（即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译者注）或普鲁士-波兰的东普鲁士地区的特殊形势也提供了向帝国议会和各政党施压的机会。马克思在1870年时就已经预见到，德国在西部地区的兼并，将固化德国国内的“军事专制主义”。不仅如此，而且布克哈特也得出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由于阿尔萨斯-洛林，人们“即便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至少随时可能制造战争警报、战争动员和类似的问题”，“也就是说，德国本身处于一种悄悄的戒严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立宪主义和其他的不合时宜的东西都应该停止谈论。”<sup>[31]</sup>1913年的察贝恩事件（阿尔萨斯-洛林被德国兼并后，当地驻军司令直接受皇帝指挥而完全不受当时行政机关的管束。1913年，察贝恩爆发抗议示威，当时军队逮捕28名示威者。由于只有法院或紧急状态下警察才有逮捕权，因此这一行动被视为非法，但军事法庭却宣布无罪。译者注）就证明了这种预言。到那时为止，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兼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抗议滋养着法国的复仇思想，而这种复仇思想则一直影响着大普鲁士军事国家的对内和对外路线。但是，在俾斯麦把这种否定性整合的行为模式运



用到政党政治之中以后，他的继承者们继续采用这种策略，尤其是德国阶级社会的紧张关系状况，似乎需要构建一个这样效忠于帝国的集团来反对“帝国的敌人”。这一“帝国的敌人”后来主要指社会民主党。当然，如后文将要指出的那样，另外一些整合方式也日益广泛地被运用，但风险也更大。

从德意志帝国“建立时期”的长期性持续影响的角度来看，这种富有创造性的否定性整合的统治伎俩的形成，已经含有灾难性后果。但是，在此还必须进一步指出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

首先，俾斯麦曾经不断地煽动本来就已经蔓延开来的对于政党的仇恨，即根据他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用“帝国的效忠者”对“帝国的敌人”这样的二元主义来弱化各政党，并且用两个混杂斑驳的敌对阵营取而代之。俾斯麦曾刻薄地嘲讽道：“在德国，目前在职业议员之中，无能和过分自信的定额已经超过了比例”。因此，他不仅鼓励空想政治家们反对政党和反对议会，而且用自己独裁的影响作用来支持这种思想，这种独裁实际上到1918年以后仍为人们所引用。<sup>[32]</sup>

其次，通过严格的政党工具化，进一步削弱它们在制定国家政策方面的努力意志。俾斯麦的熟人们早就清楚地认识到，对于他而言，各个政党只是“邮递马匹”，他会骑着它们“直到下一个驿站”。后来，人们一再留下的印象是，俾斯麦对待各政党，“就像它们就是各个国家”，他“巧妙地操纵着它们一会儿到这里，一会到那里，一会儿结成联盟，一会儿又使它们破裂”。<sup>[33]</sup>然而，正是这种对政党的操弄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加剧了各政党政治家的无足轻重之感。

然而，特别要指出的是，以广泛的民意为背景的德国对内政策要适应于国家公民之中存在的落差。“帝国的敌人”作为第二等级的公民，受到歧视，确切地说，就是通过正式的特殊法令来反社会民主党和少数民族，或者通过反对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的非正式的程序来排挤他们。这不仅涉及到服兵役和行政管理，还有其他的领域。从法制国家的通用标准看，这是对人的藐视。然而，通过这样一个适应过程，人们对于这种有违自由主义发展趋势的下流之举的容忍度也渐渐地提高了。一些劣等的邻居，虽然在德意志帝国存在的50年间已经成了德国人日常生活经历的一部分，然而，他们也成了德国人这种否定性的“朋友—敌人”思想的强化因素。由此，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恰恰是在这样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人民之中，面对消灭少数派肉体，人们的心理栅栏会如此迅速地得到清除。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帝国的敌人”既导致了“帝国水晶之夜”（即1938年11月9日夜发生的攻击犹太



人事件。译者注)的发生,也是通向纳粹的“民族共同体”之路上必须消灭的“民族的祸害”。

#### (四) “国家维护者和生产者阶层结成卡特尔”的集结政策(1876~1918年)

1848年到1879年期间的“长时期的保守主义的反革命”(große conservative Gegenrevolution)在它的结束时期产生了长期性的影响,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工业家和大庄园主的集结政策的发展。<sup>[34]</sup>到1918年为止,这种大工业家与大地产者之间的集结政策虽然有偶尔的中断,却构成了德意志帝国政策的基础。保守派经济学家施莫勒曾评价道:“在俾斯麦的支持下,大资本和大地产者之间形成了联盟,这种联盟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统治着德国”。这一评价是与左派反对派的想法一致的。这种与进步相悖的大资本家与大地产者之间的联盟特别具有反自由主义的取向,它直接体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非自由主义化。此外,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反社会主义因素也逐渐地凸显出来。俾斯麦的态度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他试图使人们相信,与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涉及到“在杀人者和杀人放火者面前、在巴黎公社的事件面前拯救社会”。因此,必须发起一场反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毁灭性战争”。他并不打算整天把宪法挟在腋下,而是要“跳过宪法在保护个人和政党的所谓基本权利方面过于教条性的关照所造成的障碍。与社会民主党相比,国家处于正当自卫的境地”,“在运用相关手段方面可以不必过于拘谨。海盗也会被打劫!”另一方面,就在这种恐吓政策的效果像拉多维茨在外交部所欢呼的那样,在那些令人害怕的“德国庸人们”之中变得明显起来之时,社会主义工人党却在继续壮大。于是,威胁的腔调也变得更加尖锐起来。相关的攻击已经提升到用生物学家的比喻来说明清除政策,诸如“一帮危险的强盗”、“罪恶的颠覆理论”、“根据战争法来处理他们”,还有消灭“国内的这些鼠辈”等。不过,这种政策还有待在日后加以实现。<sup>[35]</sup>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俾斯麦也清楚地认识到,不均衡的工业增长推动了社会民主党的壮大,故而也“是社会主义威胁社会的特征”。因此,他采取了一种国家性的补偿政策,以保证人们的忠诚。这种补偿政策是以他的社会保险立法为基础的。当然,尽管俾斯麦有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以较长远的眼光考虑问题,宿命性地评论他那保守性的“堤坝建设”:“那些饥饿的人……会吞吃掉我们的”。不过,他是绝对不会像“那些遵守秩序的资产阶级”一样,幼稚地恐惧革命的。然而,如果只谈论“革命的恶梦”,那





完全对俾斯麦的误解。他对未来有一种悲观主义的期待。俾斯麦之子、赫伯特·冯·俾斯麦曾在转达选举指令时指出：“爸爸说，我们可以或者用灵活的策略来对付社会主义者，或者击毙他们，但是对现在的政府而言，他们根本不会有什么危险。”尽管不允许清楚地表明这样一种看法，即整体上看，“社会民主党比进步党要好”，“但是，个人的观点是不受约束的”。不管怎么说，俾斯麦是要让普鲁士邦国务部知道，他认为，正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是乌托邦式的，所以“它的壮大不会有特别的危险性”。他相信，有普鲁士军队的支持，他还是能够在冲突事件中对付德国的民主主义者的。<sup>[36]</sup>

然而，当社会民主党在柏林获得了数以百万计的选票时，俾斯麦的这种自我安全感开始减退了。与此同时，经济的繁荣、修正主义、议会的改革工作、工会的成功等一系列结果也表明，口头革命的激进主义已经驯服。因此，剩下的首先就是操控问题，也就是把握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把“红色危险”当作集结政策的发动机。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有一种思想持续扩散开来，那就是，他们感觉被不断高涨的左翼浪潮冲入角落之中。当然，和平地进行社会改革的动力并非由此而来。确切地说，从一开始，集结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打击这样一种推动力。

“国家维护者和生产者阶层结成卡特尔”反对各种解放运动。在1876年到1879年期间，它是俾斯麦对国内政策的旋转中心。1887年的卡特尔帝国议会最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甚至俾斯麦在下台之后还认为，明确要求继续实施“保守性的集结”，正是他自己的“国内政策的遗产”（施特格曼语）。需要提醒的是，在这方面，卡普里维时期的重大转折表现得尤其突出。卡普里维推行的对工业界友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意味着对大庄园主有好处。对于迄今为止一直受宠的“右派”而言，尽管这次的可耻的突然袭击给他们造成了一次短暂的恐吓，他们还是必须通过一种新的利益妥协，用经过考验的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胶合剂，将工业家们争取回来。就此而言，突出强调集结政策的社会和历史的常量要素，是非常合理的。这种集结政策巩固了少数特权者的权力垄断地位，并且使得这种权力垄断得到它所服务的多数利益集团的财政支持。但是，换一个角度讲，如果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集团，这一集团在1879年到1918年间没有任何改变地封杀了一切通向政治和社会现代化的道路，那么，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在集结政策期间，也曾有过不稳定、停顿、不断变化的联盟以及必要的妥协。因此，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12年里，人们若加以更仔细地观察，就会看到两个集中的圈子。米克威尔试图通过重新复活大工业家和大地主之间的联盟，寻求在内部较小的范围内



明确普鲁士的权力关系。但是，由于米克威尔要尽可能地避免与保守的中央党的联系，对于德意志帝国政治而言，这种联盟的基础就有些过于薄弱。蒂尔皮茨和比洛夫则将舰队作为政治整合的中心点，从而对资产阶级产生了整体性的影响，并且最终赢得了作为“宪法党”的中央党对保守性的对内政策路线的支持 [参见第四章：五：（二）（原文如此，应该是指第三章：五：（二）。译者注]]，因此使联盟的概念有了更广泛的发展。此外，这种政治整合还通过采取社会保护主义的措施，诸如 1897 年的手工业者法等，赢得了传统中等阶层的好感。比洛夫的关税政策和一系列的海军法案一道，将米克威尔的大工业家和大地主之间“集结”的坚固核心聚集在一起，而且受到工商业中等阶层的支持。于是，“庄园主和工业家在反对无产阶级前提之下的共同统治”就可以继续合适地发挥它最突出的社会政治功能，即“保障和加强受到威胁的统治阶级的社会地位”。<sup>[37]</sup> 通过这样一系列与中心人物的利益相一致的保护性措施，德意志帝国的这种集结性的“可怕的卡特尔”不断地使它的特权化的地位得到保障。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在各政党的争论中，思想和宪法政治方面的动力已经明显下降，只有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例外。这显然有利于实施集结政策的策略。在适应 1871 年到 1879 年相关抉择的过程中，纯粹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利益斗争已经取代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宪法理想。一方面，俾斯麦曾做过中肯的分析，认为“在国内发展方面，经济问题的优先地位就意味着持续的进步”，但是，在另一方面，他自己也促进这一进程。结果是，“那些没有手工业、没有财产、没有商业也没有工业，仅靠工薪、酬金和利息过日子的学者们”“必须屈服于生产民族的经济需要，否则的话就得腾出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相比起与那些抱有坚定的民族或宪法愿望的资深政治家进行搏斗，满足那些以利益协会代理人作为代表者的物质利益，更能使俾斯麦谋求的国内政治稳定的打算取得预期的直接成就。俾斯麦根据各种势力而推动的长期发展趋势就是，“各政党要明显带有经济和社会的利益共同体的特征，人们可以信赖它们，并且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诚如奥托·欣策在 1911 年所指出的那样，从 19 世纪 70 年代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种发展趋势“在意想不到的程度上”得到了实现。集结政策的基础在于，在不同的时段寻找重要利益之间的新平衡点，它既是这种利益集团发展的结果，也是加速实现这种利益集团发展的一种条件。诚如欣策所描写的那样，在专制性的德意志帝国，很显然，这种集结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君主制国家的领导地位”，而不利于形成“议会的影响”。<sup>[38]</sup>



1907年，所谓的左翼自由党人作为中央党的替补角色，加入了体现广泛的集结政策的协会和政党行列。而不久前，左翼自由党的成员之一，弗里德里希·瑙曼还曾如实地描述了具有反社会主义色彩的黑麦和钢铁联盟：“人们假装恐惧革命，以便获得好处。”<sup>[39]</sup> 1907年之后，比洛夫集团再次证明了这种集结性号召的有效性（1906年底，比洛夫政府要求帝国议会追加预算，用于镇压霍屯督人起义，遭到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的反对。比洛夫解散帝国议会，在1907年选举中集结保守党、自由党，组成“霍屯督联盟”，赢得了选举。译者注）。然而，到1909年时，各利益集团之间那种被信任的、掩饰性的不和已经让位于真正的解体。在帝国财政改革中，庄园主们极其明显地贯彻他们那种不可侵犯的自私自利，以至于他们暂时失去了与工业界联盟的基础。因此，在1909年到1911年间，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与相对自由主义的“汉萨同盟”能够进行合作。而在“汉萨同盟”之中，不论在贸易方面还是在出口工业方面，遵循的是与重工业有巨大差别的经济政策。据说只是由于汉萨同盟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态度过于软化，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才又与之分道扬镳。这一事例较之于许多其他迹象，更清楚地指明了各利益集团之间裂痕的深度。虽然在重工业、大地主和中等阶层之间又形成了小集结，但是，即便有反社会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牢固撮合，与中央党、贸易界以及农场主同盟之间的联系却暂时没有能够实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还在于，海军建设不仅已经失去了连接各种因素的凝聚力，而且由于1908年以后转向建造耗费巨大的无畏舰而引发了财政问题。与所有的早期预算相比，建造无畏舰计划增加了财政负担，而这种经济问题在财政政策方面具有爆炸性影响。1912年的选举斗争中，贝特曼·霍尔韦格的“民族集结口号”并没有能够阻止左派政党的胜利，而这种胜利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集结政策的传统合作者们趋向右倾化。诚然，现在“生产者阶层卡特尔”已经实现了，但是，所有右翼政党集团为阻挡左翼“大洪水”而进行的各种有组织的努力，都因为不可逾越的利益对立而归于失败。原本以为要通过“静悄悄的宪法转变”来实现帝国政治的议会化，代之而来的却是各种势力的多极化。在这方面，被反议会的右翼集团推翻的比洛夫是最坏的例子！（中央党不满比洛夫在1906年时将它打入反对派一边，保守党反对它改革普鲁士选举法，双双反对他为解决帝国财政困难而提出的征税提案，比洛夫被迫于1909年6月提出辞职。7月，贝特曼·霍尔韦格出任宰相。译者注）然而，这种多极化的势力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相互碰撞，而是保持着一种奇特的麻痹状态，陷于一种沉闷的恐惧和普遍存在的不信任的氛围之中。流产的右翼卡特



尔以及帝国议会两次不信任贝特曼·霍尔韦格的投票毫无结果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后者也表明，在宪法政治方面软弱无力的左翼多数派是无法伤害政府的。一个陷于深度分裂中的民族对于长期危机束手无策。毫无疑问，这种半麻痹状态是1914年夏天推行冒险政策的重要背景条件之一。

直到1917年，建立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右翼卡特尔的愿望才因“德意志祖国党”的成立而得到实现。这一组织是早期右翼联盟在第一个德国早期法西斯群众运动形态之下的合乎时势的继续。<sup>[40]</sup> 诚然，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政治上的反犹主义也是一种早期法西斯主义，但是，它获得一种群众性基础却是在1917年以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可以被视为“祖国党”的合法继承者。在这方面，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经历和社会历史背景、思想和纲领等，都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这种紧密的关系。它最终表现为一场浩大的集结运动。对于德国保守派而言，这种大规模的集结运动既是必要的，同样也是可驯服的。德意志帝国时期的集结政策也给魏玛共和国积累下极其沉重的负担。到1918年为止，这种集结政策始终服务于越来越自私自利的、传统的和新出现的领导阶层的统治利益。有如瓦尔特·拉特瑙以令人难忘的表达方式所指出的那样：与这种集结政策相对应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度中，数个世纪以来，只要不是以军事封建主义的成员或同类登台的，不是以封建主义化的官僚制度或封建主义化、军国主义化和官僚制度化的财阀统治的成员或同类出现的，都不会掌权”。<sup>[41]</sup>

### 三、整合谋略和对民主的结构性质敌视

86

除了专制性的宪法规定和波拿巴主义的宪法现实、软弱无力的政党和利益集团的自私自利、政治方面的统治伎俩和保守性的联盟等以外，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后构成的最紧密的整合衔接的影响在于，对于统治阶级而言，整个社会的秩序架构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得到了维持。在此，人们一方面必须区别思想方面的影响和各种驱动力，另一方面则要分清各种制度调节和稳定机制。在这方面有众多示例，但我们仅能从中选出少数例子示之。由于制度具有在很长时期中保障政治统治转变为人们的内心生活的作用，因此仅仅探讨一些思想方面的因素是不够的。教育制度的关键性作用即在于此。它通过最初的社会化（通过核心家庭的作用）和次级的社会化（由年龄相仿者、中小学和高校承担）来支撑社会的政治统治关系。简单地说，



这种制度化的行为控制就是以接受外来控制取代鼓励自我负责。由于这种制度化的行为控制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此，也就可以说，对民主的结构性敌视是这种制度化的行为控制的多种结果之一。确切地说，这种对民主的结构性敌视也是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社会史的特征之一。

### （一）国家思想和特别立法

德国传统的国家思想有如一个到处弥漫的霾罩，笼罩在 1871 年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的上空。这种传统的国家思想首先有三个来源。

第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德意志各邦的专制主义统治实践已经趋向于适应不断增强的上层操控。当其他地方的现代国家形成进程并不排除各种小范围的非中央集权化的自治管理之际，或者说，当其他地方的现代国家形成进程通过革命而得到改变之际，在说德语的中欧地区，受到官僚机构和军队支持的中央权力却出现了一种相对连续的增强趋势。在这方面不容忽视的是，特别是在一些较大的德意志邦国，变形的“开明”专制主义在行政管理效能方面带来了相对显著的效率，并因此而起到了反对革命的不稳定或者防止来自西欧传染的作用，放大了国家领导者的光环。于是，在国家日常事务的实践以及由于国家活动而产生的社会变迁和经济政策方面，一种巨大的影响力流传开来。结果是，仿佛数个世纪的重心都建立在这种影响之上。

第二，就像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在天主教各邦中所做的那样，马丁·路德所主张的极权崇拜产生了家喻户晓的、特殊性的影响，并为这种发展提供了思想保障。诚如人们一贯对路德的国家思想所阐释的那样，确定无疑之处在于，在实际的日常影响中，各个新教的国家教会都明确认定，国家首脑是上帝安排的最高首领，人们必须服从，绝不允许依据抵制的权利来反对他。国家首脑也因此而高高地置于批评之上。在德意志帝国最大的普鲁士邦，这种发展尤其受到追捧。由于普鲁士在德意志帝国内的霸主地位，它在这方面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这种评价同样适用于黑格尔学派的国家理想主义。19 世纪 20 年代以后，这种国家理想主义通过普鲁士的大学传播开来。在大学讲坛上，随着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到顶峰，国家由于上帝的恩赐而成了道德的体现，被赋予了一种具有神性的地位。而这种神性的地位最终变成了庸俗的国家崇拜，并且沉淀为不再有任何异议的各种观念，依然长时间地持续产生影响。有两个重要的社会集团成了这种国家理想主义的最突出的载体。一个是官僚群体。它被黑格尔称为“公共等级”，视自己为实际上的国家的体现；另一个



是文化资产阶级。它日益成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舆论制造者”，同时接受了黑格尔主义。这两大集团共同合作，经常将这种国家理想主义引进精英们的讨论之中、公共舆论之中以及教育之中。19世纪80年代，自由党人弗朗茨·冯·罗根巴赫曾评价道：“长期以来，柏林的那些为国家诡辩的人都在唱着这样一首歌，即国家是人类精神所能建造的最完美的创造物。个人是否退化成了受调节的机器，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通过与其他批评家的交流，这位来自巴登的男爵也认识到，这种独裁的国家思想不仅从一般意义上阻止了德国通向政治现代化的道路，而且直接地有利于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统治结构。他无法断定，是否“那种用议会制的装饰物和带有表面立宪制的幼稚的小游戏掩盖着的、得到有力确认的国家专制主义的时代精神，会再次发生改变。”<sup>[1]</sup>事实上，德国的这种国家思想，尤其是它的国家机器的超党派性的神话，一直到1918年甚至以后，都还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

如果一些活跃的少数派和各种解放运动试图挑战现状并因此而挑战这种国家思想的影响力，那么就会使用特别立法来对付它们，以便压服它们。文化斗争时期的天主教徒们首先感觉到了这种立法压力。1878年到1890年间，社会民主党再次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在同一个时期，针对少数民族的法案也陡然增加。这些立法都归属于特别立法，它们是对国家公民平等思想的讽刺。此外，德意志官僚国家还通过规定和公告等内部官方途径，推行极其明显的歧视政策，以此在行政管理领域、军队、司法机构和帝国各级政府中反对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徒，或者用来反对犹太人和资产阶级自由党。这些特别立法与较难琢磨的各种非正规的偏见和仇视机制一道，可能会像暂行的法律歧视规定一样，长期地发挥一种持续性的影响。当这种专制主义的国家思想虚构出一个统一的、一致的臣民社会时，它会寻求通过立法和行政管理的特殊法律来推进事实上的社会认同。事实证明，这种看上去一体化的专制国家的背后，是对持不同意见者的高压统治。专制国家会经常地利用它的垄断权力来对付持不同意见者。

## （二）民族主义和敌人的固定化

民族主义作为不断上升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反贵族的解放思想，最初是在18世纪末踏上其凯旋征程的。与不断地受到兵戎相见折磨的旧秩序的世界相反，民族主义提出了跨越疆界，各民族之间和解友好的愿望。这些民族只是要在有产者和文化资产阶级的代表机构的基础上组织建立起民族国家。然而，100年之后，人们已经几乎不再谈论这种爱好自由的基本原则以及和谐的国际合作了。民族主义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在德国却显



得颇为特殊。1848年革命的失败对德国的民族主义而言意味着又一次深刻的转折。因为这一缘故，在同样的情况下，德国的民族主义在1848年以后失去了它的自由主义的因素，确切地说，是排除了自由主义的因素，而各种敌视性的因素却不断加强，以致最后，各种敌视的概念和反对的姿态完全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从一开始，德国的这种已经改变了的、打着现代烙印的民族主义就有两大冲击方向，那就是反对外部的和反对内部的敌人。因此，人们不能仅仅强调它的对外政策方面的突出地位，却忘记了针对法国或者日后针对英国的汹涌澎湃的德国民族主义总是有其相应的国内民族主义病态恐惧的根源。德意志帝国的民族主义也具有这种两面性。它不仅对异民族具有好战性，而且对国内的敌人也极具好斗性。确切地说，它可以被动员起来反对内外两方面的敌人。不论是受到冲击的、来自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德意志帝国社会的天主教徒，还是隶属于第一国际的、被诋毁为“没有祖国的伙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是它动员反对的对象。还有一些公民也是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但又不应该隶属于这一名副其实的民族。他们成了“民族的祸害”，并因此也遭到反对。所以，早在俾斯麦时代结束时，班贝格尔就已经很忧郁地强调指出：“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对这一代人而言，爱国主义看起来就是仇恨的标记，即仇恨国内或国外不愿盲目屈从于他们的一切。”<sup>[2]</sup>

人们只要看一下帝国议会的选举斗争，就可以清楚地理解这种敌对性的民族主义的作用。1871年和1874年两次最初的选举之前，因战争激发出来的爱国主义可能仍具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此后就明显地成了保持力量的策略。在右翼力量的眼中，这种保持力量的策略就是制造对外政策的紧张或加重国际危险的可能性。于是，对于外部敌人的恐惧不仅会转变为选举中的“效忠帝国者”的弹药，而且那些最可能批评这种策略的“帝国的敌人”会由于这种批评而陷入不被信任的境地，甚至给人以与外国势力合作之感。人们轻易地就将天主教徒与罗马教廷联系起来，将社会民主党与第一国际联系起来，将波兰人与反对分割波兰的整个波兰反对派联系起来，将资产阶级自由党与议会制的英国联系起来，将中间偏左的所有政治力量与国际性的“革命和共和利益团结”联系起来。<sup>[3]</sup>民族主义的滥用以及出于选举考虑而推行的对外政策，毒化了德国国内的政治气氛。然而，只要支持统治者的议会后备部队在人数上有利并且使相关的法律草案能够带有民族迫切性的色彩，这种气氛的毒化就很少引起柏林的帝国领导层的担忧。虽然在1873年以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人们因此而抱怨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民族疲劳”，但是，正如1877年以后的历次帝国议会选举，特别是1884年和1887



年帝国议会选举时所做的那样，<sup>[4]</sup>俾斯麦非常懂得如何在选举时通过“国际热点”将“懒散的和无动于衷的选举者”动员起来（1884年和1887年，俾斯麦分别利用殖民扩张和近东危机为选举问题加分。译者注）。

俾斯麦的继任者也仿效这种伎俩。甚至到1912年时，患有法国、英国和俄国恐怖症的德国民族主义仍然与对所有政府反对派是否忠于帝国的原则性争论拴绑在一起，并且在“否定性整合”意义上受到有意识的煽动。因此，德国的民族主义不是人们所描写的近乎自主的推动力，而是从一开始就寻求统治利益，与统治集团关系密切。这绝不意味着是追随一种什么密谋理论，或者是否定民族主义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根源于通过在教育、军队、新闻媒体和文学等领域的宣传得到推动的、最终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的民族主义，而且可以在德国的统治精英们那里产生作用。但是，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寻求统治利益的这种迫切性之外，正如其总是接纳民族主义的某些特定内容一样，德意志帝国的权力精英们在很大程度上对民族主义采取权术性的、完全理性的、深思熟虑的利用。例如，1887年，在俄国和法国“危险”的阴影之下，俾斯麦用这种手段促成了“卡特尔帝国议会”；1907年，比洛夫打着帝国主义争霸的旗帜用这种方法通过了“霍屯督人选举”（Hottentonenwahlen）；1912年，贝特曼则利用这种方式大肆渲染军备政策方面的争论。因此，推崇这种方式的人都清楚这种人为地升高冲突的基本模式。而这种冲突中，都注入了民族主义的动力。

在为这种不断增长的、狂热的、恐惧外国的庸俗民族主义寻找解释时，人们不仅会像在政治社会化的各种进程中那样，遭遇到民族信念、思维形式、陈腐思想等的影响，而且会在民族主义的仇恨中发现对抗性社团的声音以及国际竞争的痕迹。同时，这些因素在民族主义的仇恨中又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只有从这样一种坚固的基本结构之中，人们才能解释清楚基于朋友-敌人之上的民族主义的吸引力。换言之，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社会的对立也在民族主义中反映出来。它们养育了民族主义，有利于民族的价值观的一种特定优先地位。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的相互交叠也能够清楚地展示种族观念在民族主义中的迅速传播。在德国国内以及相关的国际体系中，少数制造商对市场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关系的控制，强化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少数的、种族优越的统治民族有权利统治和分割世界。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中，“寡头政治的统治理想”代替了自由主义的自决要求以及民主的平等理想。在德国国内，这种思想是捍卫“站在工人阶级对立面的统治者的立场”，在对外事务方面，则要为竞争斗争进行带有种族主义





思想的辩护。<sup>[5]</sup> 在国际政治和帝国主义扩张中，如果不考虑到大企业、卡特尔和各种利益协会在国内的操控地位，人们根本就无法充分理解德国种族主义的扩散。不过，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或许人们认为这是无害的。

### （三）反犹太主义和对少数派的政策

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德国国内政治中，种族主义观点有如毒蘑菇一样，到处繁衍。除了传统的、文化的、宗教的和经济的反犹太主义外，当时还有有组织的政治反犹太主义。有组织的政治反犹太主义的迅速发展应该被视为首先是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危机现象。同样，这种政治反犹太主义与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发展趋势的波动也应该有着特别紧密的关系。在这方面，明显存在一种危机意识。它集中了由于经济不景气而引起的情绪上的紧张感、实际上的失望、歇斯底里症和不安全感，并且转而反对长期以来受到歧视的少数派。在不均衡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状况发生改变的那种痛苦经历面前，反犹太主义是社会心理上的一种逃避现实的形式，聚集了人们的种种不满。犹太人成了当时社会发展中各种弊端的替罪羊。例如，仅1873年到1890年间就有500多件有关“犹太人问题”的创作作品，它们涉及20世纪扩散开来的反犹太主义的各个方面。在这些反犹太主义的责难中，因经济萧条而引发的情绪，特别是中等阶层之中面对工业资本主义无法预见的进程而出现的普遍不快，都寻找并发现了一条渲泻的渠道。

1879年秋后柏林的反犹太主义，宫廷牧师施特克尔的反犹太人的煽动，还有1881年在波莫瑞发生的对犹太人的迫害等，使得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德

国民众突然意识到了反犹太主义的新危险。根据瓦尔特·拉特瑙的说法，在此之前，“每一个德国犹太人的年轻时代就已经经历了……痛苦的时刻”，这一时刻令他“终身难忘。他第一次完全意识到，他是二等公民



*Die fünf Frankfurter!*

图28 反犹明信片。上面写着“这五个法兰克福人！”，矛头直指发迹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罗特希尔德犹太银行家族



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且不管他如何优秀和功勋卓著，他都不可能从这种二等公民的地位中解放出来”。<sup>[6]</sup>然而，从此之后，令人忧郁的仇怨煽动越来越猛烈，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集团的公开支持，转变为政治性的或者甚至直接的行动。早在1880年12月，在一次大型反犹集会之后，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城区的“有组织的歹徒们在人来人往的咖啡馆前大喊大叫……有节奏地不断重复着‘犹太人滚出去’，阻止犹太人或者长相像犹太人者进入咖啡馆，用这种方式挑起斗殴，砸毁窗户玻璃，还有一些类似的野蛮举动。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捍卫德意志的唯心主义、反对犹太人的唯物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sup>[7]</sup>特奥多尔·莫姆森曾在柏林大学组织自由主义者抵制围绕在特赖奇克周围的反犹主义的大学教师。无怪乎，这位自由主义的学者曾反问自己：与俄国比较一下，“我们这种难为情的野蛮暴行的意图何在？”班贝格尔也“厌恶”“所谓的反犹主义”，反感这种“极端的、无节制的、卑鄙的挑拨，它将快乐建立在对相同的或比其更好的人的仇恨和压迫之上。这一民族真正至关重要的器官，如军队、学校和学术界等，充斥着这种反犹主义……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让人释怀的迷思”。在第一次反犹的暴力浪潮发生后，柏林大银行家格尔松·冯·布莱希罗德充满不祥预感地抱怨道：反犹主义“只是一次可怕的社会革命的不幸的开端”。<sup>[8]</sup>

然而，布莱希罗德给皇帝的呈文和左派自由主义者的请愿都没有能够拦挡住政治上的反犹主义。作为反犹主义基础的社会经济的结构变化战胜了一切崇高的抗议。早在1884年，保守党人就敦促选民们“拒绝”“犹太民族的服务”。事实是，正如在一种独特的说法中所表述的那样，“犹太民族”属于“国际性的和非德意志的力量之列”，“必须使每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最终认识到”，这一民族“绝不会将德意志祖国的利益置于首位”。<sup>[9]</sup>同样，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央党的宣传中长期存在的反犹主义成分也变得更加清晰了。19世纪80年代形成的反犹主义组织，如基督教社会党、反犹太人联盟、社会帝国党、德意志人民联合会、德意志改革党、德意志反犹主义联合等，在1889年结成了“反犹主义德意志社会党”，也即“德意志社会党”。在1890年“反犹主义德意志社会党”与“反犹主义人民党”合并以后（1893年以后称为“德意志改革党”），1894年形成了“德意志社会改革党”。1900年，这一政党又重新分裂成它原先的两个政党。诚然，这些政党的选举得票数从未达到过30万张，但是，早在1899年时，联合的反犹主义各党的汉堡纲领已经将“最终解决”（Entlösung）定为努力的目标。这



些反犹太主义的政党在汉堡纲领中宣称，“随着犹太人问题在 20 世纪成为世界性问题”，这一问题必须“最终通过完全的隔离以及……最后消灭犹太人来加以解决”。<sup>[10]</sup> 尽管反犹太主义没有节制，它在 19 世纪 70 年代出现之后却逐渐得到了宫廷和社会的认可。毫无疑问，这种反犹太主义与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的怂恿是分不开的。俾斯麦肆无忌惮地利用反犹太主义运动为他的选举政策的目的服务。诚然，这决不意味着他要与他的犹太银行家、犹太律师、犹太家庭医生等分道扬镳。他曾粗俗地称呼帝国议会议员拉斯克为“愚蠢的犹太青年”，称大臣弗里登塔尔为“闪米特人裤裆里的胆小鬼”。这些都可被归结为一位独裁者的成见。<sup>[11]</sup> 但是，在 1884 年帝国议会选举前不久，他曾同意一份报纸引用他的话：“犹太人竭尽所能，促使我成为反犹太主义者”。事后，他并未对此加以否认。此后他又希望：“文章要强调选举的结果，即犹太人在任何问题上都与波兰人相互勾结”，另外，“犹太人的钱财……被用来支持进步党的共和派”。<sup>[12]</sup>

在 1884 年即将举行选举前，俾斯麦曾指示普鲁士内政大臣冯·普特卡默道：如果政府公开站在反对反犹太主义的立场上，“是会触犯众怒的”；与此同时，由于犹太人向来支持进步党，如果政府过于公开地支持反犹太主义，“那就会使许多犹太人的钱财流入进步党的选举账户之中”。此外，犹太人也“极其令人可笑地敏感……为何要阻止那些想要辱骂犹太人的人们呢？”<sup>[13]</sup> 如果说在这些挖苦的背后，这位伟大的政治操控者还自信能够再次将反犹太主义保持在他的掌控之内，那么，俾斯麦的这种说法却间接地使得街头喧哗的反犹太主义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显然，这一切活动都是在俾斯麦那最狭小的圈子里进行的。这里面不仅有他的新闻走狗莫里茨·布施，也有他的长子赫伯特·俾斯麦。后者喜欢打“厚颜无耻者”布莱希罗德“这位犹太人的耳光”。他身为德意志帝国的外交国务秘书，提出了自己的准则，即不得招收任何“犹太捣蛋鬼”。他甚至对“具有犹太人思想的”英国次官米德大加嘲讽。<sup>[14]</sup> 1885 年，俾斯麦曾批准将大约 32 000 个普鲁士东普鲁士省的波兰人驱逐出境，反犹太主义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被驱逐者中，1/3 是犹太人。

对于俾斯麦这种只关心眼前效果的态度影响，班贝格尔早就充满了不祥预感。他用令人难忘的语词对此做了描述：“我们目前状况的奇特性在于，那位现在统治着我们的真正大人物，把他没有亲手掌握的一切都交给了一帮粗野的无赖来治理。这是他要容忍的独特合作。不过，也许是从来都是如此。然而，如果一个带有残暴倾向的民族将野蛮的理论当作一种力量、男子气和美德的理念加以宣扬的话，其危害将是加倍的。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状



况。由此形成了一种可怕的思想，而这种思想现在……正在抢夺控制的缰绳。”面对政治反犹主义这种可怕的规模，人们能够理解持有高度怀疑的意见。莫姆森也持有这种观点。他曾沉重地给赫尔曼·巴尔写信道：“如果您相信我在这方面能有什么作为的话，您就错了。如果您相信人们在这方面能够完全理智地行事的话，您就错了。一切都是徒劳的。我能告诉您的……仍然只是各种原因，各种逻辑上的和道德上的理由。没有反犹太主义者听从这些。他们只听从自己的仇恨和自己的妒忌，听从卑鄙的本性……没有什么可以防备那些暴徒。不管现在这个暴徒是在大街上还是在沙龙里，都没有什么区别。无赖终归是无赖，而反犹主义就是无赖的思想。它就像一种恐怖的传染病，有如霍乱一样，人们既无法对之做出解释，也无法治愈它。人们必须耐心地等待，直到毒素自己消散并失去力量。”<sup>[15]</sup>在狭义上，

直到1912年最后一次选举为止，反犹主义的政党只能吸引极少数持异议者的选票。然而，事实表明，就长期性的重要影响而言，反犹主义已经渗入保守党肌体之中，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在俾斯麦的支持下，这种反犹主义尤其通过农场主同盟散布开来。通过这种途径，反犹主义在传统权力精英之中扎下根来，反犹主义的口号则成了上流社会的谈资，确切地说，成了右翼时政评论的共同精神财富。中等阶层的小资产阶级长期以来坚持其独立的小企业主的商业资本主义的理想。然而，由于经济发展周期和集中

进程之故，他们几乎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因此，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反犹主义的社会基础也变得更加广泛了。因此，反犹主义变成了资本主义高度工业化的形态下反对资本主义的症候群的固定组成部分。1929年之后，由于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德国法西斯主义终于能够利用这种右翼激进主义来发出对于现代社会不满的抗议。



图29 讽刺德意志帝国少数民族政策的漫画：  
1913年察贝恩事件



不仅反犹主义可以说明德国国内的状况，德意志帝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也同样能够说明相关问题。波兰人少数民族（1918年以前，每10个普鲁士人中有一个是波兰人）、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人、北石勒苏益格的丹麦人、立陶宛人和马祖里 [马祖里 (Masuren)，在今波兰境内。译者注] 人等，都是通过1871年的抉择而被纳入德国的。然而，不久之后，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就开始实施反对这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同一性政策。在语言法领域，德语作为国家语言，在教育、集会、司法、商业和军事等法律方面，简言之，在公共和法律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拥有绝对的优先地位。在这方面，阿尔萨斯-洛林人得到了相对宽厚的对待。除了说法语者人数很少之外，可能出于对法国文化的尊重，也使人们难以对法语采取严厉的斗争方针。与在东部地区不同，在这里，德国人相信他们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丹麦人的遭遇则要严厉的多。在这方面，德国推行的政策首先是出于1848年以后的丹麦化政策的一种反应。最后要指出的是，反波兰人的民族冲突最为激烈。由于受到关于东西方文化落差以及日耳曼人比斯拉夫人优越的思想的长期影响，这场斗争不仅反对在普鲁士德国的波兰人的语言文化特性，而且反对波兰人少数民族在物质方面对土地的占有。在这方面，德国的相关政策也受到了最激烈的抵制。整体上看，到1918年，这种抵制以波兰人极其成功的自决而结束。总的说来，德国东部地区的两大民族主义处于毫不相让的互相碰撞状态。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尽管这种纠缠还可以更轻一些，但是要想完全避免这种纠缠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一领域，俾斯麦时代也做出过一些基本的决策。显而易见，只要波兰人愿意充当德意志极权国家的顺民，这位帝国宰相还是准备坚持旧的普鲁士多民族国家的安排。然而，在这种国家理由的掩盖下，同样存在着一种针对波兰人的反复出现的狂热性仇恨。俾斯麦曾经在1861年写道：“揍这些波兰人，让他们失去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我对他们的处境充满同情，但是，倘若我们要生存的话，除了彻底消灭他们，我们别无选择。狼也无能为力。它是上帝的造物。正因为如此，人们只要有能力，就可以射杀它。”<sup>[16]</sup> 19世纪70年代，在所有少数民族地区，德语的传播都得到法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支持。只有立陶宛人、马祖里人和索布人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地位。1871年和1878年，北石勒苏益格地区的德语最低教学时数得到增加；1872年，德语成为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官方用语，1873年成为通用教学用语，1881年则成为地区委员会名流议会的协商语言。阿尔萨斯-洛林到1914年为止还保留了许多对法语有利的特别规定，但是，在普鲁士所属波



兰地区，最高当局在 1873 年就已经颁布了德语作为唯一的公立学校用语的命令。此外，1876 年的商业语言法和 1877 年的帝国法院组织法（这一法律直到 1889 年才被阿尔萨斯-洛林接受）也牢固地加强了德语在普鲁士所属波兰地区的优先地位。然而，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期间，德语才得到大幅度的加强。1888 年，德语成为北石勒苏益格地区的唯一教学用语。结果，这一地区的紧张关系大大加剧，这种紧张关系由于地方长官冯·克勒尔的驱逐出境政策以及 1897 年到 1901 年期间对自选国籍问题的处理（根据 1866 年的布拉格条约相关条款规定，北石勒苏益格的部分居民选择了丹麦国籍。译者注）而达到了顶点。

自 1885 年驱逐波兰人之后，1886 年的反波兰人移民法意味着无法调和的斗争的真正开始。这一法律使得一个国家委员会能够不断增加各种可供支配的手段，以对德国农民有利的方式，购买东部各省的土地。波兰土地贵族是波兰民族抵抗意志的承载者，因此，这一法律挖掉了波兰民族抵抗意志载体的根基。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反对这一冲突地区的波兰教士影响的文化斗争。俾斯麦曾在他亲密的小圈子里指出：“在所有的（国内）殖民法律方面，呈现的主要想法是，把这些波兰贵族旋毛虫从国家清除出去。”这一令人讨厌的比喻不仅揭示了“他毫无顾忌的对人的蔑视”（荷尔施泰因语），而且也唤起了对“犹太寄生虫”这一反犹太主义的生态主义词汇的可怕的共鸣。<sup>[17]</sup>然而，柏林立法者的企图并没有得逞。“波兰人社区”采取了进一步将自己隔绝开来的对策。而波兰人不对等的更快的人口增长这样一种人口统计因素，也有利于抵制德国政府的企图。不久，更多的土地转移到了波兰人而非德国人的手中，而落入德国移民委员会支配权力之下的主要是德国人的土地。到 1914 年为止，移民委员会花费了将近 10 亿金马克用于“土地的日耳曼化”。有鉴于此，与其说移民委员会是一个捍卫日耳曼人利益的反波兰人机构，倒不如说是为了那些负债累累的德国容克地主能够以有利的价格出卖他们的庄园而追加的清理措施。对于地主们在民族自主掩盖下的“赚钱的爱国主义”而言，委员会基金意味着是一个用巨额资金来帮助他们的“拯救银行”。诚如弗朗茨·梅林所讥讽的那样：这些容克地主“也要日耳曼化”。<sup>[18]</sup>由于在东部地区的政策归于失败，以至于普鲁士邦议会最终于 1908 年通过了针对波兰人的没收财产法案，并于 1912 年投入使用。这种明显违反宪法的情况表明，在德国国内的民族斗争中，“法制国家”的保证已经失效。在 1904 年以前，向有争议地区进行“新的移民”取决于地方政府长官的批准，从而给了各地行政机关刁难波兰人的斟酌决



定权。1898年，帝国宰相霍恩洛厄-席林斯菲尔斯特曾规定，这些行政机关不论职责范围内外，都要“促进德意志的民族特性”。

相类似的是，德国政府的语言政策也逐渐激烈化。这种语言政策的激化导致了1901年在弗热希民尼亚[弗热希尼亚(德语为Wreschen,波兰语为Wrzesnia),当时位于普鲁士的波森地区境内,今波兰境内。译者注]的波兰孩子的父母们公开抵制的事件以及1906年和1907年波兰孩子大规模的罢学。1908年的帝国社团法在其令人关注的语言条款(第12款)中规定,只有在那些世代居住的人口占60%以上的少数民族地区,人们才可以在一个过渡期内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这一规定使冲突达到了顶点:在宪法中明文确认的基本权利竟然取决于一种政治化的少数民族人数统计结果。由此可见,这种语言政策已经达到“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主义发展阶段”(席德德语),最终跳过了宪法的限制。直到1917年4月,即通过中欧列强宣布建立波兰王国半年之后,帝国社团法的第12条才勉强被撤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驱逐波兰人的活动几乎达到了一种大规模地进行的程度。早在1887年,日后成为帝国宰相的冯·比洛夫就已经富有启发性地预示了未来冲突的前景:“在我们的波兰人地区,大规模地逐出波兰人”。<sup>[19]</sup>而事实是,1900年之后,比洛夫对于每年从俄国和加里西亚涌入的多达30万之众的波兰季节性工人并没有采取任何禁止措施。由此人们可以联想到,大量的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庄园的收益依赖于这些要求不高的工人。然而,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好斗的“东部马克联合会”(Ostmarkenverein)坚决要求对波兰人实行“强制性迁移”和“驱逐”。1914年以后,这种观点与“波兰边界地带”计划结合起来。根据这一计划,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和移民目的,将对沿着德国东部边界的地带进行兼并。

甚至像自由主义保守派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这样的人也冷静地指出,这种兼并会给“种族性的土地重划”创造自由的空间,进而形成大规模的驱逐行动,为德国移民建立起“阻止斯拉夫人的防水墙”。<sup>[20]</sup>在这方面,政府的备忘录非常清楚地预示着1939年以后激进的日耳曼化政策的来临。那种残暴镇压的早期形式已经出现在围绕语言斗争而质变的各种现象之中了。此外,在“东部马克政策”中,人们都不难看到日后的“生存空间”思想的起源、日耳曼人的文化使命和向东扩张的帝国主义。然而,在把波兰人当作“帝国的敌人”时,首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这种政策带来的困境。这种为了对付说外语的国民而产生的双重标准的法律,是对表面上合法化的、经过国家批准的法制国家和确立的宪法原则的破坏,助长了歧视少数民



族的有害习惯。此外，在德意志帝国时期还存在驱逐、没收财产、社会性的东部种族主义和日耳曼化的压制政策。倘若人们不容忍这种公然的过失的话，那么，通往日后各种暴力行为的道路是难以如此迅速地获得成功的。

#### （四）宗教作为一种合法性意识形态

在东部边界对少数民族的斗争中，宗教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浪漫主义化的波兰民族的天主教主视日耳曼化的新教为自己的死敌。反过来，从德国方面看，与天主教的“波兰主义”之间的斗争则被涂上了好战的新教的色彩。当然，鉴于国家民族观点和社会经济诸因素的主导地位，这种宗教的影响具有从属性的特征。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基督教各类宗教在 1871 年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的国内政治方面具有令人瞩目的重要地位，亦即它们在德意志帝国这样一个信仰分裂的中产阶级国家中始终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 1. 新教国家教会：王位与圣坛

16 世纪宗教改革最具重要性的后果之一，是建立新教的基督教会。与此相关的是，诸侯作为自己所统治的邦国的最高主教，变成了新教的小教皇。不管卡尔文教对普鲁士统治精英们的雄心及其内心世界对成功的追求的影响有多大，它对马丁·路德的国家教会的强有力的极权思想没有能够很有效地起到松弛作用。同样，在灌输新教的反抗权利以及与作为并非神授的社会主管机关的政府之间更为自由的关系的思想方面，它也是完全失败的。路德的宗教虔诚在德国人之中导致了一种带有“深远政治后果”的“纯粹感性的形而上学”。与此同时，在一些重要的团体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虔信主义恰恰强调回归“内心世界”，于是经常导致一种正统保守的虚伪。虔信主义要求通过个人的生活方式来改变世界，因此，它有意识地拒绝改变国家的结构。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新教反自由主义是对 1850 年以来的现代化推力的一种反动，它强化了这种拒绝改变国家结构的立场。

特别是在 1817 年路德教和卡尔文教结成联盟后，新教的基督教会成了公共法律机构。它可以在国家帮助下征收税款，并且可以参与决定小学的课程。小学的课程必须与基督教会相互协商。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仍存在。普鲁士国王作为最高主教，端坐于教士等级的顶端。由于法定的和宗教的最高职位兼于一身，其统治完全拥有一种“凯撒加教皇的特征”。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有违时代的君权神授思想。因此，在普鲁士—德国，国家授予教会“世俗的强制手段”，以便其“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征收财物。而教会则要无条件地为国家提供相应服务，“保证承认国家的合法地位，并且





以宗教手段保证臣民的顺从”。<sup>[21]</sup>

1871年以后，国王和皇帝的合一，加之兼具最高教会首脑，造就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独裁复合体，至少在北德意志的普鲁士“帝国邦”是如此。对于那些在自己教区里的教士，特别是那些在农村的、依赖于忠诚的骑士庄园主保护的教士而言，王位与圣坛的传统联盟获得了新的显赫地位。新教布道、新教的宗教课程以及新教的随军心理帮助等，对于霍亨索伦王朝的凯撒—教皇权位的稳定和合法性无疑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和小城镇地区，那里的人们最容易顺从。

然而，在工业城市和工业地区，这种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削弱的对国家和教会利益的认同呈现相反的情况。在这些地方，最显而易见的情况是，新教教会成了有产者和统治者的教堂，而无产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再参加”。于是，新教教会尝试着通过国内布道、设置“简陋的小客栈”、博德尔施文格 [老博德尔施文格 (Friedrich von Bodelschwingh, Senior, 1831~1910年)，建立了冯·博德尔施文格教会机构，向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等各种帮助。小博德尔施文格 (Friedrich von Bodelschwingh, Junior, 1877~1946年)，老博德尔施文格之子，德国神学家，大众健康的宣传者。译者注] 传教士的工人居住区以及其他类似的机构，努力工作，至少逐个地区的改善相关状况。不过，虽然从外表上看，新教教会的努力的高尚动机获得了很大的承认，它们却很少能够消弭这样一种总体印象，那就是，新教教会宁愿与已经满足的资产阶级以及友善的庄园主呆在一起，而不愿与农业工人或城市中的被剥削者为伍。工业中心地区迅速增加的非教会化和非基督教化是与教会的拒绝态度紧密相关的。例如，在1874年，柏林只有20%的夫妻举行了新教婚礼仪式，新出生者中仅有62%举行了洗礼。<sup>[22]</sup> 鉴于教会与传统贵族以及新富豪的一致性，其后果也是很明显的，即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的工人运动基本上秉持反教会的立场。根据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意识形态评价，人们就几乎不再需要这种教会的日常经历了。因此，德国的情况也证明了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年)，19世纪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曾赴美国旅行考察，著有《美国的民主》等。译者注] 在其美国之旅后提出的智慧分析。他在19世纪30年代曾写道：“倘若不能把统治者所激起的仇恨吸引到自己的身上来，宗教就不能成为世俗统治力量的一部分。一个民族越民主，社会越倾向于共和，宗教与国家权力的联合就越危险。”即使这种宗教与国家权力的联合在德国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它对于具有民主思想且在较长时间内主张共和的工人阶级而言



却完全像预言的那样，即王位与圣坛的联盟会诱导宗教“为了现在而牺牲未来”。<sup>[23]</sup> 由于在德国完全缺乏下层社会的自由的教会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分裂出来的教派”，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毋庸置疑，在英国，这种自由的教会的工作卓有成效，而且很显然，在工人阶级的工会和政治上的组织化到来之前，它们就已经知道向工人介绍阶级的认同感。在这一领域，德国存在不足。而社会民主党就填补了这个缺陷。在这里，人们找到了一种宗教替代品和精神上的救世学说。面对城市工人阶级在精神上的孤寂，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国家”决不仅仅是一种组织方面的宪法理想。因此，爱德华·伯恩斯坦在1911年回顾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历史时，称之为“从政治派别到政党”，决非偶然。然而，在不久之后，社会民主党也只是以口头革命的方式为其目标进行辩护。它通过这种方式来规范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从而间接地服务于稳定整个社会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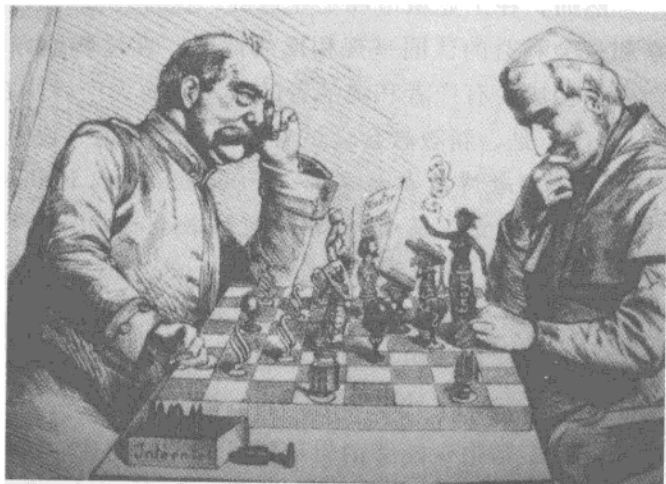


图30 有关文化斗争的漫画：俾斯麦在和教皇庇奥九世对弈

## 2. 罗马天主教：等级思想及其独占诉求

就罗马天主教会而言，它与已经崩溃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许多方面有着紧密相关的联系。尽管梵蒂冈显贵的“天塌下来了”一语经常被引用来荒诞地夸大普鲁士崛起的影响，这个新建立的新教的大普鲁士帝国起初则被视为天主教的敌对势力。文化斗争并不适合于减轻普鲁士与天主教会之间早期的仇怨。这一斗争使得天主教会的利益与它所属的包括中央党在内的世俗组织最紧密地结合起来。很显然，这种紧密程度有时候比中央党领袖路德维希·温特霍斯特所期待的还要高。天主教会被指责为天主教这一“帝国的敌人”背后的邪恶的教皇极端主义势力，而它自己又僵化地坚持其各种传统主义的立场。因此，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天主教会的处境并不轻松。此后，德国国内政治中持续的宗教较量才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松动。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对天主教的歧视仍然保留着，而且政治天主教在内



部事务方面也丝毫没有变得更宽容。不仅圣母信条和教皇无谬误论等引起了当时开明的德国公众意识的恐慌，而且在1864年公布的含有80个“时代错误”的禁书目录中，正统天主教也展开了反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科学的毫不让步的斗争，从而在极权主义要求方面强化了这种加强教会对教育和研究的控制的号召，进而在激进保守主义的盲目跟从之中将19世纪的一些最具驱动力的力量完全排除出了教会。从教会法的角度看，禁书目录对于所有天主教徒都是具有约束力的。直到数十年之后，教皇们才不得不对这一禁书目录至少进行部分的修订。

职业神职人员都是同样很自信的。罗马天主教会却给位居这样一个僧侣集团之巅的教皇披上了无谬误的灵光，从而使它自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处境之中。它必须艰难地寻找出路。它对新教所秉持的宽容原则的蔑视，使之与

具有竞争性的观点以及竞争性组织的共处变得格外困难。然而，得到某些教皇支持并于19世纪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托马斯主义的新经院哲学，无疑也对这一时期罗马天主教的反现代特征起到了强化作用。这是一个反对近代社会流动性、反对议会代表制宪法、尤其反对民主的平等思想的诸种原则的混杂物。它试图灌输行将消亡的等级社会的价值观，把正在向另一方向发展的19世纪转入中世纪秩序的紧身夹袄中，以便强化天主教对传统的回归。帝国议会和各邦议会是天主教少数派唯一能够阐释并



图31 漫画：文化斗争结束。教皇利奥八世和俾斯麦都要  
求对方亲吻自己的脚



可能实现其正当愿望的地方。但是，它与帝国议会以及各邦议会的关系却由于新托马斯主义思想的广泛影响而经常遭到削弱。与新教相比，天主教在长期、有力地协助德意志帝国的议会化方面的贡献要少，更谈不上对德意志帝国民主化的贡献了。然而，天主教渐渐地勉强接受了带有新教印记的德意志帝国。确切地说，得到大力鼓吹的德意志帝国爱国主义试图对始终处于次等国民地位的天主教徒进行补偿，消除了天主教多年来对于新教环境的不信任。天主教的影响决不可小觑。为了在表示忠诚度方面不让他入超过，天主教与路德教的邻居们一样，变成了君主制国家政权的顺从的、小心谨慎的臣仆。在帝国的天主教成员邦之外，尽管天主教不能像新教国家教会那样，授予国家首脑以任何高级的宗教职位，它却可以像社会民主党那样，在文化斗争结束之后，间接地为加强德意志帝国做出贡献。尤其是天主教各类社团组织，在等级信条之下协调起来，无障碍地得到繁荣发展，并且吸纳了许多社会能量。

就此而言，天主教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对独裁的宪法结构以及独裁政策产生过什么疑问。大凡国家让其放手的地方，它都要求取得独占地位。甚至到 20 世纪时，它还试图在诸如意大利、克罗地亚、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严厉地实行这种独占。然而，在德国，由于文化斗争带来的世俗化成就，它的独占要求首先指向家庭、教育和它自己的各种社团，更确切地说，它谋求一条不逊色于独裁的路线。有关反对混合婚姻的争论，支持对小学的社会化垄断，支持信仰天主教的工人优先选择基督教工会而非力量更强大的自由工会，等等，都已经在前文提及 [第三章：二：（一）：2]。因此，在普鲁士统治集团和新教的资产阶级眼中，天主教至少仍然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就天主教而言，尽管有着各种策略上的安排，它也没有放弃对于这一新教主导下的国家的合乎情理的不信任。不过，人们不得不考虑的一点是，从已经实现的或期望的对社会进行独裁控制的角度出发，这两个相互对立的集团之间还是存在亲和性的。当然，双方还有其他完全一致但又互不相让的领域，正因为如此，双方无法实现和解。

#### （五）独裁性社会的母体：社会化过程及其控制

每个人在各个年龄阶段的社会化过程中，其社会行为都会受到训练。他会将诸种准则转入内心之中，而这些准则在此后会操控他的行为，引导其本能走向符合文化传统和习俗的道路。不管是超越自我，良知，还是荣誉准则，随着社会化进程，社会都会给每个人的内心建立某种程度的控制体制，同时给予这一控制机关一个有关各种规定的目录，奖励某些激励性



结构、某些行为方式以及在实现确定的角色期盼的过程中的某些思想。按照这种个人与社会的“交叠”（Th.利特语），历史不仅表现为针对个人的外在力量，而且也总是体现为个人的一种内在化的力量。在这些最深沉的心理结构中，一些决定性的社会力量也会用调节性的或者扭曲的形式在发挥作用。因此，一种“业已存在的社会结构”会选择“一些特有的心理倾向”，但是不会把这些倾向表露出来。<sup>[24]</sup>

### 1. 家庭

家庭在社会化过程中承担着一种基本的任务，甚至传递具有阶层特点的语言也在其中。从某种角度讲，语言可能决定着孩子们的未来。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的农村地区还经常保持着大家庭的形式（即夫妻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加上祖父母以及一些亲戚）。然而，在这些地区，向小家庭的过渡也在进行之中，只是不像较大的城市那么猛烈突然。由此而来的是，居间传递的复杂性明显减少。这种小家庭的标准模式就是父权制家庭。在这种家庭中，父亲做出决定，母亲在法律上处于从属地位，另一方面，孩子在成年之前也陷入对父母的依赖之中。几乎毫无疑问的是，这种独裁性的家庭内部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亲切友好的。当然，这也取决于一些特有的代际冲突形式，特别是父子之间的关系。但是，几乎同样没有什么争议的是，首先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种带有阶层特征的松动。这似乎与当时更时尚的自由思想、随着教育水平提升而不断提高的教养以及物质的保障等有关。当然，这方面对于教育社会史而言是一个更宽广的领域。有一些社会阶层，他们的孩子经历了青年运动。于是，这些社会阶层改变了的新教育理念和实践就随之逐渐地渗入了到其他的社会群体之中。

在小家庭的最初社会化方面，经常有这样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在独裁的家庭与独裁的政治之间有一种线性的关系。“一种家长制的家庭状态导致独裁的行为概念的构建，而这种行为概念又反过来建立了独裁的政治状态。”这种看法正确与否，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sup>[25]</sup>无论如何，相关的比较是很难支持这种观点。就严厉性而言，威廉二世时代的父亲形象很难超过麻萨诸塞的清教徒、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以及主张共和的法国人。一种独裁的家庭结构似乎是与非常特殊的“政治文化”相一致的。仅仅在整个社会的平台上，这种独裁的家庭结构很难“建立”起独裁政治。不过，假如这种独裁的家庭结构嵌入一种带有普遍的独裁模式和独裁行为的社会，那么，它就能起到一种成倍放大的作用。在这方面，事实上存在一条线索，即从一个人格化的上帝父亲到诸侯代表的国家父亲、家长制的企业主，直到家



庭里的父亲。对于德意志帝国时期存在的父权制家庭秩序，它的最令人信服的后果在于“放大”了当时的历史倾向，我们不能把它视为单一原因而使之承担过多的责任。

## 2. 公立学校

6岁到18岁年龄段是接受学校教育的第二阶段社会化。在这里，我们并不涉及教育史或者课程的质量，而是将另一个视点置于突出地位，也就是通过这种教育体制使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权力关系永久化。就这一点而言，它属于统治制度。早先马克斯·韦伯就已经断言：“……当今，与根据财产以及经济等功能划分的阶级构成要素相比，教育的区别无疑是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构成等级的区别”。“特别是在德国，国家机关内外的几乎所有特权位置都与专业知识的培训相关，此外，它们还与‘普通教育’有关。整个中小学以及高等学校的体制都是为其服务的。”<sup>[26]</sup>就当时而言，这并非完全正确。在德国也存在完全不同的情况，那就是，与专业知识相比，出身和财产的特权更强大，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样，在德国，依据专业教育进行晋升变动，还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实际上，晋升变动是根据不同的社会阶层而发生变化的。德意志帝国的中小学教育制度绝不会变成在未来保障、社会地位和获取利益方面的“中央指挥台”，也不会变成人们所认为的“社会阶层结构的确定背景”，以至于认为不是“社会阶层属性……决定教育水平，而是教育水平……决定社会阶层属性”。<sup>[27]</sup>确切地说，国家开始在教育领域完全致力于其国民形式上的机会均等，还需要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可以确定的是，1918年以前，在公立学校、文科中学以及高校之中，无论任何地方，进入教育机构的抉择一直取决于在阶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因此，阶级体系就成了“无声的”标准。有关个人晋升的例外情况是无法否认教育领域相关社会统计的定局。例如，1890年，在1000名大学生中，最多只有一名工人子弟混入其中。当然，在这些社会统计中，通过多级方式，如通过两到三代人逐步提升社会地位的情况，是无法显现出来的。

早在1848年革命以前，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中已经有82%学习读书和写字，1870年以后，这一数字实际上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当然，农村的孩子中，有不少人只懂得了少得可怜的知识。诚然，正是在1848年革命之后，在学校教育中扮演支柱角色的国家开始尝试着在一些重要的专业中贯彻黑格尔的论断。他曾在1808年指出：“如果思想领域发生了根本变革，那么，现实是无法维持下去的。”<sup>[28]</sup>因此，旧的统治者的代表们有理由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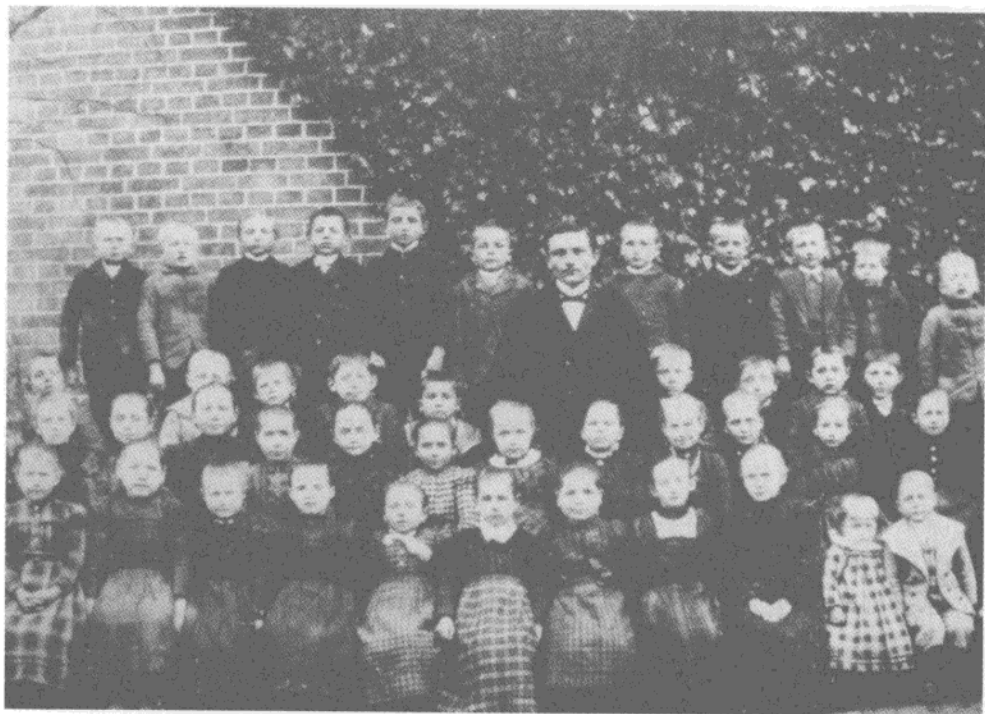


图32 某普鲁士国民学校的班级合影（1900年左右）

教育事业的扩张视为引起革命运动的原因之一。作为新的权威，教育事业战胜了从前那种沉思的准则，倾向于推动对于迄今为止尚未受到质疑的秩序秉持批评性的态度，并因此施加政治性影响。在1849年，普鲁士国王曾尖锐地指出：所有的“不幸”都归因于“虚假的教育”、“不信宗教的暴民智慧”、“用孔雀毛装饰着的表面鲜光的教育”。结果，那些使人产生思想的课程都被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sup>[29]</sup>例如，在普鲁士，1854年秋天施蒂尔的章程和劳默尔的公告都规定，要把加强祖国的信念和对于王朝的忠诚当作学习的目标。对于预先规定的真理的信仰必须通过基础教育的形式保持下来，同时通过课程的教会化而予以加强。在这种意图之下，历史课程作为反对革命的精神病药物，被用来构建爱国主义的信仰。

尽管如此，当社会民主党开始崛起并持续壮大之际，中小学课程又有了另外的功能，即发展反对“红色危险”的抵抗力量。1889年、1901年、1903年颁布的相关公告都是通过学校的协助来“与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斗争”。这些公告以威廉二世喜欢的那种引起轰动的谈话语调，规定了对780万中小學生进行“免疫”的任务。有一部分学校还根据军官学校的样板来进



进行“免疫”。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巨大压力，而且去自由化进一步也取得进展之后，中小学教育领域已经对于这种当时人们开始称呼的新的强迫性“政治教育”应对自如了。它不仅要在思想品质课程中遵守相关的指示，而且把这些指示转变成了道德规则，诸如勤奋、敬畏上帝、服从、忠诚等，进而能够与那些邪恶的、煽动性的“没有祖国的伙计们”形成明显的对照。在1914年以前，每年有超过1 000万的公立学校学生要接触这种黑白色彩的绘画艺术。在学校的历史教科书里、学校演说中以及民族纪念日（如纪念色当战役的节日）的庆典中，人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黑白绘画艺术。完全像教师手册一样，学校教科书中的材料和描述都必须用来促进学生的“意志状态”。1911年发布的“关心青年”公告甚至要求，从离开学校到进入作为“民族学校”的军队之间的“中间过渡状态”，必须保证青年工人的爱国主义的可靠性。当然，这种影响的社会心理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但是，可以估摸的是，倘若人们关注像社会民主党的民族主义化，或者留意它在1914年到1918年之间的行为，势必会受到震撼。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民族主义被用来服务于稳定社会的权力结构，并因此而使统治关系升华成为人们的内心生活。

### 3. 文科中学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对于大多数的德国孩子而言，在上完公立学校之后，正规教育就结束了。职业学校教育是他们所能继续接受的教育，但是训练极少，而且仅少数地区才有。只有极少的学生通过针眼一样的文科中学通道，接受更高的教育。例如，1885年，在德意志帝国4 700万居民和750万公立学校学生中，只有238 000名中学生。其中，普鲁士就有133 000名中学生，具体为：在文科中学（Gymnasium）学习者84 300人；在实科中学（Realgymnasium）学习者24 700人；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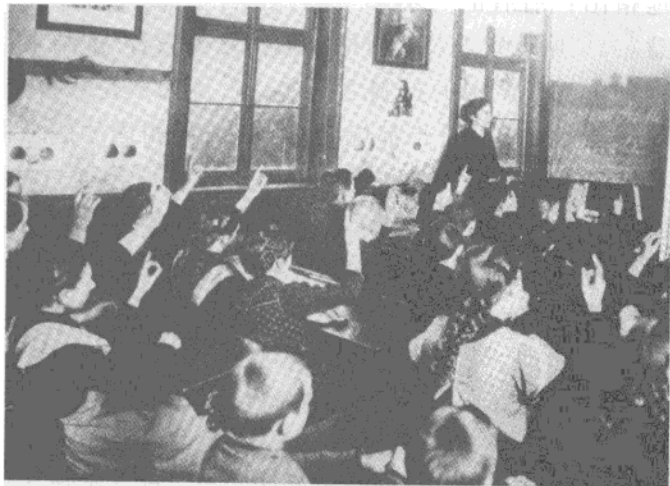


图33 德国的学生在上课（1914年）





高级实科学学校（Oberrealschule）学习者 5 100 人<sup>[30]</sup>。文科中学的中学生绝大多数来自文化资产阶级以及公职人员家庭。通过这种方式，这些有文化的阶层对自己进行新的复制。19 世纪 20 年代以后，随着严谨的新人文主义的发展，一种文化贵族的基本特征主导了整个中学教育。在资产阶级经历了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的倒退之后，这种文化贵族的基本特征增强并发展为一种狂妄自大的庸俗唯心主义。这种狂妄自大的庸俗唯心主义的片面性与受到猛烈批评的唯物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从政治上看，它却加速了向托马斯·曼所称的“受到权力保护的内心深处”的回归。这是“现实政治”的负面结果之一。从社会角度看，文化贵族对于各下层阶层持一种僵化的防御性态度。这种防御性态度就是有意识地高筑栅栏，并且将中学教育的优先权掌握在一个相对狭窄的阶层手中。而中学教育在这里可以被理解为延伸了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机会的总和。

就像早些时候的博学中学（Gelehrtenschule）一样，文科中学的目标是为在综合性大学（Universität）学习准备生员。而长期受到文科中学猛烈攻击的实科中学和高级实科学学校则为同样在很长时期内都有很大争议的技术高等学校（Technische Hochschule）准备生源。这种高校的现代形式是在 1860 年到 1890 年期间形成的。然而，首先有相当多的学生，他们在经过 6 年中学学习并通过所谓的“初中毕业考试”（Einjährigen，或叫一年证书）之后会离开学校。对于他们而言，“初中毕业考试”不仅意味着有他们喜欢的从军服役，而且也意味着打开了通向一般公职人员生涯的大门。其次，尽管缺乏相关的统计资料的说明，那些被文科中学“淘汰”下来的学生人数估计也不在少数。1834 年以后，高中毕业证书成为明文规定的进入大学学习的通行证。直到世纪之交（1902 年）时，文科中学仍然垄断着为大学准备生源的权力。然而，长久以来的情况是，并非每一个中学毕业生都上大学。1885 年，在德意志帝国的所有综合性大学中，共有学生大约 27 000 人，也就是说，是高中生人数的 1/10。然而，谁成功地走到了这一步，那么，他就已经登上了通向各种杰出的职业生涯阶梯的第一个台阶。

文科中学学生还通过特别的学校制服与大众进行某种程度的区别，以示他们构成统治精英的主要后继力量。与此同时，他们之中也还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抗议运动，即以“候鸟”著称的德国青年运动。从其社会构成看，直到 1914 年为止，德国青年运动的主力是文科中学学生。这一运动在 1897 年到 1900 年期间形成，1901 年在柏林的施特格利茨正式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们聚会于霍厄—迈斯纳山，运动达到了表面上的高潮。这些青



年群体主要包括来自中小城市以及大城市郊区的中等和上层新教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无论从必要性还是就成就而言，如反对学校的单调生活，亲近自然，“自然的生活方式”，自由地释放创造性能量以及对青年教育施加积极的影响等，这一运动都是不容低估的。然而，在这些积极的方面之外，人们也要总结一下这一运动存在的较大的消极面。这一些“候鸟”团体反对自由，反对民主，反对城市，也反对工业，他们时常将自己藏匿于德意志化的社会空想之中。犹太人以及姑娘们一律被拒之门外；保罗·德·拉加德和尤利乌斯·朗本 [保罗·德·拉加德 (Paul de Lagarde, 1827~1891年)，德国研究圣经的学者、著名东方学家；尤利乌斯·朗本 (Langbehn Julius, 1851~1907年)，德国艺术史学家，种族主义者。称荷兰画家伦勃朗为纯种的德意志人。译者注] 的《伦勃朗-德意志人》(Rembrandt-Deutscher) 是他们偏爱的读物；他们将自己划归精英行列并且由此产生的色情化的领袖崇拜，他们还对社会抱有强烈的反感，等等，所有这些都混杂在一起。此外，他们的心理状态还弥漫着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使得成百上千的德国青年运动成员在朗厄马克 [朗厄马克 (Langemarck)，比利时境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此地发生三次重大战役。在1914年的第一次朗厄马克战役中，大批德国学生志愿军死在协约国军队的枪口下。译者注] 战役中一边唱着歌曲，一边冲进机枪的火力之中。这种浪漫主义化的、反现代的基本特征，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理想主义，加上这些不久即将登上对社会负责任的位置者对于虚假的改革目标所抱有的“青年联盟的”热情，无疑削弱了这一运动对于日后不良政治的抵抗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年之后，正是这种不良政治使得反对城市和工业文明的抗议激进化。青年运动推动了向新的彼岸的启航。然而，这一“蓝色小花” (蓝色小花是德国浪漫主义的主要象征，代表着思念、爱情和无止境的追求。译者注) 不久就盛开在俄国的小铁路附近。

#### 4. 大学

1871年，有13 000名大学生求学于德国各所大学，也就是说，德国的4 100万居民中，每100万居民拥有大约320个大学生。此后，在30年内，德国大学生总数上升到了34 000人，也就是说，在5 600万德国居民中，每100万居民所拥有的大学生数量翻了一番，达到了640人(1930年为2 100名，1960年为4 600名)。这种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引发了关于“大学无产者”的热烈讨论。在这34 000名大学生中，学习神学者占10% (1960年时为2.5%)。在这些学习神学的学生家长中，只有4%受过大学教



育，因此，学习天主教神学就成了一条通向提升社会地位的途径。但是，在其他的所有学科，学生主要来自受过大学教育的资产阶级以及公职人员家庭。例如，在1900年左右，在普鲁士所有的大学生中，27%的学生的父亲曾经受过大学教育，1/3以上的学生出身于国家公职人员和教师家庭。在符滕堡、巴伐利亚、萨克森、巴登等邦，情况也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简言之，与特权阶层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相比，他们的在校大学生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应占的份额。即便有什么统计例外，有一两个工人子弟在大学学习，完成了学业，这也决不能被视为高等教育有开放性的凭据。不过，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在当时的其他西方国家，这种情况也是很少见的。很显然，在社会上招聘大学教师也是相当严格的。例如，1860年到1890年期间，在所有的取得大学授课资格者当中，有65%来自公职人员和教授家庭。<sup>[31]</sup>

1871年以后，在大学之中，政治上普遍保持一致性的压力一直很大。在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哲学学科中，国家理想主义与为现存状况辩解的历史写作并肩战斗。这种历史写作如果不是关注有关普鲁士的传奇，那就是完全关注于国家政治。就像“讲坛社会主义者”一样，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之中，特别强调国家崇拜和相信国家的改革活动。因此，未来的公职人员在服从性教育方面受到了极出色的专业训练。面对学生们和施莫勒的战友们对于德国经济状况较为温和的批评，普鲁士文化大臣博塞则坚决地反驳了这种公然的挑战。他指出：“在大学讲课中，企业家的看法……应该比迄今为止更受重视。要记住这句名言：下金蛋的母鸡不要打。”<sup>[32]</sup> 1900年以后，资产阶级热心改革的原则性抗辩终于消褪下去。法学学科是“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封建特性的统治的武器库”，<sup>[33]</sup> 一直制造一种预先确定的、狭隘的顽固守旧的精神，受到拉班德学派法学实证主义的支持。同样，在医学领域也普遍听不到什么批评性的不同看法。至于新教的牧师后备队伍，他们是在理性主义消退100年之后才接触到了一种“批评性的神学”。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新建了12所大学。对于德国大学那种高水准的、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示范性的学术水平，人们不能妄加否定。但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这些大学是维护现状的堡垒。像莫姆森、菲尔绍这样具有坚定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变得越来越少了。一种政治的和社会的保守主义——这也是民族自由党的色彩——得到实践。帝国各部以及社团法对各类考试和社团机制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大学的同一性。另一方面，一些才华横溢的局外人，如社会民主党人罗伯特·米歇尔斯、莱奥·阿龙斯等人，则被有效地拒之于大学门外。在高校教师群体中，



人们只是“在自己及其同类”的小圈子中活动。

### 5. 大学生联合会和预备军官制度

在德意志帝国的各所大学中，还有一项与资产阶级“封建化”密切相关的任务。在这方面，承载着这种政治社会化任务的公共机构就是各类社团，特别是颇具影响力的大学生联合会。在此，我们并不探讨它们作为合群的联合会和啤酒消费推动者的角色。不过，从其社会和政治功能看，它们是要为资产阶级子弟确定新贵族的荣誉和行为准则，打磨他们的准则和价值观，从而使这些在日后可能成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者与前工业社会的贵族统治集团结合起来，进而通过一种新的集体精神来化解潜在的障碍，并且像已经表明的那样，极其成功地适应另一种生活环境。在决斗场上，大学生们做作地进行模式化的决斗，以此作为已经过时的成年仪式和胆量练习的展示。这种决斗明显带有封建动机，显然常常带有添油加醋的夸张的装饰痕迹。即使在黑非洲，这种决斗形式也已经被开明的当权者视为令人讨厌的史前时期的残余物，遭到禁止。然而，在德国，它们却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了大学精英阶层的载体。

此外，大学生联合会还通过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老资格绅士”（Alte Herren）把他们的成员安插到他们所渴望的位置上。1848年成立的“克泽纳老年成员大会协会”（Kösener Senioren-Convents-Verband）最终联合了118个大学生联谊会，1500个正式成员，4000个非正式成员，以及25000个“老资格绅士”。它在职位分配方面起着分配中心的作用。如果没有“克泽纳老年成员大会协会”成员的人事推荐，某些政府部门几乎不会提供任何责任重大的职位。通过这种典型的德国式“社团裙带关系”，人们就能确证，在行政管理和司法方面的生涯只对可信赖的公职人员开放。这些可信赖的公职人员通过确定决斗以及以决斗认错的方式获得了他们的处世智慧。<sup>[34]</sup>一个大学生联合会的大学生可凭着他那带有疤痕的名片进入任何一个更上层的社会。在这方面，只需要点明他所拥有的各种“关系”优势即可。尽管在贵族团体和资产阶级的大学生协会之间时有激烈的争吵，<sup>[35]</sup>然而他们之间相同的成见已经在蔓延。他们都拒绝“犹太女性”；过敏性的民族主义持续扩散；都展示出嗜权成性者的姿态；尽管存在各种分歧，在击剑大学生协会中已经扬弃资产阶级政治等。

同样，另外一个公共机构，即预备军官制度，也被尝试着用来确保资产阶级无法再发展成政治威胁。预备军官制度最初是用来体现资产阶级的平等权利的。到1871年为止，这一制度在功能上已经转变成了新加强的军



国主义国家的试验台，即通过增补“可以接受的”资产阶级子弟而选拔职业军官。就像各类社团以及为法学家们进行的候补文职人员培训一样，这种转变也导致预备军官制度承担了一种相类似的社会化任务。一个资产阶级子弟被接纳为某一部队军官团的预备军官之前，要接受心脏和肾脏的检查，他的职业和婚姻关系也要受到仔细审查，若有一位犹太人妻子，即取消资格。只有在这种仔细的检查之后，才会把他归类为“可信赖的战友”之列。就这样的被选定者而言，这样一种抉择意味着，虽然他必须甘愿适应这种职业军队的准则和生活方式，但是这也使他披上了德意志国家“最高等级”的荣光，这一点尤其从他的名片上得到证实。对于德意志帝国的现行统治者而言，这种预备军官教育证明是一种绝对富有创造性的安排。在经历了宪法冲突带来的惊吓之后，这种预备军官制度安排使得对有抱负的资产阶级子弟的整合工作得到了长期保障。就像海因里希·曼所描写的黑斯林·迪德里希（Diederich Heßling）这样一个代表形象所感受到的那样，成为攻读博士学位者、大学生联谊会成员和预备军官，意味着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幸福感的顶峰。事实上，就保守派和自由派政党中带有这样特点的新生代来看，传统精英们丝毫不必担心权力的金字塔会被推翻。

#### （六）冲突处理

在现行统治准则受到违反的情况下，国家会使用司法机关，对各种冲突进行独断性裁决。然而，与此同时，国家也可以单方面地依靠居民内在心理的反作用方式，即臣仆精神，使某些争端趋于平缓。不过，当这一点无法达到目的时，国家就会被迫审慎地考虑采取补偿办法，以便保持或重新获得民众的效忠。

##### 1. 阶级特性的司法

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在与专制主义进行的斗争中，官僚制度在构建“法制国家”方面是有影响的。至于这种影响的确认，我们在此不做更加详细的探讨。所谓行政管理司法权对于构建法制国家所起的有益作用，在此也不做探讨。然而，长期以来有一种传言，即从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事实上平等的角度出发，德意志帝国堪称典范。这种说法受到我们当代一位法学家的有力反驳。他指出，认为德意志帝国“是一个法制国家”，“这种名声是完全错误的”。<sup>[36]</sup>当然，这里并不涉及到否认当时德国大城市与美国城市相比很大程度上所享受的法制保障。人们完全无需经常提心吊胆地在大城市中的生活。同样，法律的严肃性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在反对少数民族的斗争中，普鲁士最高管理法庭长期能够在符合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实



施政府的各种刁难。更确切地说，要正视表面上的平等保障之下难以觉察的甚至粗暴的漠视。这种情况贯穿于德意志帝国国内冲突历史的整个过程。无数的判决都是从阶级司法的意义上做出的。也就是说，国家的判决“受到现行统治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片面影响……因此，尽管法律在表面上得到运用，被压迫阶级却由于统治者操纵司法而受到损害”。<sup>[37]</sup>事实上，这种社会性的预先判决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全过程，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特别是社会民主党，都受到这种伤害。这在1872年的莱比锡谋反罪审判中已经明显地显露出来，在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时期也是随处可见，在1890年以后也还经常能够清楚地看到。在威廉二世时代，大规模的劳工斗争之后会受到过度的惩罚，1912年的矿业工人罢工就是一例。人们只需将这种司法处置与法庭在军队的决斗或侵犯方面所做出的反应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在这样一种没有先入之见的司法面前，一些公民比另外一些公民受到了更平等的待遇。当然，在旧的普鲁士公职人员中众所周知的那种普遍存在的小费行贿，在德意志帝国的司法官僚机构中并不多见，但是，阶级特性的司法这种难以觉察的腐败直到1918年为止尚未得到根除。

这种阶级特性的司法默默地发挥着作用。它实质上是以对于司法官僚机构的特殊培训的规定为基础的。在俾斯麦政府反对自由派公职人员的严酷斗争过程中，尤其是1878年以后，随着普特卡默“官僚制度改革”带来的极端保守主义的清理措施的实施，司法方面也出现了政策转轨，俾斯麦政府很快就达到了它所期望的效果。各个法院和司法机关的关键职位落到了“可靠的”人的手中[参见第三章：一：（四）]。如果人们检查一下后来的律师委员会的年龄构成，就会发现，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有相当一部分经历过普特卡默整肃的法学家，仍有机会实施他们那种君主政体的“国家凌驾法律之上”的思想。人们必须明白，普特卡默的“年轻人”在1918年时也许刚刚60岁，而他们之后的候补文职人员正值普特卡默的新体制推行之时，这些人都还相当年轻。如果这套机构还完整无损的话，那么谁又能真正地从这样的法官那里期待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 1871~1925年)，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译者注]得到合法性认可，或者期待得到对王家法庭命令的抵制呢？

## 2. 臣仆精神

有一种心理状态与德意志帝国这种极权国家的制度相对应，那就是臣仆精神。这种精神要求人们：要被动地接受国家的意志行为甚至侵犯；对于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小刁难要保持高度的谨慎沉默；在大街上遇到军官要



脱帽致意并让道；要视小小的乡下警察为国家的代表。总之，要顺从，而不是有异议。这是一种特别的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精神。这种精神虽然在强调自由的莱茵地区或者德国西南部地区遭到不少人的鄙视，却是数百年以来的政治和宗教等各种传统的产物。韦伯曾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指出，一个遭砍头的诸侯会在随之而来的整个历史进程中造成一种失去控制的解放性效果，因为伟大的父亲形象的灵光此后不会再像从前那样毫不动摇地存在下去了。因此就此而言，德国还仍然是没有革命的国度。“在外国观察者看来，这种内在化的对于权威的献身精神是有损尊严的，”因此在其他国家已经“受到阻止或被摧毁。然而在德国，它却仍然作为一种难以根除的、不受妨碍的世袭的诸侯统治的遗传因素保留着”。马克斯·韦伯因此得出结论：“从政治上讲，事实是，德国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内在化意义上的特殊‘臣仆’，因此，路德教是德国人的合适宗教。”1919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轻蔑地谈到了这种精神。他指出，“没有任何革命能够……帮助克服这种祖传下来的奴仆精神。”<sup>[38]</sup>很显然，理性主义的神学、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迪斯特韦格 [莫里茨·迪斯特韦格 (Moritz Diesterweg, 1790~1866年)，德国著名教育家。译者注] 的教育理论、莫姆森的研讨班等，志在造就自由独立的人格。从这种意义上讲，几乎可以肯定，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也是担负着无尽艰辛的启蒙努力的解放运动。然而，正如欣策曾经敏锐地注意到的那样，在1878年保守主义势力灾难性地“重新抬头”后，“整个国内政治具有了显而易见的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制度的特征。”<sup>[39]</sup>不过，随之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传统负担进一步得到强化——死者的财产在死后立即归属继承人。一个国家，它不仅毫不畏惧地使用强硬的镇压手段，而且坚定地把教团的感恩祈祷和贵族化列入计划之中，在这样一个国度中，要克服臣仆精神是很困难的。甚至连德意志帝国最激烈的反对者也受到了这种行为方式的影响。当然，也许这种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在“第二国际”中，有批评者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内组织“普鲁士化”，并且有观察家清楚地看到，在“Zabór Pruski”工作的波兰人也有这种普鲁士的特性，这些看法并非完全无中生有。毫无疑问，古老的普鲁士已经以顽强的生命力和鲜明的举止特性跨越了历史时代，长期生存下来。否认这一点，就无法看到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政治的困境。

### 3. 无冲突社会的理想

这种极权观念和臣仆观念的关系还有一种思想根源，即人们以此来间接地表达出无冲突社会的乌托邦思想。在这一种无冲突社会中，政府以及管理



部门是超党派的公共福利的守护者，“纯业务的”决策机关，当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叫做技术治国的专家。在他们之下，所有的社会集团原则上都在一种和谐的合作关系中共同生活。在这种田园式的生活中，对抗和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都没有市场，它们会遭到社会的拒绝，或者会被视为怀有恶意的捣乱企图。那些在保守主义的阴谋策划者理论中占据突出地位的捣乱分子，都必须加以打击、驱逐，在必要的时候还要彻底消灭。这样一种模式的吸引力显然基于一种活生生的历史传统，即国家要干预社会的发展进程。至今，我们从对“大联盟”的肯定以及当代“规规矩矩的社会”规划中，仍然可以部分地感受到这种模式的魅力。

冲突是结构性的，不可避免的。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否认，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反议会趋势的发展。议会是经过严格调控的解决纷争的讲坛，本身就是以承认社会的利益矛盾为前提的。如果这一点遭到否认，那么，议会就会像“聊天室”一样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认为矛盾不正常，代之以将相关矛盾制度化，确切地说，将这些矛盾转变为根据事先规定的斗争规则而日常化的仪礼，这不仅使人倾向于反对阶级斗争，而且易于迫使人们接受无冲突的观点，从而导致大和解，这种大和解则最终会使“政党争吵”的冲突沉寂下来。在这方面，我们会涉及到促成一种综合症的某些历史性前提条件，这种综合症在资产阶级中等阶层的激进化过程中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有组织的左翼力量都被升格到了捣乱者的层次，他们成了和谐的集体生活的破坏者。虽然在1848年、1862年和1871年反对上层贵族和封建国家的斗争受挫之后，相关斗争已经有所减弱。但是，这种来自左翼力量的斗争越激烈，资产阶级中等阶层之中针对来自下层威胁的各种侵略和阴郁的反感就越具有片面性。1933年以后，这种感情才猛然爆发出来。如果没有这种历史的视域，或者说，如果仅仅从1918年到1929年这一时期之后的形势出发，我们是无法深刻理解中等阶层的这种渴望和谐的集体生活的刻板行为的。

#### （七）以确保忠诚为目的的补偿性支付

尽管统治者做出了各种努力，试图保持对德意志帝国社会中的各种结构性对抗的控制，但是，事实早就证明，仅仅使用对社会化进程的操控、阶级特性的司法以及内在化的顺从等手段，并非总是奏效。此外，在1873年以后，由于不均匀的经济增长，“社会问题出现了温室效应”（罗德贝图斯语）。<sup>[40]</sup>在到1879年为止的经济萧条期间，对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极端怀疑，也猛地削弱了人们对于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信任。换言之，所





谓只要假以时日，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自由博弈必定带来公益的信念，已经受到了损害。更确切地说，德国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说明，在几乎所有的生活领域，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力出卖者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并非仅仅在物质收入方面——都拉大了。到19世纪70年代末，统治集团已经意识到，如果人们对于按照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方式的发展充耳不闻的话，会因此而引发社会政治方面的危险。因此，很早以前，诸如政治家赫尔曼·瓦格纳、部级官员特奥多尔·洛曼等，就已经草拟了一份具有远见卓识的国家改革行动计划。像卡多夫、施图姆、霍恩洛厄-朗根堡以及弗兰肯贝格等在1878年到1879年期间推行坚定的保护主义集结政策的代表，还要求立即采取社会政策方面的措施，也是绝非偶然。米克威尔出于同样的动机，也明确表示，目前“要用强有力的能量来遏制革命的爆发，通过鼓励小财产所有者来创造社会的亲善，并且要热心满足劳动阶级的各种合理要求”，以便“使混乱转向改革”。<sup>[41]</sup>

### 1. 社会保险取代社会改革

出于古老的“警察政治”的传统之故，俾斯麦在早前就相当高调地支持国家采取社会救助措施，但是遇到了自由派官僚的抵制。不过，当危机形势变得越来越坏时，他又回归到典型的波拿巴主义的稳定方式，采取基于财政预算之上的社会政策。这种社会政策构成了俾斯麦政策的国内部分，而俾斯麦政策的对外方面则是经济和殖民扩张。从一开始，俾斯麦的社会政策就不涉及那种劳工保护，也不涉及使工业领域的劳动人道化的意义上的社会改革，更谈不上变更社会秩序。众所周知，到1890年为止，这位帝国宰相一直严厉拒绝1871年才引入的工厂监察制度、取消星期日工作、缩短工时、限制女工和童工、采取最低工资保障等一系列措施。资本所有者对企业的支配地位根本就不受他们应该共同负担的社会公共福利捐税的损害。更确切地说，俾斯麦与众多的企业主持有一种相同的立场，那就是，为了保持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不允许工业界负担过重。根据施莫勒的观点，对于俾斯麦而言，不仅企业的社会政策被严格按照规定搁置起来，而且“促进当前的企业利益”成了“社会政策的核心所在”。<sup>[42]</sup>副宰相施托尔贝格在1878年曾指出，很明显，19世纪80年代的保险立法从一开始起就是作为镇压性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的“必要补充”来设计的。用贝内德托·克罗塞的话讲，俾斯麦是想满足“肉体上的各种需要”，“以便麻痹他们的精神和摧毁他们的意志”。<sup>[43]</sup>俾斯麦宰相自己对此也毫不隐讳，即他的社会政策是来源于波拿巴主义统治手段的武器库。他在帝国议会中宣称，他曾经“在法国长期生



PDF



活”，“要知道，大多数法国人对政府忠诚，……与大多数法国人是国家养老金受益者有关”。<sup>[44]</sup>如果说拿破仑三世希望通过国家保险、疾病保险机构、给小储户以养老金分红以及给合作社补贴，等等，使得工人对他的政权承担起义务，那么这位德意志帝国宰相“对这种



图34 1890年左右的地方疾病保险卡

意图有最充分的”的理解。而在另一方面，他也像拿破仑三世皇帝一样，无保留地反对劳工保护和组织法。他曾意图鲜明地介绍了他的驯服政策，这就是，不仅要用反社会主义非常法这种“预防性的措施”来迫使工人阶级放弃他们的解放斗争，而且要通过保险立法这种“国家社会主义”来使他们变得驯服。由于保护关税显著地提高了维持生活所需的费用，因此政府似乎也准备在物质方面做出妥协，以此制止自由工会的进一步发展。对此，政府的政策目标是，必须确保工人阶级就像老普鲁士的农场固定工人一样，通过领取国家养老金而保持忠诚。因此，俾斯麦以令人惊讶的坦诚毫不掩饰地承认：“要在大量的无产者之中制造……保守的意识，而这种保守的意识产生于享受养老金的权利的感觉。”他向一位记者解释了他的有关下层基础和上层结构的看法：“谁在年老时有养老金，谁就会更满足，也会更轻松地看待意料之外的事情。请您看看一个私人奴仆和公务员的区别吧。与前者相比，后者更能容忍……因为他期待着养老金。”与这种社会政策相比，一场革命会招致“完全不同的代价”，而革命是可以通过社会政策来预防的。这种社会政策是要“以发票薄的形式，给产业工人一种取代土地和财产的代替物”。<sup>[45]</sup>

然而，甜糕和鞭子的结合妨碍了所期望得到的社会政策的效果。为政治和社会平等而斗争的工人阶级拒绝对于依据非常法采取的镇压措施，也反对统治者不理睬扩大在工厂中的安全及保护问题的情况。另一方面，假如人们考虑到社会民主党的壮大以及社会政治在俾斯麦辞职危机中所起的作用，还有他承认自己在建立工人对“国家的认同态度”方面的失败，那么，罗德贝



图斯在帝国建立之年的预言就部分地得到了证实，即“社会问题……可能成为俾斯麦声誉的损点”。<sup>[46]</sup>然而，在政治上值得关注的是，不仅这种将镇压和养老金结合在一起的愚蠢做法使社会政策的吸引力不足，支付的养老金款项太少也同样是重要原因，此外，它的受益面也仅仅覆盖了很少的人群。除了上述情况外，根据 1883 年的疾病保险法的规定，多数职业工人（远非全部）必须强迫保险，但是被保险人自己必须缴纳全部保险费的 2/3。1885 年，共有 470 万被保险人，占总人口的 10%，平均每人拨付 11 马克。1889 年开始启用残废和养老保险。到 1900 年底，包括国家发给死者家属的抚恤金在内，国家发放大约 598 000 份年金，每年平均每份年金 155 马克。因此，那些生病的、受伤的和年老的工人还谈不上能够无忧无虑地生存。正因为如此，自由保守党的汉斯·德尔布吕克也承认，“如果社会民主党讥讽这一立法体系”，人们“很难抱怨”社会民主党。这一立法也就“给一部分工人——人们可能会注意到：才一部分工人——进行了保险。”与此同时，“永远都带有市侩味道的公共舆论”则会说，“现在已经通过了太多的立法，该休息一下了。”<sup>[47]</sup>

德国的社会政策是逐步地丧失它的某些源于波拿巴主义的特征的，它的各种具体成就也是慢慢地积累起来的。1913 年，每个受保者的平均年金至少已经达到 165 马克。法定的各类保障也得到扩大。1891 年确定了星期日休息和最低工资保护；1903 年和 1905 年实施童工保护；1911 年实施职员保险；1900 年进一步扩大事故保险范围；1903 年扩大疾病保险范围；1899 年以后，残废抚恤金根据帝国统一规定的费用支付，以前的发放数额则取决于各个机构的财力；1901 年，开始引入强制性工商业法庭；与此同时，开始批准设立工人住宅公共资金，不过投入较少，1901 年只有 200 万马克；1908 年的工商业管理条例补充部分则扩大了劳动保护的适用范围。加上更具重要性的实际工资的增长，修正主义在俾斯麦原先估计的范围内得到了验证。但是，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在这方面还有各种不同的观点。

(1) 社会政策是德意志帝国领导集团避免冲突的一种策略。有时候，上层统治者会同意给予更多的管理技能方面的帮助，但他们从未想过要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更大的平等权利。农业工人经常成为这种政策的忽略对象，直到 1908 年，帝国社团法还禁止他们罢工，这几乎等于禁止他们的联合权利。劳动时间的减少和安全保障等，则与严厉的惩罚条款挂钩。例如，1891 年就规定禁止工会采取强迫一致的行动，而团结一致从来就是劳动纠纷中“弱势的一方”唯一成功的机会。



(2) 威廉二世在其统治之初就宣称愿意改革，但是他失败了。这种失败决不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忘恩负义”。从俾斯麦辞职直到 1893 年和 1894 年以后在社会领域公开实行反动路线，威廉二世在社会政策方面丝毫没有显示出积极性，而是满足于与重工业界打成一片，满足于一时的哗众取宠。只是在显而易见的欺骗手段没有结果之后，他的“反颠覆的斗争”终于放弃了伪装。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各项措施而带来的行政机关方面的改善，使得一些活跃的议员和像波萨多夫斯基这样的高层官员的这份事业得以保持下来。然而，相较于国民的平等思想，他们更赞同俾斯麦的打算。此外，他们的手工业者和职员政策也确实揭穿了他们的分而治之的意图。在普遍改善全体受雇者的生活保障方面，政府的策略是，将潜在的忠于政府的中等阶层选民放在优先的地位。

然而，即使威廉二世这种谨小慎微的社会政策，在 1913 年时仍在很大程度上被现行统治阶级视为倾向于工人。1914 年 1 月，贝特曼的代表、帝国内政部代理国务秘书克莱门斯·冯·德尔布吕克就完全转向雇主一边，明确表示，要冻结社会政策。

(3) 最后，有一点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认为 1890 年以后德意志帝国的社会政策实质上是国家加强了妥协的准备。在这方面，波萨多夫斯基曾经做出过计划，而特奥多尔·洛曼早在 20 年前也已经做过相关的考虑。然而，如果人们从这种社会政策积累起来的效果中能够感受到改善的话，那么，这首先是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持续抗争的结果。尽管罢工遇到了各种阻力，司法带有阶级性偏见，还有社团法的阻挠以及集结政策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却不懈努力，直至获得某种程度的妥协。并非像人们一直所认为的那样，国家或国家官僚机构是出于人道考虑和超越利益冲突的政治智慧，才满足这种必要的妥协。只是由于社会以及帝国议会内的力量配置的原因，才迫使国家不断地做出部分的让步。在这方面，有如过去的几十年里一样，对于“红色危险”的恐惧感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政府必须加大补偿力度，以便大众的效忠不至于进一步减退。至于公职人员到施莫勒手下学习或者普遍流行的“社会君主政体”扮演中立角色的思想，都不是导致国家做出让步的原因。于是，在德意志帝国，具有未来特征的国家社会政策的计划（而非私人保险和企业的社会救济）通过一种专制性的、家长式的方式落实到了工人阶级身上。众所周知，从长远的眼光看，只有现代干预型国家可以通过重新分配国民收入的方式，扩大社会的机会均等。然而，德意志帝国统治者对于政治和社会平等的公然拒绝，使得在



制度上具有优越性的德国社会政策长期无法产生有效的影响。

## 2. 补偿性的追求威望的政策

在社会政策方面，首先涉及到的是物质方面的帮助和保障。而这些必然会导致一种忠诚于国家的集体主义精神。不过，德意志帝国的权力精英们非常清楚的是，除此之外，还要给予心理方面的补偿。高度工业化时期社会的迅速变化，不断蔓延开来的经济状况的无保障，经济状况的恶化和不稳定性，经济的波动以及这种波动的结果给现状带来的潜在问题等，所有这一切，尤其在中、小资产阶级之中产生了一种持续的、极度的不安，以致他们长期不知所向。而他们的生活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稳定和安全、平静和秩序。这就是并不认同封建主义的、非常重视威望和影响的统治集团的荣誉准则的中、小资产阶级阶层为什么也容易受到追求威望的思想和威望政策影响的社会根源。与此同时，被排除于“帝国民族”之外的德国工人阶级之中，几乎一整代人也长期持有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经常以各阶层特定的动机和驱动力为出发点，不能过早地将一切都置于一种所谓普遍的、敏感的民族主义的统一框架内。更确切地说，这种集合名词只是用来起一种掩饰作用。它模糊了对行为具有决定作用的各种经历、传统和利益状况的区别，而这些区别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并且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产业工人、小商贩和县长的身上，他们的经历、传统和利益状况是完全不同的。

在利用威望情结作为统治伎俩方面，这种政策针对的实际目标群体就是整个中等阶层。这种追求威望的政策除了在社会经济方面显示出有条件的可接受性外，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也提供了特别有利的共振可能性。在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中，经济上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以“民族”认同反对基于明显的等级之上的社会。现在，这种“民族”思想已经变为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即中等阶层也代表了现代的德意志民族以及这一民族真正的准则和价值观。基于资产阶级以及整个民族的这样一种认同的原因，这种表面性的成果被资产阶级当作一种自我价值的直接提升而加以宣传。相反，任何倒退都会被视为是对这种成果的直接攻击。因此，一种目标明确的追求威望的政策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以及暂时抵消社会经济方面的抱怨。也因为这样一种思想的关系，这种追求威望的政策也可能被用来争取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关于这种追求威望的政策与扩建海军、帝国主义以及对外政策的关系，下文还会进行深入探讨。这里只需要弄明白的是，统治阶级利益集团必须推行追求威望政策的某种必然性与社会的变化以及流行的社会阶层思想之间有关密切的关



系。我们还须看到，如果用生物学、活力论的比喻认为，一个年轻民族具有力量意识或者越来越渴望获得名声，那就会错过问题的本质。同样，社会政策和作为补充性的追求威望的政策一起，就像相互咬合的齿轮一样，构成了补偿性措施，以防德国社会陷入四分五裂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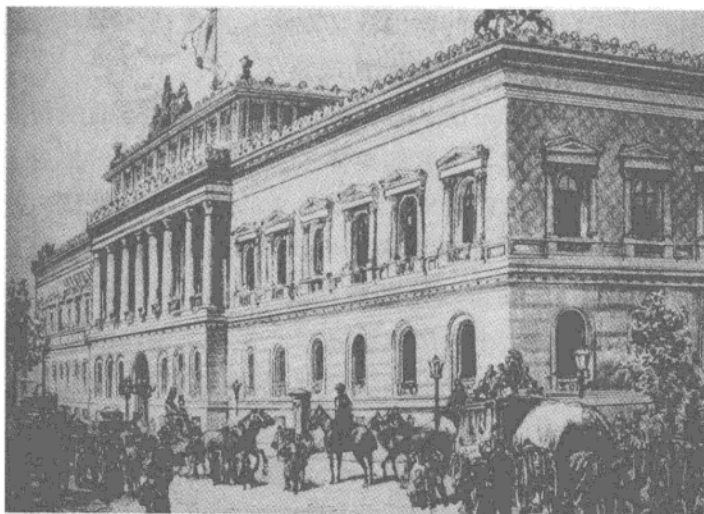


图35 柏林的帝国银行大厦

#### 四、税收和财政政策

“L' état c' est l' état”——如果不甚严格地翻译的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国家预算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真正宪法。因此，奥地利经济社会学家鲁道夫·戈尔德沙伊德曾经总结了国家预算的根本性意义，称之为“剥去了各种欺骗性意识形态的国家骨架”。“没有现代国家在公共财政方面的支持”，统治阶级就无法“维护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权力地位”。他们“通过强制性的财政安排”，使国家变成了“他们的工具”。<sup>[1]</sup>事实上，尤其是现代“税收型国家”（熊彼得语）随着专制主义领地国家的发展而开始兴起，已经无人质疑国家预算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一问题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毫无疑问，社会各利益集团会通过国家财政和税收系统贯彻了自己的利益。不过，在这方面，戈尔德沙伊德过于考虑资本主义对于利润的追逐。从另一方面看，在中欧和西欧地区，国家统治机构决非只是顺从的协调代理人。它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在德国，这种自主性与强大的前工业社会的农业精英们的利益有着紧密的关系，因此，它可能会侵犯特定的资本利益。在优先保持现存制度的情况下，国家机构可以逐渐地转变为一种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控制器。就制度框架层面而言，在调节国民收



人分配方面迟疑踌躇的开端起始于德意志帝国时期。鉴于德意志帝国这种混杂的、传统和现代因素相结合的权力结构，人们必须谨防一种假设，即资本利益可以代替各种混杂的影响，确定其在公共财政方面的完全支配地位。

### （一）统治制度的资金筹措

情况表明，在 19 世纪的最初 20 年里，国家持续的公共财政需求只能通过定期的税收方式来满足。因此，德意志各邦的财政管理变成了税收管理。在这方面，大致说来，南德诸邦中形成了收益税制度，而莱茵河以北地区采取的则是个人税和所得税形式。1820 年的普鲁士税收改革则继续沿用将城市和农村区分开来的传统方式，并且引入了一种直接的个人税，即对 6/7 的农村和小城镇的人口征收等级税。基于这种做法背后的思想是，个人纳税集成的年度税收必须取代传统的全体捐钱的体制。不过，这种制度的“严重缺点”在于，“以沉重的直接税加重了下层阶层，与此同时，富有者的负担却完全不足”。<sup>[2]</sup> 到 1861 年为止，普鲁士的骑士庄园主仍享受着完全的税收豁免权。1851 年的个人税改革是 1848 年革命的后果之一。它在对富人征税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继续有利于大财产所有者（这是有利于德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投资积累的）。直到 1873 年，这种等级税才转变为一种分类的所得税，从而取消了将城市和农村区分开来的过时做法，收入超过 900 马克者被纳入征税对象之列（实际上是在 1883 年之后才实行！）。然而，“税收负担对于并不富裕者而言……仍有压力，而征税标准的不均衡性则使得财政和社会政治方面的敏感性更加突出”。直到不久，人们才强调，征税标准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在对大地主的收入（包括他们的土地和财产税）进行评估征税时，征税标准可能由易北河以东的县长们来决定，确切地说是由他们来加以掩盖。

1873 年以后，经济的低迷加重了改善税收体制的难度。首先，帝国宰相俾斯麦是不利于消费者的间接税的有力辩护者，他对直接税做了激烈而成功的抵制。在俾斯麦和统治集团看来，征收累进所得税是特别令人讨厌的事。他曾经振振有词地指出，“对于累进所得税的准则进行合理的界定是不可能的，一旦这种税收方式得到法律上的确认，它就会进一步向社会主义的理想方向发展。”<sup>[3]</sup> 由于这样的阻挠，在 1873 年、1891~1893 年期间，税收改革在德意志帝国的最大邦普鲁士出现了停滞的局面。直到 1893 年，普鲁士财政大臣冯·米克威尔才引入了一种普遍的所得税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凡在 900 马克这一免税限额之上者，有义务自己申报收入，缴纳 0.6% 到最高达 4% 的所得税。在高度工业化时期以及国家向农业界施舍的情况下，这



完全不是什么令人痛苦的侵犯。此外，1893年征收得来的收益税也分配给了各乡镇，故此，人们是否要像现今一直盛行的那样，由于税收实现了统一而大谈“米克威尔的改革”，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然而，这种改革对于地主们而言，却意味着一种前所未闻的利好事情。他们非常清楚为什么在农村地区会允许通过这些新的法律。其中原因在于，1893年的地方捐税法实际上恢复了30年以前已经取消的“骑士庄园主土地税豁免权”。于是，不仅“税收负担的民主化”进程出现倒退，而且大地主们也通过这种“负担的调节”而大大减轻了负担。只看到这一法律前言中夸夸其谈的改革大话并且对相关解释说明信以为真，是绝对不够的。同样，也不能因为不可否认的合理化的成效而奢谈“巨大的成就”，<sup>[4]</sup>进而放弃对这些法律的政治利益背景及其客观的、有预谋的后果的考察。在这方面，人们马上会看到，支撑米克威尔的集结政策的两大支柱，即大农场和大工业，在物质上得到了巨大的好处。这并不令人惊讶。然而，历史学家们却极易囿于成见，忽视德意志帝国税收“改革”的真正本质，把立法者的动机解释当作德意志帝国税收制度的实质。不过，有一点是对的。如果完全从目标的异化角度来审视，那么，对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的福利国家和税收国家而言，米克威尔的所得税制度应该说从根本上改善了这种制度的前提条件。然而，这种情况是与决策者的意图相反的，也恰恰是俾斯麦所担心的。整体上看，米克威尔的有关法律到1918年时仍然保留着，时至今日，部分规定在联邦德国仍然有效，还有利于土地所有者。

德国各邦的财政是由税收和借款来负担的。根据德意志帝国宪法第七十条的规定 [1904年的施滕格尔法（施滕格尔（Hermann Frhr. v. Stengel, 1837~1919年），1903~1908年间任帝国财政部国务秘书。译者注）给予了补充]，德意志帝国的财政政策是以本身的收入为基础的。这种收入有三个来源：（1）各类关税；（2）消费税和交通税（包括对盐、烟草、烈酒、蔗糖、啤酒征收的税和票据印花税等）；（3）帝国邮政的收入。其他的额外收入则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4）所谓的各邦的捐款，即各邦根据自己的人口摊派的补助费；（5）源自1871年法国赔款的帝国财产；（6）各类借款。1879年之后，帝国的关税收入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诚如德意志帝国财政收入比重所展示的那样，这完全是因为农产品关税造成的。对于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德国一位最著名的财政学家称之为“在社会政策方面难以令人高兴，只是不要说令人害怕”。然而，这种关税却意味着普通消费者的巨大负担。<sup>[5]</sup> 以下为农产品关税在帝国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1879年：1 320万马克，占11.8%。

1881年：1 710万马克，占9.2%。

1891年：17 630万马克，占44.7%。

1901年：25 530万马克，占46.0%。

1913年：41 370万马克，占47.0%。

毫无疑问，从社会层面看，这种税收制度是不公平的，但是，它的运行基本正常。直到1898~1900年以后，迅速增加的军备开支才破坏了国家财政方面的收入和支出的平衡。由于直接税威胁到有产者从前一直享有的特权，他们因此而强烈支持增加各种间接税。但是，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直到1906年才进行了一次小改革，严格限制直接税，帝国在财政上陷入了仅有极少的盈余的困境。更重要的是，1908年以后，由于建造无畏舰，迅速消耗了帝国财政方面的额外收入，以至于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税收制度问题。

1909年的帝国财政改革通过间接税的方式，再次将税收从1909年的每年13 800万马克增加到了1913年的每年29 100万马克。而资金往来税，特别是消费税，则取代原先讨论过的遗物税或遗产税，开始得到实行。然而，这些税种不仅无法实现每年5亿马克的额外收入的期待，而且因此而再次损害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以至于真正的获利者都是想尽办法在这方面进行宣传煽动的地主。帝国宰相比洛夫甚至把他们刻画为“粗野的利己主义者”。<sup>[6]</sup>既然税收政策总是意味着对特定的原则性分配机制的认可，那么这次帝国财政改革实际上表明，它是明显不利于消费者的，是反工业的，但对于农业大地产者却特别优惠。这就是德意志帝国所秉持的“地产所有者集团”的态度。自俾斯麦时代以来，这一地产所有者集团被美化为“最能承载国家政体的一种社会要素”。<sup>[7]</sup>

帝国财政的主要部分都用在了军备政策上。在1880年到1913年的和平时期，德国的现役兵力增加了87%，军费开支则增长了360%。尽管帝国财政收入有了巨大的增长，在1913年时，相关的军费开支仍像1875年所需要的那样，占到了国家财政总收入的75%。在这方面的人均负担费用是：1875年为9.86马克，1890年为11.06马克，1900年为14.96马克，1910年为19.56马克，到1913年增加到了32.97马克。如果根据军费的拨付款项和完全支出情况来检查一下帝国的正常预算，并反过来换算一下它在拨付款项中所占的百分比，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军备利益集团的支配地位。下表为根据格洛夫的计算得出的相关数据（单位：百万马克）：



图36 德意志帝国5分尼的硬币（1906年）

	拨付款项	绝对军备支出	占实际需要的百分比
1876~1880年	481	485	100.8
1880~1885年	478	463	96.8
1886~1890年	700	656	93.8
1891~1895年	832	737	88.5
1896~1900年	974	837	85.9
1901~1905年	1 200	1 100	84.1
1906~1910年	1 800	1 300	73.7
1911~1913年	2 200	1 600	74.7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借款。虽然这些借款的额度难以确定，但可以通过利息的支付计算出来。仅军队借款一项，1891年到1895年的借款利息是每年4 700万马克，1906年到1910年间是每年支付6 800万马克。所以，在1913年时，国家预算的3/4都用到了与军备有关的支出方面。而诸如行政管理、社会保险、教育等其他方面的开支等，则仅仅占据了国家预算中剩余的25%。因此，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除了帝国各邦预算中或明或暗的用于军备的预算项目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帝国的财政需要完全是由军备需要来决定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各项预算项目后面，这个大普鲁士的军事国家具有优先权。同时我们也能在很大程度上看到有关



阿道夫·瓦格纳的著名而可怕的“国家支出持续增长法案”<sup>[8]</sup>的关键原因。

下列数据用事实清楚地说明了德意志帝国的支出持续增加的总体发展趋势：

年 份	支出 (10 亿马克)	占国民生产总值%	人均负担 (马克)
1872 年	0.4		
1880 年	0.5	2.6	12
1890 年	1.0	3.3	21
1900 年	1.5	4.4	29
1907 年	2.5	5.4	40
1913 年	3.4	5.8	51

国家的借款政策则反过来表明，政府对于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具有依赖性。在 1859 年到 1873 年，还有 1896 年到 1913 年期间，政府几乎都要受到“普鲁士财团”或者由大银行联合组织促成的其他借款时所定的一些条件的束缚。然而，从 1873 年到 1896 年，由于资本过剩，导致出现了空前的低利息流动资金市场，从而使得人们可以便宜地和轻易地获得借款。这就使得“独裁统治变得容易，而议会的影响力则受到削弱”。无怪乎，在 1880 年到 1890 年期间，仅普鲁士的国债就增加了 39 亿马克。<sup>[9]</sup> 尽管帝国宰相俾斯麦抱怨财政困难，指责议会吝啬，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种发展趋势。

## (二) 国民收入的分配

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方面，尽管有少数的统计数据不甚详细，但是要剖析出它的整体基本特点还是可能的。“收入分配发展中的差别”造成了“有利于较高和最高收入”的日益增加的不公平性。这种情况在“经济高涨”时期总是“显现得特别清楚”。<sup>[10]</sup> 有关德国国民收入引人注目的增长情况，这方面并没有提供太多的全方位的数据。但是，从德国工业革命结束时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德国的国民收入增加了 3 倍。

	国民收入 (10 亿马克)		国民生产总值 (10 亿马克)
1860~1869 年	10.67	1872 年	16.0
1870~1879 年	13.59	1880 年	17.9
1880~1889 年	18.95	1890 年	23.1
1890~1899 年	26.2	1900 年	32.9
1900~1909 年	35.41	1910 年	48.0
1905~1914 年	43.11	1913 年	54.7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经济发展的波动情况。例如，就工业收入而言，1865年到1874年期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1.1%，1875~1884年期间占26.7%，1885~1894年间则下降到了25%。而人均收入的统计办法尽管拉平了巨大的落差，却仍显示出这种增长。

	人均国民收入 (马克)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马克)
1860~1869年	272	1872年	388.7
1870~1879年	320	1880年	397.5
1880~1889年	406	1890年	469.7
1890~1899年	505	1900年	587.7
1900~1909年	592	1910年	743.3
1905~1914年	662	1913年	845.1

然而，如果将这些数据根据社会阶层加以分类，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1/3的德国人口在工业领域工作，但是从1870年到1900年，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方面所占的份额反而减少了55%。<sup>[11]</sup>当然，我们还不能精确地确定这一长时段中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确切份额，不过，从1873年到1913年为止，这一份额几乎一直在减少（根据每四年一个指标点）。与此同时，固定资本却在增长。

倘若我们考察一下劳动收入的分配，我们也会清楚地看到德国在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的状况。从百分比增长率看，1879年到1913年，农业的年增长率仅为2.5%，但是采矿业增长率为5.8%，工业和商业增长率为4.3%，交通运输业增长率为5.1%，贸易增长率为4.9%。如果以马克来计算的话，农业领域的劳动收入从1875~1879年的3 720万马克下降到了1895~1899年的2 550万马克，1910~1913年则下降到了2 160万马克。与此同时，在采矿、工商业、交通运输和贸易等其他四个经济领域则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即从1875~1879年的4 120万马克（相对应的四大领域分别是200万马克、2 940万马克、280万马克、700万马克）增加到了1895~1899年的5 360万马克（相对应的四大领域分别是280万马克、3 740万马克、400万马克、940万马克），1910~1913年则增加到了5 900万马克（相对应的四大领域分别是：390万马克、3 860万马克、500万马克、1 140万马克）。同样，在资本的收入方面，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出结构性的重心转移。1860年到1864年农业领域的资本收入还占48%，1875年到1879年，农业领域的资本收入在资本



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则下降到了 29.3% (28 亿马克)。1895 年到 1899 年, 农业领域的资本收入占资本总收入的 23.5% (66 亿马克), 1910 年到 1913 年则占 29% (131 亿马克)。也就是说, 农业领域的资本收入百分比出现了停滞或轻微下降的状况。与此同时, 工商业领域 (包括铁路和邮政) 的资本收入却出现了增长。1875 年到 1879 年, 工商业领域资本收入占资本总收入的 46.1%, 1895 年到 1899 年增加到 48.1%, 1910 年到 1913 年增加到 51.1%。相比较而言, 1960 年联邦德国农业资本收入和工商业资本收入的比例为 11.2:83.2。 [12]

### (三) 分配不均的强化

然而, 所有这类综合性的数据只能给人留下一种总体性发展趋势的一般印象。只有在“农业”、“工业”等框架内, 人们才能做出细致的分析, 弄清楚高收入、最高收入为一方与低收入及中等收入为另一方的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看, 这里再现了资本的集中过程, 亦即马克思早些时候所预言的资本的集中。如果没有国家在诸如税收、工资和社会政策等领域的干预, 放任私营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在自己的市场和分配机制方面发展, 那么就会在收入的分配方面形成持续扩大的差距。倘若我们回想一下曾经引证的数据, 就会回想起来, 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到 1914 年为止, 仅就收入来源而言, 工人和下层职员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还不到 1%, 而国民收入却从 180 亿马克增加到了 500 亿马克。由此我们就获得了一种印象, 那就是, 处于收入分配和财富构成这样一个磁场上的“市场法则”使各种因素都极端性地转向一个方向并将它们集结起来。由于等级传统和新的阶级社会的蕃篱作用, 德意志帝国国民之间的分配不均本来就已经很明显, 现在又受到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集团和统治集团利益所确定的分配机制的影响, 而且几乎丝毫不受福利国家的感化, 因此, 这种分配不均的状况还会继续在物质上得到巩固。

## 五、军备政策

1866~1871 年的“大普鲁士的兼并联合”是三次辉煌胜利的战争的结果, 这三次战争大大加强了军队的威望。与此同时, 这些战争使得坚定地实施专制主义的军队政策有了可能。这一新建立的国家在它的“组织规章”中也充分考虑到了这种专制主义的军队政策的实施 (里德语)。不过, 在这种实施专制主义的军队政策方面,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各种现实的力量结构, 而它们是不受帝国宪法行文的影响的。到 1918 年为止, 在德意志帝国内部的





权力分配问题上，向来是以“国王的军队”为出发点来决定的，民意代表机构一直无缘控制军队。

### （一）军队

1866 年对奥战争中，普鲁士取得了胜利。俾斯麦自己称他的这一场冒险性战争为“严酷的掷骰子游戏”。<sup>[1]</sup> 这场战争的胜利为军队建设扫清了道路。1867 年确定了到 1871 年 12 月为止的“常备军法案”，此法案规定军队人数必须始终达到人口总数的 1%。据此，每个士兵每年 225 个塔勒尔的配额加上其他的军事开支，就占到了当时北德意志联邦预算总额的 95%。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由于俾斯麦适时地发动了第三场战争，议会于 1871 年秋天出现的有关军事立法的辩论也因此被推迟。结果是，“常备军”法案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就延长了 3 年，即延长到 1874 年。

1871 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第 60~62 条）在字面上再次明确了 1867 年所规定的和平时期的兵力及财政拨款总量，不过，宪法也规定，这一切还必须“在日后通过帝国立法的途径加以确认”。然而，这一规定与德意志帝国宪法第 63 条第 4 款有明显的矛盾。1867 年以后，作为普鲁士国王的皇帝扮演着“联邦武装力量统帅”和“联邦主席”——其相关决定需要大臣的副署——的双料角色，是指挥“……战争和和平时期指挥帝国全部陆军力量”的最高统帅（第 63 条第 1 款）。在这方面，只有巴伐利亚和符滕堡保留其特定的权利。因此，皇帝是可以不受限制地确定“帝国军队的现役人数”的。这里，宪法冲突中的胜利者的真正意图暴露无遗。对此，俾斯麦也坦承，“帝国宪法的最初动机是，使皇帝在做出帝国军队兵力的决定时……不受帝国议会决议的干扰”。因此，在 1874 年以后与议会定期进行的一系列新较量中，向“帝国立法”做出让步的结果，就是要“对皇帝在这方面统揽一切的权力做出限制”。而在这些新的较量中，有关军队“自成国家”<sup>[2]</sup>（卢修斯语）的专制主义隔绝问题就被提了出来。1874 年，德意志帝国政府决定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它要求一种“优先列名权”，也就是说，现有武装力量应该完全托付皇帝指挥，议会的批准应自动生效，这样一来，帝国议会对于军事预算额度的预算权就会在事实上被消除。双方因此出现了预料之中的冲突。斗争的结果令以罗恩为中心的军官集团感到不满（斗争的结果是，俾斯麦政府与议会达成妥协，将无期限的军事预算修订为 7 年的有效期。译者注）。然而，由于这种所谓的“七年有效期”（Septennat）赋予政府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拥有所期望的兵力，帝国议会已经做出了非常实质性的让步，那么它无论如何都必须使它的继任者受到约束。显而易见，在



图37 民族自由党领导人本尼希森（1871年左右的木刻画）

这场争论中，“宪法冲突”时的阵势再次浮现出来。就左翼自由党人而言，欧根·里希特称七年期预算法为“军事事务方面反对议会制度的专制主义残留”，并且预言，“如此一类的专制主义必定会向癌症一样地扩散开来”。中央党议员马林克罗特也同样攻击七年期法，认为“军国主义正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它的血肉之躯”。而民族自由党的领袖冯·本尼希森则强烈地表达了原则性的抗议。他在试图加

强立法影响的努力失败后，总结性地指出：“战争的安排、军队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框架，因此，如果不能成功地将军队以及国防安排完全纳入立宪主义的宪法之中，那么，在这样一个国家中就不会真正实行宪法”。<sup>[3]</sup>从这一意义上讲，德意志帝国事实上在40年以后也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主义的宪法。

由于1879年向保守主义的转变，1880年的第二个七年期预算迅速得到了批准。在俾斯麦制造的“战争危机”的恫吓下，第三个七年期预算也急忙获得了通过。1893年开始，帝国议会每五年举行新的选举。于是就出现了采取为期五年预算法的要求，同时也要求用两年义务兵役制取代三年义务兵役制。尽管政府在这两点上都最终做出了让步，但这并不表明它的软弱。更确切地说，这种让步显示出政府的自信，即国王控制军队已经得到了保障。

随着各项军事法案的通过，德意志帝国在和平时期的军事力量持续提升。以下为德意志帝国的官兵编制人数与人口数之间的比例。



年份	帝国人口(百万)	军队编制人数(大约)
1870年	40.9	400 000
1880年	45.1	434 000
1890年	49.2	509 000
1900年	56.1	629 000
1913年	67.0	864 000

上表表明，从1880年到1913年，帝国军队编制人数增加了将近100%。不过，其实际兵员人数通常有些落后于规定的编制人数。与此同时，诚如已经提到的那样，军事方面的开支增加了360%，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占到帝国预算的75%。

德意志帝国仍然保留着普鲁士那种君主指挥权领域和军事管理领域之间的区隔。帝国议会可以通过军事管理领域，从普鲁士国防大臣处得到相关的咨询答复。自从宪法冲突以来，争论的焦点围绕着以下问题：针对议会在军事方面的共同决策的要求，是否要捍卫国王不受控制的军事指挥权范围，或者说，甚至要扩大国王不受约束的军事指挥权范围。从宪法的现实状况看，有关君主军事指挥权争论的最后结果是，尽管德意志帝国宪法以及普鲁士宪法都规定，君主命令的效力在表面上仍有赖于大臣的连署，但“在指挥事务方面，皇帝的命令是不受大臣的连署的影响的”。这种君主的军事指挥权是晚期专制主义统治中保留下来的核心要素，所以，在现代自由主义的宪法之中几乎无法对其进行界定。它代表了封建秩序的一种残余。在封建时代，国王因血统之故而成为他所招募的军队的当然领袖，武士们则通过个人的效忠关系而向国王承担义务。到19世纪和20世纪，普鲁士统治者的思想中仍然保留着这种残余，视国王为“最高军事贵族”。欧根·里希特则恰当地称这种思想为“国家法的神秘主义概念”。<sup>[4]</sup>在这一最高军事贵族之下，存在一个主要由三大重要机构构成的网络体系，它们是军事内阁、总参谋部和国防部。军事内阁是国王的管理工具。它悄悄地，却顺利地填入了宪法尚未覆盖的漏洞之中，即国王不受议会监督约束的军事指挥权。这一机构起源于国王的副官助手，1824年从国防部分离独立出来，1850年以后，则成了国防部的长期竞争对手。1883年，国防部人事处被解散，此后，军事内阁开始自我管理有关的人事问题。因此，这一国王的直属机关在国王的军事指挥权事务上取得了关键性的地位，能够直接地或以“幕后指挥者”的身份，对各部





门施加广泛的影响。军事内阁忠实于长期担任首脑的威廉·冯·汉克（1888~1901年）的一句座右铭，那就是，军队“必须保持一个分离的躯体，任何人不得以批评的目光去看它”。<sup>[5]</sup>在老毛奇离职后，军事内阁也通常在有损于总参谋部的情况下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普鲁士，总参谋部是拿破仑战争之后于1916年形成的。但是，到1858年为止，也即赫尔穆特·冯·毛奇开始掌管这一部门之前，它完全没有什么意义。到1959年为止，总参谋部的首脑甚至从未得到直接向国防大臣汇报的授权。然而，1866年6月，普鲁士国王发出命令，准许总参谋部无需国防部居中处理，直接给予军队指示。毛奇在1866年德国内战中的成就给了他领导下的总参谋部极大的鼓舞。众所周知，对法战争期间，毛奇曾与俾斯麦发生了冲突。这位普军总参谋长在1871年1月时甚至宣称，他迄今为止一直认为，在国王面前，他和俾斯麦宰相是平等的，但是，国王最终却站到了俾斯麦一边。第一阶段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使随之而来的法国人那令人沮丧的游击战争暗淡失色。毛奇的反对法国的“剿灭性战争”的充满仇恨的言辞也并不被大众所知晓。<sup>[6]</sup>因此，随着柏林方面军事上的胜利进军，由这位“伟大的沉默寡言者”精心培育出来的“毛奇神话”开始获得承认。不过，总参谋部、军事内阁和国防部之间的权限范围继续处于有争议的状态。然而，在帝国建立12年之后，在这几个部门之间的一场近乎经典的热带丛林遭遇战中，这一关键性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以冯·阿尔贝丢尔为代表的军事内阁、以冯·卡梅克为代表的国防部之间发生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冲突，并导致后者解职。此后，冯·阿尔贝丢尔强加给卡梅尔的继任者保罗·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两个条件：第一，军事内阁以牺牲国防部为代价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二，为了回报总参谋部的支持和谋划，总参谋部首脑获得了无须国防大臣在场而直接向皇帝汇报的权利。布龙萨特接受了这些条件。从此以后，国防部变成了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因素，而总参谋部则突然获得了自主权。有关这种部门内部权力斗争的生死搏斗的重要后果，我们会马上结合施利芬计划进行探讨。

但是，首先需要明确的是，1883年军事部门权力的新安排也符合俾斯麦的打算。他也很乐意把军队当作他的政策工具来使用。在迪佩尔的战壕（即1864年对丹麦战争。译者注）前，在1866年普鲁士脱离德意志联盟的战争以及反对拿破仑三世的战争中，都是如此。然而，这些都是为了大普鲁士的扩张。因此，他捍卫军人特权化的特殊地位。正是因为他捍卫军队的特权地位，他才于1862年得到任命。此后，他则继续支持军队。然而，只要有



必要和有可能，他都会完全拒绝军队介入政治事务。因此，在到处留下他的印记的帝国宪法中，没有涉及到帝国国防大臣的条款。他完全有理由害怕与这样一个潜在的对手进行政治竞争。在德国这样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这一对手可以利用传统的优势。简言之，他的想法就是，一个负责的国防大臣“会不断地与帝国宰相产生矛盾”。<sup>[7]</sup>与此相对，阿尔萨斯-洛林总督却毫无风险地获得了在皇帝面前表面上与宰相平起平坐的地位。然而，尽管俾斯麦全方位地加以疑心提防，军方依然施加了政治影响。毫无疑问，在1890年以后，这种影响更是有增无减。由于武官处的原因，确切地说，由于普鲁士驻圣彼得堡的传统侍从武官的原因，皇帝可以直接获取相关信息，外交部的相关规定办事程序可以被轻而易举地绕过。

更重要的是，军队上层多次提出要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的建议。毛奇在早先就提到，德国面临的两线作战正在逼近，因此，他像瓦德西一样，经常要求使用先发制人的优势。1887年，这种预防性战争的计划达到了它的顶点。鉴于俄国内部积弱，“是我们发动进攻的有利时机”，同时法国的沙文主义宣传也预示着糟糕的形势，毛奇因而建议发动一场进军俄国的战役。然而，由于俾斯麦的坚决反对，他的计划再次遭到失败。<sup>[8]</sup>俾斯麦的这种原则上反对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态度绝非出于道德和种族方面的考虑（俾斯麦的正统观念使我们相信这一点）。他的这种态度是出于一种冷静的、完全不受基督教学说影响的利益考虑。至少在1875年以后，由于战争的严重程度难以预料，发动战争的政策已经被视为过于危险。在1890年以前，由于俾斯麦长期的特殊地位，这种仔细斟酌过的政策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此之后，甚至这种建立于仔细斟酌的整体政策判断之上的约束也被取消了。政治考虑在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在毛奇之后的总参谋部里面，那种出于纯粹的军事效果和机会考虑的专业性倾向却越来越强。

132

在一个武器迅速更新的时代，普鲁士-德国军方致力于通过全面的预先规划来应对未来的战争。在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是1891年到1905年间长期担任总参谋部首脑的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行动计划是一种纯技术的追求完美的结果，它悄然地放弃了克劳塞维茨的政治优先原则。施利芬计划在1895年和1896年期间进行了多方面的修订，在一定程度上是解决即将来临的两线作战问题的精妙方案。该计划的第一个主要目标是成功地击败法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德军的右翼必须在大约6周的时间内大幅度地迂迴，通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形成强大的突进形势，以便能够包围法国军队。为此，德军右翼需要配备7倍于左翼的兵力，以便有可



能在施利芬本人喜欢称呼的现代的坎奈（公元前 216 年 5 月，罗马军队与迦太基军队在坎奈展开决战，迦太基将领汉尼拔采用两翼包抄战术，以少胜多，大败罗马军队。坎奈战役因此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著名战例。译者注）给西方的对手以整体性毁灭打击，然后再挥师东进。施利芬计划的最终文本于 1905 年 12 月到 1906 年 1 月间形成。它被认为是绝对可靠的胜利保障。而这时的沙皇俄国由于发生了第一次革命而遭到削弱，萧条乏力，因此，最后德军在西线与东线的配置计划优先落实为 8:1。



图38 德国军队从马恩河撤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的马恩河战役致使德军受到重击，它意味着施利芬计划的失败。但是，早在此之前很久，人们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有三个重要的相互关联问题会使这一行动计划从一开始就有麻烦。

第一，德军要成功地实施施利芬计划这样一种大规模的行动，军力还不够强大。尽管总参谋部很难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即毛奇的胜利总是建立在数量的优势之上的，施利芬自己却没有持续不断地要求相应地增加军队的数量。因此，这一计划是建立于一种乌托邦式的、军方完全不负责任的奇想之上的，它很难与人们所赞美的总参谋部官员们的现实主义相一致。如果没有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兵力，右翼军队绝对无法担负起它的关键任务。因此，“大施利芬计划绝不是一个成功机率极高的有把握的胜利处方”，而是“一种过于大胆的冒险”。<sup>[9]</sup>

第二，施利芬计划从一开始就抱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即在西线的一次坎奈式战役就可以最后性地决定两线作战。一方面，位于东方的大俄罗斯帝





国，特别是在 1894 年与法国结盟之后，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对手。它几乎不会因为法国盟友的一次失败而退出战争。另一方面，可以预料到的是，法国境内的游击战争及其各种难以估量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而施利芬计划的大部分制定者在担任青年军官时都经历过这种游击战争。最后，所有的历史经验表明，进军比利时必将使英国卷入战争。

第三，1897 年之后，不考虑比利时的中立就已经纳入了计划之中，从此以后，直到 1914 年打破比利时中立，这种想法一直保持着。1905 年，施利芬自己只是在一个脚注里顺便提到了英国会立即向法国提供帮助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然而，他在辞职之后甚至还介绍了有计划地运用诸如炸毁它的要塞城市等恐怖手段，来对付顽强抵抗的比利时。据此，他确信，德军可以放弃针对俄国的部署，因为德国在西线的胜利会使俄国望而却步。这两种想法表明，享有最高权威的这位德国军事谋划者对于形势的错误估计简直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在 1913 年时，小毛奇就已经对施利芬计划看得非常清楚，即攻击比利时会使英国走到德意志帝国的对立面。因此，他打算至少保障比利时人的财产并放弃德国对它的兼并。然而，他对施利芬计划这一灾难性的决定听之任之。这不仅在政治上难以置信地幼稚，而且在军事上也显得轻率鲁莽。施利芬计划“由于大幅提升纯粹的战略原则而忽视了这一问题”，它必须在政治上，并且“最终也必须在军事上接受因穿越比利时而改变的后果形势”。<sup>[10]</sup>

在大普鲁士的德意志帝国，军事思想的这种片面性发展主要基于两种趋势之上。

其一，18 世纪以后，普鲁士社会的军事化把军队提升到了威望金字塔的顶端。军事准则、军事行为和思维方式等，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约束性也越来越大。这种对军队的极度尊敬，为狭隘的军事部门和专门性人才的思维方式铺平了道路。19 世纪 60 年代的战争成果以及德国在中欧的霸主地位，则在“帝国建立时期”再次提升了德国武装力量的声望。至少在 1894 年以后，德意志帝国在两线作战中的生存似乎越来越有赖于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卓有成效的军事计划。所有这一切因素都被军队所充分利用，而它也因为专业知识的缘故而披上了一种神秘的光环。然而，由于在这方面并没有遇到什么强有力的政治干预措施，即便没有军队积极鼓励，这些因素也产生着影响。

其二，一方面是上述倾向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在俾斯麦辞职之后，政治家们面对军界以客观形势为借口的理由，采取了投降路线。施利芬和



小毛奇都令人信服地表明，霍恩洛厄和比洛夫宰相都没有坚持政治决策的优先地位。而宰相办公厅的官僚贝特曼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还对他的批评者进行反驳道：“军事方面的外行不能自以为可以对军事上的可行性进行评判，更不用提要对军事上的必要性指手划脚。”<sup>[11]</sup>这意味着向军队的屈服，是对政治协调任务的违背，放弃了对政治优先权的贯彻。对于俾斯麦以及致力于这一问题的克劳塞维茨而言，政治优先权是国家领导者的最基本的权利。

1913年以后，由于对此前已经计划的东线战役不再进行修订，相关的政治意见进一步受到限制也就不足为奇了。施利芬计划的军事决定意味着，从根本上讲，未来德国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对于法国的快速预防性打击。但是，根据施利芬计划，这也意味着要突袭比利时并因此而迫使英国参战。由此形成了一个近乎自动的链条，从而使得1914年夏天进行决策的回旋余地格外狭小。如果不考虑到德国政治和军事之间的内部权力分配，这种方向的选择是无法解释的。重大的军事战略决定从来都是与政治目标处于近乎无缝对接的状态，政治目标也绝非以军事方面的专业经验为前提，而是必须考虑到军方的意见。早在1914年六月危机之前很久，柏林就将自己置于一种完全错误的冲突战略之上。而从政治角度看，这种战略迫使英国站在法俄联盟一边参加战争，因此是“所有解决方案中最不幸的一种方案”。<sup>[12]</sup>有观点认为，法国穿过比利时的威胁性进军迫使德国采取相应的行动或者使德国的行动合法化。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1906年以后，比利时就决定坚决捍卫自己的中立地位，而且到1914年为止，英国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一直明确拒绝法国的这种考虑。德国社会的力量配置状况，德意志帝国的“现实状况”，还有德国历史传统的重心等，这一切都使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无法在政治上进行更明智的准备。对于德国而言，外部的政治状况绝不是迫使它采取有关方针的原因，出现这种状况首先是德国内部政治形势决定的产物。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不进行道德教育以及个别的罪责指控的情况下进行阐释（第三章：七）。

但是，我们在此还要提一下有关德意志帝国疆界之外的军事发展情况。在威廉德国的第一次战争中，总体战的早期形式已经得到实践。这就是1904年到1907年对德属西南非洲殖民地的大规模赫里罗起义的镇压活动。当时军政府取代行政管理总督，接管了那里的统治，使用各种残酷的手段镇压起义。诚如赤裸裸的行话所称呼的那样，军政府的目标已经不再是胜利，而是“毁灭”。在此，军政府故意进行着一场“没有和平可能性的战争”。<sup>[13]</sup> 几



乎一半的土著人被杀，其中有部分人是在被毫不留情地驱赶进没有水源的奥马赫克沙漠（Omaheke-Wüste）而遭杀害。有 1/4 的土著人遭到流放或在一种完全有计划的毁灭政策下被投入俘虏营。在直接开支增加到接近 59 000 万金马克之后，德国军队终于缔造了“安宁和秩序”，但是在这一广大的地区，只是坟地的宁静，而坟地的四周则被黑人和白人之间相互仇恨和恐惧统治着。在 19 世纪的西方国家中，只有在美国内战的最后阶段，才实施了这样一种激烈程度的战争。德国的这次殖民战争证明了可以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殖民统治的后果的批评中所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可怕的情况。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战争的景象就会清楚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 （二）军国主义

本质上讲，军国主义的流行，“源于政治领导军事、政治思维高于军队的优先权受到了质疑”（里特尔语）。<sup>[14]</sup> 长期以来，这种看法一直被批评为定义过于狭窄。如果从普鲁士-德国的历史出发，这种批评要特别受到肯定。在这里，核心问题是整个社会中的权威集团的军国主义化，而非像其他领域一样，在于政治决策暂时受到军事思维的主导。更确切地说，这种军国主义不仅与权威阶层的最高层有关，而且与军国主义的价值观、荣誉观，军国主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渗透到整个社会有关。只有从这种“社会性的军国主义”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一直到 1945 年为止的德国近现代史中，为何军队拥有真正的特殊地位。就社会史和宪法史而言，在这方面，18 世纪普鲁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封建的庄园主变成了军官。与此同时，他们还是法官，是农村居民中的企业主。因此，他们在各个生活领域中都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所谓的军队管理与庄园主的统治就紧密地纠缠在了一起。不管是农场的雇佣工人还是征募来的新兵，他们面对的都是同一个上司。



图39 对军人表示敬意



19世纪初的改革以及普遍义务兵役制并没有解开这种与农村的紧密关系。无论如何，拥有传统权力的土地贵族继续占据着军事领导阶层，甚至城镇居民也不得不在他们的手下“服务”。经过1848年和1862年的较量之后，到1871年为止，特权等级再次取得了胜利，他们的特权等级地位因此得到确认，军队的影响也因此而达到了顶点。像格哈德·里特尔这样的历史学家甚至也承认，1866年到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这种结果带来的是一种全欧性的军国主义化进程。<sup>[15]</sup>倘若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军国主义化进程除了体现为扩充军备之外，还有源自于普鲁士的历史传统的特别巨大的影响。而事实就是如此。这一点可以从各种富有启发性的外在表现方面得出结论。所有的德意志帝国宰相在帝国议会中都身着制服；在王家宴会上，身为帝国宰相的贝特曼·霍尔韦格只是少校，坐在上校和将军们的

下首；能干的普鲁士财政大臣冯·肖尔茨，作为资产阶级的一员只能获得上士军服，当他获得国王恩准而能够换取一套少尉制服时，竟然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在这些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之中，预备役军官制度占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由于社



图40 威廉二世和他的儿子们一道去参加新年阅兵式（1914年）

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持续性排斥的威胁，整个军官团越来越分离成为“国家的支撑阶层”，确切地说，它渐渐僵化成了封闭型的等级群体。

军事标准的生活思想和行为模式在整个德国社会中的扩散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军事化在国民中培育出一种卑微低下的感觉。在这方面，贝特曼·霍尔韦格就是典型范例。社会军国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可以反映出来。在宫廷里面，即使是最小的少尉也有优先特权；在人行道上要为军官让路；退役的士官被聘为邮政官员；在文科中学中要进行操练，等等。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看，这种社会军国主义完成了他们高度期望的训练作用。不过，在此



还有几个方面需要特别加以强调。

### 1. 军队是对内进行斗争的工具

毫无疑问，军队首先被视为武装冲突中的一种进攻性的或者防御性武装力量。然而，除此之外，我们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军队同时也应该是“半专制主义政府的武装了的助手、核心支柱”。“出于这样一个目的，适用于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校要发展为一种对上级盲目服从和具有忠诚于国王的思想的学校”。因此，自宪法冲突之后，军队的长服役期是要提供一种保障，即“在发生国内革命时有一支可靠的军队”可供政府使用。<sup>[16]</sup> 在进



图41 帝国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

行内部讨论时，军队高层从不隐讳他们平息骚乱的任务。在争论永久法案 [Äternatskonflikt, 即罗恩提出的长期军事预算批准 (Dauerbewilligung des Etats) 方案。译者注] 期间，罗恩曾这样说道：“一支能干的军队是独一无二的反对红色幽灵和黑色幽灵 (这里分别指社会主义运动和天主教势力。译者注) 的最好的保障。如果他们 (议会) 毁灭了军队，那么我们的末日就到来了。”<sup>[17]</sup> 这种想法在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切地说，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壮大，军队是执政官捍卫者的这样一种思想变得更有吸引力了。于是，一些职业军官就认为，普遍义务兵役制会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党人进入军队当中，因而是成问题的。1892年，不久前还是总参谋长的冯·瓦德西 (瓦德西曾在1888年到1891年间担任总参谋长。译者注) 将军在给国防大臣





冯·戈斯勒的秘密备忘录中即为“小规模职业军队”进行辩护，认为这种职业性的军队“可以通过给予较好的报酬而优先用来反对国内的敌人”。关于这种职业军队在德国的“使用”，他同时向皇帝做了解释：要对社会民主党进行预防性打击，绝不能听任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选择大规模报仇的时机，而是必须“尽可能地加速这种事件”。瓦德西竭尽所能，要求驱逐那些已经暴露的社会主义者，限制各种结社和集会权利，禁止各类不受欢迎的报刊杂志，还要求改变帝国议会选举法。而所有这些措施，都只有在军队的支持下才能得到实行。<sup>[18]</sup> 1907年，总参谋部第二战史处完成的一项研究成果就是“暴乱城市中的战斗”，这显然针对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内战形势而来的。<sup>[19]</sup> 对于军官团而言，左翼力量始终是“祖国内部的敌人”。在1912年社会民主党取得大选的胜利后，这些担忧变得更加突出，以至于影响到了1912年、1913年的军备讨论和计划。在社会民主党之中，尽管诺斯克 [古斯塔夫·诺斯克 (Gustav Noske, 1868~194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魏玛共和国时期曾出任国防部长 (1919~1920年)。译者注] 的路线早就战胜了小李卜克内西 (即卡尔·李卜克内西。译者注) 对军国主义的批评而获得了承认，但是在1914年以前，对于社会民主党的这种担忧无法得到抑制。

## 2. 社会构成和行为控制

1848年以后，首先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其后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所带来的危险使得职业军官之中形成了挥之不去的威胁感。在这一问题上，罗恩的格言具有代表性：“现在，军队就是我们的祖国，因为只有军队还没有被肮脏、发酵的各类因素……所入侵。”<sup>[20]</sup> 于是，人事政策在职业军官之中得到确认。结果是，在宪法冲突期间，毛奇竟然要求驱逐那些资产阶级的军官研习性，“因为他们还没有接受军队必须捍卫的那种思想。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支持坚持原有的东西。”<sup>[21]</sup> 于是，贵族子弟，特别是来自军官学校的学生，就成了可信赖的力量。而军队也会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可以使他们免受不良影响。1870年，冯·施魏尼茨将军曾评价道：“如果我们的容克材料停止占有军官职位的话，那么我们的权力也就走到尽头了。”而俾斯麦对此的回答是：“我不能这么说，但我已经在这样做。”<sup>[22]</sup>

基于这一方针，冯·瓦德西也于1877年提出了要求：“要在我们之中进一步发展等级精神，并且我们，也即军官阶层，一个自我存在的等级，要更进一步地与其他阶层划清界线。”只有通过“与其他的社会等级保持距离，通过一种牢固的军官等级共同体的教育”，才能达到如下目标：在“无产者反对有产者的斗争”中保持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因此，冯·瓦德西在那时已



经要求放弃“普遍义务兵役制”，原因在于，“只有一支职业军队才能阻止所有现存的社会状况的总体性崩溃”，或者“简言之……只要得到命令，就能不加思考地射杀那些贱民。对此，我们就要有武士阶层。”<sup>[23]</sup> 1900年，施利芬也表达了对这种社会排他性原则基本特性的肯定。1903年，国防大臣冯·艾内姆强调，军官的“不足”，只能通过“降低对出身的要求”来加以弥补。“但是这是不适当的。因为我们无法避免接纳更多的民主的和其他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对于军官阶层是不合适的。”<sup>[24]</sup>

社会防御性的主导思想决定着军队的人事政策。这种政策的结果之一就是强调，军队领导层的各个机构都要努力致力于确保可靠的容克的优势地位。1865年，普鲁士所有军官中有65%是贵族出身。1913年，至少仍有30%的军官是贵族出身。他们占据了几乎所有的高级职位。同年，骑兵中80%的军官是贵族出身，而步兵军官有48%来自贵族，野外炮兵军官中有41%来自贵族，只有在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技术兵种工兵之中，贵族军官才只占6%。在所有的普鲁士团级军官中，贵族出身者超过58%，有16个团甚至是清一色的贵族军官团。1913年，在近卫军各部队中，资产阶级军官还只有59人，而1908年时甚至只有4人。1900年，上校以上的所有军阶中，60%由贵族占据着，到1913年，这一比重仍占到53%。1909年，在190个步兵将军中，只有39位是资产阶级出身，所有少校之中有一半是贵族。在总参谋部属下，1888年有239名军官，1914年则有军官625名，他们之中多数是贵族，其中普鲁士籍的贵族军官占据了3/4的绝大部分份额。<sup>[25]</sup> 到1913年为止，在作为帝国军队核心的普鲁士军队中，贵族在关键性的军阶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然而，显而易见的是，随着军队规模的不断增长，贵族军官所占的份额也



图42 瓦德西将军



在下降。

因此，有关 1913 年扩军法案的争论也立即发展为围绕着军官团的社会构成的争吵。在总参谋部中，资产阶级出身的策划专家鲁登道夫首先提出，须增加 3 个军团才能满足施利芬计划的要求。但是，国防大臣冯·黑林根出于捍卫传统的贵族堡垒的目的，反对总参谋部的要求。如果现在需要“将普鲁士军队扩大它现有力量的几乎 1/6”，“那么就er必须仔细地考虑……采取重要的措施”。“对于补充军官团而言，有些社会集团并不合适，它会使军官团受到民主化的影响。而如果不吸纳这些社会集团，则又无法满足这种特殊增加的需要。”<sup>[26]</sup> 由于受到贵族特性的军事内阁的支持，国防大臣最终拒绝了总参谋部的建议。在对俄政策中也是完全一样 [参见第三章：七：(二)]，军备方面也没有实现所谓的军事方面的实际需要。更确切地说，国内社会的权力斗争决定着军事方面的决策。后来有人抱怨说，在马恩河战役中，这 3 个军团的缺失具有决定性意义。而这种军事打击力量的缺乏不能从德意志帝国议会的抵制中寻找原因。帝国议会完全乐意批准扩军计划。它应该从普鲁士德国社会的权力分配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惧和不作为中寻找原因。资产阶级的军官被极不信任地视为隐性的民主主义者。犹太公民甚至完全遭到排斥。在 1878 年到 1910 年期间，普鲁士军队中根本就没有犹太人职业军官，1911 年时才有 21 位犹太人预备役军官。这就证明了拉特瑙关于犹太人是“二等公民”的评论。反犹太主义始终是德意志帝国时期军官团的一个特征。不论是公开的或者隐藏的，这种反犹太主义都得到了有效的落实。因此，在这一方面，日后的民族社会主义在德国国防军中无需进一步触犯戒律。

不仅仅军官政策具有明确的选择标准的规定。军方甚至还试图根据相同的方式来招收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例如，在 1911 年，德国人口中有 42% 生活在农村。但是在这一年，尽管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招收的所有新兵之中，农村兵员却占了 64.1%，小城镇兵员占 22.3%。毫无疑问，农村特征极其明显。只有 6% 的兵员来自大城市，7% 的兵员来自中等城市。<sup>[27]</sup> 在这里，军方也试图将军队建立在长期以来农村居民中形成的内在化的奴仆精神之上，尽可能地减少趋于“红色”的城镇居民的比重。在这些趋于“红色”的城镇居民面前，要想使用传统的残酷对待普通士兵的方法，就得冒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将它们公诸于众的危险。与此相反，普鲁士的固定农场工人向来对统治阶层百依百顺，作为新招来的兵员，他们更乐意受到“侵犯”。此外，这些固定农场工人也最容易受到军国主义精神的影响。这种军国主义精神通



过“战争理论”以及王权主义的说教，为身兼最高宗教及军事首脑的国王和皇帝主宰下的军事世界秩序的专制结构辩护。

除了这种基于各个层面的人事政策之外，还有各种制度从新的封建荣誉准则以及社会落差的角度来确保对人们的行为的控制。直到1918年为止，决斗一直是军官之中解决冲突的一种非正规的约定俗成的形式。凡是拒绝这种古老的仪式者，都将被开除出军队。各名誉法庭则用于处理内部的纷争并要求进行决斗。甚至1913年时，普鲁士国防部还决定，这种名誉法庭单独隶属于王家司令部。帝国议会的任何权限要求都会遭到严辞拒绝。真正的军事审判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是一种与民事法庭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在这种处理方式下，人们首先强调的是团队精神和团结，而不是过错。与此同时，普通士兵违犯服役规定，会受到严厉的拘留监禁。在一些有争议的案件中，甚至民兵也会遭到监禁的惩罚。由于在法律面前原则上的不平等之故，军官们则免于被拘留。当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卡尔·李卜克内西批评和揭露这些不良现象时，“这些对国王的制服的攻击”就会遭到愤怒的拒绝，他们的相关批评就会遭到不顾事实的驳斥。于是，这个军事上的“王国中的王国”会进一步被隔绝开来，无法看透。

1913年的察贝恩事件有如反射镜一样，使军队的特殊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凸显出来。在阿尔萨斯的守备部队驻扎城镇察贝恩，一位20岁的少尉辱骂当地民众，并邀来新兵殴打这些民众。这一事件传到民众之中后，在整个德国引起了轰动。由于动荡持续加剧，导致军队进行武装巡逻和任意逮捕察贝恩市民。新闻舆论战在当时也达到了顶点。此前，只有每日电讯事件（1908年10月28日，伦敦《每日电讯》发表对德皇威廉二世的访问记。威廉二世在接受采访中称自己是英国的朋友，这种态度使之在德国成为少数派。他还声称，布尔战争期间，他阻止了建立反英的大陆同盟。而英国在布尔战争中的胜利则得益于他给英国女王送去的对布尔人作战计划。这一谈话一方面间接地向英国表明了德国的反英态度，另一方面让英国人觉得威廉二世自负傲慢。与此同时，法俄两国也视威廉二世关于大陆同盟的谈话是试图破坏它们与英国的关系。德国对外关系因此受到损害。德国舆论大哗，抨击皇帝不负责任。译者注）发生时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帝国议会中也出现了各种尖锐的冲突。议会通过了对于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的不信任投票。这些做法和许多报纸一样，都公开地表明了对于民事政府的完全无能的失望，更广泛意义上讲，就是对于国民在面对军队时无能为力的失望。此后，根据一个荒唐可笑的军事法庭的审判，相关的



军官竟然被宣告无罪释放。这一情况更加重了人们的失望。“察贝恩不祥之兆”揭示了德意志帝国的一种结构性宪法危机。在这一帝国之中，军队可以在无视国家法给予国民的权利安全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出于赤裸裸的政治考虑的情况下，傲慢地捍卫给予它的特殊地位。无论帝国司法部还是帝国国防部，人们都毫不怀疑，军方的这种行为没有法律基础。然而，国防大臣冯·法尔肯海因却能够使帝国宰相许诺保护军方。帝国议会的软弱无力，军方公然傲慢放纵，议会反对派迅速解体，军队在国家传统中的防卫角色，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1914年以前德国宪法的现实以及社会军国主义的结果。这种社会军国主义大大削弱了资产阶级的抗争。<sup>[28]</sup>只是到了德意志帝国垮台前几年，在阿尔萨斯-洛林这块“帝国领地”的土地上，军事上的半专制主义才在察贝恩事件中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察贝恩事件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暴露了德意志帝国的这种军事性特征。

### 3. “小资产阶级的军国主义思想动员”<sup>[29]</sup>

军队被视为武装起来的“德意志民族学校”。此外，它还起到了通过兵营经常对新招募的士兵进行教育和灌输的作用。它彻底地并且用多种方式参与国民在政治方面的社会化。就此而言，义务兵役制和社会军国主义也可以合乎情理地与教育制度一起，成为训练纪律和确保现有统治关系安全的进一步的手段。在这方面，需要考虑的不是对各种军国主义加以颂扬的学校教材，而是特有的各种制度。地方层面上的一些军人联合会就是值得注意的舆论因素。这些军人联合会试图原则上将所有的“退伍军人”组织起来，使他们在复员后回归大众生活。1910年，16 500个普鲁士军队联合会拥有的会员人数达到150万人。“德意志军人联盟”在1873年建立时拥有214个联合会和27 500名会员，到1900年左右就超过了百万大关，1910年时，其会员人数甚至达到了170万。此外，还有250万人参加了所谓的“基夫霍伊泽联盟”（Kyffhäuserbund）。不过，为数众多的各类联合会并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统一组织。总体上看，它们都持有一种经过培育的、好斗的、反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它们也经常是反犹主义的。俾斯麦在早些时候就承认，曾希望把这些联合会改变为国内政治方面的宣传鼓动工具，并且他也想利用它们来“有力地反对各种危害国家的努力”。在这种特别的社团组织中，政府经常得到“效忠帝国的”支持。此外就是各种半军事的青年联盟，诸如“青年德国”（Jungdeutschland）、“青年防卫军”（Jungwehr）等。“海军联合会”和“国防军联合会”（Wehrverein）的追随者在选举时，都被视为“效忠帝国的”集团。如果将他们包括在内，那么，在1914年时，加上原来的军队，



德国军队就至少有 500 万人，这相当于 1/6 的德国成年男子和青年的数量。<sup>[30]</sup>倘若我们要对德意志帝国社会之中军队的重要性及其各种更深刻的影响可能性加以评估，我们就必须明了这类数据，考虑到这些数据后面隐藏着的影响和集体精神。

### (三) 海军

在德意志帝国后半期，德国的海军舰队提高到了一种早前没有预料到的重要高度。从那时起，德国的军备政策和军事政策越来越离不开海军政策。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尽管德国的船只已经航行在东亚、太平洋等水域，而且已经环绕非洲，以便保护德国的帝国主义扩张，然而，这些船只都是些小型巡洋舰和炮艇。虽然早在 1889 年就依据此前其他各部样式建立了帝国海军部，但是它在柏林的决策中心仍没有什么地位。然而，1898 年开始建造战列舰意味着一个明显的转折点。这一转折点是多层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带来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对于 1914 年以前德意志帝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路线都有深刻的影响。在这方面，威廉时代的最关键人物之一，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也许特别引人注目。他起初负责发展鱼雷艇武器，1892 年到 1895 年间担任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897 年被任命为新的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此人尤其支持和关注在东亚地区的帝国主义扩张。如果认为他是因为一种夸张性的本位主义而推动海军建设，以便最终能与拥有长期传统的陆军接轨，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是另有打算的。从实践上看，海军政策可迅速发挥两个主



图43 海军大将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



要功能。

第一，在对外方面，它可以用来和敌对国家，特别是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强国英国，进行抗争。在蒂尔皮茨看来，那种防御性的冒险思想的发展方式在日后应该得到某种程度的削弱。根据这种威慑战略，甚至在英国这样最强大的敌人眼中，德国海军都要足够强大，以至它无法单独击败德国海军。依据于这样的进攻性目标，德国海军应该是用来显示“存在”的一种力量手段，或者在必要时用来摧毁相关的抵抗。它要服务于开辟海外市场并且保障这些市场的安全，以便捍卫德国的经济利益。

第二，从社会帝国主义（参见第三章：六）的角度看，这种进攻性的功能从一开始就与德国海军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着最紧密的关系。包括蒂尔皮茨和皇帝威廉二世等在内的海军政策推动者的打算是，德国海军必须有助于满足重工业、造船工业以及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物质利益。与此同时，这种打算实施的结果还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政治权力的诉求，稳定传统的社会结构。这种海军政策的主要社会前提在于，工业界的具体利益和资产阶级对于建造舰队的热情形成了聚合，因此较之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的帝国主义有了更广泛的基础。从经济政策角度看，建造海军舰只的定单具有长期稳定性，至少在心理上会产生这样的影响。海军还象征性地代表着德国迈向世界强权的努力，关乎民族主义的活力。从平衡性角度看，它可以转移德意志帝国国内问题的视线，用“民族的”使命来实现各社会集团的认同。无怪乎，威廉主义的专制主义与海军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海军政策的外表下面，“公民表决为基础的海军皇权是反对令人恐惧的议会化的平衡力量”<sup>[31]</sup>，在阻止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它是进行社会性防御的最先进的武器技术。正因为如此，海军政策始终也是一种社会政策。

在1870~1871年统一德国的声望消耗完了之后，蒂尔皮茨在1895年时就已经提出，德意志民族“需要指明一个明确的民族目标，一种祖国的凝聚核心”。而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的帝国主义就已经试图推行这样一种打算。然而，随着社会持续的工业化以及1890年以后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的崛起，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了。通过有关海军的鼓动，可以重新“激发对于民族政策问题的探讨”，从而造就“一种与毫无益处的空想性的社会政策相对立的健康的平衡力量”。蒂尔皮茨心里考虑的是一种国内政策方面的危机策略。在这一策略中，战列舰成了最重要的工具。在他看来，“世界政策”只有在战列舰的支持下才能得到推动。诚如他曾经典型性地表述的那样，



他希望，“这项全新的、伟大的民族使命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利益是一剂反对受过教育的和未受过教育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强力镇痛剂。”<sup>[32]</sup>在这里，海军政策可以起到民族意识的整合作用。确切地说，有关海军政策的鼓动本身已经与人们所期望的在海外的实际获利具有同等重要性。其原因在于，这种海军政策的鼓动有助于转移人们在国内的各种权力斗争以及德意志帝国阶级社会的各种紧迫问题上的视线。因此，严格说来，对于战列舰政策的代表人物而言，维持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是他们的主要目标，而有产者和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则是与推动海军政策有关的关键性社会集团。这些资产阶级反对“来自下层”的政治和社会危险，以便捍卫他们的地位。与此同时，那些前工业社会的精英们，尤其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土地贵族，间接而非直接地通过反革命集结政策的补偿性好处而从“令人厌恶的海军”中获得利益。海军政策在资产阶级之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帝国海军部帮助资产阶级在海军中发现“它的”兵种，并因此而使军队中难以贯彻的平等找到某种补偿。

从巡洋舰向战列舰舰队的过渡成为德国海军承担国内外两大防卫任务的前提。在这方面也涉及到一种完全是国际性的发展趋势。阿尔弗雷德·T·马汉也许是盎格鲁—萨克森国家中新“海权主义”的最有影响力的预言家，他从历史和思想层面为这种国际性的发展趋势做了辩护。用威廉二世的话说，马汉的著作是德国海军军官的必读书籍。马汉的《海权论》则成了蒂尔皮茨的“海军圣经”。<sup>[33]</sup>有计划的把巡洋舰换为战列舰的改换装备的看法也有其实际的基础，这种看法在1894年到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得到强化，那就是，在公海上进行作战或对沿海城市进行轰炸时，未来肯定属于以重装甲防护的、配以前所未有的大口径重炮的战列舰一边。大约在同一时间（在12年内），包括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在内的所有海上强国都开始建造装甲巡洋舰。当蒂尔皮茨带着他的计划紧跟这一潮流时，他因此就有充足的理由要求德意志帝国置身于现代海军建设的最前列。由于建造新的战列舰所需费用在军队预算中的比重极其庞大，而且缺乏现成的各种传统的支持，因此，帝国海军部发展了一种对议会政策施加影响、大规模宣传和进行目标明确的公关工作为内容的完全现代性的方式，以便在帝国议会中与充分动员起来的公共舆论博弈，达到批准增加预算的目的。从技术层面上看，帝国海军部的“公共关系”处与“德意志海军联合会”以及从事鼓动性宣传的“海军学者”之间、与各种报刊以及议会和政党之间的这种新颖合作，无疑是成功的。然而，这种海军政策所带来的巨大政治代价





不久就会显现出来。

首先，1898年的第一个海军法案通过了一个为期6年的建造计划。根据该计划，必须形成各有8艘战列舰的两支分舰队。实际上，这里涉及到一个秘密性的，为蒂尔皮茨所明确追求的长期预算问题。自此以后，海军力量将根据法定的固定期限，在现代标准的基础上，由海军决定对舰只的建造进行可能的必要性的调整。这表明，蒂尔皮茨和他的同事们在追求他们所谓的



图44 1900年左右柏林的海军宣传展览广告。图为定期在基尔水域航行的帝国军舰“普鲁士”号

有限目标方面，显示出政治上和心理上的灵活性。然而，两年以后，1900年通过的附加法案则暴露了谋求世界海军强国地位的面目。帝国海军部坚持要建立4个分舰队，每个分舰队拥有8艘战列舰、2艘旗舰、8艘大型巡洋舰和24艘小型巡洋舰，还要建立一支由3艘大型巡洋舰和10艘小型巡洋舰组成的驻扎海外的巡洋舰队。从数量上和财政上看，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特别要指出的是，帝国议会在此之外还批准了一个为期达17年、涉及巨额费用的造舰计划。然而，从质量上讲，这一处于世纪之交的方案却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与这种强有力的海军政策相联系，“冒险思想”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于是，在战列舰的建造方面本来就不甚模糊的进攻性因素也变得



清楚起来。与此同时，社会帝国主义的观点在长期性的“蒂尔皮茨计划”以及有关的鼓动中都变得清晰起来。资产阶级的各个自由派政党也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在左翼自由主义者那里，建造战列舰的计划得到了潮水般的支持。弗里德里希·瑙曼是失败的德国自由主义的突出代表。当时，他仍然受到新教牧师职业的影响，因而以一种特别富有诗意的语气进行了辩解。他在19世纪90年代时曾经著述，捍卫他“对蒂尔皮茨的愉快信任”（特奥多尔·霍伊斯语）：“我仿佛听到耶稣在说，向前走，建造战舰，而且向上帝祈祷，你们不想使用它们。”<sup>[34]</sup> 不过，在第一个海军建设附加法案的通过方面，这种对于军备的盲目迷信并不是决定性的。确实，有关海军的宣传急剧升温。15年以后，贝特曼·霍尔韦格曾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为了使德意志民族“能够建造一支……舰队，鼓励沙文主义潮流的政策”是必要的”。<sup>[35]</sup> 但是，仅仅宣传鼓动是不够的。美国驻柏林的海军武官在国内时就熟知可怕的利益政策。早在1900年3月，这位武官就已经做出了断定，在什么样的形势之下，“提高了的海军预算法案才能过关。农场主要利用他们对于海军预算法案的支持来达到对其利益保护的妥协，如果有可能，要对进口农产品加征关税，而这在日后的贸易条约中将得到反映”。<sup>[36]</sup> 而这时，德意志帝国各政府部门已经为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做了数年的准备。1902年，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终于在比洛夫关税方案中得到了实现。事实上，海军附加法案和关税是帝国议会多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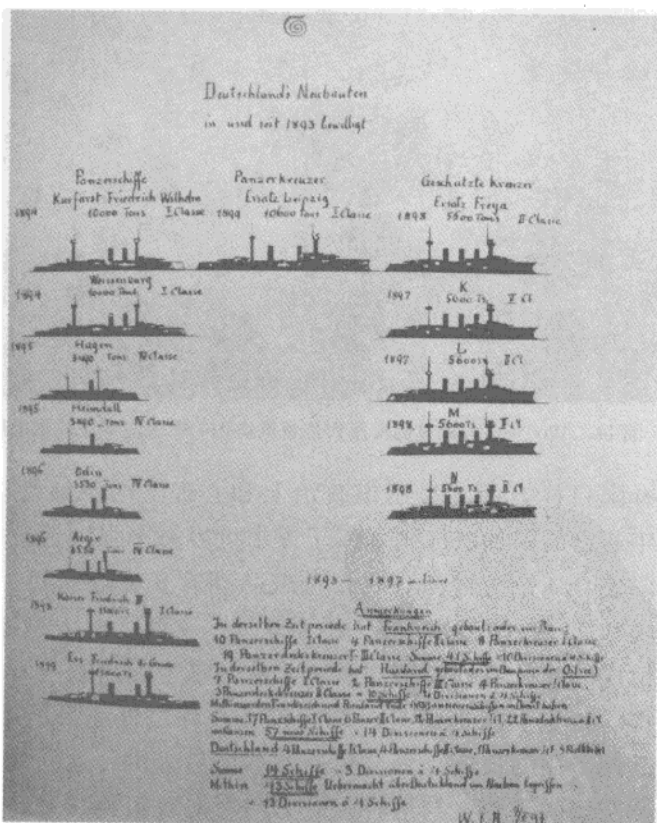


图45 皇帝威廉二世签署的德国海军列表



派捆绑在一起的一揽子方案。扩建海军得到了资产阶级和重工业界的支持，而更有利的关税体系则是大农场主们要捍卫的目标。它们共同确保了米克威尔的集结政策的成功，而海军政策正是这种集结政策的承载者。直到1914年为止，它们共同确定着德国在对外贸易以及军备政策方面的方向。但是，二者都将这种方向置于优先考虑国内统治制度的稳定之上，以便服务于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与俾斯麦时代“生产阶层的卡特尔”在传统上有关系，它们通过民族主义的煽动方式，将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决策变成了国内政治斗争措施的工具。<sup>[37]</sup>

1906年的第二个海军附加法案标志着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德意志帝国现在转而建造无畏舰。这种新型的、配备有强大战力的大型战舰（总吨位大约25 000吨，配有30到38厘米口径的火炮，最高时速达21到28海里），是由英国船厂制造的，用来回应到1906年为止德国方面的海军建设。它使得迄今为止所有的装甲战舰在某种程度上黯然失色。军备竞赛因此而急剧尖锐化。英国最终只能通过无畏舰来保持它的优势地位，而德国只有拥有类似的战舰才能缩小它与英国的差距。到这时，蒂尔皮茨的三个前提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英国完全有能力以更先进的战舰超过德国的造舰速度。它也已经克服了在政治上的孤立状态。另一方面，当无畏舰的建造提出了新的费用要求时，德国的财政状况却不见好转，反而变坏了。同时，德国对外政策的活动余地也变得更窄了。然而，帝国议会中已经形成了包括左翼自由主义者在内的多数派，他们除了支持建造无畏舰以代替迄今为止的“现役战舰”之外，而且还赞成建造3艘新的战列舰和6艘大型巡洋舰。

1908年的第三个海军附加法案将所有现役战舰的服役期缩短到20年，以便使这些新型的战舰能够更快地编入现役。与此同时，还引入了“四艘速度”计划（即到1912年为止，每年建造4艘无畏舰）。虽然并不能完全保持这种建造速度，但是在1908年到1913年期间，至少有14艘战列舰和6艘大型巡洋舰下水。由于德国在海军领域的相当成功，与英国的海军谈判在1912年归于失败。贝特曼·霍尔韦格甚至以辞职相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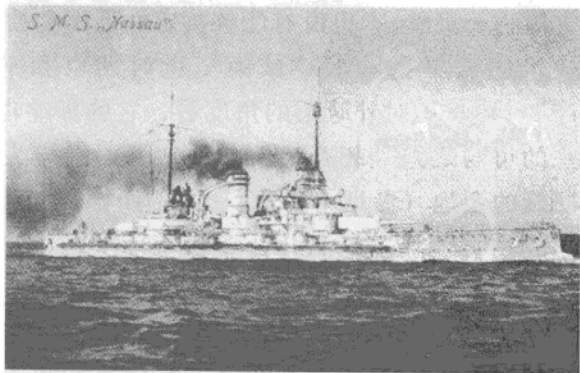


图46 德国战列舰“拿骚”号（1900年左右）



胁，力争与伦敦之间在两国的军备限制问题上达成协议。但蒂尔皮茨以造舰计划和假定性的军备政策的必要性为招摇过市的幌子，在关键时刻压倒了贝特曼·霍尔韦格。德国以英国所做出的让步不充分为由拒绝妥协。

德意志帝国领导层遂以一个新的第四个海军附加法案来回答德英两国谈判的失败结果。同样，帝国议会又批准再建3艘无畏舰和2艘小型巡洋舰，并且对舰队进行重组，以便能够建立第五分舰队。由于帝国议会中的多数议员支持军事预算法案，他们也就与政府一道成了这种炫耀的缔造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年代中，60%的军事预算都花费到了海军建设上。因此，到1914年时，德国和英国的战舰之比处于10:16的状态，也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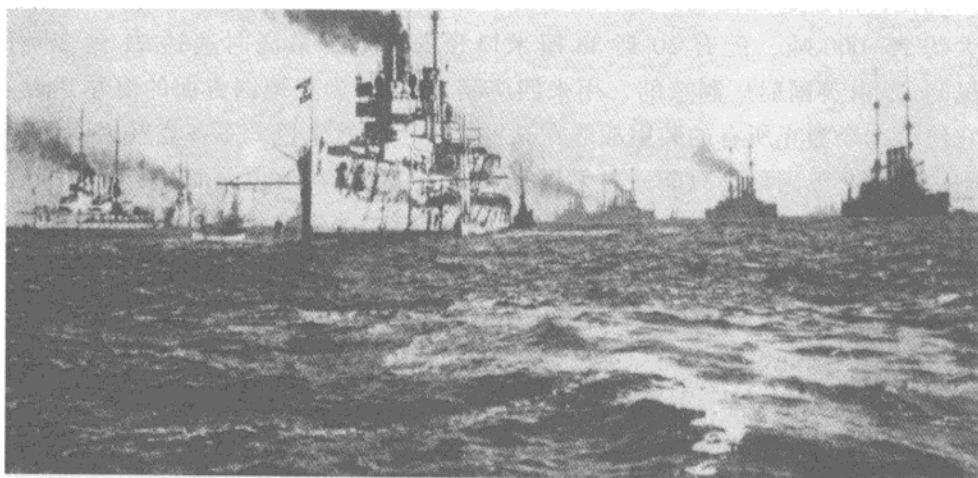


图47 赫尔果兰岛附近的德国远洋舰队

是说，几乎达到了德国所希望的2:3的比例。在国内政策方面，虽然海军没有实现世纪之交时期赋予它的那种异常欣快的希望，它却成了集结政策的支撑物。当然，它也没有能够决定性地缓和德国的阶级敌对状况。然而，海军政策的失灵意味着“威廉二世时期以和平方式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破产”。<sup>[38]</sup>从对外政策的角度看，它的影响也是一种灾难的。英国是德国唯一的可与之达成相互谅解的欧洲强国。与法、俄两国的关系已经不可能有回旋的余地（参见第三章：七）。而德国与英国的关系最终也受到了无法挽回的伤害。除了施利芬计划以外，体现好战特征的海军政策以及德国海军部的反英首脑等，必将使英国产生高度疑虑，威胁到英国的利益。从军事上看，战役舰队证明是一种巨大的失败。它从未能够对战争的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更谈不上扭转局面而使之有利于中欧诸国。与此同时，在毫无



意义的日德兰决战之后，德国舰队中开始积聚起一种声音，并且于1918年11月爆发。冯·蒂尔皮茨大将在军事上也是一个失败性人物。他在1916年3月辞职后，就转而进行与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相一致的活动。1917年，他建立了早期的法西斯组织“德意志祖国党”。

## 六、帝国主义

西方帝国主义通常被理解为：工业国家基于它们的社会经济和军事优势而在不发达地区实施的直接的、正式的或间接的、非正式的统治。这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它是以工业化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前提的。虽然这种工业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却将帝国主义与旧的欧洲殖民主义分割开来。对于这种帝国主义现象，我们可以在一种理论框架内进行极富启发性的讨论。关于这种理论框架，我们在导言中已经总体上进行了概括性的叙述。在这里，我们还要利用这种理论框架对各种相互交叉的重要问题进行分析。

第一，仅仅在极其一般的意义上将帝国主义和“经济”以及“工业化”联系起来，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够的。这种研究过于轻描淡写，对于帝国主义的普遍性一知半解，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更确切地说，有效的方法是，对于那些不断扩张的国家的工业和农业的增长尽可能地予以具体的研究。从这种增长的历史特点看，它具有不规律性。因此，这种持续经济繁荣的长期发展趋势仅仅揭示了一个方面。然而，经济增长的中断（诸如衰退、萧条、季节性波动等）、周期性的波动（诸如40个月的“Kitchin”周期、10到11年的“Juglar”周期、20年的“Kuznet”周期等）等，简言之，对于当代的人们以及历史社会学家们而言，这种“景气——危机——下跌——萧条——繁荣”的不稳定的周期，与那种被数学统计掩盖了剧烈振荡的长期趋势相比，通常要更有意义一些。<sup>[1]</sup>

第二，社会的变迁，既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人们亲眼目睹到的经济发展的伴随现象和结果。因此，它必须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来加以理解。在这方面，社会力量状况的变化以及一个民族长期存在的阶级结构等问题，首先将成为我们研究的焦点。

第三，这就涉及到围绕着获取、维护和扩大权力机会的政治斗争问题。换言之，也就是要对统治制度的内在动力进行分析。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将帝国主义明确为捍卫统治制度稳定性的策略和手段，尤其要将它与下述看法



联系起来，即它要优先解决维护还是改变现在制度的问题。在这里，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就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和同一种社会政策。在这种关系中，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类的思想意识的作用也具有影响力。这些思想意识既不能被理解为半独立存在的因素，也不能通过思想史的研究而得到充分的阐释。按照这种方式，我们就能对西方列强帝国主义在扩张方面令人惊讶的同时性和相似性进行最轻松的解读。如果我们弱化特有的民族冲动给帝国主义扩张带来的决定性的驱动力，那么，历史的个性原则就会被教条化，而这种教条化则会完全将我们引入歧途。这种教条化即使不会完全阻碍比较分析，也会使有关的比较分析变得很困难，而比较分析在说明结构的共性特征方面是颇具解释力的。

### （一）不均衡的增长和政治统治的合法化：社会帝国主义

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视角来探讨帝国主义问题，在涉及经济增长问题方面则首先有两点需要注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经济的活力释放出各种推动力，这些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拥有各种自身内在压力的系统。与这些驱动力相适应的就是一种实用性的扩张主义。这种扩张主义导致了非正规的或者借助于直接的殖民统治得到保障的市场的扩大。但是，在此并不涉及要将一种基于经济萧条之上的帝国主义（大约到1895年为止）和随之而来的基于经济繁荣之上的帝国主义区分开来，或者干脆否认帝国主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根据经验，现代帝国主义的发展是与经济发展的波动密不可分的，无论是主观上从当时人们的意识看，还是客观上就当今的帝国主义研究而言，都是如此。这不仅适用于德国的扩张，而且也同样适用于美国、法国、比利时的情况——考虑到历史时代的变化——也适用于英国的扩张。然而，在1896年到1913年世界经济高度繁荣期间，两个扩张阶段的最重要的和共同的因素就是经济的不均衡增长的经历。换言之，获利机会的合理预估时常处于困难状态。于是，人们就赋予对外贸易很高的期望值，确切地说，这种期望值直截了当地导致了它变成了一种思想意识。一个高度繁荣时期并不意味着毫无中断的持续经济景气。在1896年以后，1900年到1901年、1907年到1908年以及1913年的经济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萧条，打断了经济的发展，它使人痛苦地意识到：不存在均衡的、持续上升的经济增长。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殖民贸易方面的经营损失（当时已经意识到，现今则可以测算）或者食利者利益集团时多时少的高额赢利等，对帝国主义扩张都具有启发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而同样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对于那些决策过程的参与者而言，全球的不发



达地区意味着提供了销售和投资机会，而对国内的经济发展而言则提供了稳定的可能性。因此，实用性的扩张主义是相关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这些活动，正在成长起来的干预型国家试图寻求和控制经济的长期繁荣，限制不均衡的经济的发展，找到了反周期性经济波动的景气政策的早期形式。受到国家鼓励的出口倾向以及国外市场的取得，则导致一种“非正规的帝国”或直接的殖民统治的建立。在国内市场才逐渐发展起来，而且其吸纳能力长期被低估的背景下，国家鼓励出口和扩大国外市场的行为，目的都在于恢复和保持经济的繁荣。于是，国家的物质福利就仰赖于各种不同形式的成功扩张，当然也包括与相同发展水平国家的贸易往来。当然，这种扩张也服务于一种预防性的帝国主义，这就是，通过具有前瞻性的兼并方式，致力于确保对于未来机遇的把握。

隐藏于扩张后面的各种经济动机可能被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绝对化了。然而，这些经济动机常常只是推动帝国主义扩张的诸种力量中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人们的期望和某种意图也与这种扩张有着紧密的关系，也就是通过一种成功的帝国主义来使得社会的现状和政治权力结构合法化。从这样一种社会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德国海外扩张的意图和作用首先在于，它作为一种保守性的转移视线和驯服政策，就是要将威胁现存制度的各种改革努力——这些改革努力以自由主义的各种解放力量或者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为代表——向外转移。这是一种保守主义乌托邦式的实施国内社会目标的社会防御策略。这种保守主义的乌托邦试图在持续的社会变迁中用现代的手段来坚定地捍卫传统的社会结构。因此，在大普鲁士的德意志帝国，这种社会防御策略的目标是，既要维护传统的前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及权力结构，又要支持工业资产阶级和文化资产阶级反对“第四等级”的壮大。当然，社会帝国主义可以运用到多个方面。它或者为了国内政策之故而允诺在海外能够真正获得的好处，或者允诺有关活动的结果。也许这些活动的结果只是一种纯粹的活动本身的表面性成功，但是，从社会心理上，它们却能够在思想意识方面带来具有影响力的民族的声望的满足。正是在这种考虑之下，帝国主义变成了一种整合思想，可以被上层统治者有目的地用来对付阶级社会的各种对抗。帝国主义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转向一种“替代空间”，而且简直就变成了“一块旷野，在这块土地之上，……与现存国家及其结构和需要之间的契合”得到了实现。<sup>[2]</sup>与此同时，通过帝国主义这种海外活动计划，具有更远眼光的大地主们则在一种反动的社会集结政策中找到了维持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统治地位的新保障。



作为稳定现行统治以及使之合法化的工具，经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与现代干预型国家的起源有关，对此，上文（第二章：二）已经有所提及。在国家进行调节的资本主义体系下，国家领导者试图尽可能地保障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试图以此来保持一些重要的使整个社会得以稳定的条件，于是，政治统治越来越被合法化。这种功能与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操控性统治伎俩一道，就持续性地构成了德国海外扩张政策的基础。鉴于魅力型的和传统型的政府权威都已经受到怀疑，俾斯麦就应该为了经济上的各个利益集团和 1879 年结成的新保守主义的“联合保护主义”（Solidarprotektionismus）（H.罗森贝格语）社会同盟者的利益，改善社会稳定条件，而俾斯麦的经济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目的就在于此。它要以此缓和围绕着国民收入的分配而不断加剧的冲突，把政治和心理上的能量引向成为焦点的新的、远方的目标，因此而赋予民族使命和民族利益的思想以新的光芒，并且通过一种总体效应而重新巩固独裁的国家领导阶层以及承载这一统治阶层的特权化的社会集团的地位。

在这里，不均衡的经济增长和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压力所引起的各种问题聚到了一起，并且如发展进程所显示的那样，使推行帝国主义的路线呈现出一种不可避免性。到 1879 年为止，长达 6 年的萧条由于一次短暂的复苏而好转。在此之后，1882 年到 1886 年为止的新一轮萧条又使德国在这方面受到伤害（在美国和法国也是如此）。19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在各种社团、新闻界、帝国议会以及官僚之中形成了一种更广泛的思想认同，这种思想认同在 1879 年集结起来的政治家“战略集团”（卢茨语）中特别突出。这种认同就是，将各种提升对外贸易的要求和这种殖民性的获取统一起来。这两者都应该有助于摆脱经济危机，同时也可以缓解德国的社会冲突。诚如一则典型的预言所说的那样，“如果不能为德国劳动的剩余产品打开有常态性的、宽广的销售渠道”，那么“我们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步伐一起向前”。<sup>[3]</sup> 在德国国内形势已经发展成了“烧得过热的蒸汽锅炉”的情况下，人们自然喜欢谈论“安全阀”。1882 年建立的“德意志殖民联合会”的主席赫尔曼·楚·霍恩洛厄-朗根堡侯爵就“相信，我们在德国无法有效地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危险进行斗争”，除非获得殖民地。因此，除了经济上的直接好处之外，有关获取海外殖民地的大力鼓动也意味着“在共产主义威胁面前有更大的安全”。在具有这种思想认同的代表人物看来，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宁是一种理想模式，两者的关联是他们时常要考虑的问题。





这种关联也浮现在俾斯麦的脑海中。他受到有利的对外政策形势的刺激，同时受到经济状况、思想认同以及 1884 年帝国议会的选举等形势的影响，于是就用殖民政策对他多年来紧张的对外贸易政策以及稳定国内形势的方法进行了补充。在很短时期内，即在 1884 年到 1886 年期间，德意志帝国就在西南非洲、多哥、喀麦隆、东非以及太平洋上获得了“保护领地”。最初是想由私人企业联合组织在国家的保护下来经营这些殖民地，但是，相关利益集团拒绝最初计划所涉及的费用，并且期望由国家来承担费用昂贵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防止外国竞争。此外，各类起义也使得国家卷入了军事干涉之中。于是，到 1889 年时，这些殖民地都变成了皇家殖民地。1889 年到 1899 年期间，除了太平洋上的萨摩亚和中国的胶州湾这两块“保护领地”外，后来只是通过补偿性的割让才在非洲获得了少许的殖民地。如果不是因为与基于类似的动因而进军世界市场的手的对手的激烈竞争，那么，即使在 19 世纪 80 年代，德国正式的殖民统治也可能不会建立起来。但是，对于俾斯麦而言，这个“非正规的帝国”的好处永远都是眼前的。就这一点而言，“刚果自由贸易区”和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最能符合俾斯麦的想法。然而，在国内压力和国际竞争的双层夹击之下，他还是决定采取建立保护领地的政策。不久，这些保护领地就变成了帝国的殖民地。这种殖民扩张欲望的泛滥是绝对危险的，换言之，它会引发与英国和法国的直接冲突。俾斯麦是基于他的特殊的地位，才有能力阻止殖民扩张欲望的泛滥。他放弃了一些保护领地或者抵制由卡尔·彼得斯以及他的“德意志殖民协会”所主张的中非大帝国，这些都极其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不过，他也因此而在国内政治中树立了强大的敌人。事实证明，这些敌人加强了反对他的联盟，从而为他的下台打下了基础。他的继任者无法继续担当这样一种驯兽者的角色。尤其是在德国国内阶级对抗的规模持续扩大，并且面对以社会民主党的壮大为外在标志的相关问题时，更是如此。

## （二）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是国内政策

如今，事实已经证明，在 19 世纪 80 年代，不仅经济帝国主义指引着发展的方向，而且社会帝国主义的统治方式也决定着发展的道路。从此以后，一旦卡普里维进行部分调整以适应德国已经成为工业国家的这种现实的努力遭到地主们的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政策就会有意识地经常地回到社会帝国主义之上。诚如米克威尔在 1897 年所表述的那样，他的集结政策就是基于将“革命因素”引向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会使整个民族“转向外部”，为整个民族的“感情……打下共同的基础”。在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荷尔斯



泰因也提出了利用社会帝国主义的这种功能的思想。当时，他曾经指出，“威廉二世政府在对外方面需要一次明显的成功，以便反过来对国内产生影响。而这种所期待的成功要么是一次欧洲战争的结果，要么是一次关乎世界历史的赌博游戏，或者是一次在欧洲以外地区的征服。”<sup>[4]</sup>例如，1897年到1900年的德国对华政策就带有这样一种战略考虑，当然，正在建设的海军舰队也是出于这种战略考虑。同样，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所谓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者之中，诸如弗里德里希·瑙曼、马克斯·韦伯、蒂尔皮茨的首席理论家恩斯特·冯·哈勒以及政治学家恩斯特·弗兰克等许多人，都拥有这样的想法。一方面，一种令工人阶级满意的社会政策和议会制才会使推行强有力的“世界政策”成为可能：国内的改革将会用来服务于优先的帝国主义政策，因为国内的阶级整合是加强对外力量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世界政策”则在物质上使国内社会政策的实施成为可能，或者是说，通过成功地实施“世界政策”而使国内保持一种平静的状态。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并不参与决策，他们只是对柏林预先确定的方针中要实施的扩张政策加以支持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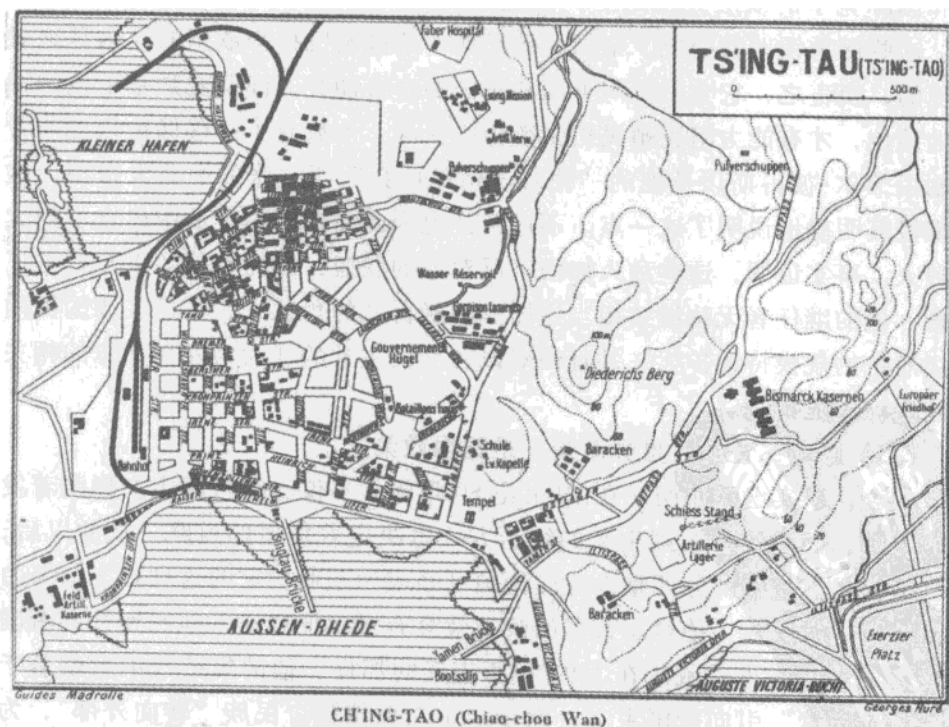


图48 德国人绘制的青岛地图



就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而言，我们显然只有从社会帝国主义的视角出发才能找出它的真正含义。“世界政策”的突然性来临的特征无法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绝对是建立在一种深思熟虑的将对外政策工具化的基础之上的，目的是服务于国内政治。大凡缺乏具体经济利益所在之处，威望的因素就显得要比从前更突出。诚如弗赖堡大学法学学者 H.雷姆在 1900 年敏锐地指出的那样，“只有德意志的世界强国思想能够去除德国国内经济利益方面的斗争。”<sup>[5]</sup>当然，这不仅涉及到以集结政策的方式来克服经济方面的冲突，同样也涉及到工人阶级的政治参与权和社会平等。在 1884 年以后，“对帝国友好的”帝国主义虽然遭到议会中的工人阶级代表们的反对，却轻易地在工人之中得到了响应。“帝国民族”内部已经撕裂成了阶级社会；以极权国家、土地贵族统治阶层和封建化的资产阶级为一方，以要求议会化和民主化的先进力量为另一方，二者之间已经出现了激烈的紧张关系。而柏林政治家们的经验阅历表明，他们从防御性的立场出发，并不打算进行必要范围内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的现代化，更不可能实行之。有鉴于此，社会帝国主义的“驯服”政策就成为绝无仅有的有希望成功的抉择。这种不二抉择固然很重要，但也是灾难性的。就像有些人在此后所指出的那样，柏林的政治家们也无法完全随心所欲地减少在海外的活动，以表明适度的克制。由于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制度内部就会产生一种持续的压力，使得不断重复运用社会帝国主义这一久经考验的工具。就这一点而言，冯·瓦德西点出了核心要义。他指出，“对外政策要对我们的国内状况有一种积极的影响”，同时他又指出，“我们无法通过国内政策来帮助我们自己，这是一种不健康的表现”。但是，在这一点上，比洛夫从他的决策中心的位置出发，却顽固地强调说，“只有一种成功的对外政策才能……有效、和解、安慰、集结、团结”。<sup>[6]</sup>

所有这一切，不仅突出了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那种匆忙和冒险的参与愿望的客观作用，而且也说明了“决策者们”坦然承认的目的以及他们有意意识的谋算。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比洛夫还以极其坦率的方式，在他那广为人知的《德意志的政策》(Deutsche Politik)一书中详细地阐述了“世界政策”，称这一“充满生机的民族政策”是“对付社会民主党的真正良方”。由此而来的是，这等于承认了国内改革政策的失败，至少它意味着已经放弃建立现代公民社会。<sup>[7]</sup>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社会帝国主义在德国政治中已经被塑造成一种政治行为模式。随着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统治的不断衰落以及向威廉二世时代的多元力量结构的转变，通过“社





会帝国主义的方式将利益集团的压力转向外部”的方式，把“早就应该进行的德国内部结构的改革”掩盖起来，从而使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对于因工业革命而改变的社会形势近乎熟视无睹的政治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趋向中立化”。<sup>[8]</sup>与直接将德国的“世界政策”理解为国内政策相比，与把这种政策视为捍卫现状的国内政策在国际舞台上的延续相比，还有什么样的解释能够更令人信服呢？

可是，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可以肯定，从其主要功能看，这种德国式的社会帝国主义还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回应，它被用来对付在阶级社会问题和不合时宜的权力分配方面发出的挑战。当然，我们不能将这种社会帝国主义完全

归结为这种令人注目的操控因素。从狭义上看，经济利益也时常发挥作用，并且确实试图在海外扩张方面有所作为。很显然，1897年以后的德国对华政策为德国的国内政策提供了施展高



图49 德国殖民政策：来自胶州的明信片

招的机会，然而，与“租借”胶州湾联系在一起的山东条约 [原文为山东条约 (Shantung-Vertrag)，此处应该是指中德双方于1898年3月签订的《胶澳租界条约》。译者注] 却将这个最富庶的中国省份牢固地纳入了德国经济的影响之下。这一条约预示着德国国内疲乏的铁路建设以及德国的重工业将参与开辟巨大的亚洲市场。诚然，巴格达铁路的政治考虑绝不能忽视，然而，对于涉及到这种扩张的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而言，它则开辟了诱人的商机。如果国家领导层也经常以经济利益为借口，夸大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或者正式怂恿这些经济利益集团去从事经营活动，只要这些经济利益集团在海外获得重要性和影响力，那么国家力量也就会尾随而至。然而，如果人们加强对于推动帝国主义扩张的各种因素的重要性的探究，同时对各种决策加以量化，结果就会表明，在1914年以前，社会帝国主义的因素或



者处于一种主导性的地位，或者始终至少与经济方面的考虑具有同等重要性。在德意志帝国扩张政策的最后阶段，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战争目标中，社会帝国主义显然再次取得了它的优先地位。

### （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泛日耳曼主义的帝国主义思想

在1853年出版的《现实政策的原则》一书中，L.A.冯·罗豪曾劝告人们要适应1848年革命以后的时代的具体利益形势。他不得不承认，“一旦人们接受某些思想并使之扎根于自己的内心深处，那么这些思想……就会始终具有强大的力量。因此，那种……充满于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思想是所有政治力量中最现实的。”<sup>[9]</sup>人们时常提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西方帝国主义时代的思想之一，就拥有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达尔文提出的“物竞天择”、在“生存竞争”中“强者胜出”的生物学原理都传播进入了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中。不可否认，19世纪70、80年代以后，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工业国家中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且产生了有据可查的显著影响，不过，只是到民族社会主义的激进种族主义时代，它才达到了顶点。就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言，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在这里，把社会达尔文主义置于社会发展的环境之中，对之加以思想性的批判分析，是特别适合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达尔文主义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早在1862年时，马克思就惊讶地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尔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这使人想起了黑格尔《现象学》，那里把市场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因此，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也指出，“达尔文有关生存竞争的整个学说简直就是霍布斯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学说、资产阶级的经济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从社会移植到可爱的自然界的一种改编。在完成了这一改编……之后，人们就很容易把这种源自自然史的学说重新移回到人类社会史中，并且会过于天真地认为，这一理论已经因此而被证明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自然法则。”就像他们之后的尼采和斯宾格勒一样，二者都断定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特别合适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自我辩护体系”<sup>[10]</sup>（普勒斯纳语）。与此同时，他们也为这种分析划定了一个范围，时至今日，仍很少有人能对之加以改进。

马尔萨斯是一位业余的自然科学家，他相信他从自然中推演出的想法。



由于受到马尔萨斯读物的影响，无论是达尔文还是生物学家 A.R.华莱士（他的研究导致达尔文决定出版他的《物种起源》），从研究心理上看，他们都是在关键时刻受到刺激而发展了自己的演进学说。我们绝不能说，这些演进学说源自所谓的自然科学的固有发展。达尔文曲解了马尔萨斯。当他把欧洲尤其是美国的“所谓雅利安人种”说成是他的理论在人类社会中也同样有效的结论性证据时，自己仿佛变成了第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确实，他显然已经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解释准备了基础。<sup>[11]</sup>毫无疑问，基于马尔萨斯和达尔文持续的循环论证乃至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自认为掌握着最新的科学，因而会产生一种共振效应，这种世界观可望使得资产阶级的经营活动、资本主义的竞争斗争、企业主的威权主义和民族自决意识的合理性得到确认。作为实证主义衰亡的征兆，这种世界观排除了对一个更开放的社会期望，并且确认了一种反平均主义的社会贵族主义的铁的定律。就其功能意义而言，社会达尔文主义既能够确保统治集团与社会进步一致，也可以说明现状的合理性。与此同时，它允许不理睬工人阶级以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愿望，视他们为生存竞争中的劣等失败者的毫无用处的反抗。社会达尔文主义还被一圈无可争辩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圣光所环绕。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种多方面的适用性，使得它在实际的和间接的关系到统治集团利益的方面拥有自己的影响力。它非常适合当做一种为帝国主义提供合法性的思想意识，因此在主要西方国家被一连串的推广者所热捧。然而，如果我们把它从一个特定的社会构成的联系中挪移出来，我们会当然地视之为独立的思想因素，错误地把它当做一种纯粹的科学方面的曲解，并因此而忽略它的穿透力。

同样，泛日耳曼主义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为帝国主义



图50 八国联军总司令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在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1900年）



扩张辩护、以扩张为努力目标、不断发展的充斥着种族主义的变种。而只有在具有德意志帝国这样一种光度的特定社会环境中，泛日耳曼主义才能发展为一种颓废堕落的社会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的集中进程和社会的两极化进程“必须在与自己民族相适应的优势特权地位方面”得到反映。经济上的发展壮大和海外的殖民征服似乎应该归功于德意志民族的“特殊的自然属性”，“也就是它的种族特性”。在任何情况下，从这种信念中都可以推导出大量的要求。种族主义的泛日耳曼主义认为，世界必须由它加以治愈。在持续不断的对外扩张方面，它形成了一套伪科学“掩盖下的理由”。泛日耳曼主义要求献身于“至高共同利益”，也就是条顿人的世界使命，原先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此成了“服务于”这种新的目标的“推动力”。在这一种含糊的描述之下，不论是银行家冯·戴尔·海特，还是具有狂热德意志特性的中小学首席教师、牛气冲天的军人和中等阶层的狂热殖民分子，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方面表达自己的愿望。<sup>[12]</sup> 尽管迄今为止尚没有证据说明泛日耳曼主义对柏林的政策决策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在属于“帝国的朋友”的公共舆论中，泛日耳曼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帝国政府出于政治考虑，极少对之予以批评。泛日耳曼主义首先在对公共舆论有极大影响力的上层及中层社会中蔓延开来，并且得到诸如“泛德意志协会”、“德意志海军联合会”、“国防军联合会”等好战组织的支持。毫无疑问，泛日耳曼主义是某种思想混合物中的有害成份，而这种思想混合物成为日后德国“种族主义”的推动因素，其极端形式对真正的才智低下者可以起到平衡作用。

## 七、对外政策

### (一) 国际体系中的德国对外政策

1866年到1871年，之所以能够在中欧地区出现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国家，是沙皇俄国以及英国善意容忍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它们允许的结果。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在现存的国际格局中拥有了一席之地。针对德国的这种地位，其他列强依据这种格局的传统对抗性结构，谋求通过组合和反组合来重要调整自己的位置。德意志帝国由于其实力和经济因素的缘故，至少已经接近于一种霸主的地位。例如，在事实上，数年之后，柏林变成了最重要的国际会议所在地，从而表明国际重心已经转移。尽管如此，由于俾斯麦宣布了德国已经“满足”的政策，德意志帝国的这种近乎霸主的地位并非特别醒目。就像在一个相互联系着的管道中一样，与1871年以后在国内实行的保





守性的驯服政策相对应，俾斯麦在欧洲舞台上推行的首先是一种保守性的连贯政策，以便确保所获得的成果。若要德意志帝国的生存不再被诸如1864年到1871年间那种好战的对外冒险政策等拿来孤注一掷——这种情况是保守主义的维护现存体制的原则所绝对不允许的，那么，对于柏林而言就存在三条可能的通用策略，那就是，“在国际领域中”防止对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具有威胁性的各种后果”；平衡“在各列强格局中暂时还不稳定的地位”；同时，要保卫“已经过时的社会秩序”。<sup>[1]</sup>

首先，人们可以从传统的达成协议的原则的角度，努力确定各个利益领域的界线，从而避免或者减少与各列强竞争对手之间的磨擦。其次，也存在一些棘手的机会，即利用各列强的利益而使之相互争斗，但是尽可能地将它们的注意力转向德国的影响范围的外围地区或引向帝国主义的扩张方面。再次，通过迅速的预防性打击击退潜在的敌人，并且把可能的联盟扼杀在萌芽状态。可是，由于担心日后受到德国的威胁，也恰恰会因此而招来联盟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对于第三种可能性，尽管毛奇之后的德国军方一直持支持立场，然而由于无法预见的冒险性，帝国领导层在长达43年的时间中一直弃之不用。而另外的两种方案则一直发挥着它们的作用。众所周知，俾斯麦多年来曾试图将他的思想付诸实现，亦即把引起竞争对抗的利益引向德国的外围地区。这种想法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于他对于法国在北非和印度支那的殖民政策的支持上，同样也体现在他对埃及问题以及俄英两国在中亚的冲突的立场上。然而，当德国在海外的利益越来越重要时，或者说，当威廉二世“世界政策”的社会帝国主义特征近乎要求德国不断地到处插手干涉时，俾斯麦的这种近乎完美的策略就变得具有风险了。由于德国的外交政策很快就丢掉了以“满足”这样一个座右铭为前提的战略，它也就成了一种临时性的权宜之计。但是，实际上，俾斯麦的长期置身于利益地区之外的策略也遭到德国自身内部力量的阻挠。也就是说，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过了几乎不到6年，有一种趋势就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持续扩张的工业资本主义仿佛在从德国内部破坏德国外交政策中有关“满足”状况的誓言。诚然，从官方的角度看，德国在欧洲并不存在要预期达到的新的领土目标，但是，从主权层面看，工业发展的动力却将民族国家的疆界弃之一边。在高速工业化时期，德国对外贸易利益在质量方面的变化给德国的对外政策注入了一种躁动的因素。而威廉大街习惯于传统国际政治的思想学派可能低估了这种躁动因素。众所周知，1878年和1879年，德国和奥地利之间进行了持续的谈判，最终导致了187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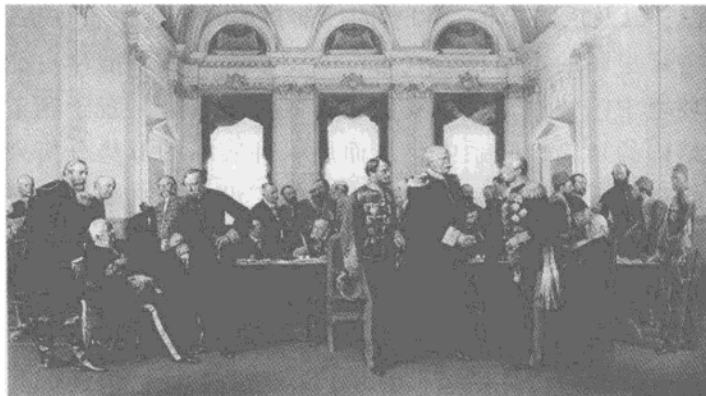


图51 在俾斯麦时代，柏林成为国际事务的中心。图为1878年7月13日柏林会议闭幕情景

10月两国同盟的建立这样一个基本的成果。但是，这一谈判首先涉及的是建立关税同盟的广泛规划，目的是要创立一个庞大的中欧集团，使之成为德国工业经济的领地。直到1887年出现重大转折之

前，德国与俄国的经济关系也显示了这样的经济问题。而德国在巴尔干地区不断增加的活动也说明了这一点。早期的德国帝国主义、关税保护和卡普里维的贸易条约等等，都用各自的方式说明，德国正在不可阻挡地卷入国际经济和世界市场之中。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有关德国已经“满足”的相对静态的思想很快就被证明是不恰当的比喻而已。

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包括社会保守主义的对内政策以及尽可能地避免冲突的对外政策在内的防御性的总体设想，已经遭受到持续不断的侵蚀。首先，这种对于德国防御性的总体设想的侵蚀不能归因于欧洲列强格局中的其他国家，更不能归因于各国领导人的不听使唤。就像俾斯麦时代的最后6年里已经显示和证明的那样，这种侵蚀是德意志帝国内部社会经济问题以及由权力精英们对相关联的核心利益进行重新界定的必然结果。例如，就像上文所提到的那样，一方面，虽然早期的德国帝国主义可以被视为国内政策的一种防御性策略，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却在外交关系方面引入了一种进攻性的因素。这种矛盾心理随处可见。显然，大约在1879年以后，这种动机和行为的两面性实际上成了一种时代性的标志。只有通过一种埃卡特·克尔将对外政策称为“国内战线”的分析，我们才能对它进行充分的阐释。与此相反，如果人们用诸如“本原性的权力政治”一类的尴尬空洞之辞的话，则无法接近于事实真相。那么，我们究竟怎样才能使问题更清楚呢？在此，我们难道需要引入一种成问题的政治行为的模型或者一种令人怀疑的社会心理的常量，来确认作为原始本能的、简言之就是近乎人类学因素的权力的享用和实施吗？也即确认霍布斯所说的“权力之后还是权力的无休止的贪欲”吗？我们不应该进一步研究基于社会分层之上的社会价值和标准体



系、政治的社会化进程、以及反映出信念和本能性前提的习惯性语言表达，以便能够揭示出各个特定集团的不同权力观念吗？“权力”就不能尽可能确切地置于它的社会环境中吗？换言之，我们就不能将“权力”置于利益的网络之中以及统治结构的功能性联系中，从而用一种实际的形势分析来尽快地取代“本原性的权力政治”这一与历史无关的、没有什么变化的概念吗？或者说，我们能够放弃这一概念吗？从“本原性的”权力欲望的角度看，对于历史上无止境的相似的重复进行探究可能会吸引行为学家。然而，如果历史学家对这样一类简单化表现出满足的话，那么他不仅阻碍了自己的客观性研究，而且无法在历史理论的框架内进行系统性的把握。在这一方面，有一个人对于本学科几无成见，他的看法完全值得人们去认真对待。兰克曾指出：“如果只关注内部的情况，那就无法认知世界。我们也要理解外部的情况，不过这只是次要的。外部的情况是暂时的，内部的情况才是持久的。”<sup>[2]</sup>

## （二）“国内政策优先”之下的对外政策

不稳定的对外政策机制，苍白的作用与反作用运动机理，消除或加剧冲突的外交程序等，所有这一些，我们在此都有意识地不加关注。丰富的文献等待的是那些想要对诸如俾斯麦的联盟体系或者威廉二世的外交进行更深入研究的人。而作为当时从事联盟体系和外交所依据的状况则总会追溯到最基本的、“持续存在的”各种关系，追溯到“国内政策优先”。这一点，在有关德国与法国、英国和俄国三大列强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上可以给我们一个大致的印象。

### 1. 法国

割占阿尔萨斯-洛林的决定是基于一系列的动机之上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国内政治的考虑以及军事方面的需要等，完全超过了改善德国的战略地位以及反对传统上处于优势地位的法国这种更高的对外安全的一般性考虑。自从这一地区违背绝大多数阿尔萨斯-洛林人的意愿而从法国分离出来后，德法关系长期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某种程度上看，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仍在为这块“帝国领地”的回归而斗争。1870年到1871年的这一决策具有灾难性的外交后果。就此而言，完全应该对这一决策进行重新审视。然而，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这种重新审视在德国无疑是自杀性的使命。顺便提一下，当时人们立即就认识到了这种灾难性的外交后果。有关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兼并是防止未来法国袭击的必要“物质保证”的理由，早在1870年秋天时就已经遭到了马克思的驳斥。他称这



图52 1871年5月10日，普鲁士和法国签订法兰克福和约。战败的法国被迫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并支付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

种理由是“蠢人”的托辞。从军事上看，1870年的战役表明，可以轻易地从德国的领土上对法国发起进攻。再者，提尔西特和约之后的德国历史已经表明，一个战败的民族会对它丢失的领土做出怎样的反应。马克思问道：“如果人们必须把军事方面的考虑当作确定民族疆界的原则，它不是一种十足的‘时代错误’吗？”那么，奥地利就可以对明乔河（Mincio）一线提出要求，法国则可以对莱茵河（在意大利境内。译者注）一线提出要求。“如果要通过军事利益来确定疆界，那么相关的要求就会永无止境。因为每一条军事界线都必然是不完善的，并且可以通过对更广大地区的兼并来得到改善。此外，它也不可最终地和公正地得到确定，因为它总是由胜利者强加给战败者，并且因此而表现为一场新的战争的起点。”由于夺取阿尔萨斯-洛林，这场战争几乎就变成了一种“欧洲的制度”，因为和平对法国而言最多是一种停战，它在一种表面的和平之后，会重新要求夺回丢失的东部地区。然而，这意味着欧洲两大民族之间永无休止的战争，意味着它们通过“相互间的自相残杀”带来的毁灭。马克思担心，到那个时候的话，在普鲁士-德国，“军事专制主义”会变得呆板起来，以便能够守住这块西部的波兰。在马克思看来，最重要的是冲突向东方的蔓延。他认为这是“不可避免



的”。“就像 1866 年孕育着 1870 年的战争一样，1870 年的战争必然孕育着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一场战争”。毋庸置疑，德国为了捍卫它的掠夺物，要么不得不得使自己尽力成为“俄国扩张的公然的奴仆”，要么就要武装起来准备“一场针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人和罗曼人种族的种族战争”，而绝对“不是一场那种不痛不痒的‘局部化’战争。”在反对法国和俄国联盟的这样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中，德意志帝国将走向终结。<sup>[3]</sup>

这位流亡伦敦的批评家洞察秋毫，他的一些预言完全得到了实现。除了马克思之外，只有来自波罗的海东岸的德意志时政评论家尤利乌斯·冯·埃卡特以相似的、怀疑的方式，较早地看清楚了“帝国领地”阿尔萨斯-洛林的同化问题，武装到牙齿的各邻国的长期敌视以及法俄战争联盟的不祥之兆。德国宰相俾斯麦曾经短暂地相信“只要他们害怕，就让他们恨吧”这样一句既残忍又愚蠢的格言，或者此后又发布指示说，“在不涉及阿尔萨斯的所有方面，我都希望对法国采取修好的立场。”<sup>[4]</sup>然而，与法国的裂缝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修补，而且在 19 世纪 80 年代已经在德国军方高层中出现了兼并阿尔萨斯-洛林的批评。他们抱怨道，我们由于获得阿尔萨斯-洛林而陷入了“在欧洲的困境”，确定了“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永久战争状态”。自 1871 年以后，毛奇就已经担心两线作战问题。而早在 1887 年，即 1892 年法俄缔结军事协约之前 5 年，俾斯麦也向普鲁士国防大臣承认，“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不得不同时间面对反对法国和俄国的战争”。不过，这将是一场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战争”。<sup>[5]</sup>在兼并阿尔萨斯-洛林 17 年以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27 年，俾斯麦已经描述了 1870 年吞并阿尔萨斯-洛林这一决定的灾难性长期影响。

阿尔萨斯-洛林就像一块漂石一样，阻碍着德法关系的改善，并因此而威胁着欧洲的和平。故而人们一再地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建议，阿尔萨斯-洛林至少实现中立化。威廉·李卜克内西曾经在时事评论中以及在帝国议会中谈到这种想法。甚至 1897 年来自维也纳的一份外交建议中也谈到这一想法。然而，正如法国的民族主义在世纪之交之后拒绝任何的承诺并且坚持阿尔萨斯-洛林的“回归”一样，在德国同样也忌讳对现状提出任何疑问。尽管如此，1905 年，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顶点之后，总参谋长冯·施利芬开始十分冷静地制定抉择性方案，或者发动一场针对法国的预防性战争，或者最终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找到新的解决方案。除此之外，德意志帝国的政策不会再有别的出路。<sup>[6]</sup>然而，由于德国方面没有认真地寻求与法国之间达成新的解决争议的方案，这种抉择在关键时刻就余地变小，成了没有其



他选择的单行轨道。

## 2. 英国

有关英国这个“阴险的海神之子”，有一个神灵活现的传说，即它在1871年以后就一直以猜疑和捣乱来对待德意志帝国的发展，并且最终完成了对德国的“包围”。很长时间内，这一传说都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正是柏林首先拒绝了严肃的合作，然后又使双方的合作变得几乎没有可能。确实，在19世纪，英国和俄国这样两个世界性帝国之间，在鲸鱼和北极熊之间，一直存在着很深的敌意。这种敌意成为德国各项政策首先要考虑的一种经常性因素。诚然，就像在1884年到1889年期间所显示的那样，德国的活动空间还是有了相当大的拓展。但是，比这些敌对或者地缘政策方面的考虑更为重要的是，直到1890年为止，在俾斯麦以及他周围的“战略小集团”之中一直存在对可能因德英合作而带来的自由化影响的担忧。德英之间的敌对并非在于这方面即将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的逐渐出现的贸易竞争，而在于它们的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的对立，也就是说，在于它们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政治文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不同的各种社会状况。在德国，“波拿马主义的半独裁”以及前工业社会的寡头统治的历史抉择，首先是要建立一种由“民族的”和（或者）“进步的”自由党人所确认的议会君主制。19世纪60年代的宪法冲突以及19世纪70年代早期民族自由党的强大力量使得各种巨大的阻碍都被弃之一边，似乎向议会君主制的过渡仍然有可能得到实现，而且俾斯麦和自由党人也都没有排除这种情况。自由党人在1879年以后还能够期望在城镇地区、南德地区以及易北河以西的德意志地区得到广泛支持。1881年和1884年的选举结果就凸显了这一点。我们只需要想象一下在威廉一世数度遭到行刺之后王储弗里德里希接管政府的几个完全可能的后果，还有后来的自由党的分离主义者实际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到柏林相当不稳定的权力平衡。人们总是喜欢提出这样一些假设性的问题，即俾斯麦认真地将英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视为敌对势力，然而也有一些无法预料的因素可能对英国的自由主义产生有利的影响，例如，德国皇储以及他那丝毫没有民族主义低劣情感的英国王妃对英国的好感；英国议会生活以及英国的土地贵族与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完全另一种类型的共生现象的持续示范作用，等等。正是这些显而易见的因素，在两国间更紧密的联系之下，可能会发挥一种可预见的、然而却非常难以操控的影响。据说，俾斯麦之子赫伯特·冯·俾斯麦曾经提到，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皇储还没有生病，我们不得不为其长期统治做好准备，在此期间，英国的影响会占据主导地位”。



由于维多利亚王妃以及在柏林将要出现具有威胁性的“格拉斯顿内阁”的原因，赫伯特·冯·俾斯麦将这种英国的影响称为“英国的亲密”。然而，俾斯麦却认为，“从我们国内的各种情况来看”，这是“令人忧虑的”。<sup>[7]</sup> 根据这位帝国宰相自己的报告，他在与冯·施魏尼茨大使有过一次谈话中，完全像他的儿子一样，认为与英国出现偶然的外交摩擦是必要的，“以便使德国人对英国抱有不快”，并以此挡住“英国的立宪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在德国的影响”。<sup>[8]</sup> 俾斯麦对格拉斯顿的痛恨，不仅在于他坚持原则，相信政治的道德责任，而且还在于他清醒地视格拉斯顿为接近民众的、与强大的时代潮流一致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强大对手。因此，俾斯麦不会让德英两国间关系的发展超越一种限度，即带有有限的冲突而又能协调一致的冷漠的共处关系。从这一点看来，如果说大俄罗斯帝国在德国的东部边界这样一个纯粹的事实似乎证明他对英国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是正确的，那么，与俄国潜在的强大力量相比，沙皇独裁性的反自由主义的亲和力、东方君主统治的共同的保守主义等，则是决定俾斯麦的这种态度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政治传统方面的合法性影响与俾斯麦时代有意识地保持与伦敦的距离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1884年到1889年期间殖民利益冲突中的仇英情绪。

在19世纪90年代，德国不仅在世界市场上与英国的商业竞争迅速上升，而且随着海军建设的发展，已经决定采取冲撞英国核心利益的政策。在1900年第一个海军附加法案之后，德国方面时而公开承认时而竭力掩盖的带有侵略性的意图已经毋庸置疑，而伦敦方面也没有倾向于以深信不移的天真来对待这一新危险。德国的海军政策已经极其明确无误地与想象中的英吉利海峡那边的敌人连结起来了，以至于英国好像只要自信地等待事情的发生就足够了。如果回忆一下“蒂尔皮茨计划”的国内政治背景，同时考虑到德国方面的这种决策不只是为了顺应国际上建造战列舰的趋势，而是在没有受到英国政策逼迫之下就以如此大规模的武装来针对英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1914年之前，德国是如何在这一国际棋局中确定它的招数的。

### 3. 俄国

俄国和德国在社会领域以及“君主制原则”等意识形态上有相通之处，它们也是分割波兰的同谋。但是，除此之外，从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出发，德国却需要对这个庞大的东方邻国采取一条小心谨慎的路线。1864年到1871年的大普鲁士的扩张得益于俄国的支持才能进行。俾斯麦就承认，



“俄国让我们获得阿尔萨斯-洛林”是直接的“亚历山大二世的个人政策”。<sup>[9]</sup>此后，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在出口的考虑方面和总参谋部的作战计划方面都要求对俄国采取一种尽可能的无摩擦的合作。就彼得堡的政策而言，1878年柏林会议的结果却意味着一种失望。而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失望也许针对的是威廉大街上的那位“诚实的捐客”俾斯麦。然而，于1880年1月生效的德国农产品进口关税却直接影响到俄国的谷物输出。本来，由于受到美国小麦的挤压，俄国已经在艰难地捍卫它在德国谷物进口中所处的主导性地位。1885年，德国的关税税率增加了两倍，1887年3月，相关的关税税率又再一次增加，几乎提高了一倍。德国的这种农业保护主义及其不可避免的、确切地说是有意意识的反俄倾向，是与19世纪70年代末以后德国社会的力量结构相对应的，并且在德意志帝国领导层看来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必然。但是，在俄国，由于特殊原因之故，这却是令人痛苦的事。在克里米亚战争溃败之后，沙皇俄国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这种进程是与成功的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而俄国工业化方面的资金支持主要建立在农产品的出口收益之上。然而，从这方面看，短短的数年内，这种高关税壁垒给俄国谷物输往相邻的、拥有接纳能力的德国市场的通道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俄国所期待的现代化的一大支柱以及与沙皇寡头政治、对外政策等有关的所有希望，都陷入了动摇之中。德国外交家们现在目睹着俄国仇德情绪的增长，而这种仇德情绪实际上都要归因于“谷物关税问题”。然而，尽管这种保护性关税对于对外政策具有爆炸性的影响，德国国内的权力关系状况却排除了长期消除这种弊病的可能性。

此外，在德国第三次提高关税税率半年之后，俾斯麦政府又给予俄国早期工业化的第二大支柱重重的一击。由于缺乏自己的流动资本，俄国的早期工业化非常依赖资本的输入。到1887年为止，德国金融市场已经占据了关键性的地位。当普鲁士所有的储蓄银行的储蓄不超过22亿马克时，德国人手中的所谓俄国有价证券却一度达到了20到25亿马克。不过，1887年11月，德国资本市场却出现了实际性的封杀俄国有价证券的状况。此后，德国方面禁止和拒绝将俄国有价证券视为绝对安全的投资和抵押。这一切在柏林交易所引发了惊慌和混乱，导致大量资金流向巴黎。在那里，法国的一些银行却吸纳了大部分的俄国国家证券。因此，俄法联盟的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柏林自己建立起来的。而当德俄两国因农产品关税而展开金融战时，俄国正面临着工业革命的突破（1890年以后）。也就是说，伦敦商业区已经向俄国关闭了大门，而从政治上看，俄国已经不存在放弃现代化的可能，于





是，在一个时期中，巴黎就成了俄国方面无限制的资本需求的唯一出路。

就这种似乎毫无顾忌的德国对外贸易和资本政策而言，从传统上看，其中有些动机显示出外交政策的意味。德国方面认为，通过这种剧烈的治疗方法，将抑制无疑被夸大的所谓好战的俄国泛斯拉夫主义，打击圣彼得堡的亲法集团，通强力地显示德国友谊的重要性来提升对德国友好的价值，从而使俄国丧失推行扩张性的、反奥地利的巴尔干政策的勇气。敌视俄国的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就捍卫对于俄国的这种强硬措施。他指出，必须“始终不渝地”压低“俄国的信誉”，“以便使它的好战性平静下来，如果可能的话，则使之得到阻止”。<sup>[10]</sup>然而，这种对外经济方面有目共睹的、明显的冒险性“边缘政策”的决心，更多地是由国内政治的因素所决定的。易北河以东谷物生产者的巨大经济利益以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庄园主阶层的社会和政治统治利益都要求采取农业保护主义，但是他们也认为有必要将俄国竞争对手从德国金融市场上排除出去，因为他们和军方一样，担心这会用来资助俄国的西部铁路建设。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界则早就宣称，要对1877年以后不断上升的俄国的进口关税进行报复。在1880年到1887年间，德国向俄国的出口下降了近一半，在德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由1875年的24%下降到了1885年的5%。在保守主义的集结政策中，这两个关键性的重要利益集团可能与俾斯麦政府的这种高关税的政策有更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从议会政治的角度看，德俄两国之间的这种冲突与人为制造出来的法国的战争威胁一道，是要用来确保在所谓的帝国议会联盟中通过1887年11月的增加军事力量的提案。对于一些鼓吹者提出德国要在东方发动一场预防性的冬季战役，俾斯麦则以完全拒绝“使用预防性进攻”的回答进行了否定。他指出，“我们只会失败，只会一无所获”。不过，德俄之间的经济冷战则会通过有限的让步来缓和这些要求。<sup>[11]</sup>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根据对内和对外政策而来的防御性的总体设想，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采取捍卫性措施的进攻性结果。这种策略表达了保守主义的乌托邦的辩证法：要无条件地捍卫落后于时代的权力状况，以至于“俾斯麦打算用来维护和平的手段……却转而用于威胁和平”。<sup>[12]</sup>无论俾斯麦宰相是否可能从一开始就相信要纠正这种与俄国的冲突策略，或者他是否认为对外政策和对外经济关系是可以分离开来的，相关的影响在1887年以后是灾难性的。从权宜性的再保险条约看，柏林不是去努力谋求由于德国农业政策的不妥协而剩下的德俄两国之间唯一可能的坚实经济基础，即俄国对德国资本市场的依赖，而是确认了俄法联盟谈判的成功结局。因此，德国的





政策不仅加剧了它面临的两线作战的危险，而且简直就是肯定了这种状况。1887年就已经确定了1894年和1914年的发展方向。显然，柏林所确定的维护德国社会和政治体制的优先考虑不允许有其他的真正选择。此外，特别是从商品和资本输出的角度看，1887年德国政府的决策及其后果也否定了俄国市场，否定了德国向海外进行帝国主义扩张方面抉择这块大陆的可能性。这一通道从此被堵断了。

## 八、第一次世界大战：向前逃跑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德国持续了一场长达12年的狂热辩论。在此期间，几乎所有有名望的德国历史学家都试图驳斥凡尔赛和约第231条对德国进行的道德和法律责难。他们声称，在1914年的七月危机中，出于正当自卫，尤其是在面对着不断向前滚压的俄国“压路机”时，德意志帝国才采取了行动。此后，在自己没有任何战争政策责任的情况下，它最终屈从于敌人的优势力量。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种观点，即包括柏林在内的所有欧洲各国首都都对形势失控负有责任，而且这样一种解释被大家所接受，甚至英、美两国的研究也不例外。在冯·韦格勒、法伊、勒努万等人的大量叙述中，这种抚慰性的、开脱罪责的看法具有代表性。而在民族社会主义统治之下，对这一问题更不可能有批评性的探讨。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最初岁月中，褐衫党统治的无节制性则成了更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1961年为止。这一年，出版了汉堡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所著的关于德国人的《争雄世界》（Griff nach der Weltmacht）一书。他不仅强烈地批评德意志帝国领导层在1914年夏天的举动，而且抨击其到1918年为止的顽固的战争政策，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费舍尔认为，就像在1939年时一样，德国也要承担1914年时的主要责任。事实上，尽管这一论点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讲都容易受到各种批评，但他的反对者的尖锐的、憎恨的、民族主义的腔调却表明，这时就是破除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不能讨论德国责任问题的禁忌的最佳时机。在这种最初的激动平息下来后，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派不仅坚持费舍尔在《争雄世界》中所表达的全方位性的批评，而且试图证明德国进行了有意识的战争准备，在战前时期确实拟定过战争计划。因此，德意志帝国的进攻性侵略具有连续性。而反对的一派虽然逐渐地、悄悄地做出了大量的让步，他们却坚持要把无所顾忌的意见表达和负责任的政治决策区别开来，把和平时期的想法和战时的计划区别开



来，把详细的帝国主义扩张目标和虚构出来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区别开来。在最后做出判断时，要坚持德国方面决策的防御性特征。<sup>[1]</sup>

### （一）攻击性的防御政策

我们在此只是对上述对立的两派的立场进行简单化的对比。这二者都无法提供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模式，以此来合理地说明德国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那种独特的攻击性因素和防御性因素的混合特征。人们从来就没有认真地怀疑过资产阶级和传统统治阶层共同拥有的“世界强国愿望”。这种愿望在19世纪80年代后变得越来越明确。然而，从展示属于当时争夺激烈的国际政治体系中的顶级大国集团之列的决心到预先筹划发动一场战争，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此外，这也是一个经验性的历史科学迄今还无法证明的仓促的结论。关于1914年德意志帝国的扩张目标的讨论，我们首先必须特别清楚地区别源于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影响的愿望。例如，德国公司和银行在法国工业领域的活动尽管造成了一定的利益联系，但是，这与吞并领土的意图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确实，人们到处在激动地谈论夺取法国的矿产，尤其是隆维-布里埃（Longwy-Briey）附近的矿产，认为有必须占据安特卫普港；泛日耳曼主义者则要求割占比利时的佛兰德地区。然而，认为德国决策者基于这些要求而有目的地策划并因此而导致了战争的说法，都只是传说而已。诚然，关于1914年以前不断地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问题人们已经着墨很多，至迟在克里米亚战争以后，这一问题已经众所周知。然而，柏林并不想首先自讨苦吃地触碰这块烫手的山芋。可以肯定，在19世纪70年代末以后，德国曾经存在模糊的或较详细的有关中欧关税同盟的设想，但是，人们的担忧超过了对于德国支配下的具有竞争力的欧洲大市场的期望。这种担忧使得德国通过民族性的孤立来克服诸如美国、英国和沙皇俄国等一些大国在农业和工业领域的竞争。确实，“东部马克联合会”的狂热分子期待着德国东部的扩展和日耳曼化，但是，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并非仅仅只有这一类的“极端分子”。简言之，如果要考察德意志帝国各种目标的连续性，我们就必须清楚，在1914年以前，无疑存在种种实际的或者异想天开的考虑，但是，在这些考虑与1914年夏天的政治决定之间并不能扯上直接的关系。毫无疑问，扩大经济影响方面的考虑绝对不能与领土的兼并目标等同起来。柏林一些部门的任务是为可能出现的战争做准备。它们那些极其普遍的、却流于外行的种种考虑以及由此而来的为数不多的行动，在其他国家也是存在的。它们从未为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发动战争而进行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准备。所谓德意志帝国政策长期以来就有意识地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进的笔直、单轨路线的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更确切地



图53 1914年的德国战争志愿者在街上游行

说，这种说法是与大战爆发前的年代的相关实际情况不尽相符。此外，这种观点的捍卫者也没有认识到，大规模的战争会使人们产生新的想法。这种观点的鼓吹者认为，根据遗传学的原则，在蓝图和准备工作之间可能存在一种联系。但是，像狂妄地宣称德国战争目标的1914年“九月纲领”（Septemberprogramm）的特别极端的形式，人们就只有通过战争塑造出的这种非连续性才能得到答案。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当德意志帝国的政策实际上加剧了“七月危机”并且驱使维也纳走向灾难性的对抗时，我们今天却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德国的政策显然已经接受了可能不再局限于欧洲大陆的战争。然而，从理论上讲，这种连续性的论点所假设的对目标的追求没有考虑到人和制度对决策者行为的限制，因此，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同时，从经验上看，和平时期有关战争目标的空洞言辞并不足以构成对于1914年夏天德国政府决策因素的影响，因此，这种论点也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们必须从其他方面来确认导致德国政府接受战争冒险的诸种因素。

就这一点而言，那些强调对外政策重要性，特别是突出同盟义务机制的重要性的陈词滥调，就完全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上。当时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已经分裂成高度武装起来的两大集团。人们都非常清



楚，一旦冷战冲突升级超越了某种界点，就会转变为热战。在这方面，柏林也不例外。其结果是，动机在这里具有其重要性。也就是说，尽管要面对可预见到的反应，动机仍使得这种冲突从冷战要向热战升级。诚如欧洲的左翼人士早就担心的那样，殖民冲突可能会点燃整个世界，但是它不在引发战争的原因之列。在拉丁美洲，在门罗主义阴影之下的经济竞争持续发展。在太平洋地区，政治上则是一片风平浪静。在东亚地区，1911年到1912年，满清皇帝让位于共和政体，这并没有导致帝国主义列强间因竞争加剧而出现分裂。各列强之间，包括柏林和伦敦之间，最近也在非洲各殖民地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而这些协议丝毫没有增加各列强之间的摩擦。确切地说，这种临时性的“瓜分世界”的协议的影响在于，仿佛欧洲列强所涉及的传统冲突地区以及它们的当事人又出现了新的紧张状况。在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之后，至迟在第二次巴尔干危机之后，任何明智之人都很清楚，在这一危险地区，必须去掉引爆地雷的引信。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的遇害以及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关系的重大转变对柏林的政策仅仅产生了间接性的影响。它们只是为柏林推行冒险性的危机战略政策提供了机会。至于压巨额赌注于这种灾难性的“战争边缘政策”之上的原因，对于复杂而具有争议性的国内因素的审视，将能够给我们最好的解释。

从根本上讲，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中，德国的政策是建立在成功的外交政策的反作用以及将国内的敌对转向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的基础上。因此，费舍尔得出的结论是，“一种活力十足的外交政策应该有助于巩固受到危害的社会现状。大工业家、容克阶级、充满保守主义精神的军队以及国家官员等，在思想、社会和私人层面上相互交织，变成了‘国家观念’的特殊的和可靠的承载者。他们从根本上将世界政策和民族主义的强权政治视为一种手段，即通过向外冲撞的路线来缓和国内的紧张社会关系”。<sup>[2]</sup> 德意志保守党和自由保守党就像中央党一样，他们在认清了俾斯麦的殖民政策、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和蒂尔皮茨的海军政策的国内政治价值之后，就开始学习把帝国主义当作促进其自身利益的手段。就民族自由党而言，1884年以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其纲领的一个要点，1907年以后则几乎成了“选举时的救命稻草”。迈内克是民族自由党中的一员。他曾在1912年写道：“毕竟……正是帝国主义的思想使我们的党……今天在内内心深处团结一致。它不仅使我们的右派和左派，而且使我们所有的同胞都不得不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联合起来。”<sup>[3]</sup> 而事实上，这种生死攸关的需要不久就弥漫开来了。在左派自由党人之中，出自瑙曼和韦伯的“自由帝国主义”的想



法也广泛传播开来。在那些大的利益协会和鼓动性社团中，德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常常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只有社会民主党还能坚持对这种扩张主义政策持原则性批评立场，当然，这种批评有时候会退居对于德国殖民政策的各种实用主义的反对之后。这种德国帝国主义与德意志帝国内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非常密切的关系，上文中已经多次予以强调。总之，由于缺少改革性的抉择，这种帝国主义尤其在德国的权力精英中形成了一种公开的或者潜在的倾向，相信对外政策的成功是反对国内问题的最好手段。关于这一点，比洛夫在他 1913 年出版的《德国政策》一书中以前所未有的坦诚再次直接地称之为德意志帝国政策的基本方针。在海军建设计划的国内政治效应失败之后，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它与“进步人民党”（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一道在 1912 年的帝国议会中形成了最大的议会党团（拥有 397 个议席中的 152 个）。于是，社会民主党与这一年大规模的罢工一起，成为特别显眼的危险征兆。在这种情况下，大工业家和大地主开始聚拢起来，试图建立一个基于爱国政策之上的集结性右派政党联盟，社会政策也因此遭到冻结。这种政治状况加剧了相互对立的政党集团之间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则使得各右翼政党以及与之立场相近的各利益集团的前景特别渺茫。长期担任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秘书长的 H.A. 比克曾在 1910 年底宣称，“战胜并摧毁”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工业界的主要任务，而中央党的左翼领袖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在 1914 年春天也指出，“摧毁社会民主党的巨大力量”是“国内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与此相对，1912 年以后，社会民主党更加寄期望于以它的“同志倾向”（Genosse Trend）在下次的帝国议会选举中进一步增加自己的议席数量。然而，没有哪个地方有什么人物能显而易见地使左派集团变得强劲而充满活力，使他们更愿意承担风险，或者能够向左派集团的敌人强有力地指明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在一个几乎已经无法再统治的体制中，贝特曼·霍尔韦格暧昧性的“对角线政策”（Politik der Diagonale）也并非就是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他的这种政策可以应付帝国的一些问题，但极少能解决这些问题。开始于 1913 年、在 1914 年仍然持续着的经济衰退，使人们更强烈地感觉到，前景再次变得很暗淡。而人们的这种感觉虽然受到了客观困难的影响，但更多的是由于心理上对于危机的不确定感所造成的。德国资本的明显短缺也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对于德国的金融资本而言，特别是在对巴尔干及土耳其的生意方面，由于涉及到大笔长期的资金，这种资本短缺的感觉尤其明显。诚然，如果不考虑少数具有重要性的例外情况，德国金融寡头集团一直倾向于一种小心谨慎的政策，更



喜欢在没有官方影响和统治的地区活动，在关键时刻置身于德国统治精英们的国家机密（Arcana Imperii）之外。因此，这种资本的短缺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战争动因，但它助长了危机意识。在1912年以后，各种明显的、危险的发展似乎在不断增加，它们给传统统治集团造成了一种仿佛被不断地逼入墙角的总体印象。有人曾用英语描述了传统统治集团的处境：They felt cornered（他们感到走投无路）。与此相对应，他们不断准备进行顽强的防御性战斗，意志变得越来越坚定，不甘心放弃已经过时的各种特权（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的爱尔兰“国内统治”问题上，英国的精英们做出同样僵化和不负责任的反应

之前，他们早就一再证明其更具有学习能力）。背靠着墙进行防卫的统治集团，其态度具有特别的高度冒险性，以便守住其处于社会顶端的位置。这里似乎涉及到一种至今仍经常可以看到的普遍的政治行为模式。主观上看，这种行为模式可以通过防御性姿态表现出来，而这种防御性姿态可以在各种信件、日记和文件中得到反映；然而，在客观上，人们却可以看到，这种防御性可以用攻击性的手段甚至公开的冲突来进行到底。这种行为与有目的战争计划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一类绝望般的毫无顾忌的防卫斗争本身是不会畏惧那种极端性的战争冒险的，因为人们并没有充分地预先考虑这种战争冒险的后果。1914年夏天德意志帝国推行战争政策的关键就在于：德意志帝国的统治精英们准备用攻击性的手段来实施他们的防御策略。



图54 1914年威廉二世所言：“我不再知道什么政党，我只知道德国人”



这种自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以来持续不断的战争冒险准备，可以追溯到1864年到1870年期间的冒险政策取得的似乎很辉煌的成功。如今，在关键的时刻，这种战争冒险准备得到了军队高层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集团的支持。他们的看法与权力精英们的“无言的假设”一起，重重地落到了决策的秤盘中，也即将1914年的新巴尔干危机当作一次达到引人注目的对外政策成功的操纵杆，以求对德国国内起到有益的反作用，并因此而踏上向前逃跑的征途。相比之下，他们却不愿信任列强之间正在出现的、但旷日持久的对危机的处理。对德国军方高层而言，他们可能的选择余地似乎非常有限。出于社会政治方面对军官新生力量的可靠性的考虑，军官队伍的扩充受到了阻止；由于信任西线的施利芬计划以及因为军队人数增加仍然不够，他们推迟了在东线的军事部署；而人们期望在西线右翼出现的“坎奈效应”则取决于根据计划所做的战时动员以及迅速的预防性打击。然而，最新的情报显示并确证，到1916年和1917年为止，俄国的军备措施将使沙皇俄国具有明显的优势，并且会将大量的德国兵力牵制于德国东部边境地带。与此同时，德国对法国的优势地位也只能持续到1915年。在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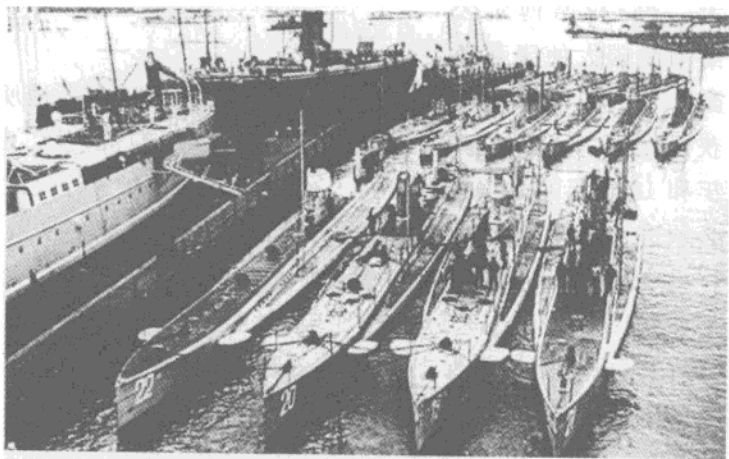


图55 1914年5月停泊在基尔港的德国潜艇

日益紧迫的时间压力下，特别是由于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原因而使德国军备的建设速度似乎已经不可能再度提高的情况下，受到制定的计划和形势发展束缚的德国军方不愿意在没有尝试的情况下就看着机会溜走，而是发出了进行大较量的威胁。如果这种恫吓取得成功，那么德意志帝国就可以赢得一个较长的喘息时间。假如导火线烧完后点着了火药桶，那么，对于军方而言，这一时刻越早越好。较早的决战较为有利，而推迟这种决战绝对没有好处。“军方”曾向宰相指出，“两年以后”，德国的失败将“不可”避免。在这里，军方的考虑和担心就涉及到在传统权力精英之中不断增长的追求冒险政策的准备。这种追求冒险政策的准备属于那些基本上悄然无声的前提之一。



一旦理智的考虑在决策方面不再能够有把握的话，那么，在危机时刻，“决策者们”就会遭到这种追求冒险政策的准备的报应。

我们已经一再地尝试着对这种由于担忧和不利的传统因素引发的多方面综合症进行描述。1914年春天，冯·拉蒂博尔公爵向法国大使康邦透

露，“商业阶层和资产者阶层正想以损害军队和土地所有者阶层为代价来获得优势。战争则提供了重新恢复正常秩序的机会。”由于“1864年、1866年和1870年的战争曾经加强了军队和土地所有者各政党”，因此，现在“有必须进行一场战争，以便将一切带回到旧的轨道上来”。正如巴伐利亚外交官冯·赖兴费尔德在与贝特曼会谈后所记下来的那样，“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某些集团”由于越来越强烈地担心红色危险，期望通过一场战争而完全使“德国国内状况形成保守主义意义上的康复”。与冯·赖兴费尔德一样，普鲁士的老牌保守党人冯·海德布兰德则将战争与“强化家长制的秩序和意识”联系在一起。<sup>[4]</sup>自俾斯麦开始用战争方式解决宪法冲突以后，这种想法就成了保守派政党的一种思想特征。如今，当1914年的危机形势相比较而言被视为对统治集团具有危险性时，这种绝望性的孤注一掷的倾向再次有了市场。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理解贝特曼·霍尔韦格在1918年所做的回顾性表述，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特定意义上的”防御性战争。<sup>[5]</sup>

不过，在这方面，我们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在1914年夏天，帝国宰相本人却担心大战将给国内政治带来其他的影响。这年6月，贝特曼-霍尔韦格还表达了自己的怀疑态度。他指出，“由于社会民主党鼓吹和平，战争的不可忽视的后果可能是大大提升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并因此而推翻一些王位”。他毫不掩饰地认为海德布兰德的关于战争会稳定社会秩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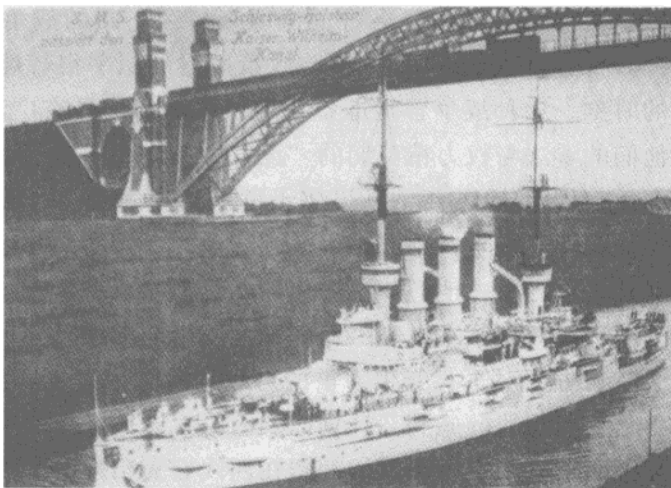


图56 帝国海军“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号战舰通过威廉皇帝运河





期待是“瞎扯”，并且预料，“一场战争，不管其结果如何，将会颠覆现存的一切”。<sup>[6]</sup>然而，这种现实主义的预言却无法决定性地改变他的行动。换言之，在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决策机构网络中，处于德意志帝国官位顶端的贝特曼·霍尔韦格既不具备影响力，也不具备优秀的个人品格，因而无法把他的担忧转化为一种与其看法一致的保守性的和平政策。而1914年七月危机再次表明，这位帝国宰相再也无法用一种明确的协调方式来指导德意志帝国的政策。

由于这种妨碍协调的结构性障碍，任何对于个人责任的指责都会错过实质性的问题，即隐藏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中”的问题。从德国方面看，简单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长期进行战争谋划的结果，而是根源于德国统治阶层“没有能力”面对一个迅速民主化的世界带来的增长的各种问题。于是，带有历史性色彩的倾向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这就是以一种攻击性的防御手段来对国内面临的各种困境做出反应。而这种攻击性的防御政策就是通过外交政策领域，迫不得已的时候也会通过诉诸战争，来平息德国国内的问题，或者获得喘息的机会，以便继续“促进他们自身的狭隘利益，阻止社会民主党”。<sup>[7]</sup>由于受到柏林鼓励的奥匈和塞尔维亚的冲突迅速迫使当时的各个联盟团体体系开始运作，因此，这种“深思熟虑的冒险”失败了。1914年8月的战争表明，这是一种近乎不抱希望的危机策略。这种危机策略不仅从可能性的角度来考虑这场大战，而且有意地进行战争冒险，并且直接地推动了战争的爆发。布尔克哈特曾在1872年预言道：“如果”出于防止政治和社会权力的丢失“这样相同的目的”而需要“另一场战争”，“那么我们就应该再来一场战争”。恩格斯在1887年时也已经远见卓识地预言到这种战争在20世纪的含义。他指出，这场战争“对普鲁士德国而言，不可能是另一场战争，而只会是一场世界大战，而且是一场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规模和激烈程度的世界大战。800到1000万的士兵将会互相残杀，他们会超过任何一次蝗灾，将整个欧洲啃吃得一干二净。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将压缩至三到四年，并且会扩大到整个欧洲大陆；饥谨、瘟疫，由于严峻的困难造成的军队和民众普遍野蛮化；我们在贸易、工业和信贷等方面的人为活动陷于混乱，普遍的破产倒闭；旧的国家及其传统国家智慧出现崩溃，以至于成打的王冠滚落于石子铺成的大街之上而无人问津。”在这种灾难之下，据说俾斯麦在1897年时曾表达出的一个愿望就可以实现了：“他也许还会从自己创作的这件杰作的毁灭亲历他的复仇。”<sup>[8]</sup>

## （二）战争经费筹集和战争经济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进程以及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外交策略，人们已经有大量简明扼要和详细的说明。在这里，我们不谈这些问题，而是要突出强调德国战争经费筹集和战争经济的基本特征。这场战争并非像一些国家所期望的那样，仅是一次长达数个月的决斗性的、快速相互打击。因此，在1914年8月4日之后，这场战争的经费筹集只有通过授权法案才有可能进行。据估计，直接的战争耗费会达到1520亿到1550亿马克，也就是说，每天达到9800万马克到1亿马克。在这些耗费中，大约60%是通过9笔长期借款来实现的，其票面金额为990亿马克，实际为970亿马克。其余的部分是通过国库债券（1918年11月底，其存量为512亿马克）和税收收入实现的。设立在柏林尤利乌斯塔（Juliusurm）的著名的施潘道战争基金（Spandauer Kriegsschatz）是1871年法国赔款剩余款项的持有者，它共计只有20500万马克，也即只够两天战争的开支。<sup>[9]</sup>就像在1870年到1871年的战争那样，德国的基本原则仍然是，其财政重负的主要部分将由未来的战败者来负担。因此，国务秘书黑尔费里希在帝国议会说得很坦率：“我们始终抱着的希望是，在缔结和约时，这场强加于我们的战争带来的账单会交给我们的敌人。”<sup>[10]</sup>英国最终推行的高额战争税主要是由有产者承担的，德国没有引进此类税种，这就意味着它不可避免地要增加由13种独立发行的纸币来实现的流通货币的供应量。而流通货币增加所导致的购买力的过剩，有一部分将通过公债方式加以吸纳。然而，在战争期间，由于这种新设立的流通货币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与经济方面货物的供应状况结合起来，这种政策的相关后果在德国战败之后才显现出来（这里指魏玛共和国初期的严重通货膨胀。译者注）。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德国战后的通货膨胀可以追溯到1914年8月。

180

在德国的战时财政政策中，借贷绝对处于中心地位。德意志帝国政府获得了借贷方面的法律垄断权，其他的资本借贷者都不得从事相关活动。“如果按照德国领导层的意愿去办的话，那么，长期借贷在整个国家债务中所占的比重还要更大一些”（吕特格语）。到1916年3月的第四期战争借贷为止，所筹集到的款项还能够满足为德国政府发行的短期公债提供本息。但是，在此以后，从第五期到第九期借贷的发行看，这种情况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到1918年11月，没有着落的剩余债款还有512亿马克。实际上，这意味着短期公债转变成了长期的国家债务，也就是说，“向众多财富所有者授予了……拥有财富的称号”。而这些财富拥有者之中，大多数人原本在物质上就不富有。在1919年时，德国的实际国家债务为



1 560 亿马克，按计息为 5%算，每年国家财政为此分期偿还的债务额度为 50 亿马克。

高额战争税有诸多的好处。在英国，1917 年以后，80%的由股份公司创造的战争利润都纳了税，高额的战争税至少填补了整个战争费用的 30%。然而，在德国，由于社会权力分配之故，这一税收制度却无法实施。这种战争税会将货币迅速从流通领域抽离出来，并因此而使流通货币与下降中的消费品的生产相适应，其结果会减缓由于生活费用上扬而造成的通货膨胀性的价格上涨。但是，首先，那些战争的获利者就不会将他们从军火合同中挣得的钱财大规模地借给德国政府，以期日后获得高额的利益收入。公共福利方面的政策定位显然不会容忍如此片面性地滥用国民财富。然而，到 1918 年为止，德国的权力精英们不仅成功地坚持了战争借贷政策，而且在 1916 年以前，甚至一直成功地阻止了各项战争利润税的实施。1917 年，这类战争利润税收只有 48 亿马克，1918 年则仅为 25 亿马克。到 1918 年为止，德国战争费用的支出中，总共只有 16%源自各种税收。由于这些做法，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来的是德国财政状况史无前例的崩溃。而在这一财政崩溃中，资产阶级的中等阶层在物质基础上受到了首当其冲的打击。让人惊讶不已的是，在 25 年以后，相似的一幕又再现了。而不管是当时还是早先时候，这两次财政崩溃所造成的失望并没有指向真正的责任者。

德国战争经济的基本特征始终贯穿于四年战争之中，这些特征包括对于进口原料和食品的依赖，劳动力的缺乏以及协约国封锁效率的持续提高等。1913 年，德国急需的硝酸钾（用来制造弹药）、锰和橡胶等，完全依赖进口；90%的棉花、羊毛和铜，65%的皮革，50%的铁矿石等也依靠进口。德国境内有充足的煤炭，而且到最后也能通过从瑞典进口紧缺的铁矿石。然而，除此以外，德国也同样明显急需集中地组织和管理原料的获取。1914 年 8 月，通用电气公司总裁瓦尔特·拉特瑙设法在国防部建立了一个战争原料处，并且在 1915 年 4 月前一直亲自领导该处。此后，直到 1918 年为止，军事技术官僚出身的克特少校一直相当熟练地管理这一部门。在这一部门和其他的一些机构中，逐渐地建立起了限制性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尽管私人资本所有制、私人投资和折旧的决定以及私人定价等明显阻碍着德国的战争努力，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却从来没有损害过私人经济。拉特瑙曾计划扩大控制的范围，但没有得到实现。

在农业经济领域，德意志帝国只是部分地实现了自给自足。例如，在 1913 年，德国就必须进口 20 亿马克的食物。尽管德国 90%的谷物产自国



内，但是，在战争年代里，谷物产量却不断下降，到1917年，收获量已经只有1913年的一半。由于谷物和土豆在减产中受到的影响最大，封锁带来的饥饿就成了协约国的有效武器。从邻国和中立国进口的粮食只有极少量能够顺利到达德国。尽管如此，直到很晚才开始推行强制经济。到1916年为止，地主的反抗阻碍着控制的落实，而最后半心半意地实行的相关措施也没有能够阻止1916~1917年那个令人压抑的“萝卜冬天”的来临（毫无疑问，到1944年底为止，德国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物资供应情况要更好一些，因为供应计划事先就制定好了，被占领地区遭到了有计划的劫掠，物资的储备组织得更好）。

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之下，德国的城镇显然很吃亏。在城镇之中，黑市发展起来。黑市之中过高的价格又只对富有者有利。于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出现了截然性的对立。与此同时，穷人和富人之间不断增长的敌对情绪则特别加剧了城市内部阶级社会的裂痕。

1916年春发生了第一次抗议集会，反对糟糕的供应状况。尽管同年5月就实现了建立战时食品供给局的计划，但是，这一机构所取得的成就却使人们普遍感到失望。在1916~1917年冬天，每人每天还可以获得170克以上的面包配额。此后，由于收成特别坏，个人的配给已经无法得到保障。自1913年以后，儿童的死亡率上升了50%。有关战争期间因饿致死者为70万人的统计数据似乎属于过低的估计。这就是“战斗的祖国”的现实，它并非像容格尔、博伊梅尔堡、措贝尔莱因以及其他许多政治右派作家在日后所描写的那样，是一幅理想主义化的图画。

倘若战时食品供应揭穿了农业利益集团可恶的、不断重复的、浮夸的空洞言辞，亦即鼓吹他们是有能力服务于大众福祉的“粮食生产阶层”，那么，工人组织则提出了另外的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有大



图57 一战中德国食品匮乏的宣传画：“我们不要挨饿！”



约 500 万士兵，此后这一数字逐渐上升到 1 100 万，也就是说，从德国总人口的 7.5% 上升到了 16.5%。然而，这也意味着，劳动力的缺乏不久将取代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所担心的失业。就此而言，战争经济，特别是军火工业的需要，不仅提升了企业主的力量，而且也显著地加强了德国自由工会的影响。各军事指挥官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就宣布在其防区内戒严，接管了各项行政权力。在他们的监督之下，工人和企业主之间才出现了迟疑不决的合作。为了达到提高生产和防止罢工的主要目标，总司令部和企业主的代表们都不得不做出各种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让步，这些让步在总体上对他们的对手有好处，并且最终在工资方面导致一种非正式的自主体制。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国内以及企业政策的发展则加剧了两大对立阵营内部扩散开来的冲突。

在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内部，右派和左派之间的裂痕也不断扩大。右派倾向于无条件地支持德国的战争努力，左派则由于力量越来越强大而能够日益明确地捍卫其反对派的立场。在企业主阵营内部，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和工业家联盟（BdI）在 1914 年合并成了“德国工业战争委员会”（Kriegsausschuß der deutschen Industrie）。然而，在该阵营内部也存在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自己是“家里的主人”，坚持不妥协的立场，另一派则主张做出有限度的妥协。在这里，意识形态方面的“城堡的和平” [城堡的和平（Burgfrieden），原本指中世纪时期贵族间达成的城堡周围不得进行战斗的协议。这里指党派斗争的暂时停息。译者注] 的假象也只是短暂地掩盖了相关问题。德意志帝国的政策缺乏源自于强有力的议会及其政党的那种特别的整合作用，而所谓的“1914 年理念”这点微不足道的混合饮料也无法弥补这种整合作用。因此，在大战期间，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进一步得到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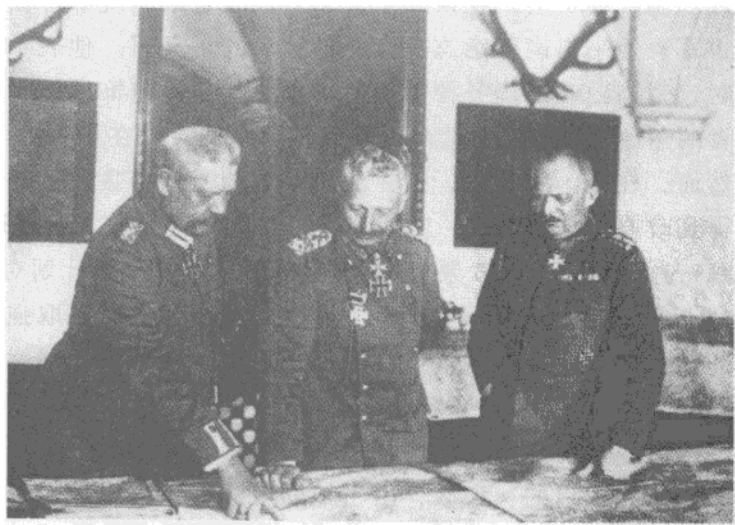


图58 最高统帅部领导。自左至右：保罗·冯·兴登堡、皇帝威廉二世和总司令埃利希·鲁登道夫





强。这一点在疲乏无力的国家战时强制经济中可以看出来。这种无力的强制经济极大地有利于有产者阶级，并且使生活费用成本的上涨超过了实际工资的涨幅。

1916年的“兴登堡纲领”（Hindenburg-Programm）也有这种摇摆不定的让步的特征，它是各种力量对比和双方权力机会压力下的结果。这是第一次根据特定的计划从事总体战的努力。通过破除到那时为止仍很流行的特别性的临时举措，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主持下的第三最高军事统帅部（3. Oberste Heeresleitung，简称 OHL）提出了一种激进的提升战争努力的目标：第一，就像鲁登道夫的得力助手鲍尔上校所指出的那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军需品的生产提高到目前产量的两到三倍。<sup>[1]</sup>军方的各项具体供货要求几乎满足了重工业界的所有愿望。最高军事统帅部根据重工业的需要来充分调整它的各项计划。第二，与生产项目紧密联系在一起还有所谓的“辅助服务组织法”（Hilfsdienstgesetz）。这一法案试图努力将所有的成年公民都列入为战争目标服务的行列之中。鲁登道夫原本还要求普遍的劳动强制（包括妇女在内），将兵役义务扩大到50岁的男子，对青年进行入伍前的教育，关闭大学以及所有与进行战争无关紧要的工厂。这就预示着整个社会的军事化的来临。左派和中间派的政治家们立即表示反对这些涉及广泛的要求。但是工会领袖们尤其反对这些要求。工会要求得到让步，以换取它放弃劳动自由的权利。他们坚持要在所有企业中建立工人委员会以及仲裁和调解委员会。在谈判中，军方代表是最高统帅部铁路处负责人格勒纳将军。他来自南德意志，有一种抽象的正义感。他表示赞成让步。与此同时，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黑尔费里希却毫不掩饰地担当起大工业利益捍卫者的角色，坚决反对让步。格勒纳将军的主张在相关法律草案中获得承认。然而，在帝国议会中，这一法律草案却受到多数议员的批评。最终，尽管得到政府的支持，这一法律草案也是在数度修改之后才被采纳。1916年12月，这一法案以235票对19票获得通过。该法案计划对所有16岁到60岁的人实行强制劳动，对军事工业中的全体劳动者采取强制手段。工作岗位的转换必须向企业仲裁委员会说明理由并得到它的同意。企业仲裁委员会同时承担企业内部的调解工作。尽管政府达到了企业主赢利不受限制的目的，但是，名义工资的增加也不受控制了。如果说重工业企业在生产计划方面达到了目的，那么，由于辅助服务组织法之故，工会成了与企业主平等的力量因素，其价值也会得到显著的提升。然而，帝国议会不仅拒绝以半公决的鼓掌方式通过最高统帅部渴望的这一草案，反而还制定了制度规



章，这种制度规章可以被解释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解决劳动冲突做出预先判决。为此，社会民主党、左翼自由党人和中央党之间第一次结成了多数派。这一多数派后来通过了1917年7月的“和平决议”，它也是所谓的“魏玛联盟” [Weimarer Koalition, 1919年2月，在议会中没有超过半数的社会民主党与中央党和民主党联合组成所谓的“魏玛联盟政府” (Weimarer Koalition Regierung)。译者注] 的早先形式。最高统帅部、德国政府和工人们虽然都对这些结果深感失望，但是，政党领袖和工会活动家们也不得不为他们本来就有限的成果付出高昂的代价。当然，人们可以谈论工人阶级及其组织融入国家的进展，但是，在实际上，而且可以说在感觉上，这只是意味着他们对于“混乱的政治体制”（费尔德曼语）的一种适应，是他们对未曾改变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核心条件的效用的认可，因此，充其量也只是前文提到的“否定性整合”的一种继续而已。与那些渴望获得承认的工会运动的务实活动家们相比，少数持不同意见的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他们的看法不久就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赢得了数以千计的支持者。

新成立的处于格勒纳领导下的战争局实际上排挤了国防部，然而却陷入了持续扯皮拉筋的权能冲突纠纷之中。此外，早在1916~1917年冬天，原料、煤炭和运输危机的发生已经证明，“兴登堡纲领”难以实现。“辅助服务组织法”则不仅无助于协调进行整体战，反而加剧了工会和企业主之间的相互矛盾。如果说军火工业领域的工资在四年内上涨了约150%，那么，与工厂主的利润相比，这几乎就是微不足道的增加。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国家作为唯一的买主，愿意支付任何价钱。加之粮食问题和前线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国内各种状况的不稳定性也就增加了。

在这方面，1917年的罢工就是一种极其明显的证据。在这一年，罢工次数由1916年的240次跳跃性地猛增到562次，参加罢工人数达到1500万。这年4月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罢工最初是由俄国革命以及减少面包定量所引起的。尽管罢工遭到了军队的镇压，但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得到彰显，在莱比锡尤其如此。它公开表示反对德国的吞并目标和三级选举制。罢工浪潮一直延续到夏天。由于上西里西亚和科隆的企业主坚持传统的极端敌视工会的立场，这两个地区的罢工尤其激烈。此后，社会和政治上的两极分化迅速发展。最高统帅部、企业主和右翼政党大声疾呼，要求进行毫不妥协的镇压政策，而这经常得到百分之百的执行。另一方面，左派则得到广泛的支持，这一点在五金工人联合会 (Metallarbeiterverband) 中尤其突出。右翼工会干部感到，要保持对其成员情绪和行为的控制已经越来越困难，各种





“无管束的”罢工就是明证。如果他们不愿看到失去各种决定性的影响力，他们就必须逐渐适应这种激进化。1918年1月的大规模罢工把罢工浪潮推到了一个新的顶点。这次发生于柏林的罢工迅速汇集了50万人，在帝国范围内的罢工工人则达到了100万以上，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出于自发性的抗议。在1918年这一年，到十一月革命为止，还有499次罢工。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格勒纳此人并不赞成调和，而是主张监督战争利润以及基于战争利润的税收，即便是这样，他也于1917年夏天被最高统帅部和重工业界从他的位置上撵了下来。像他这样打算进行某种程度的调和的人，几乎没有谁能再继续呆在重要的机构之中。随着战争的最后一年的到来，一方面，由于吞并敌方领土的狂热和“祖国党”的躁动，德国的社会和政治对立进一步加剧了；另一方面，对战争的厌倦、饥饿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也变得越来越无法调和了。

### （三）战争目标和阶级社会

德国社会的根本性冲突非常清楚地揭示了它的阶级特征，在这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种阶级社会的对立已经非同寻常地加剧了。如果我们不考虑到这种社会结构层面以及宪法政治的层面，那就不可能领会德意志帝国的战争政策的中心点，也就是说，不可能理解德国战争目标的意义和作用。关于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目标，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人们已经着墨很多，也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在此，我们无须涉及诸如战争敌对双方竞相提高自己的战争目标问题，或者双方都陷入一种要求和反要求的灾难性的纠缠问题，或者由于特殊形势下缺乏明确的道义，任何一方都无权因某事而指责另一方的问题。我们在此感兴趣的是德意志帝国社会帝国主义的连续性，甚至是它的强化问题。现在再也不能严肃地否认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从所谓的1914年“九月纲领”中所包含的德国战争目标的狂妄计划，直到1918年秋天这种幻想性计划的最后延续，都总是非常清楚地、甚至有些露骨地与各种直接获利的期望联系在一起，亦即具有经济的、战略的特点，或者与移民、少数民族政策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是否涉及到法属洛林的隆维-布里埃（Longwy-Briey）附近的铁矿、比利时的港口、俄国的“谷仓”和波兰的“边境地带”（Grenzstreifen），那些鼓吹进行正式的吞并或者进行非正式的统治的人们，都对这种实际性的、巨大的物质利益毫不隐讳。然而，如果将德国的战争目标政策全部归结到这些利益之上，并且根据时髦的经济决定论，仅仅认为好像只是为了满足重工业扩张集团对利润的追逐，或者认为其主要动机只是为了确保所谓的战略前沿地带，那就





错了。这样的动机也决不仅仅限于在许多政治家的霸权梦想和一些泛德意志主义教授的强权思想之中可以找到。更确切地说，从备感振奋快慰的战争开始到幻想破灭的战争结束，战争目标成了一种期望所在，那就是通过对外政策方面的成功来转移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改革要求，能够再次使传统的统治关系以及特权化的权力精英们合法化。数十年来，这种危机战略已经构成了柏林推行的政策中的一种固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而战争形势则为这种危机战略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可能性。

这些动机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极其丰富的各种备忘录、往来通信和各类呈文之中，简言之，贯穿于所有的文献之中。这些文献由于费舍尔的《争雄世界》引起争论而已经为大家所熟知。它不仅合乎德意志帝国的政策，而且也与“德意志帝国各邦的战争目标政策”相符合。<sup>[12]</sup>在德意志帝国各邦中，各种离奇的方案和荒诞而落伍于时代的想法湮没了一切与现实的接触，拯救旧秩序及其代表者的努力被放到了优先的位置。有关波罗的海沿岸的新德意志附属邦（这里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译者注）问题，有关阿尔萨斯-洛林和比利时北部佛兰德人地区给普鲁士、立陶宛给萨克森、符登堡人出任波兰国王的分配计划等，这些方案都使人们沉浸于没完没了的补偿讨论和漫无边际的幻想之中。数年来，在内阁和各邦诸侯的顾问们的热烈探讨之中，没有什么不可以谈的事。可以肯定，一种完全的晚期封建主义的王朝野心在这方面起着作用，同样肯定的是，对预料之中的普鲁士的力量增长的警惕，也是一种经常性的推动力。但是，在这里，从采纳这些考虑和手段的真正意义看，主要还是出于稳定已经过时的贵族君主制传统社会的需要。很显然，在这种古怪组合的繁华装饰（这是用委婉的方式来描写制定计划时的病态性的狂乱）的背后，捍卫现状是最主要的考虑。正因为如此，有关德意志帝国战争目标的讨论不仅显示了它的狂妄成性和对世界强国野心的渴望追求，以及它在毫无节制的雄辩和脱离现实性方面令人震惊的程度，而且也表明了它活动空间的狭隘性，表明不愿直接面对国内深刻变化的统治集团所能做出的选择是有限的。由于统治集团看到自己所处地位的致命性危险在不断增加，出于对广大民众公开的或模糊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要求的恐惧，他们加快了对于安全可靠的路线的选择，以便能够通过伟大的、极具幻想性的对外扩张的成功，超越他们的时代，使自己得到拯救。关于这一点，贝特曼·霍尔韦格在1914年时就已经指出，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更是在1887年时就已经做了预测。<sup>[13]</sup>因此，在这些战争目标中，存在一种必然性的发展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像当时的权力分配状况那样，日



耳曼人的事务是持续性的。也正因为如此，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不只是这种具有攻击性的狂亡野心，还有统治集团的感觉。就当时而言，正如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帝国主义扩张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集团感觉到迫切需要通过对外政策方面的手段来保卫他们的地位。

德国战争目标政策的功能性作用是难以被高估的。毫无疑问，战争目标政策可以被视为德国的权力精英们进行整合的手段，就此而言，战争目标的规划过度恰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德意志帝国社会已经出现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深度裂痕。不过，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可忽视的一点在于，1918 年春天以后，在具体的扩张利益和扩张方案的定义方面，有关的战争目标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质的飞跃。由于这样一个缘故，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开始了。<sup>[14]</sup>

在俄国 1917 年革命之后，德国第三最高统帅部成功地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将苏维埃政府置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强迫和约”的约束之下（1918 年 3 月 3 日）。由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首次为德国政府提供了将战争目标计划转变实践的机会，此后，在长达数个月的时间里，德国的战争目标计划转变成了各种具体的决定。各种所作所为最清楚地表明了作为胜利者的德国强迫其敌人接受真正的迦太基式的和平条件，它们包括使俄国的领土残缺不全（例如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芬兰和波罗的海诸国分离独立），强加经济方面的要求，试图在一个过渡时期之后将俄国的乌拉尔山以西地区置于德国的统治之下等。1914 年 12 月泛德意志协会的一份备忘录曾要求俄国退回彼得大帝时的疆界。不过，这份备忘录当时被禁止印刷。然而，现在由于鲁登道夫的介入，这份备忘录已经可以大批量出版和广泛传播。而它的大部分要求也得到了比预期更多的满足。1918 年 3 月以后，西线战争呈现胶着状态，巴尔干战线则露出了崩溃的迹象。与此同时，“在德国领导层中普遍”出现了支持“控制整个俄国，使这一庞大帝国长期依附于德国”的设想。事实上，这种“自然发展”是和对于 1914 年以前的沙皇俄国的过高估计“截然相反”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为实现这种“宏伟设计”创造了某些前提条件。1918 年 8 月 3 日的德俄补充条约则间接地加强了德国对于没有被占领的俄国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德国军队保持着从纳尔瓦（Narva）经过普雷斯考（Pleskau）[即今俄国境内的普斯科夫（Pskow）。译者注]、奥尔沙（Orscha）、莫吉廖夫（Mogilew）直到罗斯托夫的战线。他们控制着乌克兰，先遣部队占领着克里米亚并且一直到达高加索山脉的南部地区。德国在东方的“大空间”已经明确形成了。就此



而言，由于巨大的战争目标看上去最终将陆续实现，德国在1918年秋天的崩溃似乎较为突然和令人震惊。东部的“前沿地带”就像幽灵一样消失了。然而，在若干年之后，当人们宣传希特勒关于“在苏联的废墟之上建立东方帝国”之时，它就绝不仅仅涉及到一位空想家幻觉性的幻景，而是存在足够的“早在1918年时就已经实现了的实际性连接点”。尽管只是昙花一现，但是“这一德意志东方帝国已经实现过一次”。<sup>[15]</sup>

除了国内政治考虑以及急需直接的、即使只是最低限度需要的谷物和原材料的输入的影响外，德国方面的决定还进一步受到新的动机的影响。而这些新的动机也表明我们所说的战争目标出现质的变化是正确的。

第一，在协约国进行封锁之后，德国几乎在长达4年的时间中与世界市场隔绝开来，德国的贸易关系遭到摧毁。1916年春天，当柏林得知协约国准备在战后对世界进行经济上的瓜分之后，人们开始普遍接受自给自足的想法。这种想法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中欧”计划。于是，向具有巨大粮食和土地资源潜力的俄国扩张就似乎很有必要，它几乎成了德国取得成功的唯一可能性。特别是在沙皇专制制度崩溃之后，德国的那些自给自足看法的鼓吹者就可以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了。

第二，到那时为止，在具有决定权的领导集团中也持有一种看法，那就是，这次世界大战只是“未来大规模战争”的开端。在未来的大规模战争中，各世界列强将通过无休止的争夺来不断重新确定它们的统治区域。这种敌对性国际体系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种，它必然要求很大范围的战略安全。于是，整个俄国就好像成了一种可供支配的破产者的财产。

第三，在新获得的“东方土地”上，“泛德意志协会”、“东马克联合会”和鲁登道夫等都肆无忌惮地迁出斯拉夫人，然后以补充的方式对在俄国的德意志移民进行聚集在一起的“种族性的土地归并”。早在1915年12月，作为第三最高统帅部的实际首脑，鲁登道夫就曾经这样评价俄国：“在这里，我们要为那些在继续向东方扩张的斗争必不可少的人们取得种植的场所。这种向东方的继续扩张是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的。”<sup>[16]</sup>从这一谈话中可以看出，就种族主义的日耳曼化政策而言，早在1918年，相关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这种轻松毫不费力加以拓展的动机分析因此表明，在这一时期，民族社会主义的纲领和实践的前提条件已经形成或者已经得到创立。

除了战争目标政策外，其他的整合性思想也至少在短时期内产生了重要作用。1914年8月宣布的“城堡的和平”使德国的国内政治斗争平息下来。人们呼唤一个虚构的民族共同体，以便确保这一“战斗中的民族”的同心同



德。在德国的中等市民阶层中，人们仍然崇尚无冲突的社会，但是，在社会民主党这些“没有祖国的伙计”中间，“城堡的和平”这一惯用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疑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显然在1914年8月4日就已经被接纳为全民族的成员了。诚然，到1916年为止，这种大话编织出的谎言还是破产了。

德国学术界对于这种“1914年理念”坚持得更长一些。如果说他们已经没有了革命的传统，那么他们渴望至少有一种反对英国人的小商贩意识、高卢人的浅薄和斯拉夫人的野蛮的防卫意识。这种“理念”与战前时期各种可恶的恐怖症紧密相关，与对英国的仇恨、与反犹主义、与德国化的狂妄自大、与浪漫化的过于强调德意志特点等有关。一些著名的学者也用脏话漫骂。与西欧在精神和政治文化方面进行分离再次得到了确认。与西欧的连结纽带遭到了有意识的剪断，狂妄的自以为是使德国人的生活方式得到吹捧，这种生活方式的品质被视为可以治愈世界。此外，新旧两大教会的战争神学也流入了这种有毒的汤汁。它充斥于大量的小册子、战争谈话和战地邮件等之中。在这方面，总体战的思想也以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形式扩散开来。在面对敌人联盟的状况下，总动员和战争进程不仅是平衡人数众多的下层民众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且提供了一种解决德国阶级社会问题的虚假方案。这种极端美化的“战壕共同体”（Schützengrängengemeinschaft）被赋予了诸多的好处，而这些好处在和平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多数人不能享有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不正常期待之中，这种可以在前线造成大批死亡的不正常社会关系被描写成了理想社会的典范。在这一社会中，权威、守纪和落伍于时代的共同体生活占据了支配地位。在现代世界面前，“武装的民族”的思想逃入了一种带有军事生活和社会军事化的特征的社会浪漫主义之中。阶级的对立则通过一种明显以等级制组织起来的战争国家的指挥结构来予以消除。在这一点上，到1933年为止，“全民国家”思想的右翼保守派代表人物，如弗赖尔、容格尔、福斯特霍夫等，还有其他许多人，就如民族社会主义本身一样，都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承接性关系。<sup>[17]</sup>

1918年，许多从事宣传的御用文人因德国的失败而受到突然性的震惊，只有少数人保持着冷静。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气候证明了这一点。卡尔·克劳斯当时带着尖锐的嘲讽口吻评价道：“我经常想，就这个中部强国的所有诗界和文学界无赖而言，当时他们有些是出于头脑发昏的蠢行，有些是出于希望通过赞美他人的英雄式死亡来延长他们自己生命的投机目的，胡乱



写作。现在，当人们逐字逐句地刊出这些劣作时，想不出有什么比这种做法使他们受到更大的折磨了。”然而，如果人们能记住，“他们用这种方法逼迫那些没有幸运地把他们的精神错乱转变为文学的人都走上了不归之路”，那么，这也许会起到有益的作用。“我的建议是，在缔结和约之后，抓捕那些战争文人，在因战争致残者面前对之施以鞭笞，但这一点至今还没有实现……”<sup>[18]</sup>

#### （四）最后一次“上层革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社会二重性的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看出来：例如，在工业企业主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方面；在“中等阶层”与上层社会之间不断加大的社会差距以及“中等阶层”与无产阶级日益拉近的社会距离方面；在社会各阶级与国家机器的关系方面；在各类罢工和各种镇压措施方面，等等，都是如此。同样，在1916年以后，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也加强了。3月，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一个少数派正式脱离该党。自从1914年8月第一次有关战争贷款的辩论以后，这一少数派就持续强化自己的看法。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公开分裂的来临。1917年1月，主要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撰写的“国际集团”（Gruppe Internationale）的“斯巴达克信件”（Spartakusbriefe）开始出现。同年，这一集团中产生了“斯巴达克同盟”。这一同盟构成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翼。1917年4月，还是在哥达这个地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了。有组织的德国工人阶级的分裂也因此确定下来。

另一方面，1916年8月委任的在鲁登道夫和兴登堡领导下的第三最高统帅部则支持德国国内政策的右倾化发展趋势。从一开始，鲁登道夫就认为，最高统帅部的“独裁”是“极有可能的”。而他的亲信鲍尔在同年秋天也对此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在同年12月指出，“唯一的出路必然是军事独裁”，鲁登道夫“在名义上属于最高首长”，只有“绝对的军事独裁”才能对形势有所帮助。1917年7月贝特曼·霍尔韦格的下台表明，虽然最高统帅部并没有有意识地实行独裁，但是在实际上已经在某些领域中形成了独裁。据称，鲁登道夫被提议出任帝国宰相。皇帝威廉二世是名义上的最高军事统帅。至迟在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被迫辞职之后，这位皇帝就“通过他自己的将军们变成了一种影子皇帝”。<sup>[19]</sup>诚然，在对内政策方面，最高统帅部的“独裁”并不能总是充分地贯彻它的各项意志（例如“兴登堡纲领”），而且在1918年9月底以后，它也丧失了它的民意基础，但是，在此之前，它仍然拥有充分的行使权力的机会，并且使人们意识到，在德意志





帝国的权力结构中——有些已经完全退化——最高统帅部的地位仍然可以被视为独裁者。这种发展并不缺乏某种程度的逻辑性。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这一大普鲁士的德意志帝国的顶端，权力真空就再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填补。皇帝没有能力填补这一权力真空，议会和各政党被阻止参与到这一权力真空中来，而民间力量则表明其无法胜任这种责任要求。由于军队才使得 1870~1871 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有了可能，并且在此以后一直顽强地捍卫它的特殊地位，此外，在 1914 年以后直到 1918 年秋天为止，它的那些拥有权力的竞争对手们



图59 鲁登道夫

也几乎没有能力挑战它的这种地位，有鉴于此，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时刻，那种推动德意志帝国出现的基本法则就再次显露出来。军国主义露出了它的真正嘴脸。诚如毛奇的军队确定了德意志帝国的开端一样，鲁登道夫的“军事独裁”则揭开了德意志帝国最后阶段的序幕。这一圆圈已经开始合上。

1917 年夏天出现的“德意志祖国党”是第三最高统帅部的支持者。而“德意志祖国党”也同样受到了最高统帅部的支持。出于同样的原因，最高统帅部在捍卫三级选举权问题上也对普鲁士邦议会给予了支持。在 1917 年 7 月帝国议会以多数支持通过“和平决议”以后，东普鲁士农业协会总裁沃尔夫冈·卡普 [沃尔夫冈·卡普 (Wolfgang Kapp, 1858~1922 年)，德国政治家，1906~1916 年担任东普鲁士农业协会总裁，1917 年成立“德意志祖国党”，1920 年 3 月发动兵变。译者注] 以及军事上已经失败的冯·蒂尔皮茨海军上将，与各利益集团以及鼓动性团体一起，共同创立了“德意志祖国党”，以此作为激发民族主义的集结平台。这是带有早期法西斯主义特征的帝国主义的群众性运动。在 9 月 3 日柯尼斯堡的成立大会上，卡普和蒂尔皮茨当选为第一主席和第二主席，理事会被赋予了广泛而充分的各种权力。



一场声势浩大的鼓动性征募会员的活动随之发动起来。到1918年7月为止，据说“德意志帝国党”已经拥有125万个人会员和2536个地方性团体的社团会员。这一组织所宣称的目标表明，它制定的计划野心巨大，再次超越迄今为止所有的战争目标，试图在东部和西部都进行吞并。根据这一计划，要控制荷兰和比利时的沿海地区；建立中部非洲殖民帝国；通过向俄国和土耳其

其进行扩张，“一直达到太平洋和印度的门户”。〔20〕

这样一个将右翼力量集结起来的政党，曾经是1913年努力的目标，而且在1879年、1887年和1897年的集结政策中已经预先设定了它的轮廓，而如今，它终于变成了现实。重



图60 西里西亚纺织工

工业（以施廷纳斯、基尔多夫、胡根贝格、罗伊特格、罗希林等人为代表）、电气、化学和机械制造工业（以卡尔·杜伊斯贝格、维尔纳·冯·西门子、恩斯特·冯·波尔锡西等人为代表）、汉萨同盟的大型贸易和船舶制造商、工业家联盟、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德意志帝国中等阶层协会和农民联合会、“泛德意志协会”以及其他的沙文主义社团组织等，构成了“祖国党”的广泛的公共机构的、然而却是病态性的基础。这一政党既不缺少金钱，也不缺乏宣传技巧。其宣传技巧甚至可以给戈培尔〔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 1897~1945年），德国纳粹政治家。1933年3月起担任国民宣传教育部长和德国文化协会主席。译者注〕以启示。它充分利用了其成员与国家官员以及军队之间的特殊关系。在军队之中，由鲁登道夫引入的“爱国课程”（Vaterländische Unterricht）通过与法律相抵触的、然而却已经悄悄地得到认可的“祖国党”的鼓动宣传而得到了补充。群众性的意见表达则用来动员那些对于“将战争坚持到底”以及有关战争目标等口号没有抵抗力的公众。就像早先持保留态度的迈内克在1918年9月所写的那样，“这个由于错误领会的利益利己主义和错误领会的理想主义衍生出的怪物是德国政党史



上最大的骗子之一，它在以吞并为目的的民族主义中找到了一种最好的方式，用来对内对外坚定不移地实施一种严格的威权政策。”<sup>[21]</sup> 在一种最后的狂怒、虽然表现出满怀胜利信心却已经显出绝望的抵抗中，通过“祖国党”联合起来的各种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中，仍尝试着做不可能的事情，那就是：保存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所有专制结构，同时在对外方面强行取得胜利和平。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只是通向德意志世界帝国的第一步。

虽然这种傲慢延续还不到一年，然而，这里已经从组织上和宣传造势上勾勒出了日后德国激进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与“祖国党”有关。安东尼·德莱克斯勒是“祖国党”的负责人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创立者，他成了这种联系的最合适的象征。当迈内克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时，他清楚地看到，“泛德意志协会和祖国党正是希特勒崛起的开端。”<sup>[22]</sup>

“祖国党”短命的历史在1918年春天达到灾难性的顶点。与此同时，4月底以后，德国在西线的大规模攻势已经呈现出失败的迹象。到7月中旬，德国方面代号为“米夏埃尔”的攻势崩溃，而协约国则在广阔的战线上发起了反攻。8月14日，位于斯帕大本营的最高统帅部首次承认，尽管德国在东线取得进展，现在的形势已经变得“毫无希望”。到9月29日，由于“德国军队已经……完了”，并且“彻底的失败似乎已经不可避免”，最高统帅部遂提出了停火的要求。突然间，最高统帅部开始注意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纲领，而事实上，直到10月5日为止，它也不甚了解威尔逊的十四点。最高统帅部于是最后通牒似地要求帝国宰相“一刻也不能耽搁”地发出他们的停火建议。9月30日，保守党接到了这一消息，10月2日，其他政党也接到了这一消息。许多人从战争目标的振奋激情中惊醒过来，跌入了深度的失望之中，例如，施特雷泽曼就忍受了一种神经崩溃的痛苦。贝特曼的同事库尔特·雷茨勒在10月1日写道：“长达百年的奴役就要到来了。世界梦想永远终结了。所有的傲慢都不复存在了。”<sup>[23]</sup> 这一切虽然说得过早，但是却反映了人们的看法的转变。

1917年以后，在最高统帅部中就已经在谈论“背后一刀”（Dolchstoß），即国内的左派力量从背后伤害前线的军队。1918年6月，也即在十一月革命爆发前很长时间，有关“背后一刀”的传说就已经被精心编造出来了。10月1日，鲁登道夫曾玩世不恭地解释道：政治家必须“现在就喝掉使我们陷于被动地位的汤汁”。“从根本上讲”，正是他们“使我们到了





图61 《南德意志月刊》1924年4月的封面。上面写着“背后一刀”

这个地步”。格勒纳在总结他得出的印象时，曾这样评论道：“军队领导层”从此以后的立场是，“拒绝对停火以及日后的其他进展承担责任”。而事实是，帝国的政治领导层必须在表面上正当地参与进来，承担起这样一个与上述过于仓促的行动相关的污点。与此同时，“泛德意志协会”主席海因里希·克拉斯则提出了一个孕育着灾难的办法。他号召发动“毫无顾忌的反对犹太人的斗争”，其目的是，“必须以此来转移我

们善良的、误入歧途的人民那种只是极度合理的不满。”<sup>[24]</sup>

当军方可耻地逃避迄今为止一直要承担的责任时，德国的政治状况出现了突然性的变化。作为一种逃避策略，最高统帅部表达了推动帝国政府议会化的愿望，以便使帝国议会中的多数派政党能够担负起战争的失败和战后问题的责任。海军上将冯·欣策是新近才上任的外交国务秘书，与最高统帅部有着最紧密的接触。他将这种宪法的改动描写为最后的“上层革命”，是“预防下层革命的”唯一的“手段”。他指出，如果最高统帅“要出风头，那么它就必须提供一种过渡，使得从胜利到失败的转变能够忍受……这应该就是它的镇痛效果”。因此，像格勒纳这样一位深谙相关情况的专家，也直截了当地称之为“欣策实施的议会化”。当然，在这样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背后还有其他的打算，那就是，尽可能地保留王权和武装力量这样一些保守势力的堡垒，防止颠覆制度的活动，同时又要为协约国所接受。鲁登道夫在



10月7日也曾表达了这样的想法：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就是能够重新骑马策鞭，依照旧的办法加以统治。<sup>[25]</sup>

与上述看法不同的是，新的研究认为，最高统帅部的这种策略与帝国议会的强大动议权恰好是一致的。可是，根据这种观点，似乎要夸张地把魏玛共和国时期议会制的开端尽可能地向前追溯。1918年春天，出于对鲁登道夫的敬重和西线攻势的考虑，帝国议会全体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计划推迟到秋天举行会议，而各党派委员会则推迟两个月再举行会议。然而，围绕议会化进行的斗争却并不特别令人注目。到9月底，尽管帝国宰相冯·赫特林这块第三最高统帅部的挡箭牌也被各政党的政治家们赶下了台，但是，到这时为止，欣策——在此，欣策的名字被当作缩写的方式来使用——要求议会化的压力也已经开始生效。然而，所有可以纳入考虑的多数派政党的宰相候选人都拒绝接任宰相职位。如果再考虑到这时极端不利的情势，那么，这样的状况还可以被视为一种自信的议会化运动的征兆吗？

在此期间被任命为宰相的马克斯·冯·巴登亲王鲜为人知。他始终不赞成1917年7月的“和平决议”，甚至在1918年春天时还拒绝接受这一决议。相反，他要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军事方面取得的成果，抵制议会制的政府改革。然而，那些熟练操控局势的人们把他推上了宰相的宝座，而这一职位自1871年以来至少还是有人想得到的，如今却无人问津。然而，诚如已经所说的那样，只有当“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批准’了他的竞选”<sup>[26]</sup>之后，他才能接受这一职位。马克斯·冯·巴登不带色彩而又本意良好、



图62 马克斯·冯·巴登



并且看上去对军事独裁绝对不会有危险。人们也许会问，如果在9月29日以后已经瓦解的军事独裁拒绝这样一位候选人，那么，帝国议会的动议权又会是什么呢？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正是按照这种方式于10月3日被任命为帝国宰相。当天晚上他签署了最高统帅部起草的给各协约国的电报。后来，这位宰相评论道：“这一步骤简直就是投降”。然而，他在愤怒的结语中提出的“最高统帅部要对这一步骤以及这一步骤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却证明只是一种政治的梦想而已。虽然已经有这样顽强的、具有影响力的议会党团，而且人们已经适应了这种议会党团，但是，由帝国议会自己来独立地实现议会化进程，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阿图尔·罗森贝格也曾指出：“德意志帝国的议会制不是由帝国议会争取来的，而是鲁登道夫安排的结果。这类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中是无先例可寻的。”<sup>[27]</sup>

1918年10月28日（即鲁登道夫辞职两天之后）的“十月改革”（Oktoberreform），除了其他方面之外，还引入了议会君主制的法律。但是，这根本不可能涉及权力结构的明确改变，更谈不上什么议会制政府的可靠基础。海军领导层就完全绕开了新政府。10月29日，它下令远洋舰队起锚出海。这一举动成了引发革命的最后导火线。在同一天，皇帝威廉二世逃进了



图63 1918年11月9日的柏林示威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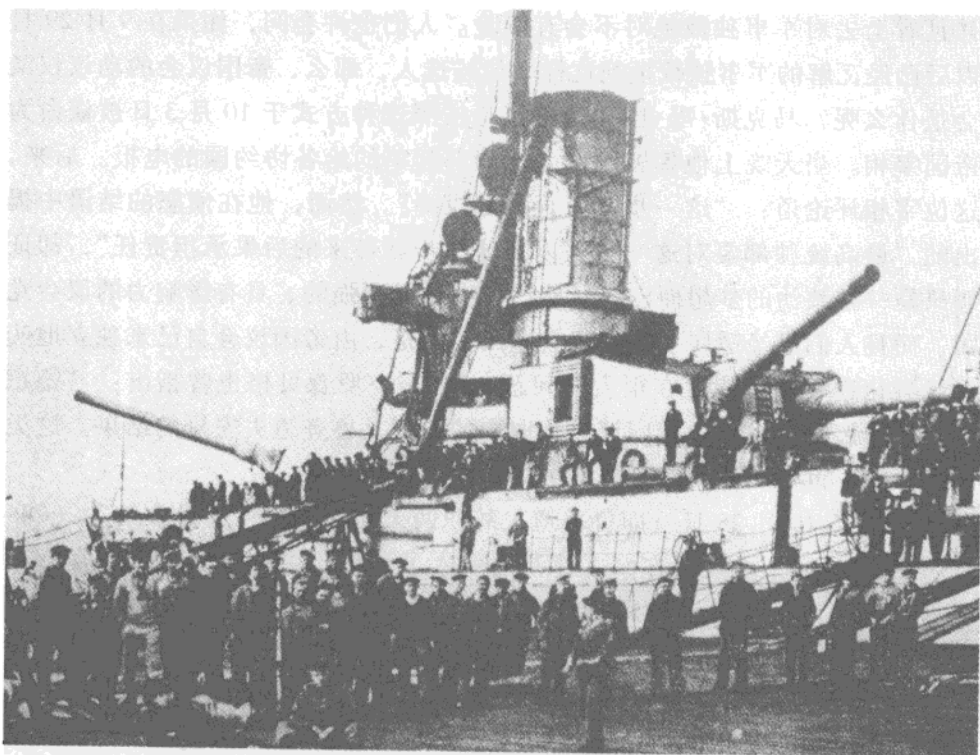


图64 1918年11月初威廉港中的舰队哗变

大本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又回到了普鲁士军事国家的核心位置上。旧政权的各种力量与新秩序之间的较量并非很果断。相反，种种迹象表明，在10月底以后，可能会出现政变形式的保守性反攻。缪尔维克（Mürwik）海军学校校长曾以一种不带等级色彩的公正口吻指出，“如果有人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并且必须退场，而他却就像我们所做的那样，给其他在这危急关头来帮忙的人不停地制造麻烦，这实在不是君子所为，更谈不上什么高尚。我们现在已经因经营不善而破产。”一切表明，改革已经走到了危险的地步；议会君主制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值得利用的威尔逊的诓骗，而可能会变成现实；回归现状之路似乎要被阻断。在这种时刻，不经过斗争就放弃王权和军队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sup>[28]</sup>然而，议会君主制在德国仅仅实行了3天，革命就先于各种反动行动到来了。水兵们反对成为军事上毫无意义的炫耀性进攻的牺牲品，反对仅仅为了取悦于海军领导层的自杀精神而策划的将造成大规模伤亡的绝望性行为，亦即宁愿冒险毁掉所有战舰，也不愿它们被俘获。水兵们的抵制引发了10月28日到11月3日的公开起义。这一起义很快从基尔蔓延到其他城市。11月7日，慕尼黑爆发革命，



图65 漫画：废黜威廉二世

11月9日，柏林也爆发革命。皇帝和皇储放弃了皇位，匆忙逃亡他乡。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普·沙伊德曼宣布建立共和国。11月10日，由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各出三人组成的革命的“人民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接管了政府事务。这一委员会承认了来自多数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非正式的最高政治地位的合法性。不过，他并非马克斯·冯·巴登的直接继承者。开始于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的历史甚至没有满48年就结束了。

#### （五）德国革命：社会民主还是保守性的共和？

什么使得德意志帝国的灭亡无可挽回？是一场叛乱呢，还是一场革命？在1918年10月底到1919年1月底之间，当所有的德国王公贵族都已经被推翻，而相对失控的形势已经结束，并且新的共和国的路线图已经勾勒出来时，德国的历史发展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可选择性呢？德国经历了一次尽管时间很短但确实存在的革命，对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1918年11月到12月间，长期积聚下来的各种结构性问题打碎了已经脆化的栅栏，旧的统治制度被扫除得一干二净，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把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社会力量状况的重新配置与全新的制度秩序一道，似乎正在出现。11月11日，左派自由党的时政评论员特奥多尔·沃尔夫曾在“柏林日报”宣称，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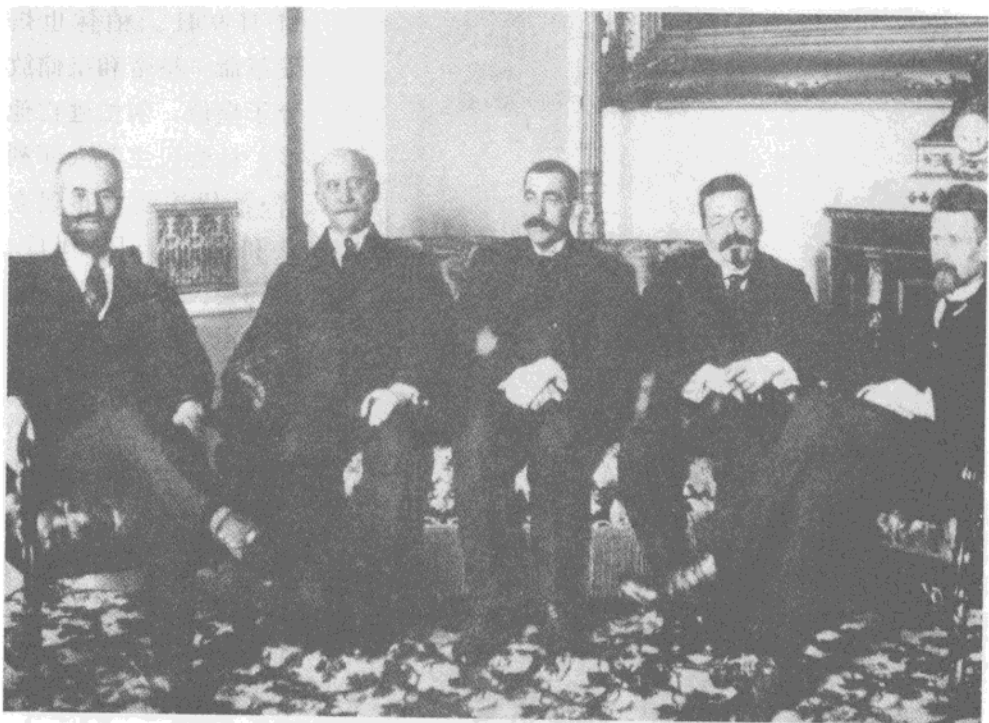


图66 1919年初的人民代表委员会。自左至右为：奥托·兰茨贝格、菲利普·沙伊德曼、古斯塔夫·诺斯克、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鲁道夫·威塞尔

次暴力变革是“所有革命中最伟大的革命”，“因为人们从未在一次的冲击中就将这样一个坚固的、由牢固的围墙护绕着的堡垒攻下。”对时事问题有着敏锐洞察力的学者恩斯特·特罗尔奇也写道：“就像英国、美国和法国一样，德国今天有了她成功的革命”，不过，这次革命发生“在普遍的军事、经济和精神崩溃的最不幸的时刻”。<sup>[29]</sup> 饥饿、失败和士兵起义并非导致革命的仅有原因。更确切地讲，深刻的社会经济矛盾，加上长期掩盖着的、由于战争期间独裁的丧失而大大加剧的、归根结底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基础危机，造就了一种渴望变动的潜能。而这种对于变动的渴望最终导致了革命的爆发。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多数观点仍然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还存在可选择性，即一边是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专政，一边是魏玛的议会制共和国。而最近的讨论与阿图尔·罗森贝格等一类的持批评态度的外行有关，并且一律以一种“拥有牢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为标准，而不是设立在魏玛共和国的基础之上。简言之，



这种讨论的结果就是，德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只有保守性的共和与社会民主两种抉择。而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在当时“至多”也只是“一种虚幻的、并不现实的”可能性。<sup>[30]</sup>各个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在这两种观点之中都占有突出地位。毫无疑问，他们都是自发性的，是以1905~1907年以及1917~1918年时期的俄国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群众性抗议运动的“临时性的斗争和管理机构”。<sup>[31]</sup>这些委员会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努力的目标，而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也是他们的亚文化中的常用语言。他们打算从这种亚文化中突围出来。然而，到1919年春天为止，绝大多数委员会却持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他们认为这些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只是临时性的过渡体制，其中只有个别的因素可以引入议会制共和国的新制度之中。因此，在俄国，列宁能够在1917年11月对25万名党员以及第二届全俄苏维埃大会中的布尔什维克绝对多数派（60%）表现出信心，在11月底基于普选制之上的制宪议会选举中获得了900万张选票（占25%），赢得了左派社会革命者的合作。与此相比，在德国，“斯巴达克”，也即德国共产党，在1919年1月时却只有千把党员，充其量也只对柏林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大会2.5%的代表拥有影响力。在1920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德国共产党仅得到了2.1%的选票。根据阿图尔·罗森贝格估计，如果德国共产党参加1919年1月的国民大会选举，那么，它可能只获得1%的选票。这时，大多数的左派都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活动。而独立社会民主党只是好斗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激进民主党人的聚集地而已。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德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必然性的共同看法，也使得考茨基和伯恩斯坦这两个在修正主义问题上争论不休的对手暂时重新走到一起。因此，当时既缺乏用来暴力夺取政权的共产党干部，也缺乏目标明确的计划和相关准备。这一点在1919年1月的起义中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简言之，“斯巴达克”和德国共产党在1918年和1919年没有丝毫成功的机会，即便这种“红色恐怖”拥有小资产阶级和有产者阶级想象中的那种荒诞地夸大了的力量，也是如此。从过去50年的历史视角来看，共产党的任务就是通过加速工业化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部分现代化，而在德国，已经不再有这种任务。不管是当时还是在今天，这就是共产党在德国政治中缺乏真正的功用的原因，也是它在争取社会政治参与权以及民主监督方面普遍无法取得信任的原因。

虽然当时的德国不存在来自左边的严重危险的威胁，但是，在君主制垮台和十月改革失败后，人们仍需要对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真空加以填补。从另一方面看，对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统治秩序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也





应该是德国革命的重要任务。1916年，贝特曼·霍尔韦格曾就有关“不可能改造易北河以东地区”的观点阐明了他忧郁的看法，并且得出结论：“必须打碎它——消灭它”。恩斯特·特罗尔奇也怀疑性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场社会主义的革命是否可以避免呢？马克斯亲王政府针对旧的统治阶层的反抗的各项步骤，包括明确的大规模的和彻底的各项社会改革等，是否能有效地得到实施呢？

换言之，如果不在实际上对旧秩序的各种结构进行彻底摧毁，一切都不会有结果。”诚如古斯塔夫·迈尔在1918年10月20日就已经考虑到的那样：如果没有这场及时的革命介入，“德国的暴力政治家们会……再次……统治德国吗？”<sup>[32]</sup>



图67 士兵委员会成员袖章

从对德国政府及其官僚制度、德国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等的根本性改革和民主化的历史任务来看，德国革命是失败的。为什么呢？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1917年之后担任社会民主党多数派（MSPD）的主席。尽管他在11月10日之后由于革命而获得了领导国家的授权，而且绝不是从德意志帝国那里接管政权，但他很快就与军队的代表，同时也间接地反映传统统治集团利益的代表格勒纳将军结成了非正式的联盟。这一联盟的目的在于，为新政府获得尽可能多的秩序，而控制群众运动则被反过来当作是捍卫现状的首要前提条件。因此，这一联盟协定可以被视为一种抵制和遏制革命的象征。在处于主导地位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看来，这一联盟协定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的德国面临着战争的失败，即将面对的是成百万的军队复员带来的骚动状况，还有在协约国继续进行封锁之下对战时经济进行调整。在这种形势下，加上受到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及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等要从左翼进行的包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就特别表达了对于“现存反抗形式”的信任危机以及对于政党和工会组织的极大不信任。他们担心自己在德国会落得俄国的克伦斯基 [克伦斯基 (1881~1970年)，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加入社会革命党，7月起任第二届临时政府总理，十月革命后出逃。译者





注]的下场,亦即是革命的激进化一直发展为令人憎恶的布尔什维克化。可是,这种担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幻想性的危险,而这种幻想出来的危险则魔咒般地使他们轻率地限制了自己的决策空间。几乎与此同时,自11月中旬以后由施廷纳斯和列金[列金(Legien Carl, 1861~1920年),德国工会领袖。译者注]领导下的中央劳动联盟(Zentralarbeitsgemeinschaft)与艾伯特—格勒纳联盟、企业主以及工会进行合作,捍卫他们的地位,力图在这一种风云激荡的形势下使组织起来的工人们保持平静。[33]

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领导层的这种总体上的对于革命的防御性态度,并非根源于1917~1918年这种直接的形势。只有将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领导层打上历史印记的精神、他们的行为传统、他们的理论与实践的特殊关系等视为明显的特别重要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又排除了推行大胆的改革路线的可能性,人们才能理解这种对革命的防御性态度。不过,真正的决策权还是掌握在这一领导层手中。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及工人和士兵委员会都敦促变革,他们都支持这种路线。包括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追随者在内的大众也“实现了人们寄予他们的各种期望”:他们发动了起义,迫使旧的政府下台;他们为一个新的开端创造了条件,而且也已经表明,他们积极支持建立一种真正的民主秩序。然而,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却使他们感到失望。[34]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人们很难从社会民主党的亚文化中看到一块革命者的培育场。这一组织致力于捍卫已经获得的东西和取得新的地位。这种努力已经耗费了它几乎所有的精力。另一个方面,歧视和刁难也没有达到一种无法容忍以致他们产生革命的激情的地步。因此,除了个人的魅力作用以外,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之中很难出现德国的列宁或托洛茨基式的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中,有关大规模罢工辩论的结果以及事实都同样使人从幻想中清醒过来。尽管存在三级选举权问题,直到1918年为止,也只是一小部分最极端的左派才讨论过政治总罢工的问题。考茨基主义的革命雄辩掩盖了实践上的改良主义政策。与一种不断进行各种冒险的选择相比,他们更宁愿选择一种宿命论的不行动主义。数十年来,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一直把君主制国家的改革视为未来的任务。然而,突然间,他们在一种革命的风暴之下登上了负责任的位置,被各种不习惯的任务所包围。而事实证明,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领导人无法突破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的束缚。当然,这种思维和行为习惯的束缚绝对不是意味着要必须做出的反应,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政治家们、“革命的负责人”和群众运动等都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领导人成了强大的德国历史连续



性的俘虏，把革命带来的解放性的非连续性更多地视为一种威胁，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重塑国家的机会。他们并没有感到他们是革命的全权代表，而是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看守者。他们有意识地将他们的过渡政府视为一个短暂的小插曲。当时，他们仍然对达成意见一致抱有幻想，单方面延长“城堡的和平”，而不是解决现实冲突。从他们那种寂静主义的固执精神来看，与暂时瘫痪了法律而受到的伤害相比，受到大肆渲染的来自左派的危险似乎更危险。当真理的时刻到来时，不管他们怎样严肃地接纳改变现状的呼声，他们已经表明，自己无法胜任这一挑战。

从主观上看，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领袖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别无选择。鉴于他们过去的经历，这种看法是不难理解的。然而，任何人，只要关注一下他们的行为的各种客观作用，那就不能不看到其具有深远影响的各种结果（更多的马上会在日后显现出来）。不管怎样，他们的这种看法的病症阻碍了下列各种强有力的和快速的转变：它阻碍了士兵委员会以及许多军官都在期盼的军队改革；阻碍了工人委员会和资产阶级及其相关自由派政党都认为的必要的经济改革；阻碍了唯一可以切断拥有强大力量的土地贵族的命脉的农业改革；阻碍了唯一可以废除德意志帝国官僚统治制度的司法和管理改革。不管怎样，显然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将要为这种一时难以估量出的功能性障碍付出代价。不仅小资产阶级对于秩序的渴望对相关的改革产生了阻碍作用，而且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对于接近内战的形势的担心也成了各种改革的障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艾伯特-格勒纳联盟就是这种恐惧的结果。然而，对军队的政策恰恰表明，“人民代表委员会”中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代表的估计是错误的。格勒纳答应用10个师来稳定国内局势。但总共只来了1800人，而且到12月24日为止，面对革命的水兵，这些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支正处于解散中的帝国军队已经不再服从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当1919年1月6日柏林开始斯巴达克起义时，政府手中仍然没有一兵一卒。但是，应召而来的数以万计的工人却保护着总理府，他们拯救了政府，并且占领了几乎整个首都。直到1月11日，自由军团（Freikorps）才开进柏林。当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设法用共和国的人民武装来维持秩序时，在德国，尽管数以万计的民兵、军官和武器都是现存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领袖们却在建立共和国的民兵方面耽搁了长达两个月的时间。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领袖们没有去武装和组织他们的群众，甚至到1月6日也没有满足这些群众发出的“武器！武器！给我们武器”的愿望。他们反而害怕自己的追随者，并因此拒绝建立可以信赖的武装力量。最高统



帅部不仅没有被取消，而且还在运作，从而为自由军团开辟了道路。

当全民代表大会开始选举时，一切都已经清楚地表明，“德意志帝国的整个统治和精神机构都保留着”，其中包括“行政管理、司法、大学、教会、经济和所有的将军”。<sup>[35]</sup>于是，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之后，出现了由于失望而带来的激进化的突变，并因此而在第二阶段出现了1919年春天的无产阶级起义，这些起义由于血腥的镇压而迅速归于失败。在革命爆发两个月以后，那些旧的权力精英们虽然在各方面都处于一种穷于应付的状态，却开始从“颠覆时期的意志瘫痪”中恢复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元气。<sup>[36]</sup>各次选举和由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以德国民主党（DDP）面目出现的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组成的魏玛联盟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向马克斯·冯·巴登政府的倒退。因此，革命就成了一种多余的、骚扰性的插曲。很快，一切都会表明，这根本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魏玛共和国继续典型地称为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诚如恩斯特·特罗尔奇所看到的那样，魏玛共和国“基本上体现了一种反革命的、致力于秩序的……原则。只有鼠目寸光者才会欢欣鼓舞并且认为1848年革命的目标现在已经实现了。其实不然。原本是1848年革命的前进道路上的一次勇敢行动，现在却变成了一种保守性的阻碍和挫败革命的步骤，变成了确保那些革命的敌人进行合法活动和不断增强影响的手段”。<sup>[37]</sup>于是，德意志第一共和国在放弃激进的人事和机构变动这样一种沉重的不利条件之下，开始了它的短暂历史。

在这一点上，我们只有两个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有论点认为，如果没有国家机器、社会和经济的深刻改组，那么在1918年以后，德国就不可能形成长期有效的民主。因此，工人和士兵等委员会所表达出来的改革的愿望应该得到果断的利用。对此，并不是说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制度可以成为一种长期的机构设置，并且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也没有这么看。在我看来，在这种观点之外还存在具有说服力的不同看法。在此，我们只对这种不同的看法进行简单的概述。这种不同的看法支持代议制民主，却反对“直接的”民主。<sup>[38]</sup>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制度基于一种经常性的参与和戒备之上，然而这种制度要求长期性的动员，违反了轮换参与和休息的人类学的常态，因此看起来几乎是行不通的；同样，它所要求的超党派也难以实现：各政党要么迅速组成了议会党团，要么被用来协调有关分歧；那些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也离不开官僚机构。很快，就有500名官员为“执行委员会”（Vollzugsrat）工作；如果没有技术官僚，要对高度复杂化的经济进行计划和操控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同样，在工人和士兵委员会



的分级排列中，更高级别的机构获得了一种信息方面的优势地位，对固定职位感兴趣，而且不易被废除，因而通过公民选举对他们进行控制并非易事。于是，等级制度也就产生了。因此，在实践中，分权方面的问题可能在于，废除分权制度会增加较高级别的委员会的权力垄断机会，减少个人和团体的自由空间。从历史的角度看，各委员会主要是由工人和士兵组成的。然而，在这种冲突形势结束以后，又怎样来提供对少数派的保护呢？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必须默默忍受吗？或者说，如果抵制被认为是合法的，那么它在实践中行得通吗？这种通过工人和士兵委员会进行自我统治的理想是以理性的考虑和行动为前提的。如果取消了这些前提条件，那么，由于缺乏“各种控制和平衡”手段，对于少数独裁者的篡权的抵制就会变得愈加困难。而且，从原则上讲，这种委员会的理论是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假设性一致为基础的，因此，这种理论含有一种对社会和谐充满期待的浪漫主义的社会愿景。而这种和谐社会是与复杂社会中的实际的利益多元主义相矛盾的。其结果是，这种理论也不承认社会冲突是社会结构条件方面的发展的推动力。在这种条件下，与议会民主相比，社会少数派的安全状况就更差。虽然人们有权批评国家的官僚机构和寡头政治，有权批评经济状况，尽管迫切需要改善对于各项决策以及政治代表的控制，但是，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制度作为工业化国家中的一种永久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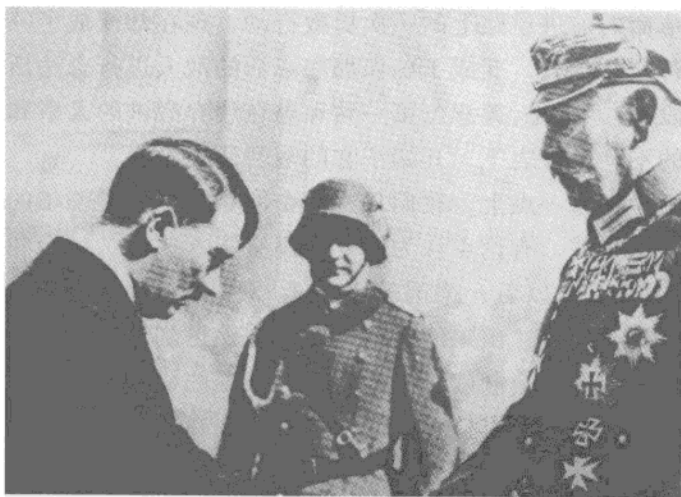


图68 1933年3月21日，兴登堡总统问候总理希特勒

制度结构，似乎是极其有问题的，而且在改革能力方面也比代议制的机构要差。然而，在像1918~1919年这种历史性的变革形势下，如果当时的政治领导人能坚决地推进改造德国社会的政策，工人和士兵委员会还是可以被用来为此服务的。关键点在于，当时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在长达几个月之久的时间内都希望民主化，而非布尔什维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有人要进行民主化并且因此要废除迄今为止的国家、社会和经济框架的核心条件，那么，对他而言，要实现这种变革，除了取得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帮助外，没有别的选择。

第二，在涉及到从德意志帝国向魏玛共和国过渡的许多问题上，自然会谈到关于德国未来发展可能性的一种假设性的考虑：如果……，那会发生什么呢？这种思考方式无疑会有一种人为的特征，然而，历史学家不可能也不允许回避对于各种可能的抉择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用以换取魏玛共和国的社会代价问题，而这种社会代价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在德国，如今人们可以更容易地通过参照亚洲来讨论这种换取魏玛共和国的社会代价。与印度有更多的人成为神牛、老鼠以及洪水和饥荒的牺牲品的演进性发展道路相比较，中国尽管有血腥的牺牲，它在社会经济现代化方面的革命性突进付出的痛苦就少一些吗？这是一些带有很多变数的复杂问题，人们无法通过这种批评性的讨论来做确定性的回答。然而，正直感以及对于我们的学习能力所抱的信心等，要求对已经做出的各种决策和遭到搁置的各种决策所造成的社会代价不断地加以探究。就这一点来看，任何有关魏玛共和国的可能性的评价都无法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在12年多一点之后，魏玛共和国开始走下坡路，迈向布吕宁的独裁统治 [布吕宁 (Heinrich Brüning, 1885~1970年)，德国政治家。1930年3月组建由中央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联合内阁。该内阁带有明显的反议会制倾向，故有此说。译者注]，1933年，纳粹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它的“夺权”。很显然，德国的历史发展由此抵达了一个连结点。要解释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连结点，我们不仅要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浮现出来的诸多问题，而且必须追溯一系列具有长期影响的历史负担。可是，在这方面，1918~1919年影响德国历史发展的转轨仍然具有其重要的意义。面对1933年以后的牺牲和恐怖，我们难道无须去权衡一下1918年有一种新开端——排除旧的统治集团、弱化或者甚至暂时性地瘫痪旧的统治体制的功能——将会造成的代价吗？有赞成魏玛的解决办法而又无须接受它的终结的吗？然而，这样一来，关于1933年出现了历史连续性“断裂”的主张不就更成问题了吗？这些因耽误时机而迅速显现的后果会使我们对于决策形势的复杂性和由此带来的问题的评价更加深刻。既然德意志帝国的官僚机构、军队、教育、政党、经济和利益集团等的历史连续性特别明显，那么有一点至少可以确定，那就是，传统的权力精英们能够为希特勒上台效犬马之劳。纳粹党自身的原动力，中等阶层的激进化，赢得农村地区民众，工人运动的削弱等，这些因素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纳粹这



一最强大的政党的“夺权”，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在当时的实际状况下，如果没有人扶一把，纳粹党的“领袖”是绝对不可能成功上台的。从这一角度来看，1918~1919年所做出的各项决策的代价在1933年开始以意想不到的规模呈现出来，以至于最终影响到整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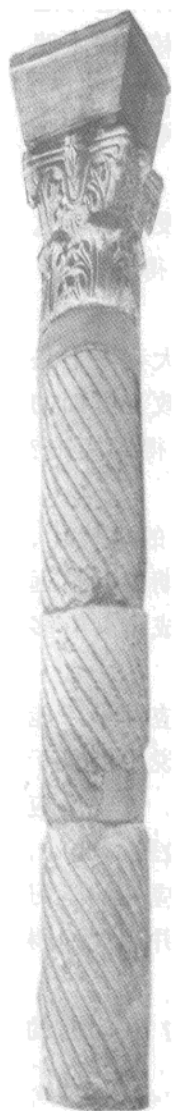




## 第 4 章

### 结 语

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约翰内斯·齐库尔施在德意志帝国灭亡数年之后评价道：“新的德意志帝国这一壮观城堡的建立是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它建立于凭借诡计和暴力，通过与国内外敌人的严酷争斗，不惜违反宪法和进行内战，不顾国王的反对，违背德国民众大多数人不愿走俾斯麦所选择道路的意志的基础之上。”<sup>[1]</sup> 因此，有观点认为，德意志帝国垮台的种子已经埋在这一新建立的国家的基础中。这种观点确实在很长时期中成了持激烈批评态度的外行们的看法。在这方面还存在一种观点，即“帝国建立年代”的各种形势具有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此后已经布下了德意志帝国失败的伏笔。但是，从一种更宽广的时代视野来看，绝对不能因此而确定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处于和平状态下，君主制的大普鲁士专制国家是否还有继续发展的能力。即使德意志帝国在 1914 年以前取得了成功，确实捍卫住了既有现状，旧的秩序已经史无前例地取得了它的合法性，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失败，那么德国的社会和政治现代化就有可能了吗？或者说，难道我们就不能在时间上看得更久远一些，把德意志帝国专制政府在战





争中以及革命中的失败视为其政策和总体性的宪法特征的一种结果吗？人们真的还认为 1918 年是一种模糊不清的、可以修改的事实，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像老一辈们所做的那样，坚持德意志帝国具有改革的能力吗？或者说，我们不应该指出德意志帝国统治者的有意识的冒险政策和促成这种冒险政策的力量状况吗？我们不应该指出德意志帝国它那打上历史烙印的机构、利益和思想的僵化吗？我们不应该从其陈腐中看到它们落伍于时代的各种证据吗？确实，其他的一些君主制度从战争的失败中存活了下来。因此，对于德意志帝国进行批判性的思考的各种困难是明摆着的。然而，鉴于德国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方面、在提升总体战方面、在激进法西斯主义的教育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加之这一切直至今日仍具有巨大的影响，进行这种批判性的思考是有必要的。由于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强制性约束力的魔咒看起来已经被突破，这种批判性的思考因此会变得更加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以某些可讨论的、明白易懂的标准作为基础，进行这种批判性的评价是有可能的。

据我所见，首先有三大系列性问题可以作为这种讨论的出发点，而这些提出的问题常常只是确定方向的标记而已，并且只能部分地得到解答。这些问题是：

第一，一种广泛而持久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其中涉及到的问题有：怎样才能扩大平等权利和社会政治方面的参与权利？法律的、地域的和社会的流动情况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施？如何来调节结构性的冲突？

第二，不论是成功的现代化，延缓的现代化还是受到阻挠的现代化，它们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和代价是怎样来分配的？特别是，从短期的和长远的眼光看，这类现代化给某些社会阶层或整个社会带来的额外成本又有多高？

第三，面对一种不断加速的变迁，德国社会超越主观的适应性学习能力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学习理论的制度学说中的关于合法性需求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历史为一种学习过程是一致的。这种适应变化的学习能力特别需要从掌握决策权的权力精英们那里得到检验。此外，还须考虑到，民族的或特殊阶层的各种价值体系是否对这种适应性的学习能力起到阻碍或促进的作用，是否有利于某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并因此而得到特定的结构的支持。

于是，就立即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进行现代化？在当时的





思想视域之下，应该致力于何种可能的学习目标？对此，诚如前言中已经概括性地提到的那样，我们的探讨是以一种指导性的设想为基础的。据此，我们认为，在当时，社会经济的变迁和政治机构的发展应该沿着不断趋向于接近同步的方向前进，要不断扩大政治的参与权和各种决策的民主的合法性，并且使之获得正式的保障。或者就是相反的情况，人们就得容忍危险的紧张状况的形成和宪法遭到损害的冒险，陷入非常严重的“学习病态”中，从而使人们可能在和平时期就对德国的发展能力提出疑问。虽然在18世纪以后，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也经常是联袂出现的，但是，工业化和民主化并非必须携手进行。德国、日本、俄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更确切地说，相关的经验证明，从功能的从属性来看，工业化与官僚主义化是相互关联的。就此而言，民主化并非工业化的直接结果，它常常是通过不懈的政治和社会抗争而取得的成果。对于各个工业国家而言，这种政治和社会的抗争发展并保持了迄今为止最适合的政治状况。在这些国家中，在建立现代社会国家的过程中，民主的基本秩序似乎最能提供一种具有灵活性的政治制度和具有承受能力的合法基础。倘若没有这种灵活性和合法性，难以解决的各种根本性危机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因此，社会政治的现代化与民主状况的现实性是密不可分的，有关社会学习能力的评价可以根据工业社会中社会经济的变化状况的广度和速度，诸如平等权利的实施情况、决策的透明度、对权力获得者的民主监督、适当的生活保障等等，简言之，就是根据逐步地实现一种民主的社会福利国家的状况，来加以确定。这并非以一种无以复加的教条化的想象为基础，而是来自于历史的经验。这种历史的经验表明，与其他的社会状态相比较，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由于具有更容易修正决策的可能性，因而会更接近于一种人性的、开放的社会。

1850年以来的经济史表明，从工业化的迅速扩张的意义上看，在普鲁士-德国这样一类刚开始仍很传统的国家中，经济的进步是有可能的。确实，就像上文曾多次指出的那样，恰恰是德国工业经济这种无可争议的具有说服力的经济成就提出了各种特别的问题。显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农业利益集团都一直试图通过诸如税收、金融以及一些恶劣的政治措施等，给工业的发展制造一些麻烦。然而，工业化的长期进程在制度、政策和思想意识方面都得到了足够的支持，因此，农业利益集团在工业发展面前早就无力回天了。于是，工业经济日益壮大，克服了各种阻挠，逐渐地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下向前发展。

德国社会在现代化方面给人的印象是矛盾的。在1871年以前，德国人



口就已经有可能进行法律和空间上的垂直流动。事实上，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德国的社会现代化就可以从农村人口的大规模国内迁移中得到好处。然而，直到1918年为止，由于这一“帝国民族”特有的晚期等级制以及与此同时所具有的阶级社会的裂痕，这种垂直的社会流动一直受到严重阻碍。当然，上升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完全就像内战之后的美国一样，在德意志帝国也有一些令人目瞪口呆的发迹升迁的成功故事。然而，与美国相比，在德国，社会出身、宗教信仰和所毕业学校等因素在早期以及很长的时期内都更多地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流动机会。在大多数的例子中，似乎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从一个熟练工人爬升到小学教师，然后上升到较高职位的公务人员和大学老师。通用电气公司总裁，瓦尔特·拉特瑙对个人职业生涯的情况特别熟悉，他在1917年时曾指出，“等级的分离在我们这里非常严格，以至于我在30年中只经历了一个例子，即一个工人和工人的儿子升迁进入了更高的资产阶级行列。”<sup>[2]</sup>社会的平等权利根本就没有在制度上确定下来，或者只是受到极其犹豫不决的敷衍。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教育事业中得到特别明确的认识。但是，在对工人阶级特别是农业工人具有明显歧视的社团法中，我们也可以觉察到这一点。而国家统治者和权力精英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减轻这种思想上的反平等的落差，更不用说消除这种落差了。

鉴于国家各主管机关和政治性的代表机构在整个社会方面的决策权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延缓在这里就有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罗豪早在1862年时就曾预言，随着俾斯麦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由于神的恩典，反动派最锋利的也是最后的一支箭弩”已经射了出来，在短时间内，人们就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突破。<sup>[3]</sup>而事实证明，直到1871年为止，这一预言并没有实现。由于三次战争和大普鲁士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旧的权力结构变得更加稳定了，而且这种巩固旧的权力结构的努力由于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保守性支撑措施而继续得到延伸。俾斯麦在一些才华横溢的表达中曾不断重复一种观点，以至于有些人因此而认为这是他的行为准则。他的这种观点认为，历史是不能制造出来，“某些基本的问题必须任其发展”，人们无法“操控……时间的流动”。<sup>[4]</sup>然而，他在一些重大的国内问题上却毫不动摇地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作为反对议会化和民主化，反对平等权和参与机会，因此也反对现代社会基本潮流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这位宰相秉持的是一种逆流而动的路线。威廉二世时期的多元统治则是对他的路线的仿效。因此，布尔克哈特在1871年所持的怀疑态度是对的。他曾指出，



“对于所有这一切即将带来的国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泪水也许会充满我们的眼眶。”<sup>[5]</sup>

帝国议会选举法没有满足它的起草者有关基于保守性的公民投票授权之上的各种期望，然而，它的民主性特征对于这些起草者而言却间接地产生了一种政治上的缓冲作用。由于它并没有与议会制的政府形式的转变联系在一起，因此，直到1918年10月之前，它都只是一个不彻底的解决方案。更糟糕的是，它还可以被用来不断抵毁反对派，使之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毫无疑问，在迫使打开不可逾越的 *Arcana Imperii*（国家秘密）的门槛方面，帝国各政党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增加，但是，它们仍然无权担当起整体性的政治责任。因此，德意志帝国统治政权剥夺了它自己赢得持不同意见的各个集团的重要效忠的机会，而让这些持不同意见的集团轻松进入合法的政治决策位置本来是有助于对它们进行整合的。鉴于这种状况，迈内克在1910年时甚至冠之为“保守党的国内政策”，这种政策的“结果是一种使用警察国家武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看不见的内战”。<sup>[6]</sup>

由于统治集团顽固捍卫包含有公开投票的普鲁士三级选举法，而且这一选举法在1896年又获得了新的、时常被忽略的萨克森阶级选举法的支持，在涉及帝国立法权方面，敷衍搪塞的特征变得更加突出。这种选举法与诸如汉萨城市等地的其他阶级选举法一道，成了危害大多数选举者的一根毒刺。大多数选举者在帝国各邦的选举中变得无足轻重。统治集团不仅能够抵制要求他们适应时代变化的压力，而且就像在工业占主导地位的萨克森那样，他们可以使选举法变得更糟糕。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这种野蛮的利益利己主义更加令人无法忍受，但统治者并没有明智地改善相关状况。早在1916年，贝特曼就已经充满预感地谈到了“战争之后的革命的梦魇”，因为届时“将不得不面对那些从战场回家的军人们提出的巨大的要求”。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看法，贝特曼所说的“巨大的”要求，只是在选举问题上要实现“最低限度的羞耻感和起码的礼貌”。所有这些回来的军人们在前线“以自己的鲜血”捍卫了那些拥有特权选举权者的财产后，难道他们必须悄无声息地回到最下层等级中吗？保守党的看法就像其政党的色彩一样，它认为他们就应该如此。例如，鲍尔上校在1918年4月就曾写道：“我们必须经常强调的是，在普鲁士以及其他各邦实行平等选举权，就意味着完蛋。我们现在做出这种牺牲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最后被犹太人和无产阶级扼杀吗？”十月改革在这方面也来得太晚。因此，甚至作为忠诚的普鲁士人和爱国者的施莫勒也在1910年时预言，如果普鲁士不实行扩大的、秘密的和直接的选举权的话，



就会出现 1848 年在法国发生的那种革命。<sup>[7]</sup>

就像首先是自由党人，然后是军队和一些鼓吹政变的人所渴望的那样，帝国选举法并没有被废除。然而，政治参与权也没有在各邦的决策层面以及整个国家的决策层面上得到落实，而是像在巴登一样，充其量只是得到了非正规的扩大，有时甚至收回了这种权利。人们多次引证的工人代表参与国家社会保险方面的地方疾病保险机构之事，根本就不是什么平衡举措，更不是对直到 1918 年 5 月依然有效的工业法规第 153 条的弥补。这一条款宣称，如果强迫工人参加工会罢工，将会受到惩罚，有组织的罢工因此变得更加困难。工人代表的参与也不能弥补对于“政治性社团”的通盘禁止。由于这种禁止，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形式直到 1899 年以后才逐渐地变得有了可能。工人代表的参与也不能弥补拒不给与工会控告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1908 年帝国社团法的通过才终止。工人代表们的参与也不能弥补直到 1916 年仍被拒绝的、那怕只是涉及某些方面的企业内部工人参与的共决制，以致“立宪”工厂没有能够与立宪君主制相应的特征。所有这些相关的问题，我们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一列出。

在其他领域，各种监督性的安排也受到有效阻止。在帝国议会和各邦议会实际上已经瘫痪的情况下，谁来考察官僚们呢？谁能有效地来反对晚期专制主义的军队特权呢？谁又能像工厂观察员和工会干部那样去支持农业工人反对地方上的地主们呢？面对有组织的生产者利益集团的影响，谁又能坚持立法决策方面的更高的透明性呢？尽管我们很难断定，决策议论的开放性是否得到提升，从根本上讲，这方面还是成问题的。人们不应低估 19 世纪 60 年代自由主义的时政评论的影响，但是，也不应高估 1914 年以前德意志帝国缓慢的自由化进程。

一直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前工业社会的价值体系，支撑着德意志帝国统治集团的守卫工作。德意志的国家思想则进一步将超党派的利益政策神秘化，从而助长了针对政党的各种错误的保留态度，使官僚政治在各种批评面前得到保护。中等阶层的社会浪漫主义、“候鸟”（Wandervogel）运动、新托马斯主义以及各种种族主义的激进派别等，则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各类冲突转移开去。这些冲突不是通过公开的、政治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而是被斥之为不正常的现象。将军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普鲁士主义试图将普鲁士政治的畸形发展辩解为军事君主制的生命力旺盛的证据。所有这一切，阻挡了人们对现实的关注，却有利于各类强大的利益集团。不论在讲坛还是布道坛，在教科书还是新闻之中，这些强大的利益集团都果



断而灵活地利用这一切来增进德国的“真正价值”。对德国小学和中学之中“思想品德教育”领域教学计划的审视表明，它们的主导思想极其准确地反映了现行统治者的思想。

因此，人们的一个总体印象是，德意志帝国的社会政治权力结构连同它所支持的思想意识形态足够坚固有力，以致到1918年秋天为止仍能使德国社会接受其约束性的条件。然而，它不得不为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社会分化付出代价，而帝国的危机管理机制能够应对这种政治和社会分化方面的长效解决办法却越来越少。

我们在此要再次使用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现代社会科学分析的一些原理。根据这些原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首先必须应对六种危机。新的德意志帝国在建国时期的形势在许多方面可以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确定，只是在“文化斗争”时期，国家行政管理的扩张和分化才导致了一次国家权力与社会之间发生冲突的真正危机。此后，国家的影响力持续广泛地进入社会生活之中，但没有再发生这种紧张的状况。从一些社会阶层来看，帝国式的民族主义、经济繁荣、德国式的教育以及军事制度——只举几个重要的因素——能够迅速对付社会的整合性危机。然而，尽管民族主义在德国工人之中不断扩散，对社会民主党的恶劣歧视最终却成了德国社会整合不充分的明显标记。当然，这种社会整合的失败并没有导致德国社会真正的认同危机。共同的规范语言、共同的文化和政治传统、以及在德意志民族国家时代的共同经历等，都使得这种认同危机无法发生。可是，与相邻国家关系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德国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却由于这种社会整合的失败而可能出现危机。分配危机也没有解决。当然，这一问题至今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解决。在1914年以前的德意志帝国，人们已经习惯于工业社会中普遍增长的却完全不公的财富分配。然而，这种不公平的分配却进一步加剧了德国社会的分配危机。同样，持续性的社会和政治参与危机，无视急迫需要的、已经部分地落伍于时代的统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等，也在加剧中。

此外，还有两件事情加剧了这种危机问题。各类社会冲突作为对抗性社会的运动力量，直到最后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只是在处于战争的形势下，国家才首次认可了在工资纠纷中集体自主商定的状况。帝国议会是一个解决冲突的论坛。在这里，1912年选举中形成的多数派（1912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110个席位，成为帝国议会第一大党。译者注）感觉到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跟他们的影响力相比，他们仍然微不足道。甚至在1913年时，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在得到皇帝的明确支持的情况



下，仍能轻松地对于帝国议会的两次不信任投票（没收波兰人财产和察贝恩事件）不予理采。针对紧张的阶级关系和利益对立，统治者则致力于一种和谐的共同体理想，想象的民族利益。最后甚至出现了“城堡的和平”的假面舞会。然而，很明显，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否定某些思想意识，是专制国家试图尽可能长时间地在它的臣民们面前拒绝承认各种社会冲突，以此隐瞒他们制度化的隔离状态以及相比较而言得到认可的合理解决办法。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出，这种对于冲突的恐惧深深植根于各种历史的传统之中。不管怎样，这种对于冲突的恐惧归根结底只会加剧各种对立，并且成为引发革命的一种根本性因素。这种迟疑不决的社会和政治现代化以及诸如在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大地产经济方面的经济现代化等所付出的代价，经常通过保护关税和税收等方面的帝国立法等，在形式上经常会转嫁给整个社会。然而，在实际上，这种负担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的影响有着巨大的差别。与工业城市中依赖工资为生的民众相比，大地主是支持农产品关税的。他对于由此而带来的进口的基本食品的价格上涨，反应可能会平静得多。大工业家则可能攻击那些很低的以至于难以觉察的累进所得税率，称之为盗窃行为，然而，高额的间接税却首先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家庭本来就精打细算的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费用增加了。在受雇用的劳动者消费群体中，大多数人在经济上相对脆弱。几十年来，他们只能通过一个受到歧视的政党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他们的这种状况，与统治集团对地主的“捐赠政策”、对重工业界的利益的细心呵护以及出于政治上的统治利益考虑而对中等阶层的优先关心等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例如，通过手工业立法或者职员保险，这些集团在物质上的要求以及在思想上保护他们的地位的需求等，都得到了满足，与此同时，统治制度也以大多数民众为代价而得到了稳定。一般来讲，弱势群体所付出代价的不公平性，是与财富分配方面有利于强势群体的不断扩大的差异相对应的。

从一种更细微的角度来看，所获得的社会好处和所付出的社会代价也是不对等的。德国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体制已经贵族化，它藐视一切形式上的均等机会，继续给予一小部分社会群体以特权。在一个时期，当特殊的专业知识已经超出了出身门第带来的好处以及生产过程中有利的位置，日益成为提升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时，这种教育体制却通过拒绝给予培训专业知识和普通“教育”而将大部分民众与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偶然性捆绑在了一起。根据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对于教育政策的观点的变化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传统的大学教育对于社会流动性的阻碍作用是



如何逐渐地被人们所认清以及如何变得松动起来的。然而，在这方面，德国的左派在1918年到1933年间也几乎没能取得什么成就。由于教育方面的极其明显的和令人感到痛苦的差别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于是民族社会主义的民族共同体的虚伪的平均主义的允诺看上去也就有了吸引力。

德意志帝国教育制度的特点也许可以视为一种更普遍的问题的症状。个人、群体或者整个社会的超越主体的学习能力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社会关系的相对开放或封闭。在这一方面，许多发展线索都归结到了德国缺少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上，并且因此而导致“提出问题”的意识的缺失，没有能够砸开或者至少是松动各种传统的结构。没有受到削弱的前工业社会权力精英们的各种统治传统，军事制度中不断延续的专制主义，自由主义的软弱和很早就已经出现的非自由化，不利于各种社会流动的障碍，对于不同社会等级的区别和标准的执着坚持，教育制度中的精神贵族特征，等等，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在19世纪的政治软弱和失败而造成的，意味着德国社会在表面上的一种非政治化，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上看，却有利于维持德国社会的现状。所有这些只是作为范例列出的因素，都在没有发生过革命的德国发展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由于俾斯麦使现状合法化的政策取得了成功，这些因素甚至再次得到了加强。当然，这类成功并没有排除诸如经济等方面的局部性的现代化，其主要原因在于，在1848年以后，“上层革命”的策略在经济领域首先产生了增强新兴工业体制的作用。同样，这种成功也没有排除取得其他方面的成绩的可能性。因此，技术方面的教育克服了各种障碍而得到很好的组织，以致很早就开始了科学技术创新潮流，并且这股潮流得到了持续保持。许多大城市不仅因为自由派领导力量撤回地方一级政府而受益，而且从官僚传统中得到了很多的好处。德国的城市管理以及地方保障服务成为1890年以后的美国“进步主义”的一种榜样，并非偶然。诚然，在1895年，有17万多人由于参加罢工而遭到了惩罚。他们知道了什么是阶级司法。然而，确定无疑的是，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即便是工人和少数民族成员，在物质方面也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保障。那些高度评价盎格鲁-萨克逊的党派民主的人，同时也必须看到其日常生活中黑暗的一面。纽约的移民聚居区就是一例。还有美国南方诸州的私刑。在美国内战之后，数十年的时间内，每天都有至少一名黑人会成为这种刑法的牺牲品。政党政治、私刑和大城市的生活等也许没有可比性，但是，任何制度的比较都必然会涉及到难以类比的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无论如何，在德意志帝国内部，不仅要关注保障社会凝聚力的惩戒和镇压（这些粗暴的或被理想化的方式很显



然产生了影响), 而且也要留意日常生活状况。尽管进行了各种抗议活动, 多数民众还没有感到日常的生活状况已经到了极其压抑的地步, 以致帝国的危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会发展成革命形势。

从德国统治精英们适应社会变化的学习行为的视角出发, 我们必须在此再次探讨一下德意志帝国统治制度相对稳定性的原因。至于这种统治制度相对稳定性的传统基础,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多次提及。如果用时髦的理论语言来表达, 在某些方面我们只能称之为“病态的学习”。阶级选举法的保留和引入, 在基本的社会冲突方面的反动态度和所得税范围的扩大, 1913年的察贝恩事件, 帝国社团法包含的直到1917年4月才废除的语言条款, 等等, 这一切都表明, 即使仅仅从一种纯粹自私的维护统治制度的利益来衡量, 那也是一种极其目光短浅的考虑。贝特曼的看法也因此而得到了证实: 历史将“表明军国主义的缺乏教养、愚蠢以及完全持有沙文主义观点的上层阶层的腐朽”。<sup>[9]</sup>这就为1918年的革命危机做了直接的预先准备。在别的方面, 统治精英们则坚守他们通过继承得来的权力位置, 他们的成就在价值上超过了他们所冒的风险。毫无疑问, 贵族、各部官僚、各省政府以及县级长官(这是维持易北河以东农业地区稳定的真正支柱)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制度在某各程度上造成了政治上的各种紧张关系。然而, 有关中立的行政管理的神话、传统的制约却与对巨大的利益受益者的实际照顾等联合起来, 长期将这种政治上的紧张关系置于红色威胁的标记之下。毋庸置疑, 强制兵役和日常生活中、学校各学科领域中以及各类社团组织中的社会军国主义的结合, 也酿成了各种具有挑衅性的摩擦面。不过,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为止, 统治制度的稳定所带来的好处要比摩擦更多。1918年11月, 发生的两件事情才真正表明了人们对于官僚制度和军队的厌恶程度。

一切之中, 最有效之举也许在于, 基于统治者学习过程之上的各种策略把对现代形式的适应与对传统的权力地位的顽强捍卫结合到了一起。社会帝国主义、社会保护主义和社会军国主义这种灾难性的三位一体为此提供了各种足够的范例。在社会帝国主义方面, 统治精英们对于工业化的反应与有利于社会政治方面的特权等级的效果紧密联系在一起; 同样, 在社会保护主义方面, 诸如国家社会保险立法等带有未来色彩的各种布置则与各种倒退性的而非自由主义的保护措施联系在一起, 以期扩大“帝国的朋友”的阵营; 在得到全力推动的社会军国主义方面, 现存的各种传统特权则通过现代性的鼓动方式和精心设计的教育目标而得到捍卫。同样, 早期





的干预型国家的特点也是如此，而像农场主同盟之类的现代利益协会也极其清楚地表明，对于现代性的组织和宣传的适应性是如何完全与捍卫旧的利益协调起来的。德国统治者的整个学习过程被汉斯·罗森贝格描写为是旧的农业精英的“虚假的民主化”。<sup>[10]</sup>从根本上讲，这一过程表明，农业精英们通常会极其灵活地准备在表面上与时俱进，但是在这一幌子之下，他们却毫无顾忌地坚持捍卫他们的传统地位。

所有这些病态性学习或者说灵活性学习的措施、策略和过程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这种学习与传统主义和局部的现代化一道，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住了一种历史上已经过时的权力结构。同时，它们也达到了不断和缓德国社会矛盾的目的。然而，另一方面，特别是从长远的眼光看，它们明显产生了一种不断增加的重负。那些受到保护的利益和传统与平等权、参与机会以及废除令人难以接受的习俗的诉求之间对立的时间越长，它们之间和解的难度也就越大。就像德国工业化的经济成就提出了各种巨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一样，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中捍卫传统的权力关系的成功也需要付出相关的代价。这种代价来得虽然很晚，却较为高昂，持续的时间也较长。没有解决的各种问题不断积聚起来，最终都必须面对；已经僵化的过时的各种制度需要加以更新；顽固坚持的各种优先权不应该再由少数特权人物享受；对国内各种改革问题不断推托和转移视线，宁愿选择战争冒险也不愿做出妥协的决策，等等，这一切都是对于权力精英的好学性的评价。他们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根据时代的要求开始向现代的政治和社会关系转变。这里并不涉及理论上的各种推测，而是建立在通向革命的爆发和旧的政体灭亡的各种进程之上的评价。革命的爆发和旧政体的灭亡这一重大转折性事件属于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它是对德意志帝国缺乏有效适应能力的一种清算。

然而，这一重大事件与过去的决裂还不够深入，人们到处都可以感受到各种有违时代的传统继续被保留下来。这种状况使得 20 世纪德国历史的连续性问题尖锐化。我们不要以显而易见的辩解来抱怨“通过连续性范畴而歪曲对德意志帝国的评价”。<sup>[11]</sup>我们应该在保持与历史社会科学必不可少的各种传统相一致的情况下，直面这些连续性问题，并对它们加以区别分析，而不是抱一种逃避现实的态度。当然，我们在这里实际上并不涉及肤浅的个人化，即从俾斯麦经过威廉二世和兴登堡直到希特勒。我们应该更多地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和心理的结构，这些结构就像复印纸一样，有能力在很长时间内建立起相同的或类似的形态。我们也要分析各种引发反常和不连续性的因素。在这样的结构背景下，我们当然要再度探讨各种有利于具有超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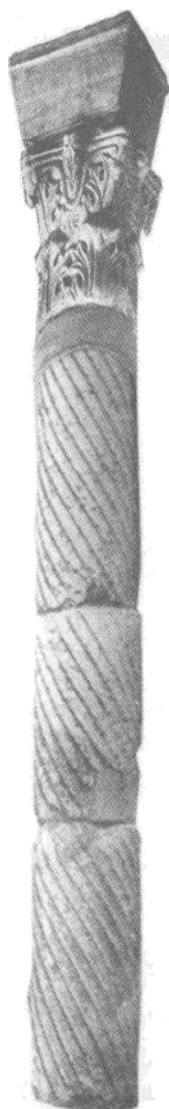
魅力的政治人物出现的特定前提条件。

确实，直到 1945 年以前，在一些领域中，受益于旧的历史传统和新的经验，德意志帝国的权力精英们不幸的成功继续在产生影响，对此可以开出一串长长的沉重历史负担的清单，诸如对独裁政治缺乏抵抗力；教育和政党制度中存在敌视民主因素；处于前工业社会的统治集团、准则和理想仍有影响力；对德意志国家思想的执着坚持；官僚制度的神话，等级制的落差与阶级对立的重叠；政治性的反犹主义操弄，等等。正因为如此，1871 年到 1918 年的德意志帝国的历史知识依然是理解最近 50 年德国历史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 附 录



## 一、缩写

- AA Auswärtiges Amt 外交部
- AH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美国历史评论
- BA Bundesarchiv Koblenz 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
- BdL Bund der Landwirte 农场主同盟
- DZA Deutsche Zentralarchiv, I: Potsdam 德国中央档案馆
- GW O. v. Bismarck, Gesammelte Werke, 19 Bde, 1924/35 俾斯麦全集, 19卷, 1924-1935年
- Fs. Festschrift 纪念册
- GStA Geheimes Staatsarchiv 秘密国家档案
- Hg. Herausgeber 主编, 出版者
- HZ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历史杂志
- IESS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7 Bde, 1968 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
- J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当代史杂志
- JMH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现代历史杂志
- Jh. Jahrhundert 世纪
- MEW Marx-Engels, Werke, 41 Bde, 1957/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1卷, 1957-1966年



- MS Maschinenschriftliches Manuskript 打印手稿  
NL Nachlaß 遗著  
PA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A Bonn 波恩外交部政策档案馆  
PVS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政治季刊  
RB O. v. Bismarck, Reden, 14 Bde, 1892/1905 俾斯麦谈话 14 卷,  
1892~1905 年  
RT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 德意志帝国议会协商速记报告  
RV Reichsverfassung 德意志帝国宪法  
ZfG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历史科学杂志  
ZGS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政治科学总汇杂志  
ZdI Zentral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 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





## 二、注 释

### 导言：

[1] K. Marx, Einleitung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1857) . MEW (s. Verzeichnis der Abkürzungen S. 240) 13. 1961, 632.—Belegt werden im allgemeinen nur Zitate. Die Bibliographie im Anhang V.3 gibt in der Reihenfolge der nummerierten Abschnitte einen knappen Überblick über die wichtigste Literatur.

[2] E. Rosenstock-Huessy, Die europäischen Revolutionen u. der Charakter der Nationen. Stuttgart 1962, 526.

[3] B. Moore, Soziale Ursprünge von Diktatur u. Demokratie. Frankfurt 1971; H. Rosenberg, Probleme der deutschen Sozialgeschichte. Frankfurt 1969; ders., Große Depression u. Bismarckzeit. Berlin 1967.

[4] E. Engels an Danielson, 18. 6. 1892. MEW 38. 1968, 365.

[5] R. Dahrendorf, Demokratie u. Sozialstruktur in Deutschland, in: ders., Gesellschaft u. Freiheit. München 1961, 262.

[6] Vgl. Dazu H.-U. Wehler, Krisenherde des Kaiserreichs 1871–1918. Göttingen 1970, 12f.

[7] K. F. Werner, NS-Geschichtsbild u. Geschichtswissenschaft. Stuttgart 1967, 97.

[8] F. Engels, 1887/88. MEW 21. 1962, 454; A. Rosenberg, Entstehung u.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sup>1971</sup>, 95.

### 第一章：

[1] T. Veblen,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15) . Ann Arbor 1966, s. auch Marx (MEW 23, 12f.—50 Jahre vorher!) ; A.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Mass. 1962 (1965) , 5–30.

[2] G. Schmoller, Charakterbilder. München 1913, 49.

[3] G. Ipsen, Die preußische Bauernbefreiung als Landesausbau,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2. 1954, 47; F. Lütg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grarverfassung vom frühen Mittelalter bis zum 19. Jh. Stuttgart 1963 (1967) , 228.

[4] Die letzten Zitate: H. Rosenberg, Die Pseudodemokratisierung der Rittergutsbesitzerklasse, in: ders., Probleme, 33, 12, 16f.

[5] Gerschenkron, 62.

[6] T. Hamerow, Restau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Germany 1815–1871. Princeton 1958, 207, 210; A. Desai, Real Wages in Germany, 1871–





1913. Oxford 1968, 108, 117; I. Akerman, *Theory of Industrialism*. Lund 1960, 305, 307, 309, 311, 331–80. Die wirtschafts- u. sozialstatistischen Daten, wenn nicht anders vermerkt, nach: W. G. Hoffmann u. a., *Das Wachst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Heidelberg 1965. Die folgenden Streikzahlen: W. Steglich, *Eine Streiktabelle für Deutschland, 1864–80*,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60/II, 235–83.

[7] Chargé de Rumigny, 4. 4. 1829, nach: P. Benaerts, *Les origines de la grande industrie allemande*. Paris 1933, 15; Metternichs Denkschrift für Kaiser Franz, Juni 1833, in: A. v. Klinkowström Hg., *Aus Metternichs Nachgelassenen Papieren*. V, Wien 1882, 505, 509.

[8] MEW 13. 639, 642.–Klasse wird in diesem Abschnitt als analytische Kategorie verstanden.

[9]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reußischen Hauses der Abgeordneten, 1855/56*, II, 462 (20. 2. 1856).

[10] E. N. Anders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Prussia, 1858–64*. Lincoln 1954, 441; M. Messerschmidt, *Die Armee in Staat u. Gesellschaft*, in: *Das Kaiserliche Deutschland*. Hg. M. Stürmer. Düsseldorf 1970, 95.

[11] O. v. Bismarck, *GWXV*, 165, vgl. 114; H. Oncken, R. v. Bennigsen. II, Stuttgart 1910, 45; G. Ritter, *Die preußischen Konservativen und Bismarcks deutsche Politik, 1858–76*. Heidelberg 1913, 74.

[12] G. A. Craig, *Die preußisch-deutsche Armee, 1640–1954*, Düsseldorf 1960, 214; F. Lassalle, *Ges. Reden u. Schriften*. Hg. E. Bernstein. IV, Berlin 1919, 307f.

[13] Rosenberg (Probleme, 52) im Anschluß an C. Schmitt, *Verfassungslehre* (1928), Berlin 1957, 31f. 118.

[14] H. Rothfels, *Probleme einer Bismarck-Biographie*, *Deutsche Beiträge* 1848/II, 170 (umgestellt). Typisch abgeschwächt in: ders., *Bismarck*. Stuttgart 1970, 20.

[15] G. Mann, *Deutsche Geschichte des 19. Jhs*. Frankfurt 1958, 383.

[16] Burckhardt an Preen, 12. 10., 17. 3. 1871, in: J. Burckhardt, *Briefe*. Hg. M. Burckhardt. V, Basel 1963, 139, 152; ebenso: *Scrutator* (M. McColl),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War?* London 1870, 95, 102.

[17] R. Stadelmann, *Moltke u. der Staat*. Krefeld 1950, 145; J. Becker, *Zum Problem der Bismarckschen Politik in der spanischen Thronfrage*, *HZ* 122. 1971, 603; ders., *Der Krieg mit Frankreich als Problem der keindeutschen Einigungspolitik Bismarcks 1866–70*, in: *Das Kaiserliche Deutschland*, 83. Clausewitz: Wehler, 110–12.

[18] W. Sauer, *Die politisch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mee u. das Problem des Militarismus*, *PVS* 6. 1965, 349. Zum folg. Ders., *Das Problem des deutschen National-*



staats, in: H.-U. Wehler Hg., *Moderne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 Köln 1973, 407-36.

[19] GW , 514f.; Otto an Talleyrand, 13. 8. 1799, in: P. Bailleu, *Preußen u. Frankreich, 1795-1807. Diplomatische Correspondenzen*. Leipzig 1881, 505; K. Schwartz, *Leben des Gen. C. v. Clausewitz. I*, Berlin 1878, 234 (21. 5. 1809); K. Griewank Hg., *Gneisenau. Ein Leben in Briefen*. Leipzig 1939, 379f. (9., 14. 8. 1830); GW VIII, 459.

[20] Freytag (Sept. 1871) nach: H. Kohn, *Wege vom Geist des deutschen Bürgertums*. Düsseldorf 1962, 178; A. v. Villers, *Briefe eines Unbekannten. II*, Leipzig 1910, 44f. (an A. v. Wiarsberg, 24. 7. 1870); G. G. Gervinus, *Hinterlassene Schriften*. Wien 1872, 21-23 (1. Denkschrift zum Frieden, Anfang 1871); Marx, *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1875). MEW 19. 1962, 29.

[21] R. Stadelmann, *Deutschland u. die westeuropäischen Revolution*, in: ders., *Deutschland u. Westeuropa*. Laupheim 1948, 14, 27f., 31.

## 第二章:

[1] J. Habermas, *Technik u.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 1968, 68.

[2] R. Höhn Hg., *Die vaterlandslosen Gesellen, 1878-1914. I*, Köln 1964, 29; MEW 6. 1959, 405; Desai, 108. Die genaue Datierung bis 1914 nach A. F. Burns, *Business Cycles*, IESS 2. 1968, 231 Tab. 1. Ausführlicher: Rosenberg, *Depression*; H.-U. Wehler, *Bismarck u. der Imperialismus*. Köln 1972, 39-111.

[3] MEW 23, 28 (1873).

[4] Höhn, I, 29; W. Mommsen Hg., *Deutsche Parteiprogramme*. München 1960, 790.

[5] Rosenberg, *Depression*, 187; ders., *Probleme*, 72; Tarifsätze: H.-H. Herlemann, *Vom Ursprung des deutschen Agrarprotektionismus*, in: *Agrarwirtschaft u. Agrarpolitik*, Hg. E. Gerhardt u. P. Kuhlmann. Köln 1969, 189; Motive: K. W. Hardach, *Die Bedeutung wirtschaftlicher Faktoren bei der Wiedereinführung der Eisen- u. Getreidezölle in Deutschland 1879*. Berlin 1967, 30-49.

[6] A. Gerschenkron, *Bread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1943). N. Y. 1966, 67.

[7]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Hg., *Statistisches Jahrbuch 1963*. Stuttgart 1963, 57.

[8] J. A. Schumpeter,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1911). Berlin 1964, 102.

[9] F. Kleinwächter, *Die Kartelle*. Innsbruck 1883, 143.

[10] R. Calwer Hg., *Handel u. Wandel 1900*. Berlin 1901, 27.

[11] Außer Hoffmann s. P.-C. Witt, *Die Finanz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03-13*. Lübeck 1970, 382-85; A. Feiler, *Die Konjunkturperiode 1907-13*. Jena 1914,



171f., 86, Tab. 177–204. Konzentration: Wehler, Krisenherde, 308f., Lit. 428f.

[12] F. Grumbach u. H. König, Beschäftigung u. Löhne der deutschen Industriegewirtschaft 1888–1954,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79. 1957/II, 153; T. Orsagh, Löhne in Deutschland, 1871–1913, ZGS 125. 1969, 476–83.

[13] F. Naumann, Demokratie u. Kaisertum. Berlin 1900, 92f.; K. Kitzel, Die Herrfurthische Lnadgemeindeordnung. Stuttgart 1957, 13–65, Zit. 18; M.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al- u. Wirtschaftsgeschichte. Tübingen 1924, 503.

[14] L. Bamberger, Erinnerungen. Berlin 1899, 501–517; Deutscher Ökonomist 12.6. 1909, 387f.

[15] L. Bamberger, Bismarcks Großes Spiel. Die Geheimen Tagebücher. Frankfurt 1932, 339 (6. 6. 1887). Vgl. T. Fontane, Briefe an Friedländer, Hg. K. Schreinert. Heidelberg 1954, 305, auch allg. Betrieb: z. B. G. Briefs, Betriebsführung u. Betriebsleben in der Industrie. Stuttgart 1934, 120.

[16] M. Weber,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Tübingen <sup>2</sup>1958, 19.

[17] L. Brentano, Die deutschen Getreidezölle. (1911), Stuttgart <sup>3</sup>1925, 25–32.

[18] F. Beckmann, Di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russischen Getreideverkehrs unter den Handelsverträgen von 1894 u. 1904, H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 Statistik 101. 1913, 145–71; G. Schmoller, Einige Worte zum Antrag Kanitz, Schmollers Jahrbuch 19. 1895, 617; Gerschenkron, Bread, 53f., 64, 69, 74f., 79f.; Rosenberg, Probleme, 67–80.

[19] H. Heller, Staatslehre. Leiden <sup>3</sup>1963, 113.

[20] H. v. Friedberg an Kronprinz Friedrich, 4. 5. 1879, Nl. O. v. Richthofen, 1/1.2, PA, AA Bonn; T. W. Adorno, Einleitung, in: ders. Hg., Spätkapitalismus o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Stuttgart 1969, 23f.

[21] Habermas, 76f., 84, 92.

[22] Vgl. Hardach, 70–72.

[23] A. Bebel, Zum 1. Oktober, Neue Zeit 9. 1891/II, 7.

### 第三章：（一）

[1] A. Rosenberg, 15; Bismarck an Bülow, 21. 12. 1877, GWVI, 103.

[2] Weber, Polit. Schriften, 233. Bismarck nach: R. v. Friesen, Erinnerungen aus meinem Leben. III, Dresden 1910, 11f.

[3] G. Anschütz, Der deutsche Föderalismus, in: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Staatsrechtslehre. I, Berlin 1924, 14f.; T. Hobbes, Leviathan, Hg. I. Fetscher. Neuwied 1966, 206 (II, Kap. 26, Abs. 6).

[4] E. R. H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nach 1789. III, Stuttgart 1963, 11;





folg. Zit. 18.

[5] Marx an Ruge, 5. 3. 1842, MEW 27, 397.

[6] K. D. Bracher, Die Auflö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Villingen <sup>5</sup>1971, 11.

[7] Lassalle, II, 60 (Über Verfassungswesen, 1862).

[8] Roggenbach an Bamberger, 11. 2. 1879, Nl. Bamberger, DZA I, 173/4-5. Bei W. P. Fuchs (Hg., Großherzog Friedrich v. Baden u. die Reichspolitik, 1871-1907. I, Stuttgart 1968) findet sich ein Dutzend Diktatvorwürfe.

[9] F. Meinecke, Reich u. Nation von 1871-1914, in: ders., Staat u. Persönlichkeit. Berlin 1933, 167.

[10] L. v. Schweinitz, Denkwürdigkeiten. II, Berlin 1927, 83 (18. 11. 1879) 270 (Apr. 1884), vgl. 307; ders., Briefwechsel. Berlin 1928, 214 (Mai 1886); Bosse nach J. Röhl, Deutschland ohne Bismarck. Tübingen 1969, 26; K. Oldenburg, Aus Bismarcks Bundesrat, 1878-85. Berlin 1929, 10, 38, 55; J. Hansen, G. v. Mevissen, Berlin 1906, 843 (1884); Kapp an Cohen, 23. 8. 1879 u. 9. 7. 1881, in: F. Kapp, Vom radikalen Frühsozialisten des Vormärz zum liberalen Parteipolitiker des Bismarckreichs. Briefe 1848-1884, Hg. H.-U. Wehler. Frankfurt 1969, 122, 133.-Amphill an Granville, 11. 3. 1882, in: P. Knaplund Hg., 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 Washington 1944, 256; Kasson an Bayard, 30. 4. 1885, in: O. Stolberg-Wernigerode, Deutschland u.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im Zeitalter Bismarcks. Berlin 1933, 327, 329.

[11] L. Bamberger, Bismarck Posthumus. Berlin 1899, 8; GW VI c, 156 (4. 2. 1879); GW VIII, 532.

[12] Der 18.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1852), MEW 8, 115-207.

[13] L. Bamberger, Charakteristiken. Berlin 1894, 84; Engels an Marx, 13. 4. 1866, MEW 31, 208.

[14] Bamberger, Posthumus, 58, 25; Burckhardt an Preen, 26. 9. 1890, in: Burckhardt, Briefe, Hg. F. Kaphahn. Leipzig 1935, 490; Die Geheimen Papiere F. v. Holsteins. II, Göttingen 1957, 181 (17. 11. 1884).

[15] H. Gollwitzer, Der Cäsarismus Napoleons III. Im Widerhall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Deutschlands, HZ 173. 1952, 65; s. F. Mehring, Weltkrach u. Weltmarkt. Berlin 1900, 34; S. Hellmann, Die großen europäischen Revolutionen. München <sup>2</sup>1919, 15-17.

[16] L. Bamberger, Zum Jahrestag der Entlassung Bismarcks (1891), in: ders., Ges. Schriften. V, Berlin 1897, 340. Vgl. Die Klage der Kronprinzessin Viktoria: Mann, 430f.

[17] H. Rothfels, 170; ähnlich K. Griewank (Das Problem des christlichen Staatsmannes bei Bismarck. Berlin 1953, 55: „Anstound Vorbild für Entartungserscheinungen“).

[18] A. v. Deines an H. Deines, 20. 3. 1890, Militärarchiv Freiburg, N 32/11; Bur-



- ckhardt an Preen, 13. 4. 1877, Briefe, VI, 1966, 124; Mommsen nach: Kohn, 198, 201.
- [19] GWXV, 640.
- [20] Bismarck an Wilhelm I., Okt. 1879, Ni. Bismarck, 13. Schloß Friedrichsruh; dazu H. Pachnicke, Führende Männer im alten u. im neuen Reich. Berlin 1930, 63.
- [21] M. Stürmer, Einleitung, in: ders. Hg., Das Kaiserliche Deutschland, 20f.
- [22] GW XIV, 1475, 27. 11. 1872. Klassisch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H. Rosenberg, Bureacracy, Aristocracy,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 Cambridge/Mass. 1958 u. ö., dt. Bis 1848 geführt: Göttingen (demn.) .
- [23] K. Heinig, Das Budget. I, Tübingen 1949, 388. Allg. E. Kehr, Das soziale System der Reaktion in Preußen unter dem Ministerium Puttkamer, in: ders., 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 Hg. H.-U. Wehler. Berlin 1970, 64-86, u. die Lit. III. 1. 4.
- [24] C.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 Denkwürdigkeiten aus der Reichskanzlerzeit. Stuttgart 1931, 290; P. Molt, Der Reichstag vor der improvisierten Revolution. Köln 1963, 142f.; P. Rssow u. K. E. Born Hg., Akten zur staatlichen Sozialpolitik in Deutschland, 1890-1914. Wiesbaden 1959, 146.
- [25] E. N. u. P. R. Anders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inental Europe in the 19th Century. Berkeley 1967, 167, 166-237; O. Hintze, Der Beamtenstand, in: ders., Soziologie u. Geschichte. Göttingen 1964, 68, 66-125. Eingehenderüber die Zeit bis 1918: J. Kocka, Klassengesellschaft im Krieg.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 1914-1918. Göttingen 1973, Kap. III, 67-85.
- [26] Von M. Weber z. B.: Wirtschaft u. Gesellschaft. I, Tübingen 1956, 125-30; II, 823-876; ders., Polit. Schriften, 294-431. Überblick: A. Lotz,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eamtentums. Berlin 1909.
- [27] Anderson, 195; Molt, 143; L. Muncy, The Junker in the Prussian Administration, 1888-1914. Providence 1944, 189f.; R. Lewinsohn, Das Geld in der Politik. Berlin 1930, 20f.; W. Runge, Politik u. Beamtentum im Parteistaat. Stuttgart 1965, 170-74, 181; R. Morsez, Die Oberste Reichsverwaltung unter Bismarck, 1867-90. Münster 1957, 246.
- [28] C. Schmitt, H. Pruess in der deutschen Staatsrechtlehre, Neue Rundschau 41. 1930, 290; Runge, 173; J. Röhl Beamtenpolitik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in: Das Kaiserliche Deutschland, 295.
- [29] J. Kocka, Vorindustrielle Faktoren in der deutschen Industrialisierung, in: Das Kaiserliche Deutschland, 265-86; ausführlicher ders., Unternehmensverwaltung u. Angestelltenschaft, Siemens 1847-1914. Stuttgart 1969.



## 第三章：(二)

[1] T. Heuss, Das Bismarck-Bild im Wandel, in: L. Gall Hg., Das Bismarck-Problem. Köln 1971, 264.

[2] Das Folgende mehrfach nach Gesichtspunkten von M. R. Lepsius (Parteiensystem u. Sozialstruktur: Zum Problem der Demokratisierung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in: Fs. F. Lütge. Stuttgart 1966, 371-93; Extremer Nationalismus. Stuttgart 1966;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als historisch-soziologisches Problem, in: Spätkapitalismus?, 197-213) u. T. Nipperdey (Über einige Grundzüge der deutschen Parteigeschichte, in: Fs. H. C. Nipperdey. II, München 1965, 815-41).

[3] T. H. Marshall,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in: ders.,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 Y. 1965, 71-134.

[4] G. Mayer, Die Trennung der proletarischen von der bürgerlichen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1863-70 (1912), in: ders., Radikalismus, Sozialismus u. bürgerliche Demokratie, Hg. H.-U. Wehler. Frankfurt 1969, 108-78.

[5] F. J. Stahl, die gegenwärtigen Parteien in Staat u. Kirche. Berlin 1863, 73.

[6] Kapp an Cohen, 5. 1. 1875, Briefe, 107f.; Hammacher an seine Frau, 28. 5. 1879, Nl. Hammacher 20/36f., DZA I.

[7] Bamberg, Erinnerungen, 501.

[8] Grundlegend dazu H.-J. Puhle, Agrarische Interessenpolitik u. preußischer Konservatismus im wilhelminischen Reich, 1893-1914. Hannover 1966.

[9] H. Boldt, Deutscher Konstitutionalismus u. Bismarckreich, in: Das Kaiserliche Deutschland, 127.

[10] Innenminister v. Puttkamer, 5. 12. 1883 im Abg. Haus, nach: H. v. Gerlach, Die Geschichte des preußischen Wahlrechts. Berlin 1908, 37.

[11] A. Schäffle, Die Quintessenz des Sozialismus. Gotha 1987, 1.

[12] W. Andreas Hg., Gespräche Bismarcks mit dem badischen Finanzminister M. Ellstätter,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Oberrheins 82. 1930, 449 (1. 2. 1877) ;ähnlich H. v. Poschinger, Stunden bei Bismarck. Wien 1910, 98; RB VI, 346f., VII, 287.

[13] Rosenberg, Depression, 82-88. Zur politischen Programmatik: Mommsen, Parteiprogramme, 294-403; zur politischen Aktivität: die Lit. III, 2. 1. 4.

[14] Schmoller, 52; Griewank, 47.

[15] E. Bernstein, Rez., Dokumente des Sozialismus 1. 1902, 473; s. F. Naumann. Die Politischen Parteien. Berlin 1910, 96.

[16] Mommsen (Nation 13. 12. 1902), nach: L. M. Hartmann, T. Mommsen.



Gotha 1908, 258.

[17] G. Mayer, *Erinnerungen*. München 1949, 179.

[18] Rosenberg, *Probleme*, 34f.

[19] W. Hennis, *Verfassungsordnung u. Verbandseinfluß*, PVS 2. 1961, 23–35.

[20] E. Kehr, *Soziale u. finanzielle Grundlagen der Tirpitzschen Flottenpropaganda*, in: *Primat*, 130–48; ders., *Schlachtflottenbau u. Parteipolitik, 1894–1901*. Berlin 1930 (21966), 169f.; W. Marienfeld, *Wissenschaft u. Schlachtflottenbau in Deutschland 1897–1906*. Berlin 1957, 83; H. A. Bueck, *Der Zentral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 I*, Berlin 1902, 291f.

[21] K. v. d. Heydt an Hammacher, 30. 6. 1886, *Nl. Hammacher* 57; K. Lamprecht, *Deutsche Geschichte. Zur jüngsten deutschen Vergangenheit (1903). II/2*, Berlin 1921, 737.

[22] G. Radbruch, *Die politischen Parteien im System des deutschen Verfassungsrechts*, in: G. Anschütz u. R. Thoma Hg., *Handbuch des deutschen Staatsrechts. I*, Tübingen 1930, 289.

[23] W. Liebknecht, 9. 12. 1870, *Norddt. RT* 1:2:154.

[24] Sybel an Baumgarten, 27. 1. 1871, in: J. Heyderhoff u. P. Wentzke Hg., *Deutscher Liberalismus im Zeitalter Bismarcks. I*, Osnabrück 21967, 494; R. Stadelmann, *Moltke u. das 19. Jh.*, HZ 166. 1942, 309.

[25] Sauer, *Problem*, 428–36.—NB. Für historische Neotraditionalisten: Solche Techniken brauchen keinen schriftlichen Niederschlag zu finden (so daß direkt Quellen fehlen mögen), aber dennoch sind sie aus der in die politischen Verhaltensweisen gleichsam eingebauten Rationalität des Herrschaftsinteresses erschließbar; sie können sich über die Köpfe der Beteiligten hinweg als „Response“ auf einen „Challenge“ durchsetzen und sind dennoch im nachhinein in der Form strategischer Bedürfnisse wie intentionales Handeln interpretierbar.

[26] O. Pfülf, *Bischof v. Ketteler, III*, Mainz 1899, 166.

[27] RB 12, 305; GW VIII, 419; XIV/II, 910; H. Hofmann *Fürst Bismarck. III*, Stuttgart 1914, 154; GW XIV/II, 955.

[28] Vgl. dazu die ausführlichere Diskussion über den politischen Antisemitismus, unten III. 3.3.

[29] GW VIc, 350 (24.12. 1886).

[30] R. Lucius v. Ballhausen, *Bismarck-Erinnerungen*. Stuttgart 1921, 304 (25. 10. 1884); E. Foerster, A. Falk. Gotha 1927, 430 (29., 30. 8. 1878); M. Stürmer Hg.,



Bismarck u. die preußisch-deutsche Politik. München 1970, 131, 127; ausführlich ders., Staatsstreichgedanken im Bismarckreich, HZ 209. 1969, 566-615.

[31] Marx nach: H.-U. Wehler, Sozialdemokratie u. Nationalstaat, Nationalitätenfragen in Deutschland, 1840-1914. Göttingen <sup>2</sup>1971, 57; Burckhardt an Preen, 26. 4. 1872, Briefe. V, 160.

[32] Bismarck an Puttkamer, 3. 3. 1883, BA, P 135/6348 (gedr. in Stürmer Hg., Bismarck, 195) .

[33] Pourtalès an Bethmann, 15. 10. 1853, in: A. v. Mutius Hg., Graf A. Pourtalès. Berlin 1933, 73; Mann, 443.

[34] Rosenberg, Probleme, 33.

[35] Schmoller, 41; Bismarck an Mitnacht, Herbst 1878 (Entwurf) , Nl. Bismarck XLVII; GWVIII, 298 (18. 2. 1879) ; Kronratsprotokoll, 5. 6. 1878, in: Stürmer Hg., 125; C.v. Tiedemann, Aus 7 Jahrzehnten. II : 6 Jahre Chef der Reichskanzlei. Leipzig 1909, 258; J. M. v. Radowitz, Aufzeichnungen u. Erinnerungen, 1839-90, Hg. H. Holborn. II , Stuttgart 1925; Wehler, Bismarck u. der Imperialismus, 189-91.

[36] Entwurf, Anm. 35; GWVIII, 492; H. v. Bismarck an Rantzau, 29. 10. 1881, Nl. Bismarck 41 (auch W. Bussmann Hg., Staatssekretär Graf H. v. Bismarck. Aus seiner politischen Privatkorrespondenz. Göttingen 1964, 108) ; 30. 10. 1881, ebda, Protokoll der Staatsministeriumssitzung v. 8. 12. 1884, in: Stürmer Hg., 207; GWXV, 288, 393, 398, 449, 465.

[37] Hofmann, I , 132 (s. GWVIII/ 304; RBX, 130) ; II , 406-8 (11. 3. 1897) ; D. Stegmann, Die Erben Bismarcks, 1897-1918. Köln 1970, 67; E. Kehr, Englandhß u. Weltpolitik, in: Primat, 164; ders., Schlachtflottenbau, 265. Vgl. Berghahn: /5. 3. 1, u. H. A. Winkler, Mittelstand, Demokratie u. Nationalsozialismus. Köln 1972, 40-64.

[38] Hofmann, I , 130 (RBX, 56) ; GW VIc, 121; O. Hintze, Das monarchische Prinzip u. die konstitutionelle Verfassung, in: ders., Staat u. Verfassung. Göttingen <sup>3</sup>1970, 378.

[39] Naumann, Demokratie, 139.

[40] H.-G. Zmarzlik, Bethmann Hollweg als Reichskanzler, 1909-14. Düsseldorf 1957, 50; Der Weltkrieg, Hg. Reichsarchiv. Kriegsrüstung u. Kriegswirtschaft. Anlagen I , Berlin 1930. 122f.; Stegmann, 216f., 288, 404-499.

[41] W. Rathenau, An Deutschlands Jugend. Berlin 1918, 100.

### 第三章：(三)

[1] J. Heyderhoff Hg., Im Ring der Gegner Bismarcks, 1865-1896. Leipzig 1943,



- 223 (Roggenbach an Stosch, 7. 11. 1883) .
- [2] L. Bamberger, Die Nachfolge Bismarcks. Berlin <sup>2</sup>1889, 41.
- [3] GW VI b, 486 (12. 9. 1870) .
- [4] GW VIII, 79 (21. 4. 1873) , 441 (12. 12. 1881, Bennigsen) .
- [5] Nach r. Hilferdings (Das Finanzkapital [1910] . Berlin 1947, 504f.) und O. Bauers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 die Sozialdemokratie. Wien <sup>2</sup>1924, 491ff.) hervorragender Erörterung.
- [6] W. Rathenau, Ges. Schriften. I ., Berlin 1925, 188f. (im Orig. Präsens) .
- [7] E. Bernstein, Geschichte der Berliner Arbeiterbewegung. II , Bern 1907, 59.
- [8] Th. Mommsen an Anon., 13. 8. 1882, Nl. Bamberger 151/4, DZA I ; Bamberger an Hillebrand, 17. 12. 1882, ebda, 91/72; Bleichröder (1880) nach W. Frank, Hofpreidiger A. Stoecker u. die christlichsoziale Bewegung. Hamburg <sup>2</sup>1935, 86.
- [9] Wahlaufuf der Deutschkonservativen: Nl. Goldschmidt, PA.
- [10] Mommsen, Parteiprogramme, 84.
- [11] Foerster, Falk, 485 (10. 3. 1878, Lasker) ; Bamberger, Posthumus, 35 (Friedenthal) .
- [12] Frank, 110; H. v. Bismarck an Rantzau, 2. 11. 1881, Nl. H. v. Bismarck 41.
- [13] W. v. Bismarck an Rantzau, 23. 5. 1884, Nl. Rottenburg 4/203, GSA Berlin-Dahlem.
- [14] H. v. Bismarck an Rottenburg, 8. 8. 1882 (Bleichröder) , Nl. Rottenburg 3; 25. 9. 1887 (AA) , ebda, 3; an Münster, 20. 4. 1885 (Meade) , Nl. Münster, 5, Schloß Deneburg.
- [15] Bamberger an Hillebrand, 7. 12. 1880, Nl. Bamberger 91/33; Mommsen an H. Bahr, nach: P. W. Massing, Vor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Antisemitismus. Frankfurt 1959, 177.
- [16] GW XIV/1, 568 (Bismarck an seine Schwester, 26. 3. 1861) .
- [17] Rantzau an Rottenburg, 12. 12. 1886, Nl. Rottenburg 5/237 u. Nl. O. v. Bismarck; Holstein an H. v. Bismarck, 13. 12. 1884, Nl. Bismarck 44.
- [18] Wehler, Krisenherde, 188; über die Polenpolitik: 181–99 (mit Zahlen) ; Elsaß-Lothringen: 51–56; Nordschleswig: ders., Sozialdemokratie, 86–102.
- [19] Papiere Holsteins. III , 1961, 214 (Bülow an Holstein, 10. 12. 1887) ; Schieder nach: Wehler, Krisenherde, 194.
- [20] F. Meinecke, Ausgewählter Briefwechsel, Hg. L. Dehio u. P. Classen. Stuttgart 1962, 59 (an Goetz, 6. 5. 1915) .
- [21] Weber, Wirtschaft u. Gesellschaft. II , 683f., 698f.



- [22] Ministerialblatt für die gesamte innere Verwaltung 37. 1876, Berlin 1887, 44.
- [23] A. de Tocqueville, Über die Demokratie in Amerika. I, Stuttgart 1959, 343.
- [24] Zit. Nach H.-U. Wehler Hg., Geschichte u. Psychoanalyse. Köln 1971, 28f.  
(Litt, Adorno, Hartmann) .
- [25] Lepsius, Demokratie, 204.
- [26] Weber, Polit. Schriften, 235f.
- [27] R. Dahrendorf, Soziale Klassen u. Klassenkonflikt in der 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 Stuttgart 1957, 64.
- [28] G. W. F. Hegel, Briefe, Hg. J. Hoffmeister. I, Hamburg 1953, 253 (an Niethammer, 28. 10. 1808) .
- [29] T. Nipperdey, Volksschule u. Revolution im Vormärz, in: Fs. Schieder. München 1968, 117 (F. W. XV .) , 141f.
- [30] Die folgenden Angaben nach: F. Ringer, Higher Education in Germany in the 19th Century, JCH 2. 1967, 123-38; W. Zorn, Hochschule u. höhere Schule in der deutschen Sozialgeschichte der Neuzeit, in: Fs. M. Braubach. Münster 1964, 321-39.
- [31] C. v. Ferber, Die Entwicklung des Lehrkörpers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u. Hochschulen, 1864-1954. Göttingen 1956, 176f.
- [32] Der Preußische Landtag. Handbuch für sozialdemokratische Wähler. Berlin 1908, 505.
- [33] R. Michels, Umschichtungen der herrschenden Klassen nach dem Kriege. Stuttgart 1934, 68.
- [34] T. Eschenburg, Ämterpatuonage. Stuttgart 1961, 20, vgl. 33-41.
- [35] Eine persönliche Reminiszenz: Noch 1953 wurde während einer Diskussion die Konzession des Vorsitzenden des früher hochfeudalen Bonner Corps "Borussia ", man habe sogar zwei Bürgerliche aufgenommen, unter dem Pfeifen von Burschenschaftlern von Korpsstudenten mit einem "Pfui Deibel"quittiert.
- [36] R. Schmidt, Die Zeit, 13. 10. 1967, 29.
- [37] E. Fraenkel, Zur Soziologie der Klassenjustiz. Berlin 1927 (Darmstadt 1968) , 41.
- [38] Weber, Wirtschaft u. Gesellschaft. II, 660; A. Einstein-H. u. M. Born, Briefwechsel, 1916-55. München 1969, 39 (9. 12. 1919) .
- [39] O. Hintze, Die Industrialisierungspolitik Friedrich d. Gr., in: ders., Historische u. Politische Aufsätze. II, Berlin 2o.J., 132 (vorher, 131: "Eine Wirkung friderizianischer Gedanken in der inneren Verwaltung wie in der äußeren Politik (!) .



[40] Nach H. Dietzel, Bismarck,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III, Jena 31909, 65.

[41] Interpellation Stumm u. a., RT 4:3:3, Anl. I, 17; H. Herzfeld, J. v. Miquel, II, Detmold 1938, 33; Wehler, Bismarck u. d. Imperialismus, 459–64.

[42] Schmoller, Charakterbilder, 41, 59.

[43] Stolbergs Votum im Preuß. Staatsministerium, 11. 9. 1878, in: Stürmer Hg., 133; B. Croce, Geschichte Europas im 19. Jh. Frankfurt 31968, 266.

[44] RB XII, 639f.

[45] GW VI c, 230; VIII, 396; H. Rothfels, T. Lohmann, 1871–1905. Berlin 1927, 63f.

[46] H. v. Lerchenfeld–Koefering, Erinnerungen u. Denkwürdigkeiten, 1848–1925. Berlin 21935, 297 (1890); Briefe u. sozialpolitische Aufsätze von Dr. Rodbertus–Jagetzow, Hg. R. Meyer. I, Berlin 1882, 136 (Rodbertus an Meyer, 29. 11. 1871).

[47] H. Delbrück, Polit. Korrespondenz, Preußische Jahrbücher 57. 1886, 312; Zahlen: Deutsche Wirtschaftskunde. Berlin 1930, 337–42; S. Andić u. J. Veverka,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in Germany Since the Unification, Finanzarchiv 23. 1963/64, 247. Ausgaben p. c.:

1885: 59M.

1891: 158M. 5.1% d. Reichshaushalts

1901: 424M. 8.7%

1907: 686M. 9.6%

1913: 994M. 10.3%

[48] K. E. Born, Staat u. Sozialpolitik nach Bismarcks Sturz, 1890–1914. Wiesbaden 1957, 98, 104f., 178, 183, 214, 218, 223, 101, 90, 96, 246.

### 第三章：(四)

[1] R. Goldscheid, Staat, öffentlicher Haushalt u. Gesellschaft, in: Handbuch der Finanzwissenschaft, Hg. W. Gerloff. I, Tübingen 1926, 171; ders., Staatssozialismus oder Staatskapitalismus. Wien 1917.

[2] W. Gerloff, Der Staatshaushalt u. das Finanzsystem Deutschlands, 1820–1927, in: ders. Hg., III, 1929, 9; diesem unübertroffenen Abriss (1–69) folge ich hier, das nächste Zitat: ebda, 10.

[3] GW VI c, 406 (22. 1. 1889). Folg. Zitat: Rosenberg, Probleme, 69, 19.

[4] F. Hartung, Deutsche Geschichte, 1871–1919, Stuttgart 41952, 232.

[5] Gerloff, 28.

[6] Witt, 275; zur Entwicklung vorher: 139ff., vgl. 292ff.





[7] Provinzial-Korrespondenz 12. 10. 1881.

[8] Gerloff, 19f., 23, 28; A. Wagner, Grundlegung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Leipzig 1982, 895. Allg. Andić/Veverka, 243-78.

[9] Rosenberg, Peppression, 45. Zahlen: A. Spiethoff, Die wirtschaftlichen Wechsellaugen. II, Tübingen 1955, 2; H. Stuebel, Staat u. Banken im preußischen Anleihewesen, 1871-1913. Berlin 1935, 22, 43.

[10] W. Fischer u. P. Czada, Die soziale Verteilung von mobilem Vermögen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Spätmittelalter, in: 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II, Paris 1968, 287. Zahlen: W. G. Hoffmann u. J. H. Müller, Das deutsche Volkseinkommen, 1851-1955, Tübingen 1959; P. Jostock, the Long-term Growth of National Income in Germany, in: Income and Wealth. V, Hg. S. Kuznets. London 1955, 79-122; Andić/Veverka, 241.

[11] P. N. Stearns, European Society in Upheaval. Social History since 1800. N. Y. 1967, 206.

[12] Hoffmann, Wachstum, 86f., 95, 100.

### 第三章：(五)

[1] GWX, 324 (11. 3. 1867) .

[2] Stürmer Hg., 221 (9. 1. 1887) ; Lucius, 51.

[3] Richter: E. Eyck, Bismarck. III, Zürich 1944, 76; Mallinckrodt: A. Wahl, Deutsche Geschichte von der Reichsgründung bis zum Ausbruch des Weltkrieges. I, Stuttgart 1926, 114; Bennigsen: RT 2:1:2:754.

[4] R. Schmidt-Bückerburg, Das Militärkabinett der preußischen Könige u. deutschen Kaiser, 1787-1918. Berlin 1933, 78.

[5]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 Reichskanzlerzeit, 116 (2. 11. 1895) .

[6] Friedrich III., Das Kriegstagebuch von 1870/71, Hg. H. O. Meisner. Berlin 1926, 325.

[7] Großherzog F. v. Baden, 93 (12. 4. 1875) .

[8] Wehler, Krisenherde, 174f.

[9] G. Ritter, Der Schlieffenplan. München 1956, 68f.; zum Folg. 27, 71f., 79, 81, 35.

[10] F. Meinecke,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1946) , in: ders.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Stuttgart 1969, 3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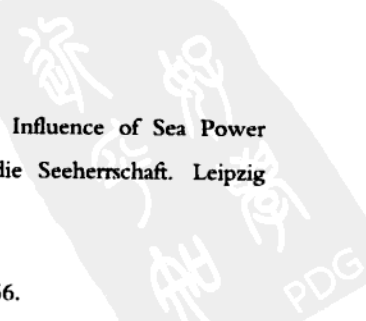
[11] T. v. Bethmann Hollweg, Betrachtungen zum Weltkriege. II, Berlin 1919, 9.



数字图书馆  
PDF



- [12] Ritter, Schlieffenplan, 95, 83, 91.
- [13] H. Bley, Kolonialherrschaft u. Sozialstruktur in Deutsch-Südwestafrika, 1894–1914. Hamburg 1968, 203f.
- [14] G. Ritter, Staatskunst u. Kriegshandwerk. I, München 1954, 32.
- [15] Ebda. II, 1960, 115.
- [16] MEW 17, 106 (Engels, 17. 9. 1870) .
- [17] A. v. Roon, Denkwürdigkeiten. III, Berlin 1905, 390 (4. 2. 1874) .
- [18] W. an v. Gossler, 20. 2. 1897 Nl. Bülow, 22, 85–91, BA. A. v. Waldersee, Denkwürdigkeiten, Hg. H. O. Meisner. II, Stuttgart 1923, 388 (an Wilh. II, 27. 1. 1897) .
- [19] W. Deist, Die Armee in Staat u. Gesellschaft, 1890–1914, in: Das Kaiserliche Deutschland, 318, 329.
- [20] Roon, I, 154 (25. 3. 1848) .
- [21] Stadelmann, Moltke, 407 (6. 12. 1861) .
- [22] Schweinitz, Denkwürdigkeiten. I, 259 (26. 5. 1870) .
- [23] Waldsee an Manteuffel. 8. 2. 1877, nach: Ritter, II, 360f.
- [24] Der Weltkrieg, Anlagen II, 91 (Nr. 26, 19. 4. 1904) .
- [25] M. Kitchen, The German Officercorps 1890–1914. Oxford 1968, 5, 22, 24; Deist, 322; Kehr, Primat, 58.
- [26] Der Weltkrieg, II, 180 (Nr. 56, 20. 1. 1913) ; vorher: H. Herzfeld, Die deutsche Rüstungspolitik vor dem Weltkrieg. Bonn 1923, 63.
- [27] Kitchen, 148; Antisemitismus: 22–48; Ehrengerichte: 51.
- [28] Wehler, Krisenherde, 65–83.
- [29] Messerschmidt, 110.
- [30] Kitchen, 132, 141f., K. Saul, Der „Deutsche Kriegerbund“, Militärgeschichtlichen Mitteilungen 1969/ II, 159.
- [31] V. Berghahn, Der Tirpitz-Plan. Düsseldorf 1971.
- [32] A. v. Tirpitz, Erinnerungen. Leipzig 1920, 98, 96, 52.
- [33] Kehr, Schlachtflottenbau, 45, 107; A.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Boston 1890; vgl. Ders., Die weiße Rasse u. die Seeherrschaft. Leipzig 1909.
- [34] T. Heuss, F. Naumann. Stuttgart 1937, 138.
- [35] Bethmann an Valentini, 9. 12. 1915, nach Stegmann, 456.
- [36] Beehler an State Dept., 31. 3. 1900, Record Group 59,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 C.

[37] Dazu Kehr u. Berghahn.

[38] Berghahn, 392.

第三章：(六)

[1] Wehler, Bismarck, 41f.; ders., Krisenherde, 306f.

[2] Nipperdey, Grundzüge, 832f.

[3] E. v. Weber, 4 Jahre in Afrika. II, Leipzig 1878, 564; zum Folg.: Wehler, Bismarck, 112-93, spez. 121, 163.

[4] Miquel nach: H. Böhme, Deutschlands Weg zur Großmacht. Köln 1972, 316; Holstein an Kiderlen, 30. 4. 1897, Nl. Kiderlen (Kopie Böhme) ;ähnlich an Eulenburg, 4. 12. 1894, in: J. Haller Hg., Aus dem Leben des Fürsten P. Zu Eulenburg. Berlin 1924, 173.

[5] In: A. Kirchhoff Hg., Deutsche Universitätslehrer über die Flottenvorlage. Berlin 1900, 21.

[6] Tagebuch 31. 12. 1895, in: H. Mohs Hg., A. Graf v. Waldsee in seinem militärischen Wirken. II, Berlin 1929, 383; Bülow an Eulenburg, 26. 12. 1897, in: Röhl, Deutschland, 229.

[7] B. v. Bülow, Deutsche Politik, in: Deutschland unter Kaiser Wilhelm II., Hg. S. Körte u. a. I, Berlin 1914, 97f.

[8] K. D. Bracher, Deutschland zwischen Demokratie u. Diktatur. München 1964, 155.

[9] A. L. v. Rochau, Grundsätze der Republik. Stuttgart 1853, 28 (Hg. H.-U. Wehler, Berlin 1972, 40) .

[10] MEW 30, 249 (18. 6. 1862) ; 20, 565 (Dialektik der Natur) ; an Lawrow, 12./17. 11. 1875, ebda, 34, 170; H. Plessner, Zur Soziologie der modernen Forschung, in: Versuchs zu einer Soziologie des Wissens. München 1924, 423.

[11] G. Himmelfarb, Darwin and the Darwinian Revolution. N. Y. 1959, 157-61, 235f.; 393-96; R. M. Young, Malthus and the Evolutionists: The Common Context of Biological and Social Theory, Past & Present 43. 1969, 109-45; H.-U. Wehler, Sozialdarwinismus im expandierenden Industriestaat, in: Fs. F. Fischer, Düsseldorf 1973, 133 42; C.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I, N. Y. 1871, 154, 173f.; ders., Life and Letters, Hg. F. Darwin. I, London 1887, 69, 316.

[12] Hilferding, 504-6; ähnlich Bauer, 491-507.



第三章：(七)

[1] Nach A. Hillgruber, Entwicklung, Wandlung u. Zerstörung 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s, 1871–1945; in: 1871. Fragen an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Berlin 1971), 171–203.

[2] Ranke nach: E. Kessel, Rankes Auffassung der amerikanischen Geschichte, Jahrbuch für Amerikastudien 7. 1962, 31 (aus dem Nachlaß).

[3] MEW 17. 1964, 268–79; hierzu Wehler, Krisenherde, 22f.; Wilhelms . Urteil: ebda, 331, Anm. 16.

[4] Bismarck an Arnim, 2. 2. 873, GP I, Nr. 96; Wehler, Bismarck, 316.

[5] A. v. Waldsee, Aus dem Briefwechsel, Hg. H. O. Meisner. I., Berlin 1928, 36, 57, 69; K. E. Jeismann, Das Problem des Präventivkriegs, Freiburg 1957, 109ff.; Bismarck an Bronsart, 31. 12. 1887, GW 6c, 378f.

[6] Wehler, Krisenherde, 334f., Anm. 31; GP XII, 279 (22. 1. 1897); Schlieffen: Kitchen, 105.

[7] B. v. Bülow, Denkwürdigkeiten. I, Berlin 1930, 429; Schweinitz, Briefwechsel; 193.

[8] F. Ponsonby Hg., Briefe der Kaiserin Friedrich. Berlin 1929, 471; Queen Victoria, Letters. 2. S., III, London 1928, 505f.; Holstein, II, 167; GW 8, 381, 383.

[9] Holstein, I, 123. Das Folgende nach: Wehler, Krisenherde, 163–80.

[10] R. Wittram, Bismarcks Rußlandpolitik nach der Reichsgründung, in: H. Hallmann Hg., Zur Geschichte und Problematik des deutsch–russischen Rückversicherungsvertrags von 1887. Darmstadt 1968, 469.

[11] Bismarck an Reuss, 15. 12. 1887, GP VI, 1163; Stürmer Hg., 245; Wehler, Krisenherde, 175.

[12] H. Oncken, Das alte u. das neue Mitteleuropa. Gotha 1917, 56.

第三章：(八)

[1] F. Fischer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üsseldorf 1961; ders., Krieg der Illusionen. Die deutsche Politik 1911–14. Düsseldorf 1969.

[2] Fischer, Krieg, 366.

[3] F. Meinecke, Werke II, Darmstadt 1958, 62 (22. 5. 1912); W. J. Mommsen, 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 1971, 485.

[4] Bueck und Erzberger werden zitiert in: Fischer, Krieg der Illusionen, 53, 47. Vgl. D. Groh, Negative Integration u. revolutionärer Attentismus,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1909–1914. Berlin 1973, Kap. 4; ders., Je eher, desto besser. Innenpolitische Faktoren für



die Präventivkriegsbereitschaft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13/14, PVS 13. 1972, 501–21; Gespräch Rratibors mit Cambon: *The Diary of Lord Bertie of Thame, 1914–18*, Hg. L. A. G. Lennox. I, London 1924, 352, 355 (1./2. 6. 1916, von Cambon); Lerchenfeld: P. Dirr Hg.,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Kriegsausbruch*. München 1925, 113 (4. 6. 1914); Heydebrand: K. Riezler, *Tagebücher*, Hg. K. D. Erdmann. Göttingen 1972, 183 (7. 7. 1914).

[5] Gespräch Bethmann mit Hausmann, 24. 1. 1918, nach: W. Steglich, *Die Friedenspolitik der Mittelmächte. I*, Wiesbaden 1964, 418 (dort auch "in 2 Jahren").

[6] Nach Lerchenfeld u. Riezler, Anm. 4.

[7] Mommsen, 493.

[8] Burckhardt Briefe, V, 160; MEW 21, 350f.; F. X. Kraus, *Tagebücher*, Hg. H. Schiel. Köln 1957, 684 (21. 3. 1897, von Jolly nach Besuch in Friedrichsruh).

[9] Dies und das Folgende nach F. Lütge, *Die deutsche Kriegsfinanzierung im 1. und 2. Weltkrieg*, in: Fs. R. Stucken. Göttingen 1953, 243–57, Zit. 249f.; R. Andexel (*Imperialismus, Staatsfinanz, Rüstung, Krieg*. Berlin 1968, 15–59) schätzt 150 170 Mrd., täglich 85–95 Mill. M.: England: 105, Frankreich: 74, alle: 485 Mrd. M.

[10] Nach G. Keiser, *Die Erschütterung der Kreditwirtschaft zu Beginn des Krieges 1914/18*, *Bankarchiv* 39. 1939, 505.

[11] G. D. Feldman, *Army, Industry and Labor in Germany, 1914–18*. Princeton 1966, 149–249; neben der zu III. 8 ständig heranzuziehenden Analyse von Kocka (*Klassengesellschaft*) die beste Arbeit hierzu.

[12] So der Untertitel der vorzüglichen Studie von: K.-H. Janssen, *Macht u. Verblendung*. Göttingen 1963. Die Lit. über die Kriegsziele in: W. Schieder Hg., *Erster Weltkrieg*. Köln 1969.

[13] S. Anm. 4 u. MEW 21, 351.

[14] A. Hillgruber, *Deutschlands Rolle in der Vorgeschichte der beiden Weltkriege*. Göttingen 1967, 58.

[15] Zitate: ebda, 64, 66, vgl. 60–67; Zit. unten: 63. Die Verträge: H. Stoecker Hg., *Handbuch der Verträge, 1871–1964*. Berlin 1968, 171–75.

[16] Ludendorff an H. Delbrück, 29. 12. 1915, nach: E. Zechlin, *Ludendorff im Jahre 1915*, HZ 211. 1970, 352.

[17] Dazu Wehler, *Krisenherde*, 98–109.

[18] K. Kraus, *Unsterblicher Witz*. München 1961, 318, 329.

[19] H. Delbrück: *Das Werk des Untersuchungsausschusses der Verfassungsgebenden*



Handwritten text: 德意志图书馆 (German Library) and a large 'PDG' watermark.



Deutschen Nationalversammlung u.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 Reihe IV, 4, 156, vgl. 2, 173; 7, 261. Bauer: W. Deist Hg., Militär u. Innenpolitik im Weltkrieg, 1914–18. II, Düsseldorf 1970, 651f. (Nr. 246), dort in der Einl. zu Bd. I Argumente gegen die OHL-Diktatur-These; vgl. auch v. Thaer (u. Anm. 23), 151, 198.–W. J. Mommsen, Die deutsche öffentliche Meinung u. der Zusammenbruch des Regierungssystems Bethmann Hollweg,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 Unterricht 20. 1969, 657, Anm. 4; Wehler, Krisenherde, 364, Anm. 37.

[20] Nach: Stegmann, 501 (3. 8. 1918), vgl. 497–519.

[21] Meinecke, Werke II, 251, vgl. 222.

[22] Ders., Autobiogr. Schriften, 354 (Deutsche Katastrophe, 1946).

[23] A. v. Thaer, Generalstabsdienst an der Front u. in der Obersten Heeresleitung, Hg. S. A. Kaehler. Göttingen 1958, 234f. Riezler, 480.

[24] Thaer, 236, W. Groener, Lebenserinnerungen, Hg. F. Hiller v. Gaertringen. Göttingen 1957, 466; Stegmann, 515.

[25] Werk des Untersuchungsausschusses, IV, 2, 401; 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Berlin 1929, 169; Feldman, 516, vgl. 363, 502–7; Groener, 450.

[26] E. Matthias u. R. Morsey, Die Bildung der Regierung des Prinzen M. v. Baden, in: Vom Kaiserreich zur Weimarer Republik, Hg. E. Kolb. Köln 1972, 76, Anm. 68 (nach P. Scheidemann, Memorien eines Sozialdemokraten. II, Dresden 1928, 187); dort z. B. die erwähnte These.

[27] A. Rosenberg, 218; E. Matthias u. R. Morsey Hg., Die Regierung des Prinzen M. v. Baden. Düsseldorf 1962, 216 (16. 10. 1918).

[28] Deist, II, 1316, Anm. 8; ders., Die Politik der Seekriegsleitung u. die Rebellion der Flotte Ende Oktober 1918,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14. 1966, 341–68; W. Sauer, Das Scheitern der parlamentarischen Monarchie, in: Kolb Hg., 77–99.

[29] E. Troeltsch, Spektator-Briefe. Tübingen 1924, 19 (30. 11. 1918). Das folgende im Anschluß an R. Rürup (Probleme der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918/19. Wiesbaden 1968), E. Kolb Hg. und die dort resümierte neue Lit. (v. Oertzen, Kolb, Tormin u. a.).

[30] Kolb, 25, u. H. Grebing, ebda, 386–403. Die alte Version: K. D. Erdmann, Das Zeitalter der Weltkriege (Gebhardt IV). Stuttgart 1959, 77–92.

[31] Rürup, 20.

[32] Riezler, 359 (14. 6. 1916); Troeltsch, 302f.; Mayer, Erinnerungen, 314.

[33] G. D. Feldman u. a., Die Massenbewegungen der Arbeiterschaft in Deutschland



am Ende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917–1920) , PVS 13. 1972, 85 (Zit.) ; ders., The Origins of the Stinnes–legien Agreement, in: Fs. Rosenberg, Berlin 1970, 312–41.

[34] R. N. Hunt, F. Ebert u.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von 1918, in: Kolb Hg., 135 (danach unten über die Militärpolitik) .

[35] G. Mann, Deutsche Geschichte des 19. u. 20. Jhs. Frankfurt 1958, 670.

[36] Feldman u. a., 97.

[37] Troeltsch, 15.

[38] Nach Gesichtspunkten von G. A. Ritter, ,Direkte ,Demokratie ' u. Rätewesen in Geschichte u. Theorie, in: E. K. Scheuch Hg., Die Widertäufer in der Wohlstandsgesellschaft. Köln 1969, 188–216.

#### 第四章：

[1]J. Ziekursch, Politische Geschichte des Neuen Deutschen Kaiserreichs. I , Frankfurt 1925 3f.

[2]W. Rathenau, Briefe. I , 250 (an E. Norlind, 1. 4. 1917).

[3]Rochau, Hg. Wehler, 9.

[4]GW 8, 340; RB 13, 105; vgl. 4, 192; 12, 380; 13, 130.

[5]Burckhardt, V , 130 (12. 10. 1871).

[6]Meinecke, Werke II ,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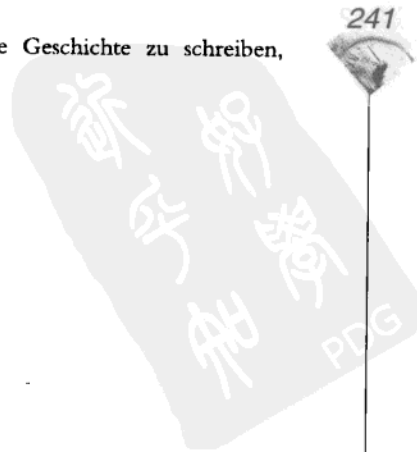
[7]Riezler, 359; Weber, Polit. Schriften, 235; Stegmann, 502; G. Schmoller, Die preußische Wahlrechtsreform von 1910, Schmollers Jahrbuch 33. 1910, 357, 361–64.

[8]Vgl. Committ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Hg., Studi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7 Bde, Princeton 1963–71, vor allem L. Binder Hg., Crises, 1971.

[9]Riezler, 426 (13. 4. 1917).

[10]Rosenberg, Probleme, 7–49.

[11]P. Kielmansegg, Von den Schwierigkeiten, deutsche Geschichte zu schreiben, Merkur 276. 1971, 366–79.





### 三、文献目录

以下参考文献根据两方面的考虑做了简单的选录：一是考虑到具有普遍重要性的研究学习所需的文献（尽可能地囊括继续深入研究所需的文献目录）；二是考虑到特别令人兴奋的研究所需的著作。

#### 原始材料和文献索引

Dahlmann - Waitz, Quellenkunde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Hg. H. Heimpel. Stuttgart seit <sup>10</sup>1969. - Knapp: W. Baumgart Hg., Bücherverzeichnis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Berlin 1971.

##### (一) 通史和政治史

Th. Schieder Hg., Handbuch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VI, Stuttgart 1968, XV - 230. - H. Grundmann Hg., Gebhardt - Handbuch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III, Stuttgart <sup>9</sup>1970, 140 - 375; XV/1, <sup>9</sup>1974. - E. Büssem u. M. Neher Hg., Repetitorium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Neuzeit 3: 1871 - 1914. München 1972.

##### (二) 宪法史

E. R.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III u. IV, Stuttgart 1963/69. - E. - W. Böckenförde u. R. Wahl Hg., Moderne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1815 - 1918. Köln 1972, 471 - 92.

##### (三) 社会史

H. - U. Wehler Hg., Moderne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 Köln <sup>5</sup>1976, 565 - 640. - W. Köllmann u. P. Marschalck Hg.,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Köln 1972, 391 - 400.

##### (四) 经济史

H. - U. Wehler, Problem der modernen deutsch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in: ders., Krisenherde des Kaiserreichs, 1871 - 1918. Göttingen 1970, 408 - 30. - D. S. Lande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1750 - 1914,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I/2. 1965, 943 - 1007. - Vgl. auch jeweils die Artikel in der IESS, im Handwörterbuch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1953 - 68) und im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sup>3</sup>1909 u. <sup>4</sup>1924).





### 有关历史写作的文献

Deutsche Historiker, Hg. H.-U. Wehler. 5 Bde, Göttingen 1971/72, in 1 Bd. 1973. -J. Streisand Hg., Studien über di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2 Bde, Berlin 1963/65. -G. Iggers,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München <sup>2</sup>1972. -Theoriefragen: H.-U. Wehler, Geschichte als 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 Frankfurt 1973.

#### 各种不同视角下的通史类著述

G. Mann, Deutsche Geschichte des 19. u. 20. Jhs. Frankfurt 1958 u. ö. -A. Rosenberg, Entstehung u.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1955 u. ö., 17-319. -K. Buchheim,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8. München 1969. -J. Ziekursch, Politische Geschichte des Neuen Deutschen Kaiserreiches. 3 Bde, Frankfurt 1925/30. -E. Engelberg, Deutschland 1871-1897. Berlin 1965; F. Klein, Deutschland 1897-1917. Berlin <sup>3</sup>1969. -E. Eyck, Bismarck. 3 Bde, Zürich 1941/44; ders., Das persönliche Regiment Wilhelms II. Zürich 1948.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XI: 1870-98. 1962; XII: 1898-1945. 1960 u. neu 1968. Vgl. auch: R. Dahrendorf, Gesellschaft u.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1965 u. ö.; G. Barraclough, Tendenz der Geschichte im 20. Jh. München <sup>2</sup>1970; A. Mayer, Dynamics of Counter-revolution in Europe 1870-1956. N. Y. 1971.

#### 新的资料手册和文集

Das Kaiserliche Deutschland, Hg. M. Stürmer. Düsseldorf <sup>2</sup>1977; Probleme der Reichsgründungszeit, 1848-79, Hg. H. Böhme. Köln <sup>2</sup>1973; Wehler, Krisenherde; Die großpreußisch-militäristische Reichsgründung, Hg. H. Bartel u. E. Engelberg. 2 Bde, Berlin 1971.

#### 本书各章相关参考文献

##### 第一章

一、有关农业史参见：II.1. Zum Landadel: H. Rosenberg, Probleme der deutschen Sozialgeschichte. Frankfurt 1969; F. Tönnies, Deutscher Adel im 19. Jh., Neue Rundschau 23. 1912/II, 1041-63; R. Meyer, Adelsstand u. Junkerklasse, Neue Deutsche Rundschau 10. 1899, 1078-90; H. Preuss, Die Junkerfrage. Berlin 1897. Ein sozialhistorisches Kollektivporträt fehlt. Vgl. die Lit. oben C.

二、有关工业化史参见：II.1, sowie W. G. Hoffmann, The Take-Off



in Germany, in: W. W. Rostow Hg., *The Economics of Take-Off into Sustained Growth*. London <sup>2</sup>1968, 95-118; H. Böhme, *Deutschlands Weg zur Großmacht, 1848-81*. Köln <sup>2</sup>1972; T. S. 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Germany, 1815-71*. Princeton 1958; ders.,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German Unification, 1858-71*. 2 Bde, Princeton 1969/73; H. Rosenberg, *Die Weltwirtschaftskrisis 1857-59*. Stuttgart 1934, Neudr. Göttingen 1974.

三、E. N. Anders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Prussia, 1858-64*. Lincoln 1954; zuletzt: R. Wahl, *Der preußische Verfassungskonflikt u. das konstitutionelle System des Kaiserreichs*, in Böckenförde u. Wahl, 171-94; G. Mayer, *Radikalismus, Sozialismus u. bürgerliche Demokratie*, Hg. H.-U. Wehler. Frankfurt <sup>2</sup>1969, mit Lit. über Liberalismus u. Arbeiterbewegung in den 1860er Jahren.

四、有关战争政策（最重要的文献）：J. Becker, *Der Krieg mit Frankreich als Problem der kleindeutschen Einigungspolitik Bismarcks 1866 bis 1870*, in: *Das Kaiserliche Deutschland*, 77-88; ders., *Zum Problem der Bismarckschen Politik in der spanischen Thronfrage 1870*, HZ 212. 1971, 529-607, wo gegen die unhaltbare Enlastung der preußischen Politik bei E. Kolb (*Der Kriegsausbruch 1870*. Göttingen 1970) überzeugend argumentiert wird.

## 第二部分

一、有用的统计资料：W. G. Hoffmann u. a., *Das Wachst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Heidelberg 1965; A. Spiethoff, *Die wirtschaftlichen Wechsellagen*. 2 Bde, Tübingen 1955, vor allem die Tafeln in II.-K. Borchard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ermany*. London 1972. dt. München 1972; D. André, *Indikatoren des technischen Fortschritts. Eine Analyse de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in Deutschland 1850-1913*. Hamburg 1971. Anregend vor allem: H. Rosenberg, *Große Depression u. Bismarckzeit*. Berlin <sup>2</sup>1976. Überblick: U.-U. Wehler, *Bismarck u. der Imperialismus*. Dtv, <sup>4</sup>1976, 39-111. Speziell zu 1873-79: H. Mottek, *die Gründerkrise*,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66/ I, 51-128. Eine moderne wirtschaftshistorische Gesamtdarstellung fehlt. Zur Agrarwirtschaft: H. Rosenberg, *Probleme*; ders., *Große Depression*; W. Albel, *Agrarkrisen u. Agrarkonjunktur*. Berlin <sup>2</sup>1966;



H. W. Finck v. Finckenstein, Die Entwicklung der Landwirtschaft, 1800–1930. Würzburg 1960; S. v. Ciriacy-Wantrup, Agrarkrisen u. Stockungsspannen. Berlin 1936. Eine moderne Gesamtdarstellung fehlt auch hier. Zur Bevölkerungsentwicklung bis 1918: Köllmanns Studien, in: Mod.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 613f.; F. Zahn, Die Entwicklung der räumlichen, beruflichen u. sozialen Glieder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seit dem Aufkommen der industriell-kapitalistischen Wirtschaftsweise, in: B. Harms hg., Volk u. Reich der Deutschen. I, Berlin 1929, 220–79; G. Neuhaus, Die berufliche u. soziale Gliederung der Bevölkerung im Zeitalter des Kapitalismus; ders., Die Bewegung der Bevölkerung im Zeitalter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beides in: Grundrider Sozialökonomik. IX. 1, Tübingen 1926, 360–505.

二、Eine mit Rosenbergs Buch vergleichbare Studie gibt es hierzu noch nicht. Man kann ausgehen von: E. W. Axe u. H. M. Flinn, An Index of General Business Conditions for Germany, 1898–1914,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7. 1925, 263–87; W. Paretti u. G. Bloch,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01–1955,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Quarterly Review 9. 1956, 186–234; A. Feiler, Die Konjunkturperiode 1907–13. Jena 1914; P.–C. Witt, Die Finanz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03–13. Lübeck 1970. Zur Agrargeschichte s. II. 1.–Über den Organisierten Kapitalismus und die Anfänge des Interventionsstaats in dieser Zeit setzt jetzt erst die Diskussion ein, z. B.: 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 Hg. H. A. Winkler, Göttingen 1974 (darin H.–U. Wehler, Der Aufstieg des Organisierten Kapitalismus u. Interventionsstaats in Deutschland, und J. Kockas Beitrag). S. Hierzu noch: S. Andić u. J. Veverka,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n Germany Since the Unification, Finanzarchiv 23. 1963, 169–278; H. Timm, Das Gesetz der wachsenden Staatsausgaben, ebda 21. 1961, 207–47; J. P. Cullity,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al Employment in Germany 1882–1950, ZGS 123. 1967, 201–17; J. A. Schumpeter, Die Krise des Steuerstaats, in: ders., Aufsätze zur Soziologie. Tübingen 1953, 1–71; F. Neumark, Wirtschafts- u. Finanzprobleme des Interventionsstaats. Tübingen 1961; F. Facius, Wirtschaft u. Staat. Die Entwicklung der staatlichen Wirtschaftsverwaltung in Deutschland bis 1945. Boppard 1959.



### 第三章

—

(一) Allgemeine Einführung: E.-W. Böckenförde, Der Verfassungstyp der deutschen konstitutionellen Monarchie im 19. Jh., in: ders u. Wahl, 146 bis 70; H. Boldt, Deutsche Konstitutionalismus u. Bismarckreich, in: Das Kaiserliche Deutschland, 119-42; E. Kehr, 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 Hg. H.-U. Wehler. Berlin 31976.

(二) Spezielle und vergleichende Studien fehlen noch. Vorerst: e. Engelberg, Zur Entstehung u. historischen Stellung des preußisch-deutschen Bonapartismus, in: Fs. A. Meusel. Berlin 1956, 236-51; H. Gollwitzer, Der Cäsarismus Napoleons III. im Widerhall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Deutschlands, HZ 173. 1952, 23-75; R. Griepenburg u. K. H. Tjaden, Faschismus u. Bonapartismus, Das Argument 8. 1966 (41), 461-72; auch R. C. Tucker, The Theory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Daedalus 97. 1968, 731-56.

(三) Informativ, aber personalistisch zugespitzt und die strukturellen Antriebskräfte verfehlend: J. Röhl, Deutschland ohne Bismarck, 1890-1900. Tübingen 1969. Vgl. Damit Eyck, Das Persönliche Regiment, u. J. A. Nichols, Germany after Bismarck, 1890-94. Cambridge/Mass. 1958, vor allem: G. U. Scheideler, Parlament, Parteien u. Regierung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1890-1914, Aus Politik u. Zeitgeschichte B 12/71, 16-24, u. D. Stegmann, Die Erben Bismarcks, Parteien u. Verbände in der Spätphase des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s. Sammlungspolitik 1897-1918. Köln 1970. Zum Reichstag u. den-wahlen: J. J. Sheehan,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the German Reichstag, 1871-1918, AHR 74. 1968, 511-28, dt. In: G. A. Ritter Hg. Deutsche Parteien vor 1918. Köln 1973; C. G. Crothers, The German Elections of 1907. N. Y. 1941; D. Fricke, Der deutsche Imperialismus u. die Reichstagswahlen 1907, ZfG 9. 1961, 538-76; J. Bertram, Die Wahlen zum Deutschen Reichstag vom Jahre 1912. Düsseldorf 1964. M. Stürmer, Regierung u. Reichstag im Bismarckstaat 1871-1880. Düsseldorf 1974.

(四) Zur Bürokratie vor allem E. Kehr, Das soziale System der Reaktion in Preußen unter dem Ministerium Puttkamer, in: Primat, 64-86; R.



Morsey, Die Oberste Reichsverwaltung unter Bismarck, 1870–90. Münster 1957; L. W. Muncy, The Junker in the Prussian Administration, 1888–1914. N. Y. 1970; J. Röhl, Beamtenpolitik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in: Das Kaiserliche Deutschland, 287–311. Weitere wichtige Lit. In: Mod.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 587ff. Kritik der Mißstände u. Korruption: P.–C. Witt, Der preußische Landrat als Steuerbeamter 1891–1918, in: Fs. F. Fischer. Düsseldorf 1974, 205–19; L. Schücking, Die Reaktion in der inneren Verwaltung Preußens. Berlin 1908. Allg. Bürokratieproblem u. Industrie: J. Kocka, Vorindustrielle Faktoren in der deutschen Industrialisierung, in: Das Kaiserliche Deutschland, 265–86; ders., Unternehmensverwaltung u. Angestelltenschaft, Siemens 1847–1914. Stuttgart 1969; seine weiteren Arbeiten in: Mod.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 613; R. Mayntz Hg., Bürokratische Organisation. Köln 1968; R. K. Merton u. a. Hg., Bureaucracy. N.Y. 1952 u.ö. Vorzüglich ist: H.–J. Puhle, Vom Wohlfahrtsausschuß zum Wohlfahrtsstaat, in: G. A. Ritter Hg., dass., Köln 1973, 29–68 u. W. Schluchter, Aspekte bürokratischer Herrschaft, München 1972.

## 二

(一) Allgemein zur Parteiengeschichte: L. Bergsträsser u. W. Mommsen, Geschichte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1965; W. Tormin,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arteien seit 1848. Stuttgart 1970; D. Fricke Hg., Die bürgerlichen Parteien in Deutschland, 1830–1945. 2 Bde, Leipzig 1968/70; W. Mommsen Hg., Deutsche Parteiprogramme. München 1960 u.ö. – T. Nipperdey, Über einige Grundzüge der deutschen Parteigeschichte, in: Moderne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237–57; R. Lepsius, Parteiensystem u. Sozialstruktur in: Fs. Lütge. Stuttgart 1966, 371–93; ders., Extremer Nationalismus. Stuttgart 1966; ders.,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als historisch-soziologisches Problem, in: Spätkapitalismus o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Hg. T. W. Adorno. Stuttgart 1969, 197–213; E. Pilart, Die Rolle der Parteien im deutschen konstitutionellen System vor 1914, in: Böckenförde u. Wahl, 258–81; D. Grosser, Vom monarchischen Konstitutionalismus zur parlamentarischen Demokratie. Den Haag 1970.

1. Eine modern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liberalen steht noch aus, die ältere lit. Findet man aber in Fricke's Handbuch und in den folgenden Ar-



beiten: G. Seeber, Zwischen Bebel u. Bismarck. Zur Geschichte des Linksliberalismus in Deutschland 1871–1893. Berlin 1965; L. Elm, Zwischen Fortschritt u. Reaktion. Geschichte der Parteien der liberalen Bourgeoisie in Deutschland 1893–1918. Berlin 1968, G. R. Mork, Bismarck and the „Capitulation“ of German Liberalism, *JMH* 43. 1971, 59–75; J. J. Sheehan, Liberalism and the City in 19th Century Germany, *Past & Present* 51. 1971, 116–37.

2. Eine bis 1917 führende Darstellung fehlt. Guteüberblicke: R. Morsey, Die deutsche Katholiken u. der Nationalstaat zwischen Kulturkampf u. dem I. Weltkrieg, *Historisches Jahrbuch* 90. 1970, 31–64; H. Maier, Katholizismus, nationale Bewegung u. nationale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Hochland* 57. 1965, 318–33. Noch immer nicht ersetzt: K. Bachem, Vorgeschichte, Geschichte u. Politik der deutschen Zentrumspartei, 1814–1914. 8 Bde, Köln 1927/32, Aalen <sup>2</sup>1965.

3. Moderne Parteigeschichten der verschiedenen konservativen Parteien fehlen noch immer. Zur Einführung: S. Neumann, Die Stufen des preußischen Konservatismus. Berlin 1930; R. M. Berdahl, Conservative Politics and Aristocratic Landholders in Bismarckian Germany, *JMH* 44. 1972, 1–20; H. Booms, Die Deutsch-Konservative Partei. Düsseldorf 1954; H.-J. Puhle, Agrarische Interessenpolitik u. preußischer Konservatismus im wilhelminischen Reich 1893–1914. Hannover 1966 (<sup>2</sup>1975); Stegmann.

4. Am stärksten ist die Forschung zur Geschichte der Sozialdemokratie in Bewegung geraten. Als Auswahl: G. Roht, Social Democrats in imperial Germany. Totowa 1963; V. L. Lidtke, The Outlawed Party, 1878–1890. Princeton 1966; G. A. Ritter, Die Arbeiterbewegung im wilhelmischen Reich, 1890–1900. Berlin <sup>2</sup>1963; H. J. Steinberg, Sozialismus u.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Bonn <sup>3</sup>1972; H.-C. Schröder, Sozialismus u. Imperialismus. I, Hannover <sup>2</sup>1975. C. E.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 London <sup>2</sup>1973; D. Groh, Negative Integration u. revolutionärer Attentismus, 1909–14. Berlin 1973; H.-U. Wehler, Sozialdemokratie u. Nationalstaat, 1840–1914. Göttingen <sup>2</sup>1971.

(二) Wichtig zur Information: Frickes Handbuch. Allg. H. J. Puhle, Parlament, Parteien u. Interessenverbände, 1890–1914, in: Das Kaiserliche



Deutschland, 340–37; ders., Von der Agrarkrise zum Präfaschismus. Wiesbaden 1972; H. A. Winkler, Pluralismus oder Protektionismus? Verfassungspolitische Probleme des Verbandswesens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Wiesbaden 1972; W. Fischer, Staatsverwaltung u. Interessenverbände im Deutschen Reich 1871–1914, in: ders., Wirtschaft u. Gesellschaft im Zeitalter der Industrialisierung. Göttingen 1972, 194–213; T. Nipperdey, Interessenverbände u. Parteien in Deutschland vor dem I. Weltkrieg, in: Moderne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 369–88; Interessenverbände in Deutschland, Hg. H. J. Varain, Köln 1973.–Speziell: Puhle, Agrarische Interessenpolitik; ders., Der BdL im wilhelmischen Reich, in: W. Ruegg u. O. Neuloh Hg., Zur soziologischen Theorie u. Analyse des 19. Jhs. Göttingen 1971, 145–62.–H. Kaelble, Industrielle Interessenpolitik in der wilhelminischen Gesellschaft, 1894–1914. Berlin 1967; ders., Industrielle Interessenverbände vor 1914, in: Ruegg/Neuloh, 180–92.–S. Mielke, Der „Hansa-Bund“. 1912–1914. Göttingen 1976.–H. A. Winkler, Der rückversicherte Mittelstand: Die Interessenverbände von Handwerk u. Kleinhandel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in: Ruegg/Neuloh, 163–79.–Über Flottenverein und Wehrverein gibt es keine neueren Monographien. A. Galos u. a., Die Hakatisten. Der Deutsche Ostmarkenverein 1894–1934, Berlin 1966. Eine Geschichte der Kolonialverbände fehlt, vgl. Aber Wehler, Bismarck u. der Imperialismus, 158–68, auch in: Varain Hg. A. Kruck, Geschichte des Alldeutschen Verbandes, 1890–1939. Wiesbaden 1954; E. Hartwig, Zur Politik u. Entwicklung des Alldeutschen Verbandes, 1891–1914. phil. Diss. Jena 1966, MS. Gewerkschaften. D. Fricke Hg., Di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 1869–90; Zur Organisation u. Tätigkeit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1890–1914. Leipzig 1964/62; H. Wachenheim, Di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 1844–1914. Frankfurt 1971, Lit.: 641–69, u. in: Ritter, 2. 1. 4.

(三) Hierzu: W. Sauer, Das Problem 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s, in: Moderne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 407–36.

(四) Vgl. Hierzu die Diskussion in: Stegmann; Böhme; Wehler, Bismarck u. der Imperialismus; Winkler; Puhle u. Berghahn: 5.3.

三

(一) In erster Linie das billante Buch von L. Krieger, 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 Chicago <sup>2</sup>1972; daneben H. Lübke, Politische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sup>2</sup>1974; Aufsätze von K. D. Bracher, Das Deutsche Dilemma. München 1971, 11–40; F. Stern, The Failure of Illiberalism. N. Y. 1972, XI–XLIV, 3–25, dt. In: Das Kaiserliche Deutschland, 168–86; R. Dahrendorf, Gesellschaft u. Freiheit. München 1961. Allg. hierzu: W. Gottschalch u. a., Geschichte der sozialen Ideen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1969; L. W. Pye u. S. Verba Hg.,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1965, 3–26, 130–170, 512–60.

(二) Aus der riesigen Literatur nur: R. M. Berdahl, New Thoughts on German Nationalism, AHR 77. 1972, 65–80; E. Kehr, Englandhaß u. Weltpolitik, in: ders., Primat, 149–75; P. R. Anderson, The Background of Anti-English Feeling in Germany 1890–1902. N. Y. <sup>2</sup>1969; H. Plessner, Die verspätete Nation. Stuttgart <sup>3</sup>1959; T. Schied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von 1871 als Nationalstaat. Köln 1961. Weiterführend: K. W.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Mass. <sup>2</sup>1966; fast klassischer Überblick: H. Koln, Die Idee des Nationalismus. Heidelberg 1950 u.ö.

(三) R. Rürup u. T. Nipperdey, Antisemitismus,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 Stuttgart 1972, 129–53; A. A. Rogow, Anti-Semitism, IESS 1. 1968, 345–49; A. Bein, Die Judenfrage in der Literatur des modernen Antisemitismus, Bulletin L. Baeck Institute 6. 1963, 4 51; W. Boehlich Hg., Der Berliner Antisemitismus-Streit. Frankfurt 1965; H. M. Klinkenberg, Zwischen Liberalismus u. Nationalismus im dt. Kaiserreich 1870–1918, in: Monumenta Judaica. Köln 1963, 309 84; P. W. Massing, Vor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Antisemitismus. Frankfurt 1959; P. Pulzer, Die Entwicklung des politischen Antisemitismus in Deutschland u. Österreich 1867 1914. Gütersloh 1966. Nationalitätspolitik: H.-U. Wehler, Polenpolitik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1871–1918, in: ders., Krisenherde, 181–200; ders., Sozialdemokratie u. Nationalstaat; M. Broszat, 200 Jahre deutsche Polenpolitik. Frankfurt <sup>2</sup>1972; O. Hauser, Polen u. Dänen im Deutschen Reich, in: Reichsgründung 1870/71. Stuttgart 1970, 291–313; D. P. Silverman, Reluctant Union. Alsace-Lorraine and Imperial Germany, 1871–1918. London 1972; H.-U. Wehler, Das Reichland Elsaß-Lothringen 1870–1918, in: ders., Krisenherde, 17–63.

(四) :Zur allgemeinen Problematik die Artikel in, Religion in ..





Geschichte u. Gegenwart“, bzw. im „Staatslexikon“. Hier vor allem: K. Hammer, Deutsche Kriegstheologie 1870–1918. München 1971; H. Missalla, „Gott mit uns“. Die deutsche katholische Kriegspredigt 1914–18. München 1968; W. Pressel, Die Kriegspredigt 1914–18 in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 Deutschlands. Göttingen 1967.

(五) 1. Zu diesem weithin unerforschten Bereich der Sozialgeschichte des Alltags: M. Horkheimer Hg., Studienüber Autorität u. Familie. Paris 1936; allg. U. Oevermann, Sprache u. soziale Herkunft. Frankfurt 1972.

2–4. E. N. Anderson, The Prussian Volksschule in the 19th Century, in: Fs. H. Rosenberg. Berlin 1970, 261–79; W. C. Langsam, Nationalism and History in the Prussian Elementary Schools, in: Fs. C. Hayes. N. Y. 1950, 241–60; H. Schallenger, Untersuchungen zum geschichtsbild der Wilhelminischen Ärau. der Weimarer Republik. Ratingen 1964; D. Hoffmann, Politische Bildung, 1890–1933. Hannover 1971; trotz starker Vorbehalte auch: K.–H. Günther u. a., Geschichte der Erziehung. Berlin 1966; H. König, Imperialistische u. militaristische Erziehung in den Hörsälen u. Schulstuben Deutschlands, 1870–1960. Berlin 1962. W. Lexis Hg., Das Unterrichtswesen im Deutschen Reich. 4 Bde, Berlin 1904; F. Paulsen, Geschichte des gelehrten Unterrichts. 2 Bde, Berlin 1919/21; F. Ringer,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1890–1933. Cambridge/Mass. 1969; ders., Higher Education in Germany in the 19<sup>th</sup> Century, ICH 2. 1967, 123–38; W. Zorn, Hochschule u. höhere Schule in der deutschen Sozialgeschichte der Neuzeit, in: Fs. M. Braubach. Münster 1964, 321–39; D. Fricke, Zur Militarisierung des deutschen Geisteslebens im wilhelminischen Kaiserreich, Der Fall L. Arons, ZfG 8. 1960, 1069–1107.–W. Z. Laqueur,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Köln 1962; H. Pross, Jugend, Eros, Politik. Bern 1964; W. Kindt Hg., Die Wandervogelzeit, 1896–1919. Düsseldorf 1968; J. Müller, Die Jugendbewegung als deutsche Haupttrichtung neukonservativer Reform. Zürich 1971.

5. Kritische Darstellungen des studentischen Verbindungswesens im Kaiserreich fehlen noch. Über den Reserveoffizier: E. Kehr, Zur Genesis des Kgl. Preuss. Reserveoffiziers, in: ders., Primat, 53–63.

(六) Auch hierzu vor allem ältere Studien: E. Kehr, Das soziale System



der Reaktion in Preußen unter dem Ministerium Puttkamer, in: ders., Primat, 64–86; E. Fraenkel, Zur Soziologie der Klassenjustiz. Berlin 1927 (Darmstadt <sup>2</sup>1968). Überblick: Fricke, Organisation, 272–75. – L. Cecil, The Creation of Nobles in Prussia 1871–1918, AHR 75. 1970, 757–95.

(七) Aus den Quellen: W. Vogel, Bismarcks Arbeiterversicherung. Braunschweig 1951; knapp auch: Wehler, Bismarck, 459–64. Die Phase nach 1890 muß ganz neu bearbeitet werden; zu staatsgläubig und unreflektiert: K. E. Born, Staat u. Sozialpolitik seit Bismarcks Sturz, 1890–1914. Wiesbaden 1957. Übersicht: F. Syrup u. O. Neuloh, 100 Jahre staatliche Sozialpolitik 1839–1939. Stuttgart 1957.

#### 四

(一) Noch immer W. Gerloff, Der Staatshaushalt u. das Finanzsystem Deutschlands 1820–1927, in: ders. Hg., Handbuch der Finanzwissenschaft. III, Tübingen 1929, 1–69; F. Terhall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öffentlichen Finanzwirtschaft 1800–1945, ebda, I, <sup>2</sup>1952, 274–326. Neuerdings Witt. Finanzpolitik.

(二)、(三) Grundlegend hierzu: W. G. Hoffmann u. a., Das deutsche Volkseinkommen, 1851–1955. Tübingen 1959; H. J. Müller u. S. Geisenberger, Die Einkommensstruktur in verschiedenen deutschen Ländern 1874–1913. Berlin 1972; W. Fischer u. P. Czada, Die soziale Verteilung von mobilem Vermögen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Spätmittelalter, in: 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Paris 1968, 253–304; H. Stuebel, Staat u. Banken im preußischen Anleihewesen 1871–1913. Berlin 1935; Spiethoff, II, T. 11 u. 12.

#### 五

(一) M. Messerschmidt, Die Armee in Staat u. Gesellschaft. Die Bismarckzeit, in: Das Kaiserliche Deutschland, 89–118; W. Deist, dass., 1890–1914, ebda, 312–39; G. A. Craig, die preußisch–deutsche Armee, 1640–1945. Düsseldorf 1960; Handbuch zur deutschen Militärgeschichte, 1648–1939, 3. Lief. Frankfurt 1968; K. Demeter, Das Deutsche Offizierskorps in Gesellschaft u. Staat, 1650–1945. Frankfurt <sup>4</sup>1965; M. Kitchen, The German Officercorps, 1890–1914. Oxford 1968; K. E. Jeismann, Das Problem des Präventivkriegs. Freiburg 1957; R. Höhn, Sozialismus u. Heer. 3 Bde, Berlin 1959/69; Kehr,



Primat, 87–197; G. Ritter, Staatskunst u. Kriegshandwerk. I u. II, München 1954/60 u.ö., adzu W. Sauer, PVS 6. 1965, 341–53; G. Ritter, Der Schlieffenplan. München 1956; Ostaufmarsch: Gasser and Groh: 8.1.

(二) J. Erickson u. H. Mommsen, Militarismus, Sowjetsystem u. Demokratische Gesellschaft 4. 1971, 528–68; K. Buchheim, Militarismus u. ziviler Geist. München 1964; V. Berghahn Hg., Militarismus, Köln 1975; zur Gnesis: O. Büsch, Militärsystem u.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ßen. Berlin 1962; anschaulich aus der Zeit: L. Quidde, Der Militarismus im heutigen deutschen Reich. Stuttgart 1893.

(三) Hier ist nach den bahnbrechenden Studien von Kehr (Schlachtflottenbau u. Parteipolitik 1894–1901. Berlin 1930, 1966; Primat, 111–48) die Flottenapologetik à la Hallmann und Hubatsch endgültig durch kritische Analysen verdrängt worden: V. Berghahn, Der Tirpitz-Plan. Düsseldorf 1971; ders., Flottenrüstung u. Machtgefüge, in: das Kaiserliche Deutschland, 378–96; ders., Zu den Zielen des deutschen Flottenbaus unter Wilhelm II., HZ 210. 1970, 34–100; H. Schottelius u. W. Deist Hg., Marine u. Marinepolitik im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871–1914. Düsseldorf 1972; J. Steinberg, Zesterday's Deterrent. Tirpitz and the Birth of the German Battle Fleet. London 1965; W. Marienfeld, Wissenschaft u. Schlachtflottenbau in Deutschland, 1897–1906. Berlin 1957. Vergleichende Arbeiten fehlen leider noch immer.

## 六

(一)、(二) Die Lit. ist verzeichnet in: H.–U. Wehler Hg., Imperialismus. Köln 1976, 443–75; ders., Bismarck u. der Imperialismus, 511–14, 520–66. Vg. Auch W. J. Mommsen Hg., Der moderne Imperialismus. Stuttgart 1971; Kehrs Arbeiten; Berghahn, Tirpitz-Plan.

(三) Zum Pangermanismus s. IV. 2. 2. u. K. Schilling, Beiträge zu einer Geschichte des radikalen Nationalismus, 1890–1909, phil. Diss. Köln 1968.–H.–U. Wehler, Sozialdarwinismus im expandierenden Industriestaat, in: Fs. F. Fischer, Düsseldorf 1974, 133–42, mit der Lit.

## 七

(一) Ausführliche Verweise in den Handbüchern, oben A. Hier vor allem A. Hillgruber, Entwicklung, Wandlung u. Zerstörung 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s, 1871–1945, in: 1871–Fragen an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Berlin 1971, 171–203; ders., Bismarcks Außenpolitik. Freiburg 1972; ders., Die ‚Krieg-in-Sicht‘-Krise 1875, in: Fs. M. Göhring. Wiesbaden 1968, 239–53; W. J. Mommsen, Die Latente Krise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09–14. Frankfurt 1972.

(二) Wehler, Krisenherde, 17–84; ders., Bismarck, 416; ders., Krisenherde, 163–80.

八

(一) Aus der anschwellenden Lit.: F. Fischer,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üsseldorf 1967; ders., Krieg der Illusion. Düsseldorf 1971; in dieser Frage klarer: L. Burschardt, Friedenswirtschaft u. Kriegsvorsorge. Deutschlands wirtschaftliche Rüstungsbestrebungen vor 1914. Boppard 1968. Zur Vorgeschichte: G. Schmidt, Innenpolitische Blockbildungen in Deutschland am Vorabend des 1. Weltkriegs, Aus Politik u. Zeitgeschichte B 20/72, 3–32; D. Groh, Innenpolitische Faktoren für die Präventivkriegsbereitschaft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13/14, PVS 13. 1972, 501–21; A. Gasser, Deutschlands Entschluß zum Präventivkrieg 1913/14, in: Fs. E. Bonjour. I, Basel 1968, 173–224; F. Stern, Bethmann Hollweg u. der Krieg. Tübingen 1968; J. Joll, 1914 – The Unspoken Assumptions. London 1968. Kritische Synthese: V. Berghahn,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the War in 1914. London 1973. Zur Diskussion u. Lit.: W. J. Mommsen, Die deutsche Kriegszielpolitik 1914–18, in: Kriegsausbruch 1914. München 1972, 60–100; W. Schieder Hg., Erster Weltkrieg. Köln 1969; I. Geiss Hg., Juli 1914: München 1965 (mit der erwähnten älteren Lit.) . Darstellungen: F. Klein u. a., Deutschland u. der 1. Weltkrieg. 3 Bde, Berlin 1968/70; P. Kielmansegg, Deutschland u. der 1. Weltkrieg. Frankfurt 1968; K. Jarausch, the Enigmatic Chancellor: Bethmann Hollweg. New Haven 1973. Fortab sowohl theoretisch als auch empirisch unentbehrlich: J. Kocka, Klassengesellschaft im Krieg.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 1914–1918. Göttingen 1973.–Allg. E. B. Hass u. A. S. Whiting,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 Y. 1956, 62–64; R. N. Rosecrance, Action and Re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Boston 1963, 304f.

(二) F. Lütge, Die deutsche Kriegsfinanzierung im 1. u. 2. Weltkrieg, in: Fs. R. Stucken. Göttingen 1953, 243–57; M. Lanter, Die Finanzierung des Krieges. Luzern 1950; R. Andxel, Imperialismus – Staatsfinanzen –



Rüstung-Krieg. Berlin 1968.—G. F. Feldman, Army, Industry and Labor in Germany 1914–18. Princeton 1966; die drei Bände von F. Klein u. a.; noch nichtüberholt: J. T. Shotwell, Wirtschafts- u. Sozialgeschichte des Weltkriegs. 11 Bde, Stuttgart 1927/32. —Inflationsbeginn: W. Fischer, Deutsche Wirtschaftspolitik 1918–45. Opladen <sup>3</sup>1968, 9–19.

(三) Hierzu die Arbeiten von F. Fischer u. die Lit. in: W. Schieder Hg. u. F. Klein u. a.; auch: M. L. Edwards, Stresemann and the Greater Germany, 1914–18. N. Y. 1963.—Ideen von 1914: Ringer, Decline; W. J. Mommsen, M. Weber u. die deutsche Politik, 1890–1920. Tübingen <sup>2</sup>1974, 206–304; K. Schwabe, Wissenschaft u. Kriegsmoral, 1914–18. Göttingen 1969; F. Klein, Die deutschen Historiker im 1. Weltkrieg, in: Streisand Hg., II, 227–48; H. Lebovics, Social Conservatism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Germany 1914–33. Princeton 1969, dazu E. Johann, Innenansicht eines Krieges, 1914–18. Frankfurt 1968 u. IV. 3. 4. Entwicklung auf der Linken: Schorske; J. W. Mischark, The Road to Revolution, German Marxism and World War I. Detroit 1967; G. G. Feldman u. a., Die Massenbewegungen der Arbeiterschaft in Deutschland am Ende des 1. Weltkriegs, 1917–20, PVS 13. 1972, 84–105; auf der Rechten: Fricke Hg., I, 620–28; Stegmann; M. Weber,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Tübingen <sup>3</sup>1971, 217–20.

(四)、(五) Vorzügliche Bibliographie in: E. Kolb Hg., Vom Kaiserreich zur Weimarer Republik. Köln 1972, 406–25; in diesem Band vor allem die Beiträge von Sauer, Hunt, Kolb, Rürup, Grebing. Außerdem: PVS, Sonderheft 2, 1970; R. Rürup, Probleme der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918/19. Wiesbaden 1968; E. Kolb, Die Arbeiterräte in der deutschen Innenpolitik, 1918/19. Düsseldorf 1962; P. v. Oertzen, Betriebsräte in der Novemberrevolution. Düsseldorf 1963; U. Kluge, Soldatenräte u. Revolution. Studien zur Militärpolitik in Deutschland 1918/19. Göttingen 1975; W. Elben, Das Problem der Kontinuität in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Düsseldorf 1965; K. L. Ay, Die Entstehung einer Revolution. Bayern 1918/19. Berlin 1968. Die wichtigen neuen Quelleneditionen sind bei Kolb Hg. verzeichnet.

#### 第四章

Zum Kontinuitätsproblem: A. Hillgruber, Kontinuität u. Kiskontinuität in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von Bismarck bis Hitler. Düsseldorf 1969 u. ö.; K. Hildbrand, Deutsche Außenpolitik 1933–1945. Stuttgart <sup>2</sup>1973; W. Alff, Thesen zum Kontinuitätsproblem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Das Argument 70. 1972, 117–24; A. Lüdtkke, Zur Kontinuitätsfrage, ebda, 105–16; Stern, Illiberalism, u. Wehler, Krisenherde.

## 1977 年再版时补充的文献目录

### 原始材料和文献索引

J.-P. Halstead u. S. Porcari, Modern European Imperialism: A Bibliography of Books and Articles. 2 Bde, Boston 1974; H.-U. Wehler, Bibliographie zum Imperialismus. Göttingen 1977; ders., Bibliographie zur modernen deutschen Sozialgeschichte, 18.–20. Jh. Göttingen 1976; ders., Bibliographie zur modernen deutsch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18.–20. Jh. Göttingen 1976; G. P. Meyer, Bibliographie zur modernen deutsch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18.–20. Jh. Göttingen 1977; H. Berding, Bibliographie zur Geschichtstheorie. Göttingen 1977.

### (三) 社会史

Geschichte u. Gesellschaft 1. 1975/H. 1, Hg. J. Kocka, Soziale Schichtung u. Mobilität in Deutschland im 19. u. 20. Jahrhundert; H. Kaelbl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Germany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0. 1976, 144–65.

### 有关历史写作的文献

G. G. Igger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Middletown 1975 (dt. 1978); H.-U. Wehler, Modernisierungstheorie u. Geschichte. Göttingen 1975.

### 新的资料手册和文集

G. A. Ritter Hg., Das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Göttingen <sup>2</sup>1975; ders., u. J. Kocka Hg.,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 1870–1914. München 1974; S. Pollard u. C. Holmes Hg., Documents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II: Industrial Power and National Rivalry, 1870–1914. London 1972.

## 各章相关参考文献

### 第一章

#### 二

R. Spree, Die Wachstumszykle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1840–1880. Berlin 1977; ders. U. J. Bergmann, Die konjunkturelle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1840–1964, in: Sozialgeschichte Heute. Fs. H. Rosenberg, Hg. H.–U. Wehler. Göttingen 1974, 289–325; R. Fremdling, Eisenbahnen u. deutsches Wirtschaftswachstum. 1840–1879. Dortmund 1975.

#### 三

M. Gugel, Industrieller Aufstieg u. bürgerliche Herrschaft. Sozio-ökonomische Interessen u. politische Ziele des liberalen Bürgertums z. Zt. des Verfassungskonflikts 1857–67. Köln 1975.

### 第二章

#### 一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Hg., Bevölkerung u. Wirtschaft 1872–1912. Stuttgart 1972; G. Hohorst u. a.,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0–1914. München 1975; W. Zorn Hg., Handbuch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s- u. Sozialgeschichte. II: 1800–1970. Stuttgart 1976; D. S. Landes, Der entfesselte Prometheus. Technologischer Wandel u. industrielle Entwicklung in Westeuropa von 1750 bis zur Gegenwart. Köln 1973; H. Mottek u. a.,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II: 1871–1945. Berlin 1974; W. O. Henderson, The Rise of German Industrial Power 1834–1914. London 1976; F.–W. Henning, Die Industrialisierung in Deutschland, 1800–1914. Paderborn 1973; ders., Das industrialisierte Deutschland, 1914–1972. Paderborn 1974; E. Barth, Entwicklungslinien der deutschen Maschinenbauindustrie 1870–1914. Berlin 1973; E. Klein,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andwirtschaft im Industriezeitalter. Wiesbaden 1973; W. Köllmann, Bevölkerung in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Göttingen 1974; P. Marschalck, Deutsche Überseewanderung im 19. Jh. Stuttgart 1973; H. Kaelble, Sozialer Aufstieg in Deutschland 1850–1914,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Sozial- u. Wirtschaftsgeschichte 60. 1973, 41-71.

二

K. W. Hardach,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 20. Jh.* Göttingen 1976; H. Daems u. H. v. d. Wee Hg., *The Rise of Managerial Capitalism.* Den Haag 1974; M. Geyer u. A. Lüdtke, *Krisenmanagement, Herrschaft u. Protest im organisierten Monopol-Kapitalismus (1890-1939)*,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Informationen* 4. 1975, 12-23.

### 第三章

一

(二) F. Stern, *Gold and Iron. Bismarck, Bleichröder,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 N. Y. 1977; H.-W. Wetzel, *Presseinnenpolitik im Bismarckreich 1874-1890.* Frankfurt 1975.

(三) E. T. Wilke, *Political Decadence in Imperial Germany. 1894-1897.* Urbana/Ill. 1976; R. Gellately,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Despair. Shopkeepers and German Politics 1890-1914.* London 1974; K. Saul, *Staat, Industrie u. Arbeiterbewegung im Kaiserreich. Zur Innen- u. Sozialpolitik des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1903-1914.* Düsseldorf 1974; B. Heckart, *From Bassermann to Bebel. The Grand Bloc's Quest for Reform in the Kaiserreich 1900-1914.* New Haven 1974; B. Vogel u. a., *Wahlen in Deutschland 1848-1970.* Berlin 1971; G. A. Ritter Hg., *Gesellschaft, Parlament u. Regierung.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in Deutschland.* Düsseldorf 1974; R. R. Tannenbaum, *1900: The Generation Before the Great War.* N. Y. 1977.

(四) L. Cecil, *The German Diplomatic Service, 1871-1914.* Princeton 1976; L. W. Muncy, *The Prussian Landräte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Monarchy, 1890-1918,*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6. 1973, 299-338.

二

(一) O. Büsch, *Parteien u. Wahlen in Deutschland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 in: *Abhandlungen aus der Pädagogischen Hochschule Berlin, I*, Berlin 1974, 178-264; T. Nipperdey, *Gesellschaft, Kultur, Theorie.* Göttingen 1976.

1. J.J. Sheehan, *Liberalism in an Unliberal Society. A History of Liberalism in 19th Century Germany.* Chicago 1978; D. S. White, *The Splintered*





Party: National Liberalism in Hesen and the Reich 1867-1918. Cambridge/Mass. 1976; K. Holl u. G. List Hg., Liberalismus u. imperialistischer Staat. Der Imperialismus als Problem liberaler Parteien 1890-1914. Göttingen 1975; J. C. Hunt, The People's Party in Württemberg and Southern Germany 1890-1914. Stuttgart 1975; S. Zucker, L. Bamberger, 1823-1899. Pittsburgh 1975; A. Milatz, Die linksliberalen Parteien u. Gruppen in den Reichstagswahlen 1871-1912,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12. 1972, 273-93.

2. R. J. Ross, Beleaguered Tower: The Dilemma of Political Catholicism in Wilhelminian Germany. Notre Dame 1976; J. K. Zeender, The German Center Party 1880-1906. Philadelphia 1976; D. Blackburn, The Political Alignment of the Centre Party in Wilhelmine Germany, Historical Journal 18. 1975, 821-50.

4. G. A. Ritter, Arbeiterbewegung, Parteien u. Parlamentarismus. Göttingen 1976.

(二) H.-J. Puhle, Politische Agrarbewegung in kapitalistischen Industriegesellschaften. Göttingen 1976; P. Ullmann, Der-Bund der Industriellen " 1895-1914. Göttingen 1976; G. A. Ritter u. K. Tenfelde, Der Durchbruch der Freien Gewerkschaften zur Massenbewegung im letzten Viertel des 19. Jh., in G. A. Ritter, Arbeiterbewegung u. Parlamentarismus. Göttingen 1976, 55-101; H. Kaelble u. H. Volkmann, Konjunktur u. Streik während des Übergangs zum Organisierten Kapitalismus in Deutschland,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 u. Sozialwissenschaften 92. 1972, 513-44.

(四) D. Stegmann, Wirtschaft u. Politik nach Bismarcks Sturz. Zur Genesis der Miquelschen Sammlungspolitik 1890-1897, in: Fs. F. Fischer. Düsseldorf 1974, 161-84.

### 三

(二) H. A. Winkler Hg., Nationalismus. Köln 1978; H. K. Rosenthal, German and Pole. National Conflict and Modern Myth. Gainesville 1975.

(三) U. Tal, Christians and Jews in Germany 1870-1914. Ithaca 1974; R. Rürup, Emanzipation u. Antisemitismus. Studien zur Judenfrag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Göttingen 1975; ders., Emanzipation u. Krise. Zur Geschichte der 'Judenfrage' " in Deutschland vor 1890, in: Juden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1890-1914. Tübingen 1976, 1-56; R. Lill, Zu



den Anfängen des Antisemitismus im Bismarck-Reich, Saeculum 26. 1975, 214-31; R. Gutteridge, The German Evangelical Church and the Jews 1879-1950. N. Y 1976; W. Mosse Hg., Die Juden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Tübingen 1976. R. S. Levy, The Downfall of the Anti-Semitic Political Parties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Haven 1975; W. T. Angress, Prussia's Army and the Jewish Reserve Officer Controversy Before World War one, in: J. J. Sheehan Hg., Imperial Germany. N. Y. 1975, 93-128.

(四) K. Hammer, Der deutsche Protestantismus u. der Erste Weltkrieg, Francia 2. 1975, 398-414; R. van Dülmen, Der deutsche Katholizismus u. der Erste Weltkrieg, ebd., 347-76.

(五)

1. Geschichte u. Gesellschaft 1. 1975/H. 2 u. 3, Hg. H.-U. Wehler, Historische Familienforschung u. Demographie; W. Conze Hg., Sozialgeschichte der Familie in der Neuzeit Europas. Stuttgart 1976; M. Mitterauer u. R. Sieder, Vom Patriarchat zur Partnerschaft. Zum Strukturwandel der Familie. München 1977; J. R. Gillis, Youth and History 1770 to the Present. N. Y. 1974.

2-4. K. H. Hartmann u. a. Hg., Schule u. Staat im 18. u. 19. Jh. Frankfurt 1974; F. Meyer, Schule der Untertanen. Preußen 1848-1900. Hamburg 1976; F. Pfetsch, Zur Entwicklung der Wissenschaftspolitik in Deutschland 1750-1914. Berlin 1974; L. Burchardt, Wissenschaftspolitik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Göttingen 1975; P. Borscheid, Entwicklung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u. 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n Revolution (Baden 1848-1913). Stuttgart 1976.

(七) A. Gladen,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politik bis zur Gegenwart. Wiesbaden 1974; F. Tennstedt, Sozialgeschichte der Sozialversicherung, in: Handbuch der Sozialmedizin, Hg. M. Blohmke u. a., III. Stuttgart 1976, 385-492.

四

(一) P.-C. Witt, Finanzpolitik u. sozialer Wandel. Wachstum u. Funktionswandel der Staatsausgaben in Deutschland, 1871-1933, in: Sozialgeschichte Heute. Fs. H. Rosenberg, Hg. H.-U. Wehler. Göttingen 1974, 565-74; ders., Reichsfinanzen u. Rüstungspolitik 1898-1914, in: Ma-



rine u. Marinepolitik im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871-1914, Hg. H. Schottelius u. W. Deist. Düsseldorf 1972, 146-77.

(二) A. Jeck, Wachstum u. Verteilung des Volkseinkommens in Deutschland 1870-1913. Tübingen 1970.

### 五

(一) Handbuch der deutschen Militärgeschichte, IV/1 u. 2: 1814-1890. München 1975/76; M. Kitchen, A Military History of Germany From the 18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Bloomington 1975; M. Messerschmidt, Militär u. Politik in der Bismarckzeit u.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Darmstadt 1975; M. Stürmer, Militärkonflikt u. Bismarckstaat. Zur Bedeutung der Reichsmilitärsgesetze 1874-1890, in: Gesellschaft, Parlament u. Regierung, Hg. G. A. Ritter. Düsseldorf 1974, 225-48; B.-F. Schulte, Die Deutsche Armee 1900-1914. Düsseldorf 1977; W. Deist, Armee u. Arbeiterschaft, 1905-1918, Francia 2. 1975, 458-81; H. Rumschöttel, Das bayerische Offizierkorps 1868-1914. Berlin 1973; H. Herwig, The German Naval Officer Corps. 1890-1918. Oxford 1973.

### 六

R. v. Albertini u. A. Wirz, Europäische Kolonialherrschaft 1880-1940. Zürich 1976; R. F. Betts, The False Dawn.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19th Century. Minneapolis 1976; P. Hampe, Die ökonomische Imperialismustheorie. München 1976; W. J. Mommsen, Imperialismustheorien. Göttingen 1977.





## 四、人名索引

### A

- 阿龙斯, 莱奥 Arons, Leo 109  
埃卡特 v. Eckardt, Julius 35,163,166  
埃尔茨贝格尔 Eryberger, Matthias 175  
艾伯特 Ebert, Friedrich 112,199,202,203, 204  
艾内姆 v. Einem, Carl 140  
爱因斯坦 Einstein, Albert 113  
安普西尔勋爵 Ampthill, Lord Odo Russel 46  
奥尔登堡 v. Oldenburg-Januschau, Elard 46

### B

- 巴尔特 Barth, Theodor 64  
巴塞曼 Bassermann, Ernst 72  
巴尔, 赫尔曼 Bahr, Hermann 94  
巴登, 马克斯·冯 v. Baden, Max 54 196, 197,199,205  
班贝格尔 Bamberger, Ludwig 9,34,49,50, 64,89,92,93  
鲍尔 Bauer, Max 31,184,191,213  
鲍尔 Bauer, Otto 31,184,191,213  
贝特曼·霍尔韦格 v. Bethmann Hollweg, Theobald 72,85,86,137,138,142,148~150, 175,178,179,187,191,202,215  
倍倍尔 Bebel, August 8,27,62,69,72,77  
本尼森森 v. Bennigsen, Rudolf 64,129  
比克 Bueck, Henry A. 74,75,175  
比洛夫 v. Bülow, Bernhard 34,36,53,84,85, 90,97,123,135,148,157,175

彼得大帝 Peter d. Gr., Zar 188

彼得斯 Peters, Carl 75,155

俾斯麦,赫伯特 v. Bismarck, Herbert 82, 167

俾斯麦, 奥托 v. Bismarck, Otto 5,13,14, 15,16,17,18,19,21,25,28,34,35,38,41~56, 62,64,67,69,74,77~81,83~85,89,90,93~ 96,100,101,112,115~118,121~123,125, 128~129,131,132,134,135,139,145,149, 154,155,157,161~164,166,168~170,174, 178,179,209,212,217,219

波尔锡西 v. Borsig, Ernst 7,193

波萨多夫斯基 v. Posadowsky, Arthur 118

伯恩斯坦 Bernstein, Eduar 201

博德尔施文格 v. Bodelschwingh, Friedrich 99

博塞 v. Bosse, Julius R. 46,109

博伊恩 v. Boyen, Hermann 12

博伊梅尔堡 Beumelburg, Werner 182

布施, 莫里茨 Busch, Moritz 93

布尔克哈特 Burckhardt, Jacob 17,179,212

布拉赫尔·卡尔-迪特里希 Bracher, Karl Dietrich 4 (前言)

布莱希罗德 v. Bleichröder, Gerson 92,93

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 保罗 Bronsart v.Schellendorf, Paul 131

布鲁克 v. Bruck, Karl, L. 10

布吕宁 Brüning, Heinrich 207

布伦塔诺 Brentano, Lujo 35

### C

措贝尔莱因 Zöberlein, Ernst 182



## D

- 达尔文 Darwin, Charles 152,159,160,189  
 德尔布吕克 Delbrück, Hans 52,117,118  
 德尔布吕克 v. Delbrück, Clemens 118  
 德莱克斯勒, 安东尼 Drexler, Anton 194  
 迪斯特韦格 Diesterweg, Moritz 113  
 蒂德曼 v. Tiedemann Christoph 75  
 蒂尔皮茨 v. Tirpitz, Alfred 54,75,84,144-151,156,168,174,192  
 东克尔 Duncker, Franz 77  
 杜伊斯贝格·卡尔 Duisberg, Carl 193

## E

- 恩格斯 Engels, Friedrich 24,48,159,179,187

## F

- 法尔肯海因 v. Falkenhayn, Erich 143  
 法伊 Fay, Sidney 171  
 菲尔绍 Virchow, Rudolf 13,109  
 费尔德曼 Feldman, Gerald D. 185  
 费舍尔, 弗里茨 Fischer, Fritz 171,174,187  
 弗里德贝格, 海因里希·冯 v. Friedberg, Heinrich 37,78  
 弗赖塔格, 古斯塔夫 Freytag, Gustav 20  
 弗兰克, 恩斯特 Francke, Ernst 156  
 弗赖尔 Freyer, Hans 190  
 弗兰肯贝格 v. Frankenberg, Fred 115  
 弗朗茨·费迪南 Franz Ferdinand, Erzherzog 174  
 弗里德里希三世 Friedrich III., Kaiser  
 弗里登塔尔 Friedenthal, Karl R. 93  
 弗洛伊德 Freud, Sigmund

## G

- 戈尔德沙伊德, 鲁道夫 Goldscheid, Rudolf 120

- 戈培尔 Goebbels, Josef 193  
 戈斯勒 v. Gossler, Heinrich 139  
 格拉赫, 路德维希·冯 v. Gerlach, Ludwig 47  
 格拉斯顿 Gladstone, William E. 168  
 格勒纳 Groener, Wilhelm 184~186,195,202~204  
 格洛夫 Gerloff, Wilhelm 123  
 格申克龙, 亚历山大 Gerschenkron, Alexander 2,6,9  
 格维努斯 gervinus, Georg G. 20

## H

- 海德布兰德 v. Heydebrand u. der Lasa, Ernst 178  
 海特 v. Heydt, Karl 76,161  
 汉克, 威廉·冯 v. Hahncke, Wilhelm 131  
 汉马赫尔 Hammacher, Friedrich 9  
 汉泽曼 Hansemann, Adolph 75  
 荷尔施泰因 v. Holstein, Friedrich 96  
 赫特林 Hertling, Georg 53,54,196  
 黑尔费里希 Helfferich, Carl 180,184  
 黑格尔 Hegel, Georg W. F. 87,88,104,159  
 黑林根 Heeringen, Josias 141  
 黑斯林, 迪德里希 Heöling, Diedrich 111  
 胡根贝格 Hugenberg, Alfred 75,193  
 华莱士 Wallace, Alfred R. 160  
 霍布斯 Hobbes, Thomas 43,159,163  
 霍恩洛厄-朗根堡 v. Hohenlohe-Langen burg, Hermann 115,154  
 霍恩洛厄-席林斯菲尔斯特 v.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 Chlodwig 53,56,97  
 霍伊斯, 特奥多尔 Heuss, Theodor 148



J

基尔多夫 Kirdorf, Emil 193

K

卡多夫 v. Kardorff, Wilhelm 115  
 卡梅克 v. Kameke, Georg 131  
 卡尼茨 v. Kanitz, Hans W. A. 36  
 卡普 Kapp, Friedrich 46  
 卡普 Kapp, Wolfgang 192  
 卡普里维 Caprivi, Leo 25,27,35,53,64,83,  
 155,163  
 卡森 Kasson, John A. 46  
 凯姆 Keim, August 75  
 康邦 Cambon, Jules 178  
 考茨基 Kautsky, Karl 31,71,201,203  
 考塞尔, 德 de Courcel, Alphonse 46  
 科泽勒克 Koselleck, Reinhart  
 克拉斯 Class, Heinrich 75,195  
 克劳塞维茨 Clausewitz, Carl 18,19,132,135  
 克劳斯 Kraus, Karl 190  
 克勒尔 v. Köller, Matthias 96  
 克虏伯 Krupp, Friedrich 59  
 克伦斯基 Kerenski, Alexander F. 202  
 克罗塞, 贝内德托 Croce, Benedeto 115  
 克尔 Kehr, Eckart 35,163  
 克特 Koeth, Josef 181  
 克特勒 v. Ketteler, Wilhelm E. 79  
 肯内曼 v. Kennemann, Hermann 75

L

拉蒂博尔 v. Ratibor, herzog 178  
 拉多维茨 v. Radowitz, Joseph M. 82  
 拉加德, 保罗·德 de Lagarde, Paul 108  
 拉萨尔 Lassalle, Ferdinand 8,14,15,45,69,77  
 拉斯克 Lasker, Eduard 93  
 拉特瑙 Rathenau, Walther 86,91,141,181

兰克 v. Ranke, Leopold 164  
 兰普雷希特 Lamprecht, Karl 76  
 列金, 卡尔 Legien, Carl 77, 203  
 列宁 Lenin, W. I. 201,203  
 劳默尔 v. Raumer, Karl O. 105  
 勒努万 Renouvin, Pierre 171  
 洛曼, 特奥多尔 Lohmann, Theodor 115,  
 118  
 雷茨勒, 库尔特 Riezler, Kurt 194  
 雷姆 Rehm, Hermann 157  
 雷希贝格 v. Rechberg, Johann B.  
 里希特, 欧根 Richter, Eugen 15,64,79,  
 129,130  
 里德 Ridder, Helmut 127  
 里克特 Rickert, Heinrich 64  
 里特尔 Ritter, Gerhard 136,137  
 李卜克内西, 卡尔 Liebknecht, Karl 8,62,  
 68,77,129,142,191  
 李卜克内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66  
 利特 Litt, Theodor 103  
 卢茨 Ludz, Peter Christian 154  
 卢修斯 Lucius v. Ballhausen, Robert 128  
 鲁登道夫 Ludendorff, Erich 141,184,188,  
 189,191~197  
 路德 Luther, Martin 87,92,102,113  
 吕特格 Lütge, Friedrich 180  
 卢森堡, 罗莎 191  
 罗特费尔斯, 汉斯 Rothfels, Hans 51  
 罗根巴赫 Roggenbach, Franz 88  
 罗森贝格, 阿图尔 Rosenberg, Arthur 197,  
 200,201  
 罗德贝图斯 Rodbertus, Carl 114  
 罗恩 v. Roon, Albrecht 12,13,128,138,139  
 罗豪 v. Rochau, Ludwig A. 212  
 罗森贝格, 汉斯 Rosenberg, Hans 4 (前



言) ,3,154,219  
 罗森施托克-许赛, 欧根 Rosenstock-  
 Huessy, Eugen 3 (前言)  
 罗希林 Röchling, Louis 193  
 赖兴费尔德, 胡果·冯 v. Lerchenfeld,  
 Hugo 178  
 朗本, 尤利乌斯 Langbehn, Julius 108

**M**

马尔萨斯 Malthus, Thomas R. 159, 160  
 马汉 Mahan, Alfred T. 146  
 马克思, 卡尔 Max, Carl 8, 11, 20, 25, 31,  
 44, 46, 49, 70, 71, 80, 99, 127, 159, 164,  
 165, 166, 201, 210  
 马克思·韦伯 Weber, Max 31, 34, 35, 43, 53,  
 57, 59, 105, 113, 157, 175, 213  
 马林克罗特 Mallinckrodt, Hermann 129  
 马沙尔 Marshall, T. H. 62  
 曼, 托马斯 Mann, Thomas 107  
 曼, 海因里希 Mann, Heinrich 76, 111  
 曼海姆 Mannheim, Karl 60  
 毛奇 v. Moltke, Helmuth 15, 18, 131~135,  
 139, 162, 166, 192  
 迈尔 Mayer, Gustav 72, 202  
 迈内克 Meinecke, Friedrich 46, 97, 174, 193,  
 194, 213  
 梅林 Mehring, Franz 96  
 梅菲森 Mevissen, Gustav 46  
 梅塞尔施密特 Messerschmidt, Manfred 13  
 梅特涅 v. Metternich, Clemens W. 10, 20,  
 54  
 门罗 Monroe, James 174  
 米德 Meade, Robert 93  
 米克威尔 Miquel, Johannes 9, 64, 83, 84, 115,  
 121, 122, 149, 155  
 米夏埃尔 Michaelis, Georg 194

莫姆森 Mommsen, Theodor 51, 64, 94, 109,  
 113

## N

拿破仑三世 Napoleon III., Louis Bonaparte  
 17, 46, 116, 131  
 尼采 Nietzsche, Friedrich 159  
 诺斯克 Noske, Gerhard 139  
 瑙曼 Naumann, Friedrich 34, 64, 85, 148,  
 156, 174,

## P

普勒斯纳 Plessner, Helmuth 159  
 普特卡默 v. Puttkamer, Robert 50, 56, 59,  
 69, 77, 93, 112

## Q

齐库尔施 Ziekursch, Johannes

## R

容格尔 Jünger, Ernst 182, 190

## S

沙恩霍斯特 v. Scharnhorst, Gerhard 12  
 沙伊德曼 Scheidemann, Philipp 199  
 圣·瓦列尔 St. Vallier, M. 46  
 施蒂尔 Stiehl, Anton W. F. 105  
 施利芬 v. Schlieffen, Alfred 131~135, 140,  
 141, 150, 166, 177  
 施密特 Smith, Adam 13  
 施莫勒 v. Schmoller, Gustav 19, 36, 70, 82,  
 109, 115, 118, 213  
 施塔尔 Stahl, Friedrich J. 63  
 施泰因 v. Stein, Lorenz 19, 96  
 施陶芬贝格 v. Stauffenberg, Franz 64  
 施特格曼 Stegmann, Dirk 83



施特克尔 Stöcker, Adolf 68,91  
 施特雷泽曼 Stresemann, Gustav 73,194  
 施特林泽 v. Struensee, Karl G. 19  
 施廷纳斯, 胡果 Stinnes, Hugo 193,203  
 施图姆 v. Stumm, Carl F. 115  
 施托尔贝格 v. Stohlberg, Udo 115  
 施瓦岑贝格 v. Schwarzenberg, Felix 10  
 施魏尼茨 v. Schweinitz, Lothar 46,139,  
 168  
 舒尔策-格沃尼茨 Schulze-Gävernitz,  
 Ger-hard 31  
 斯宾格勒 Spengler, Oswald 159

T

特赖奇克 v. Treitschke, Heinrich 61,92  
 特罗尔奇 Troeltsch, Ernst 200,202,  
 205  
 托克维尔 de Tocqueville, Alexis 99  
 托洛茨基 Trotzki, Leo 203

W

瓦德西 v. Waldersee, Alfred 132,138,139,  
 157  
 瓦格纳, 阿道夫 Wagner, Adolph 125  
 瓦格纳, 赫尔曼 Wagener, Hermann 11,  
 115  
 沃尔夫 Wolff, Theodor 199  
 威尔逊 Wilson, Woodrow 194,198

威廉二世皇帝 Wilhelm II., Kaiser 51  
 威廉一世皇帝 Wilhelm I., Kaiser  
 韦格勒 v. Wegerer, Alfred 171  
 维布伦, 索尔斯坦 Veblen, Thorstein 1  
 维多利亚王妃 Viktoria, Kronprinzessin 168  
 维勒斯, 亚历山大·冯 v. Villers, Alexan-  
 der 20  
 翁肯 Oncken, Hermann 14  
 翁鲁 v. Unruh, Hans V. 9  
 温特霍斯特 Windthorst, Ludwig 100

X

希尔弗丁 Hilferding, Rudolf 31  
 希尔施 Hirsch, Max 77  
 希特勒 Hitler, Adolf 51,189,194,207,219  
 西门子 v. Siemens, Werner 193  
 西贝尔 v. Sybel, Heinrich 78 欣策 Hintze,  
 Otto 57,84,113,196  
 欣策, 冯 v. Hintze, Paul 195  
 席德尔 Schieder, Theodor 97  
 肖尔茨 v. Scholz, Adolf H. W. 137  
 兴登堡 v. Hindenburg, Paul 184,185,191,  
 196,219  
 熊彼得 Schumpeter, Joseph, A. 31,120

Y

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Zar 169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德意志帝国

作者=(德)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著

页数=266

出版社=西宁市：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03

SS号=12238213

DX号=000006696692

URL=<http://book.szdnet.org.cn/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696692&d=76CF5F07AB9C45C4FD0C07C502CF036E>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1871年的形势：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国家的建立

- 一、农业革命与乡村贵族领导阶层
- 二、工业革命和城市资产阶级
- 三、国内政治：反动、自由主义和宪法冲突
- 四、争霸战争与“上层革命”

第二章 向工业国家迈进

- 一、1873~1895年，高度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工业增长的紊乱和结构性农业危机
- 二、1895~1914年，工业的高度繁荣和受补贴的农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干预型国家的崛起

第三章 统治体制和政治

一、政治体制

- (一) 立宪君主制或假立宪的半专制主义？
- (二) 到1890年为止的波拿巴式独裁统治
- (三) 1890年之后的持续性国家危机：没有协调的独裁性多头统治
- (四) 官僚制度：统治要素和组织类型

二、中心问题：捍卫现状反对政治动员

- (一) 软弱无力的政党
  - 自由党
  - 中央党
  - 保守党
  - 社会民主党
- (二) 利益协会进入国家政治生活：反民主的多元主义及其反对者
- (三) “否定性整合”的统治伎俩：“帝国的敌人”反对“帝国的朋友”
- (四) “国家维护者和生产者阶层结成卡特尔”的集结政策（1876~1918年）

三、整合谋略和对民主的结构性敌视

- (一) 国家思想和特别立法
- (二) 民族主义和敌人的固定化
- (三) 反犹主义和对少数派的政策
- (四) 宗教作为一种合法性意识形态
  - 新教国家教会：王位与圣坛
  - 罗马天主教：等级思想及其独占诉求
- (五) 独裁性社会的母体：社会化过程及其控制
  - 家庭
  - 公立学校
  - 文科中学
  - 大学

大学生联合会和预备军官制度

- (六) 冲突处理
  - 阶级特性的司法
  - 臣仆精神
  - 无冲突社会的理想
- (七) 以确保忠诚为目的的补偿性支付
  - 社会保险取代社会改革
  - 补偿性的追求威望的政策

四、税收和财政政策

- (一) 统治制度的资金筹措
- (二) 国民收入的分配
- (三) 分配不均的强化

五、军备政策

- (一) 军队
- (二) 军国主义
  - 军队是对内进行斗争的工具
  - 社会构成和行为控制
  - “小资产阶级的军国主义思想动员”
- (三) 海军

六、帝国主义

- (一) 不均衡的增长和政治统治的合法化：社会帝国主义
- (二) 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是国内政策
- (三)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泛日耳曼主义的帝国主义思想

七、对外政策

- (一) 国际体系中的德国对外政策
- (二) “国内政策优先”之下的对外政策

法国

英国

俄国

#### 八、第一次世界大战：向前逃跑

- (一) 攻击性的防御政策
- (二) 战争经费筹集和战争经济
- (三) 战争目标和阶级社会
- (四) 最后一次“上层革命”
- (五) 德国革命：社会民主还是保守性的共和？

#### 第四章 结语

##### 附录

- 一、缩写
- 二、注释
- 三、文献目录
- 四、人名索引